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出版社

ISBN 978-7-80758-786-6



9 787807 587866 >

定价：40.00元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杭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杭州道教 / 孔令宏, 韩松涛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80758-786-6

I. ①民… II. ①孔… ②韩… III. ①道教史—杭州市—民国 IV. ①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6245号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蓓

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786-6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忠焕

副主任 赵光育 熊恩生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新德 陈江明 张学继 项文惠 夏卫东

倪素浓 陶水木

主 编 孙忠焕

副主编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总 序

民国时期是我国纷繁错综之秋，杭州和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发展、抗战、内战和解放的历程，在历史风云的挫折蹒跚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民国杭州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城市，涌现出了众多知名人物，也发生了不少举国瞩目的大事。

1911年杭州光复，结束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随后不久杭州又成为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相继建立了政权。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杭州顺应民主和时代的潮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身近代民族工业的热情，在杭州以丝织业为主的轻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并开辟了城站新商业区和湖滨新市场，形成了都市新的商业格局。受革命思想的激励，杭城出现不少近代报刊，为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发挥了作用；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各式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浙江图书馆的创办更是杭州乃至全省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些变化与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杭州在全省的地位、在全国的影响。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光复后杭州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以及剩余旗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道路建设。这项计划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加速了杭州城市空间变化。屏障拆除之后，西湖便融入城市之中。这样，西湖从郊外

景色转变为城市景区，用当时杭州居民自己的话来形容：“西湖搬进了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浙江省政府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组建市政府，奠定了杭州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杭州建市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1929年，浙江省政府为了“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即在杭州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促进了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本次活动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被誉为中国会展业的开端。以西博会为契机，杭州开始了近代城市建设，城市外围交通路网相继建成，市政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公共汽车、自来水厂和电厂等城市公用设施应运而生，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这一时期，杭州是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品的中转地。伴随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杭州商贸日益繁荣，金融业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出现了戏院、电影院、体育场等近代文体场馆。旅游业快速发展，国内游客每年达百万以上；除政界要人、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频繁来杭外，也不乏来自外国的游客。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杭州进入八年沦陷时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就此中断。在日伪的统治下，杭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工商业受到重创，大批学校迁避他乡，文化教育设施和名胜古迹被大量破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杭州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杭州的工商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重大的发展机遇转瞬即逝。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惊人的战争费用，导致政府滥发钞票，引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金融崩溃。杭州的近代化进程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城。杭州的解放，使杭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民国杭州这段历史，尽管近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但成果还是显著的：杭城逐渐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日趋完善，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更是迈进了近代社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民国时期的执政者不愿也不敢去触碰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那时的发展是畸形的，广大的农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进行的。杭州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解读城市的历史，除了溯源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外，应将城市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综合对比研究，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历年来，杭州市政协非常重视对民国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除征集、出版大量民国“三亲”史料之外，1997年6月由第四届杭州市政协主席周峰主编的《民国时期杭州》正式出版，填补了民国杭州史研究的许多空白。2009年11月，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同民国浙江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省内外80多位专家学者对近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杭州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2010年9月，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市社科规划办合作，推出了“民国杭州研究”重点专项研究招标课题。经过专家评审，有20个项目获得正式立项。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即是“民国杭州研究”专项课题的成果展示。总的来说，这套丛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丛书涵盖了民国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二是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个特点在这套丛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和当代意识。丛书各作者期望通过对民国杭州历史的研究来为当下杭州发展的实践服务。

在这套研究丛书推进的过程中，杭州文史研究会始终坚持严格要求、高标准的宗旨，从具体每一部书的研究思路到写作提纲再到成稿，都组织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严格评审，各位作者根据评审意见数易其稿，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为了力求达到一个总的目标：要使这套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专著在学术上能够经得起检验，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民国杭州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有待于各界人士的评论指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的推出，必将对以后的民国杭州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今日杭州是历史杭州的传承和发展。民国时期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纵深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而且其所揭示的历史轨迹能够为当前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也可为杭州的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孙忠焕

2011年7月于杭州

目 录

总 序·····	孙忠焕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民国杭州道教的背景·····	004
第一节 先秦至北宋杭州道教概述·····	004
第二节 南宋至清杭州道教概述·····	015
第三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社会历史背景·····	031
第二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宫观·····	047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宫观概述·····	047
第二节 玉皇山福星观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069
第三节 余杭洞霄宫的历史·····	091
第三章 民国时期归属于道教的民间信仰及活动·····	100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老东岳庙·····	10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公庙·····	122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组织·····	135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及其经济状况·····	135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传戒活动·····	138
第三节	杭州市道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153
第五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高道·····	179
第一节	李理山的事迹及其对道教的贡献·····	179
第二节	其他高道和道教学者在杭州的活动·····	194
第六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影响及意义·····	199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对民俗的影响·····	199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意义·····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1
附 录 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		225

绪 论

道教有1800多年的历史，但道教的研究历史却只有150多年。道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本土宗教，但最早开始对道教进行学术研究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学者。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持续不断，成果颇多，使得巴黎作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地位持续了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由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受政府的鼓励和中国热的影响，日本学者纷纷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使得日本一度成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有个别学者从事道教研究，零星地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总体来看，量比较小，研究的领域有限。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才开始大量从事道教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断言，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终于回归到道教产生的故土了。

严格意义上的道教虽然产生于东汉时期，但它的渊源则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巫术和原始宗教，并直接继承了春秋时期产生的道家哲学和稍后战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方术，经过西汉时期长时间的酝酿，到东汉正式形成，从那以后持续发展到今天。这样悠久的历史，决定了道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道教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根本信仰。这样的宗旨决定了它有一系列非常独到的特点，例如，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道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像儒家高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所以被儒生垄断的正史颇为轻视它，对它的记载不多，道士主要生

活在社会的中下层，知识文化水平总体来看不是很高，加之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对自己历史的记载和研究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有差距，存在着颇多缺憾。但是，道教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养生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事实上又把俗文化与雅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其社会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这几方面决定了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困难性。

道教具有复杂性，对它的研究颇为困难，道教研究的历史还很短，道教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却大有前途的年轻领域。既有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宏观的历史研究，虽然梳理出了道教发展的脉络，但颇为粗疏。这就要求我们把研究方式具体化：一是作断代的、分阶段的具体研究。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已经出现，但主要集中于清代以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成果很少。二是作专题研究，如宗派、人物、道教文化各领域的专题研究、道教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等。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关于道教术数、道教科仪、道教政治思想、道教法律思想、道教在国外的传播等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三是作地域性的道教史研究。这方面先有《西北道教史》^[1]出版，范围比较大，继而有《江西道教史》^[2]等的出版，对一个省的道教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作地域史研究，它的史料范围，就不再仅仅满足于《道藏》和《藏外道书》这两部大型文献。事实上对地域道教史的研究，这两部文献是根本不够用的。我们不得不把地方志、档案、文人笔记小说、报纸杂志、乡邦文献、碑刻、宗谱、宫观（寺庙）山志等都包括进来，而且，还要进行田野调查，走访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文史馆、政协文史委员会、民族宗教局（委员会）、主要的道教宫观寺庙等，对有文字资料的碑刻进行拓片，对道士和道教的知情者进行口述史的采访。这样的研究，当然会很辛苦，工作量也会大很多，在当前盛行量化考核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很聪明讨巧的方法，显得颇为迂腐笨拙。但是，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到很多前人没有找到的新材料，翔实而清楚地描述道教在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存状态，只要以严谨的学术方法进行，所产生的成果就会很有价值，不

[1] 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孔令宏、韩松涛：《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仅能够充实道教研究，而且可以丰富该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加深对该地域道教的认识，有助于政府对宗教管理和文化发展作出科学决策，增强该地域的文化软实力。

地域道教史的研究还可以缩小，并把断代史研究结合进来。本书就是把地域范围缩小到一个城市，并把时间缩短到民国时期的近40年时间里。由于道教与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不匹配，加之民国时期战争和社会动荡，新中国建立后政局变化，道教在近代急剧衰落，道教的文献资料留存下来的很少，民国时期活到现在的道士已年过古稀且硕果凋零。所以，本项研究最困难的就是搜集材料。我们已经为此尽了最大努力。所以，本书虽然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平心静气地以学术良知而论，我们问心无愧。今后如果新发现有价值的资料，我们将会对本书进行修订。

本课题的研究，缘于2007年至2010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地区与宗教社会研究所高万桑（Vincent Gossaert）研究员发起的“道士与道庙：1900—2000”国际科研合作课题。该课题选择广州、杭州、武汉三个城市作为典型进行研究，我是杭州子课题的负责人。课题已于2010年结项。2010年，我申报了杭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代杭州道教史”并获得批准，同年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撰写“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丛书”，我申报了“民国杭州道教研究”选题并获得批准。2011年，我以“浙江近现代道教研究”为题申报浙江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而获得立项。本书也是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2012年重点课题“近现代浙江道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所以，本书是上述四项课题的结项成果和进一步的延伸研究成果。本书由我拟订写作提纲，分工合作完成。浙江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韩松涛写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一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方玲女士写第三章第一节，其余章节我写。初稿完成后我作了全书统稿。我的博士生解少君协助制作了1900年杭州道教宫观寺庙的表格，研究生周珊珊协助作了附录的文字录入工作，谨致谢忱。

孔令宏

2012年7月于杭州

第一章 民国杭州道教的背景

杭州道教的历史是悠久而持续的，没有中断过。对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研究，应该联系着此前的历史来进行，这样对其来龙去脉才会有清晰的认识。为此，在展开民国杭州道教研究之前，我们先来简略地陈述民国以前杭州道教的历史。

第一节 先秦至北宋杭州道教概述

杭州道教历史悠久。早在道教形成之前，杭州就已有不少神仙传说。赤松子，传说为神农时的雨师。今富阳赤松子山，传说为赤松子驾鹤休息之处。《咸淳临安志》卷二七《山川》载：“赤松子山，在（富阳）县东九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围四十里一百步，赤松子驾鹤时憩此，因得名。”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八《仙释》也有类似的记载：

“富阳赤松子山，相传赤松子驾鹤往来时憩于此。”桐君，传说为黄帝时的医师，因采药来到桐庐县东山，居于桐树下。有人问其姓氏，他指一指桐树，人们就称他为桐君。^[1]现有桐君塔、桐君庙、凤凰亭、桐君潭等遗迹。许由，据传是帝尧时代的名士，尧欲让位于他，许由不受而逃至箕山隐居。箕山有多处，河南登封、山西和顺、河南范县都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杭州昌化也有箕山，《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山川》载：昌化县（今杭州临安市昌化镇）箕山是许由隐居之地。董双成，据

[1] [宋]祝穆：《舆地纪胜》卷八。

《汉武帝内传》，为西王母的侍女，其故宅，据苏轼说，为富阳妙庭观。^[1]彭祖，据《列仙传》卷上《彭祖传》载，是商朝大夫，活了八百多岁。他曾隐居于杭州临安县，八百山、八百里、百岗岭等的得名均与他隐居该县有关。东汉时期，传说仙人王远（字方平）和他的神仙妹妹麻姑到他的徒弟蔡经位于杭州仙姥墩的故宅，以千钱向余杭姥沽酒喝，离开时给余杭姥药粒数丸，余杭姥服后成仙。仙姥墩在杭州府治西五里，杭州《净慈寺志》说在旧长桥东，万历《钱塘县志》外纪说在柳浪闻莺，此外，余杭西五里也有阿老墩。这是千古传唱的仙话。上述仙话传说，充分说明，在巴蜀地区之外，道教的酝酿和起源还有另一个地区，即东部滨海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在内。浙江杭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杭州道教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杭州道教，主要是部分著名道士到杭州修炼传道，其中余杭天柱山是这一时期杭州道教的重镇。

道教初创时期，五斗米道创造人张陵，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六《山川》载，出生于杭州天目山，即临安於潜镇。该镇现有张公舍、生仙山等遗迹。此说晚出，虽然其真实性存疑，但正如《江西道教史》所述，张陵的子孙有不同世系，其中一些世系即传衍于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区。^[2]这一说法，至少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道教创立后，汉晋时期，左慈、葛玄、郭文（字文举）、许迈等著名道士都到过余杭天柱山修道、传道。左慈是汉魏著名术士，曾到过杭州於潜县的天柱山。葛玄是三国时期著名道士，曾到过东阳、绍兴、定海、余杭等广大浙江地区。郭文在浙江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存有较多以其命名的遗迹。宋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四、二五《山川》提及：“余杭山，一名由拳山……《晋书·仙逸传》载，郭文举隐于余杭山，常著鹿裘葛巾……亦名郭公山，今岩室中炼药石灶犹存。”又有

[1] 《苏轼诗集》第2册卷九《富阳妙庭观发地得丹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5、436页。

[2] 孔令宏、韩松涛：《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70页。

“郭山”，也当与郭文有关。另据宣统《临安县志》载，郭文墓在郭公山。元代邓牧《洞霄图志》卷五《人物门》中有“灵曜郭真君”篇说：

“梁乾化三年七月，封灵曜真君，今临安冲虚宫，武康郭林，余杭天真仙洞亦各有遗迹。”^[1]许迈是晋代名道，在杭州民间影响很大，遗迹不少，如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附近的於潜县有“许迈宫”，“在西尖下，乃修真之邃宇也，余址尚存。居民至今呼为道士迈”。^[2]

葛洪堪称早期道教学术的集大成者，在道教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葛洪的从祖葛玄也是三国时期著名道士和道教领袖，后世道教追认他为灵宝派祖师。杭州地方志中多处记载有葛洪的遗迹，有些地方对葛玄与葛洪没有很好地加以区分，有些地方仅称葛仙翁，现将两人的相关遗迹合录如下。《晋书》本传称葛洪曾经于余杭山见过郭文举、何幼道，说明葛洪曾经在杭州停留过是无可置疑的。现存最早记载葛洪遗迹的地方志为南宋《淳祐临安志》，曰：“案乐史《寰宇记》云：杭州灵隐山旧名稽留山，许由、葛洪所隐。”^[3]稍后的南宋《咸淳临安志》、明万历《杭州府志》、明《西湖游览志》等记载更多。综合来看葛洪在杭州的遗迹主要分布在灵隐天竺、龙井、葛岭三地。

天竺山附近的遗迹，《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山水》之《城西诸山》记曰：

稽留峰 《太平寰宇记》云：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志反，故号稽留。

岩石室、龙泓洞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元献公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

炼丹井、烹茗井 晏元献公《舆地志》：天竺山下有葛仙翁炼丹井，今在下天竺寺藏院。又云：灵隐山有白少傅烹茗井。

[1] 邓牧：《洞霄图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五九号·浙江省》，据元至大年间旧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2]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六《山川五·於潜县》，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3] [宋]施谔撰：《淳祐临安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一四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葛坞、朱墅 晏元献公《舆地志》：葛坞，在灵隐山，
吴方士葛孝先所居也。陆羽《寺记》云：晋葛洪亦曾居此。朱
墅者，梁隐士盐官朱世卿之别墅。

丹灶堂 陆羽《记》云葛洪炼丹之所（已废，姑仍从旧
志）。^[1]

上述记载中所提及的陆羽为中唐人，故葛洪与灵隐稽留峰等处的关系的确立可上溯至中唐。上文称陆羽撰写的《记》《寺记》，或如卷二十三引称的《二寺记》，全称为《灵隐天竺二寺记》。《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初。“晏元献公《舆地志》”，晏元献公即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为宋仁宗时人。这说明上述所引内容是从中唐至北宋时期的文献中辑录出来的。如这里所记，稽留峰曾为葛洪的居住地，灵隐寺中的丹灶堂为葛洪的炼丹之所。

关于葛坞，《咸淳临安志》录有北宋郭祥正诗：“二葛既成仙，犹存炼丹处。有时化鹤来，徘徊不知去。”^[2]据万历《杭州府志》，“二葛”并不是指葛玄、葛洪：“葛坞、葛井：稚川遗迹也，相传吴赤乌二年葛稚川得道于此，唐时有方士葛孝仙亦隐兹坞，故郭祥正诗云：‘二葛既成仙，犹存炼丹处’是也。”^[3]吴赤乌二年（239）得道的是葛玄而非葛洪，这里显然把葛玄与葛洪事迹混淆了。显然，灵隐山的葛坞曾为葛玄的居住地。

关于龙井的葛洪遗迹，《淳祐临安志》卷三十七《井》曰：“龙井，本名龙泓，吴赤乌中，葛洪炼丹于此，井有《记》，秦少游撰。……秦少游撰《龙井记》：龙井旧名龙泓，吴赤乌中，方士葛洪曾炼丹于此，事见《图记》。……”^[4]秦少游为宋代著名词人秦观，为

[1]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5页。

[2] 同上，第606页。

[3] [明]陈善等修：明万历七年刊本《杭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四号》第6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9页。

[4]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第746页。

北宋神宗、哲宗时人，时约为北宋末年。《图记》是何书不详。这里所说的“吴赤乌中”，时间为公元238年8月至251年4月，此时活跃于浙江的，不是东晋时期的葛洪（约281—341），而是三国吴方士葛玄（164—244），因为此时葛洪尚未出生。

杭州市区的葛翁井有四处：葛岭、仙芝岭、翁家山、天竺山下。此外，治平寺西有葛公双井。在杭州周边的县城，也有多处葛洪炼丹井的遗迹。《咸淳临安志》曰：“新城县，炼丹井，晏公《舆地志》：葛仙翁炼丹之所。”“葛仙翁炼丹井，在硤石紫微山。”^[1]现今新城县（今临安新登镇）的葛溪、白乳泉、县北二里的葛丹井、县西七里的宝胜院炼丹井，均传说为葛洪的炼丹之所。余杭塘栖附近有葛墩村，村内有葛仙翁祠。

葛岭是葛洪在杭州最重要的活动遗迹。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记载：“葛岭，在西湖北，赤霞岭东，昔葛洪炼丹之所。宋贾似道赐第于此，有别墅名‘养乐园’，久废。”^[2]葛岭也有葛翁井，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二提及：“葛翁井，在葛岭北，寿星石南，在智果寺西南可数十步，上方下圆，人饮井中水者，多不染时疾，相传为葛稚川投丹之所。”^[3]关于“饮井水不染时疾”的故事，可上溯至宋代，《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七曰：“葛公双井，在治平寺西，居人饮此水，不染时疾，传言葛公炼丹于此。”^[4]元代著名道士张雨曾隐居于葛岭，并有数首诗咏葛岭，如“一宿葛翁丹井上，化为蝴蝶梦魂清”^[5]、

“葛洪井上访真居，一饮丹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散甚，子非知我我知鱼”^[6]等。宋元明时期的这些记载均说明，葛洪与葛岭的关系颇为密

[1]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第751、752页。

[2] [明] 陈善等修：明万历七年刊本《杭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四号》第5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2页。

[3] 同上，第6册，第1639页。

[4]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第748页。

[5] 同[3]，第1639页。

[6] [明] 田汝成撰：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西湖游览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八七号》第1册，第282页。

切，葛岭当因葛洪在此炼丹而得名。

《西湖游览志》还记载“葛岭上有葛仙翁墓”，并引“吴立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诗：人生扰扰间，颇觉天地窄……”^[1]为证。不过葛岭上的葛仙翁墓即使有也只是衣冠冢，因为史料明确记载葛洪死于广东罗浮山。关于葛仙翁墓的有无，孙向中认为葛岭有抱朴子墓的所有证据，其实只有吴莱一首名为《景阳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的诗，而其肇始者为成化《杭州府志》，并认为吴莱喜欢虚构，作游仙诗。《四库全书提要》称吴莱诗风“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2]，言下之意，吴莱称其谒抱朴子墓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孙向中又说：“根据这首诗的题目《景阳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的字面含义，抱朴子墓应当在景阳宫的初阳台，而非西湖葛岭的初阳台。西湖葛岭的初阳台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岭》中有记载：‘南高峰下烟霞岭、葛岭，在西湖之西，葛仙翁炼丹于此。有初阳台。’但葛岭并没有景阳宫；《梦粱录》卷一《车驾诣景阳宫孟飧》中提及景阳宫，当为临安朝廷大内宫观之一。”这里所说景阳宫为大内宫观之一有误。《梦粱录》卷一《车驾诣景阳宫孟飧》提到景阳宫时说：“次日，驾再诣行后殿礼，幸太乙宫、景阳宫，行款谒礼。”其中太乙宫也非大内宫殿，而是所谓的“御前宫观”，太乙宫分东太乙宫和西太乙宫，如果不冠以东西之称于前，则是指东太乙宫，如《咸淳临安志》称东西太乙宫为“太乙宫”“西太乙宫”。据《咸淳临安志》，东太乙宫在“新庄桥之南”。景阳宫为“郊庙”，供奉历代皇帝的灵位，“前为圣祖殿，宣祖至徽宗皇帝殿居中”，位置在“新庄桥之西”。这就是说，两个宫观位置相近，且均不在大内。新庄桥即民国时的凤起桥，后来填河建路，称凤起桥河下，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凤起路和延安路口，该桥以西则接近宝石山。从南宋时的景阳宫位置去初阳台可以有两种走法：可以从不远处保

[1] [明]田汝成撰：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西湖游览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八七号》第1册，第287、288页。

[2] 孙向中：《葛洪生地葬地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9—115页。

俶路的小路直接上宝石山，至保俶塔，再至初阳台；也可以从湖边走北山路，从葛岭上山至葛洪炼丹井，再至初阳台。所以，诗题之意是诗人从景阳宫（或其附近）出发登初阳台，然后谒抱朴子墓。确如孙向中所言，所有关于杭州的方志资料，都没有指出墓的具体位置，只是因旧志有这个说法，而葛岭确实因葛洪为名，所以就沿袭了葛岭有抱朴子墓的说法。葛岭抱朴道院有一块明代的《重建葛仙庵碑记》^[1]，其中提到了葛洪的后代，却仍没有提到葛洪有墓在葛岭，故葛洪墓在葛岭之说并不确切。

《重建葛仙庵碑记》由“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余姚沈应文撰”，撰写时间为“龙飞万历壬子（1612）春二月吉旦”。《重建葛仙庵碑记》虽然没有提到葛洪之墓，却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其说：“（葛洪）喜西湖山水之秀，卜居宝云山初阳台。结草庐，吸日月之精华，收山川之灵气；炼丹药以济痼瘵，浚丹井以便民用。井有三十六口，甘露、梅泉，其最冽也。又开砌山岭坦途，以便行人往来。烧丹朱，炼铅粉，刮铜绿，洗红花，染胭脂，造库酒。杭城贫民富户，无不乐其乐而利其利。”葛洪除了炼丹外，还与梅福同被认为是染料的发明者，其中提到其“炼铅粉，刮铜绿，洗红花，染胭脂”，正是其写照。葛岭抱朴道院在民国初还由染业公所管理，并于民国25年派代表奉聘请书于福星观李紫东，要求其接管抱朴道院。^[2]《重建葛仙庵碑记》又曰：“唐刺史李君构室祀之，题额曰初阳山房，造初阳台。石台历五代，至宋尚存。”据此，抱朴道院的前身是“初阳山房”，而初阳台也建于唐，且至宋尚存。吴莱所称抱朴子墓或是指奉祀葛洪之处，如此，则其诗《景阳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可以理解为从景阳宫出发到初阳台谒抱朴子祠。《重建葛仙庵碑记》又曰：“仙翁后裔葛栋，同男志淳、成纬、成纶、侄正荣，捐资□地，拓山重建楼宇。上祀仙翁，下奉祖考宗亲。”葛洪后人在当时尚存，出资购地，建设了葛仙庵，其作

[1] 朱越利：《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第74—77页。

[2] 《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杭州市图书馆1985年影印本。

用不但是祀葛洪，而且奉历代葛氏先祖。该记述其位置曰：“祠在宝云山之巅，东观海日，南对江潮，西邻孤山，北连古荡。”葛岭上现存抱朴道院，其炼丹井亦尚存。抱朴道院现所祀主要是葛洪，还祀奉纯阳祖师、东岳大帝等。

东晋时期，钱塘人杜子恭是五斗米道在本地的领袖，师事余杭陈文子擅于预测，曾为桓温北伐占卜。杜子恭死后，其弟子孙泰承位，发动暴乱，隆安二年（398）被杀后，孙恩（孙泰为其叔父）为报仇，继续与政府军对抗，失败后投水自杀。孙恩妹夫卢循继位，率众转战至广州，继至交州，义熙六年（410）兵败自杀。此后，杜子恭子孙依然统领道团，传播上清经法。

唐宋时期是杭州道教发展的高峰，尤其是南宋时期，因为南宋政权定都杭州，杭州遂一跃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由此谱写了它在中国道教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唐代，杭州开始出现道观。余杭天柱山的天柱观是杭州最早出现的道观，由道士潘先生创建于弘道元年（683）。此观创建后颇为兴盛，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特赐洞霄宫观庄一所，以给香火”。此后，其他道观相继建立。景龙观，建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紫极宫位于吴山南麓，始建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改名为真圣观。开元宫（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宝莲山的重阳庵始建于唐代开成年间（836—840）。晚唐，民间有多处关于吕洞宾的祠堂，如南山路、吴山、大东门直街等。

唐代，非杭州籍贯但在杭州居住的著名道士、道教学者很多。叶法善（616—720），字道元，括州括苍（今浙江丽水地区松阳县）人，有弟子千余人，是唐代著名道士，唐玄宗在他逝世后曾亲自撰写《故紫金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他曾在天柱观居住并在山门外建讲堂。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647—735）曾三次受皇帝召见，著述甚多。他也到过余杭天柱山天柱观，并收天柱观道士夏侯子云为徒弟。吴筠（683—778），字贞节，华阴人。开元间（713—741）南游，后止于余杭天柱山。于大历十三年（778）作《天

柱观碣》（又名《天柱山天柱观记》），常行教于江汉，大历十三年卒于剡中，归葬天柱山西麓。天柱观改名洞霄宫缘于他手植栌树“无故自枯”，15年后“复荣”等神异之事。主要著作有《玄纲论》和《神仙可学论》，还有《心目论》《复淳化论》《形神可固论》《坐忘论》《明真辨伪论》《辅正除邪论》《契真刊谬论》《道释优劣论》《辨方正惑论》等。今有《宗玄先生文集》上、中、下三卷传世。白元鉴（？—817），四川成都府人，唐玄宗幸蜀时，为威仪道士，住上皇观。后周游山川，止于余杭天柱观，在天柱观居住40年。工诗，作有《大涤十咏》。夏侯子云，从峨眉山来，师从司马承祯十数年。承祯卒，乃于大涤山中筑药圃，种芝术之属。天复间（901—903）归隐东峰，不知所在。施肩吾（780—861），唐睦州分水（今杭州富阳洞桥镇贤德片仁院村施家自然村）人，曾中进士。先后隐居于四明山、洪州西山（今南昌新建县西山）。著有《西山集》10卷、《闲居诗》百余首。《道藏·洞神部·方法类》收有题名“栖真子施肩吾述”的《养生辨疑诀》^[1]一篇。《全唐文》亦收有《养生辨疑诀》（或作《辨疑论》）。《全唐诗》收入其诗作187首。其养生之说亦见于《道枢》。施肩吾还被认为是开发台湾的先驱。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是施肩吾率领族人移居澎湖的故事。1981年出版的《台湾省地图册》在《简史》一页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人民为了逃避战乱，出现了移居澎湖和台湾的现象。唐朝进士施肩吾，曾率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

唐代，杭州出生的著名道士也不少。兹择要概述如下。朱君绪，字法满，余杭人。年十八入道，居玉清观，后拂衣入天柱山修道，所编纂的《要修科仪戒律钞》16卷是唐代道教戒律建设的代表作。暨（翼）

（卢）齐物，字子虚，师玉清观朱君绪受法箓，随入大涤山精思院。创垂象楼三间，又名书楼，积书数千卷，日以著述为事，后不知所之。徐灵府，号默希子，钱塘天目山人。关于他的生卒时间，史籍无载。《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言，徐灵府在唐武宗会昌初曾被征诏，但因“衰

[1] 《道藏》第18册，第559页。

稿”而“免命”。此后“绝粒”直至羽化，享年82岁。^[1]依此推算，他至少经历了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徐灵府师承田虚应，田则师承薛季昌，薛师司马承祯。由此可知，徐灵府为司马承祯的三传弟子，属于南岳天台系。徐灵府于宪宗元和十年（815）到天台，曾主持重修桐柏观。徐灵府著有《玄鉴》五篇，注《通玄真经》12篇，撰《天台山记》《三洞要略》《寒山子集序》。可惜目前仅存《通玄真经》注和《天台山记》。丁飞，字翰之，唐代钱塘（今杭州）人，一说济阳（今河南兰考）人。长期居住在杭州西湖北山龙泓洞，好读老庄书，善于养生术。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县人。活动于唐代大中年间（847—860）前后。生平在《续仙传》、《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太平广记》卷三十三《马自然》、陆楫《古今说海·说渊壬集·马自然传》等有传。马湘有道教多种，而常住湖州。《全唐诗》卷八六一记有马湘的诗5首，为《登杭州秦望山》《题龙兴观壁》《又诗一首》《又诗二首》。罗宁以为马湘是唐代另一版本的八仙之一。^[2]

五代吴越国时期，道教颇受重视。杭州是吴越国国都，杭州道教因此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政权的支持而有较大发展，天庆观、玉虚观、报国光孝观、水府净鉴观、重阳庵、三茅堂、清虚道院、石老庙等宫观得以建设或修复，不少外地名道纷纷来杭，杭州本地也高道辈出。余杭天柱山仍是这一时期杭州道教的中心。

吴越宝大二年（925），在杭州秦望山上建上清宫。吴越国王主持重修天柱观，亲自撰写《天柱观记》。钱镠尚道，在位期间颇为重视道教，礼遇道士。钱朗，字内光，洪州南昌人，受钱镠迎请至杭州居住二十余年。闾丘方远，字大方，舒州宿松（今安徽潜山县）人。年二十九，师香林左元泽^[3]，既得道，乃遍游名山，后止于余杭天柱山。唐景福二年（893），为筑室以居之。得到钱镠厚待，重建天柱宫以居

[1]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道藏》第5册，第328页。

[2] 罗宁：《唐代〈八仙传〉考》，《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

[3] 《洞霄图志》卷五《大涤山》，《道藏》第5册，第92、93页。

之，又奏请唐朝赐紫，并赐号玄同先生。乾宁二年（895），钱镠与之相度地势，改建天柱观。昭宗屡诏不起，赐号妙有大师。曾詮注《太平经》30篇，即《太平经钞》20卷，广行于世，对道教思想的传播有重要贡献。郑元章，字博文，十五岁入道，依真系大师李归。唐景福年间（892—893）始居余杭大涤洞。昭宗赐号正一大师冲素先生。后卒于精思院。^[1]罗隐（833—910），字昭谏，杭州府余杭郡新城县（今浙江省富阳市）人，曾为钱塘县令，后“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发运使，赐金紫”。曾经多次到过天柱观。罗隐的著述较多，如《甲乙集》《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淮海寓言》《广陵妖乱志》《谗书》《两同书》等，但这些书多已散佚，现存者仅《甲乙集》10卷及《补遗》1卷、《广陵妖乱志》1卷、《谗书》5卷、《两同书》10篇，另有序、记、碑、铭等“杂著”34篇。清《四库全书》曾收有《罗昭谏集》8卷，但遗漏颇多；今人雍文华又辑校有《罗隐集》1册，为收录罗隐著作较为完备的本子。罗隐对道教的社会、政治、哲学颇有贡献。吴越时期的名道还有鹤衣道人、韩必、吴崧、张契真等。

北宋时期，杭州道教继承吴越国时期而继续发展。这里以几位著名道士或与道教关系密切的人为例来看。吴山真圣宫高道张契真（936—1006），字齐一，钱塘（今杭州）人。他在吴越国时“主三箬斋事”，总管吴越国道教事务。^[2]入宋后，太宗选居太乙宫，召对，赐紫衣，令校道书，赐号元静大师。北宋另一次编修《道藏》也发生于杭州。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曾任钱塘县令，大中祥符五年（1012）任著作佐郎，奉命主持校正秘阁藏书和苏州、越州、台州旧存《道藏》，率十余名道士历时七年，修校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他在此基础上进行浓缩，以修炼成仙为主题，摄其精要，分类编次，辑为《云笈七

[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4—438页。

[2] [清]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九《张契真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5页。

签》122卷。《大宋天宫宝藏》已散佚，《云笈七签》因保存了不少北宋之前道书的精华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汉代至北宋道教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号余子，曾任两浙转运副使。他崇尚道教，曾表奏朝廷改天柱观为洞霄宫。冯德之，字几道，洞霄宫道士，曾参与《大宋天宫宝藏》的修校。此外，北宋时期，潘阆（？—1010）、苏轼（1037—1101）均曾居住于杭州，作有多篇与杭州道教，尤其是与洞霄宫有关的诗文，对传播杭州道教有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大中祥符三年（1010）至九年（1016），杭州太守王钦若主持编辑道教经典《宝文统录》4359卷，此即张君房《大宋天宫宝藏》的基础。

第二节 南宋至清杭州道教概述

南宋时期，杭州是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杭州道教遂跃居全国道教的核心，得到了很大发展。

首先是宫观寺庙增加了很多。南宋时最重要的宫观有13所，位处皇城及西湖周近的有12所，即西太乙宫、东太乙宫、万寿观、德寿宫、景阳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另有余杭大涤山的洞霄宫。此外，重要宫观还有不少。《梦粱录》卷十五《城内外诸宫观》记载：

今扼宫观在杭者，除御前十宫观外，编次于后。天庆观，在天庆坊，以奉圣祖保生天尊大帝香火。郡家官僚，朔望到任，俱朝谒于此。报恩观，在观桥南报恩坊。元贞观，在贡院西巷。旌忠观，在丰乐桥东北，以奉凤翔府和尚原三圣庙香火。中兴观即伍相公庙、后天明承天即梓潼庙、天竺、灵应、至德、崇应六宫观，俱在吴山之左右。鹤林观，在俞家园。景隆观，在新门外水府。净鉴观，在清水闸。玉虚观，奉三官。表忠观，奉钱王五庙香火，在龙山左右。真武观，在太和寺后。玉清宫，在葛岭下。旌德观，在苏堤先贤堂后。云涛、上清两宫观，俱在雷峰塔寺之右。冲虚观，在履泰乡。太

清宫，在龙井山。景星观，在临平岳祠之侧。顺济宫，在汤镇岳宫之左右。

外有在城及附郭女冠宫观者九，曰福田、新兴、明贞、神仙、承天、西靖、灵耀、长清等宫。

余外七县，首以余杭大涤洞天，即洞霄宫也。以下宫观二十有三，如洞霄宫者，按诸志书云：“自汉武帝迄唐、五代至宋元，一千五百余年，元名天柱，宋大中祥符年赐观额洞霄。”按《真境录》云：“宫有五洞交扁，九峰回抱，千岩万谷，秀聚其中，或泉飞彤厦之檐，云锁碧坛之角，祥光神异，兼木返于春秋，抚掌泉灵，更丹藏于翠石。”又有亭馆者七，扁曰漱玉、超然、税驾、翠蛟、飞玉、宜霜、聚仙、贞挹是也。自晋、宋以来，得道之士，许迈而下，凡二十有四人耳。更有神异曰捣药禽，盖山中异鸟最多，仅有其一，昼隐夜鸣，莫得而见，其声音清亮，彻旦不绝，类如杵药之声。曰五色云气，出于洞中。高庙脱屣万几，颐神物表，遂于乾道二年，自德寿宫行幸山中，驻蹕累日，敕大官进蔬膳，御翰《度人经》以赐。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胜矣。文忠苏公东坡诗：“上帝高居愍世顽，故留琼馆在凡间。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又方干诗：“早识吾师频到此，芝童药犬亦相迎。师今一去无消息，花洞石泉空月明。”余有名贤赋咏，不尽详述。且如道堂者，如西湖崇真道院、灵应希真道堂以下，城内外约有二十余处，皆舍俗三清道友，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来云水高人，时有神仙应缘现迹，详于志传。^[1]

这并不全，遗漏了吴山显惠观、真圣观、天清宫等。此外，周边县域还有不少宫观。临安县（今临安市）主要宫观有紫阳宫、元寂宫、

[1]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258页。

冲虚宫、崇道宫、清修观、新兴女冠宫。於潜县（今临安市於潜镇）主要宫观有至道宫、无极宫、集真观、许游观。昌化县（今为临安市昌化镇）有上清宫。富阳县主要宫观有妙庭观、丹霞观、崇元观、元阳观、崇亲思孝宫、紫霄宫。新城县（今为富阳市新登镇）有景德观。盐官县（今属浙江嘉兴市）有葆真庵。

南宋京城杭州不但有大量外籍道士，也有不少本籍著名道士。兹择要简述如下。

刘敖，高宗内侍，曾为宁寿观住持，创建通元观，任左右街都道录，主管京城及诸州府宫观道士。

皇甫坦（？—1178），字履道，夹州（今属四川）人，善医术，曾为宋高宗的母亲治眼疾，高宗、孝宗两朝四次召见，住持西湖显应观。

白玉蟾（1194—1229），本名葛长庚，因父死母改嫁白氏而改姓。祖籍福建闽清，生于南海琼州（今海南琼山）。白玉蟾的著作甚多，生前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行世。后由彭耜纂辑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又有谢显道等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彭耜编《海琼问道集》。明万历年间，何继高、林有声曾将白氏著述合编为《琼瑄白真人集》，并将原存《修真十书》中而未署明撰人的《修仙辨惑论》《谷神不死论》《阴阳升降论》等文纳入其中，该文集后被收于《道藏辑要》。至清代，董德宁曾辑有《紫清指玄集》，收入《道藏精华录》，内《性命日月论》一文未见于《道藏》及《道藏辑要》。^[1]他是金丹派南宗的实际创始人。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白玉蟾赴临安（今杭州）伏阙上书，但却没有到达皇帝的手上，并因醉而被衙门收押，后来公差知是海琼先生，一夜之后就把他放了。白玉蟾在杭州的行踪，杭州的志书有记载。《武林玄妙观志》卷二有《白琼瑄仙师》一篇，记其“嘉定中至临安，上命馆之太乙宫，尝往来天庆观与诸道流吟啸，辄竟日。时高士陈永灏游武夷，仙师赠之以诗，未几飘然而去”。白玉蟾“住持太乙宫”在《西湖游览志》中亦有记载。^[2]又，杭州玉皇山福星

[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观现存玉蟾还丹井，其井圈所刻之文中有“郭公景仙，手凿为井，养而不穷，其光璟璟。玉蟾长春，宋元代起，采药栖真，炼丹于此”之句。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二，福星观还有紫清亭，为其遗迹。据说，他曾在杭州包家山麓新建三一庵以炼丹。^[1]

陈显微，字宗道，号抱一子，维扬人（今江苏扬州）。^[2]约于1225年到当时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驻锡于佑圣观约二十年。他的著作《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收有署名“抱一子陈显微”的《文始经言外旨》。

《道藏·太玄部》收有其《周易参同契解》，此书也被《四库全书》收入子部道家类。据《周易参同契解·叙》，陈显微尚有《立圣篇》《显微厄言》《抱一子书传》行世，今不存。^[3]《道藏》还收有陈显微校正的《神仙养生秘术》一卷，收入“洞神部众术类”。该书题曰：“太白山人传，后赵黄门侍郎刘景先受，宋抱一子校正。”^[4]其内容为外丹药物之方。此外，还有一些著作难以确定为他的著作，如明胡文焕《类修要诀》所录之《抱一子逍遥歌》一篇，为七言歌行体，共80句，560字。

褚伯秀，号雪巖，又号武林道士，钱塘（今杭州）人，宋代杭州天庆观（后称玄妙观）道士。宋末元初道教学者，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106卷传世，曾注《道德》《冲虚》二经，皆佚。事见《宋季忠义录》卷一四、《武林玄妙观志》卷二。《宋季忠义录》卷一四《褚雪巖》所录之事并见于《武林玄妙观志》卷二《褚雪巖先生》。

此外，有李芑（李笑）、蔡道像、王嗣昌、张守真（第32代天师）、莎衣道人等外籍名道。本籍名道有盛旷、沈如济（沈既济）、沈敬、刘松年（1155？—1218）、周允和（1220—1285）、陆维之、孙处道（1203？—1264）、贝守一（1199？—1280）、金迈韶（1243？—1290）、朱真静（？—1243）、俞延禧（？—1187）、左幼山（幻山）、王思明、杨公清（1243—1299）、阮日益，等等。

[1] 林正秋：《杭州道教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2] 《道藏》第20册，第271页。

[3] 同上。

[4] 《道藏》第19册，第381页。

南宋时期，洞霄宫是最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其住持均得到封号，依次是：金致一，凝妙大师；叶彦球，虚靖灵一大师；李洞神（？—1173），右街道录，明素大师；陈希声（1108？—1176），右街鉴义，凝和大师；叶彦球，再任；潘三华，葆光大师；高守中，冲虚大师；王居实，虚一大师；龚大明（1168—1238），冲妙大师；王大年，冲素大师；贝大钦，灵一大师；杨大中，明一大师；龚文焕，演教大师；郎道一，通妙大师。此外，对洞霄宫做出重大贡献的名道还有：郎如山（1225？—1297），提点，总教大师；沈多福，住持，清修素养冲妙法师；舒元一（？—1307），住持，清修明素冲道法师；叶林（1248—1306），工诗，作《白鹿山房记》；孟宗宝，搜集并编辑《洞霄诗集》14卷。宋代官制中有祠禄官一类，它又有内外之别。南宋时提举洞霄宫者为内祠，据统计，南宋有六十多位左、右丞相及参知政事（副相）提举洞霄宫。

元、明、清三代是杭州道教继续得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诸道派继续在杭州传播，不少外地道士到杭州参访、修炼、传道，杭州本地也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道士，余杭洞霄宫在这一时期继续其杭州道教中心的地位，但因城内一批宫观较活跃，故其地位较前期略有降低。

元代不少道派都在杭州传播。茅山宗在杭州活跃。刘大彬，号玉虚子，杭州钱塘人，茅山宗第四十五代宗师。杜处逸（1237—1318），字道坚，采石（今安徽当涂）人，元大德七年（1303）任“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真人”，延祐年间（1314—1320）任杭州宗阳宫、四圣延祥观等住持，有弟子四十余人，其中周德方为杭州人，赵嗣祺（1227—1340）是丽水缙云人，是杜道坚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元代玄教在杭州也颇为兴盛。玄教中的吴全节、王寿衍、陈日新、薛玄曦、孙益谦等重要骨干都曾住持杭州的宗阳宫、佑圣观、延祥观、开元宫等。大宗师吴全节还在杭州盐桥南建紫琼观。

元代新建的道观有玄同观、紫琼观、长春庵、凝真庵、纯阳庵、玄真院、洞玄院、崇善院、五显庙、宝极观、天妃宫、得一道院、玉阳

庵、紫阳庵等。

元代名道较多，其原因有二：一是南宋遗留下来的；二是入元后，不少文人不愿仕元而隐居入道。元代杭州道士最著名的是王寿衍和张雨。

王寿衍（1270—1350），字眉叟，号玄览，又号溪月或溪月散人，元杭州人。曾先后任杭州开元宫提举、杭州佑圣观住持提点，又御授开元宫住持提点，皇庆元年（1312）仁宗特授以“灵妙真常崇教真人”之号。延祐元年（1314），改授“弘文辅道粹德真人”之号，领杭州路道教事，给予银印章，视二品。王寿衍是玄教接近最顶层的领导骨干，受到朝廷的优待和多次封赏。除去让他主持修复开元宫、佑圣观，住持江西南昌新建县玉隆万寿宫等重要宫观事宜外，还经常委任他主持斋醮、求箓祈福、外出访贤、向朝廷推荐官员、作为重要人员陪同宫廷人士出行，在一定程度还参与了元朝的政治。王寿衍志行高洁，处荣华贵盛而不骄奢，待人接物平和谦恭，恪守玄教清静无为宗旨，多与名人交结，名动一时。王寿衍传有弟子多人，知晓其名者有彭大年、陈子浩、张嗣显等。

张雨（1277—1348），又名天雨，字伯雨，法名嗣真，别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杭州钱塘人，宋崇国文忠公九成之裔。^[1]先去茅山礼宗师许道杞弟子周大静为师，受大洞经箓。再师玄教道士王寿衍，法名嗣真。居杭州开元宫，“风裁凝峻，见者异之”。^[2]皇庆二年（1313），他随王寿衍入京，居崇真万寿宫。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乙卯，张雨回到钱塘，住持西湖福真观。两年后徙居开元宫。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开元宫火灾，张雨因此于次年回到茅山，主持崇寿观教务。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庚辰，张雨返回杭州，“归阳德馆，作黄箓楼，储古图史甚富，往来于灵石坞之精舍”。^[3]元顺帝至正

[1] [明]姚绶：《句曲外史小传》，《藏外道书》第34册，第58页。

[2] 同上。

[3] [明]姚绶：《穀庵集选》卷九，《四库全书》第1201册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页。

十年（1350）七月，张雨卒，享年68岁^[1]，葬钱塘县灵石山玉钩桥。张雨是茅山宗道士中长于著述者之一。著有《句曲外史集》8卷、补遗3卷、集外诗1卷，为《四库全书》所收录。另有《出世集》3卷、《碧岩玄会录》2卷、《寻山志》15卷、《道德经》（集）注、《师友集》，可惜今已不存。还有《玄史》，即《玄品录》5卷，自序“老子立足者也”，现存于《道藏》。参与刘大彬主持编撰《茅山志》15卷的工作。张雨能文，善书，工画，长于诗词，在元朝颇负声望，与正一派宗师吴全节、薛玄曦等多有交游，与著名文人、僧人密切来往，数次执掌多所大宫观并获得“清容玄一文度法师”称号。

此外，这一时期的名道还有不少，兹择其要述如下。叶林，字儒藻，一字去文，号本山，钱塘人，洞霄宫名道。作诗多首。另有《白鹿山房记》。邓牧（1247—1306），字牧心，杭州钱塘人，自称三教外人，遍游名山，宋德祐元年（1275）后到洞霄宫。著有《洞霄图志》《游山志》《杂文稿》《传》等。马臻（1254—？），字志道，号虚中，杭州钱塘人，以诗画名世，著有《雪外诗集》及文集、外集等。王福缘，字子曲，号盘隐，杭州钱塘人，玄妙观名道，精于大洞雷法，工诗文。徐宏道，号洞阳，至元年间得杭州瑞石山集庆堂，改为紫阳庵而居于其中修炼，年八十三而卒。有徒弟丁野鹤等。丁野鹤^[2]（1279—1342），“钱塘人，元延祐初，祖徐太师法，弃家为全真道士。居吴山之紫阳庵，导引辟谷者二十余年”^[3]。受其影响，其妻王守素也入道修炼而有所成。舒元一（？—1307），杭州临安人，洞霄宫道士，祥兴元年（1278）任洞霄宫副宫事，两度主持修复失火的洞霄宫。后任浙西路道教提举，洞霄宫住持提举、知宫。朱明宇，杭州玄妙观提举，与张雨友善。郑本中，至正年间（1341—1368）住持杭州玄妙观，能诗善琴。

[1] 关于其卒年，说法较多，共有五种，即至正六年（1346）、至正八年（1348）、至正九年（1349）、至正十年（1350）、至正十二年（1352）。详考见丁雪燕《张雨生卒年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 丁野鹤与丁鹤年应为两人，戴良《高士传》所载应为丁鹤年。

[3] [清]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藏外道书》第31册，第123页。

王景升，杭州开元宫道士，善画道教神仙人物。丁清溪，杭州钱塘人，工于道教人物，尤善写真。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祖籍河南，生于杭州，长于画道教神像。宋汝志，号碧云，杭州钱塘人，开元宫道士，善画人物，兼工花鸟。

明代杭州道教继续得到发展。明代杭州包括仁和、钱塘二县。明嘉靖《仁和县志》载有道教宫观14所，分别为龙翔宫、宝极观、得一道院、显真道院、玄同观、元真观、凝真观、长春观、报恩观、洞真观、纯阳庵、玉阳庵、紫琼观、开元宫。明万历《钱塘县志》卷九七载有道教宫观18所，分别为佑圣观、旌德观、景隆观、至德观、中兴观、三茅观、玄妙观、承天观、通玄观、延祥观、紫阳观、重阳庵、三一庵、神霄雷院、福清竹院、宗阳宫、东岳行宫、明真宫。此外，万历《杭州府志》增补了灵顺宫、鹤林宫、玄真道院、景灵宫、真圣观。洞霄宫在明代仍为杭州重要宫观之一。这样，明代杭州道教宫观在官府登记者约有40所。其中，重阳庵对民众生活影响颇大，在其周围形成了著名的“重阳八景”，即吴山福地、青衣洞天、云水钵堂、龙虎丹室、松巢白鹤、地产灵芝、万竿翠竹、一泓涌泉，为明代杭州人民游乐的首选之地。

明成祖登位后，张扬真武信仰，杭州道教宫观中的三茅宁寿观、紫阳庵、重阳庵、佑圣观等都增加了玄武殿。

明代杭州名道也不少，重要者如下：

冷谦（1310？—1371？），元末明初人，字起敬^[1]或启敬^[2]，道号龙阳子。其籍贯有三说，或曰钱塘武林（今浙江杭州）人^[3]，或曰嘉兴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4]，所谓武陵（今湖南常德）人^[5]之说系“武

[1] [清]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2]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八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9页。

[3] [明]郎瑛：《七修续稿》辩证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123册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4] [明]陆应阳：《广舆记》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3册史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84页。

[5] 《无声诗史》和《本朝分省人物考》都称冷谦是武陵人。

林”与“武陵”音近而误。他隐居于杭州吴山火德庙。后任太常司协律郎，参加明初郊庙祭祀乐章的制订，多有创见。著有《修龄要指》，其中的养生健身法简单而实用，至今仍被养生家所重视。另有《太古遗音》（已佚）、《冷仙琴声十六法》，有画作多幅传世。

周思得（1359—1451），杭州钱塘人，字养真，一字素庵野人，曾署名思德。明成祖时，周思得以灵官法名显京师，后住持京师大德观、朝天宫，主持编撰《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周思得精习灵宝度人之旨，行持五雷火府之法，以道法济幽度显。周思得历事成、仁、宣、英、景五朝，被封为“崇教弘道高士”^[1]，为明代颇受优宠的道教名流。正统十年（1445），他以年迈恳乞还山。英宗敕于杭州城西南凤凰山上建太清观，为周思得退居之所。景泰元年（1450）五月，周思得获准告老还山，由其徒周道宁扶持，返居杭州仁和县玄元庵。次年仙逝，葬于杭州三台山前八盘岭。天将庙、玉虚延恩殿、弥罗宝阁、大德显灵宫、杭州城西南凤凰山的太清观、杭州玄元庵（即宝极观的前身）等很多宫观都是因他而修建的，这为灵宝派教义的传播提供了活动场所。其次，周思得曾主持朝天宫，执管道录司，显赫的政治地位为其弘扬灵宝派教义提供了保障。他有门徒百余人，其门徒中不乏担任道录司要职者，如周道宁、周道玉曾担任“至灵”，梅道真、王道弘曾担任“玄义”等。徒子徒孙，枝叶繁衍，形成了强大的道法传承体系，对于灵宝派教义的传播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周思得才思敏捷，勤于著述，所编《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是灵宝斋法的巨帙科书，它门类齐备、内容丰富、简洁适用，在道教史上意义重大。这套书不仅在林灵真的基础上有所修改，而且有八卷是周思得新修的内容。周思得还擅长诗文，著有《弘道集》一卷。总之，他在明代中国道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徐道彰，字凝虚，杭州钱塘人，杭州通玄观道士，曾任真人府赞教，精于清微、五雷法。

王应瑾，字景丹，号真士，杭州钱塘人，佑圣观道士，后任玄妙观

[1]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三十九，《四库全书》第4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76页。

住持，洪武三年（1370）被第四十二代张天师封为“教门高士”“洞微真隐纯一法师”，任杭州府道纪司都纪。十二年进号为“东华弘道纯一法师”“教门真士”“贞白先生”，兼领杭州府道纪司都纪，调任龙翔宫住持。

俞悟元，号清隐，杭州钱塘人，宗阳宫道士，曾任杭州府道纪司都纪，致力于修复宗阳宫。

俞复中，俞悟元弟子，玄妙观道士，曾任杭州府道纪司都纪，被天师封为“显通谦恭法师”。

郑如松，字卫凡，号真常，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出家杭州长春院，工匠，曾鼎力修复吴山至德观。

陈嘉宣（1495—1569），字戴墨，重阳庵著名道士，精于灵宝法，长于祷雨，对重建庵殿有功。

梅志暹，杭州钱塘人，明代杭州重阳庵住持，全真道士，对扩建重阳庵有功，又辑《重阳庵集》初稿。

俞大彰，字用昭，号宾梅，别号海空，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曾任真人府赞教，后为杭州重阳庵住持，精五雷法，祷雨多有验，工于医，有道行。

高濂（约1527—约1603），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杭州钱塘人，曾任鸿胪寺官，后退隐西湖。他约生于嘉靖初年，创作活动主要在万历前期。明代著名戏曲作家，能诗文，兼通医理，更擅养生。所作传奇戏曲有《玉簪记》《节孝记》，散曲现存小令十余支，套曲十余套，见于《南词韵选》《南宫词记》《吴骚合编》《词林逸响》等书。此外，有《雅尚斋诗草》初集、二集，《芳芷栖词》《遵生八笺》《牡丹花谱》《草花谱》《兰谱》等著作。《遵生八笺》以“求真、求信”的态度从经典古书、医典、名人言论中有选择地广引博收，再结合自身体验，总结出切实有效的方法，辑录成册，是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它从八个方面（即八笺）讲述了通过修身养生来预防疾病、达到长寿的方法。这八笺是“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

笺”“尘外遐举笺”。其中“饮饌服食笺”自卷十一至卷十三，收录了3253种饮食和药方及15种专论。此外，该书中的卷十一至卷十三中的“野蕨类九十六种”一章曾分别以《饮饌服食笺》和《野蕨品》为名单独出版。

清代早中期（1644—1862）是杭州全真道获得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真宫观数量大为增加。见之于史料者有大德观、宗阳宫、鹤林道院、登云观、机神殿、松晨殿、玉皇山福星观、余杭天柱观、余杭半持庵、余杭洞霄宫、余杭三元宫等等。在道派上，除余杭洞霄宫属于全真华山派外，其余均为全真龙门派。清代晚期（1862—1911）是杭州全真道颇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全真道院主要有显真道院、福星观、抱朴道院等。清代，正一道在杭州的寺庙有城隍庙、紫阳庵、通玄观、三茅观、宗阳宫、承天观、黄龙洞等。

晚明到清代中期，浙江是全真龙门派极为活跃的重镇。龙门派第五代分张静定和沈静圆两支传播。张静定，原名宗仁，号无我子，浙江余杭人，受教后隐于天台山，于嘉靖元年（1522）以教传赵真嵩。第六代律师赵真嵩，号复阳子，山东琅琊人，于天台受教后，隐王屋山，后传法于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于崇祯元年（1628）逝世。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1622—1680）曾在浙江杭州、湖州等地开坛传戒。陶守贞（1612—1673），号靖庵，系王常月弟子，开启湖州金盖山纯阳宫云巢支派，其弟子有陶太定等多人。陶太定传徐清澄（1630—1719），徐清澄传徐一返。盛青涯，号金筑老人，系王常月弟子，开启杭州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著有《三江史书全集》。有弟子潘太牧（？—1685）传其教。潘太牧纂有《湖海纪闻》，有弟子王清虚，王清虚传潘一元。王常月第九代弟子周太朗（1628—1711）开创了杭州金鼓洞支派。其弟子有戴清源（1662—1735）、高清昱、方清复（1649—1736）、金清来（1625—1711）、孟清晃（1647—1728？）、谢清涵（1634—1732）、叶清彻、童清和（1619—1716）、许清阳等人。其中戴清源又有弟子骆一中、戴一振、徐一正。骆传蔡阳善（天一），蔡传戴来□（北庄），戴传张复纯，金鼓洞支派由此得以传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

王常月第九代弟子范太清（1606—1748）开创崇道观支派。雍正十二年（1734）世宗敕建崇道观，遂开此派。后范太清延高清昱（1616—1768）住持桐柏宫，创桐柏宫支派。龙门派第十代开创的支派有：其一，高清昱创建的天台山桐柏宫支派。其二，杭州机神殿支派，由许清阳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创建。龙门派第十二代阳字辈弟子所创建的浙江全真支派有：其一，余杭南湖三元宫支派。此派系沈一炳弟子陈阳复所创。陈阳复（1730—1785），原名去非，字翼庭，号樵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早岁嗜禅，读《十六观经》而深有所得。年十六，谒金盖嗣师徐一返问道。年十七，出游。乾隆十九年（1754）自粤西归，复至金盖云巢，礼徐一返。徐授以《紫光梵斗》，遂休云巢，日夜虔礼。乾隆四十年（1775），沈一炳自桐柏来金盖，乃皈依，始嗣龙门为十二代弟子，沈为其命名，并授三大戒。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出游楚、豫间，遇李赤脚、李蓬头、金怀怀等，互相契合，多所印证。乾隆五十年（1785）春，至余杭，主南湖东堤三元宫讲席。是岁大旱，邑宰请其祷于三元帝前，应声雨下，由是声名益著。同年秋九月，逝于三元宫。其弟子有阮来宗、杨来逸、钱来玉、鲍来金等。其二，余杭铜山半持庵支派，此派系沈一炳弟子周阳本所创。周阳本（1715—1813），原名道照，字用霖，号梯霞，浙江海宁人。早岁入道，初事符篆，为余杭道纪司有年。祷雨祈晴，靡不应，兼善书法，邑都士绅皆重之，延之住持天曹观、李王观，均重兴之。年六十余，始遇沈一炳，乃皈依龙门派。入铜山半持庵，独居三十余年，日唯礼诵，凝神养气，一意金丹。士大夫来访，唯举“四书”中语反复详示，不杂二氏之说；遇释氏，则证以《金刚》《圆觉》等经；遇同门，则以老子五千言为宗旨。每曰：“所谓真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谓也，但赤子本一无知而混混，真人者物物圆觉，而一无所惑，其差别如此。”^[1]嘉庆（1796—1820）初年，尝主金盖山云巢讲席，卒葬天柱山金筑坪。其三，归安^[2]射村开化院支派，此派系沈一炳弟子费阳得所创。其四，杭州天真山登云观支

[1] 《金盖心灯》卷五《周梯霞律师传》。

[2] 民国元年（1912）撤废归安县，与乌程县合并为吴兴县（今湖州市市辖区）。

派，此派系钱阳琐所创，其详情历史无载。其五，娄东（今江苏省太仓县）鹤梅馆支派，此派为王阳诏所创。^[1]除龙门派外，华山派在浙江也有传播，如华山派第十五代贝本恒（1688—1758）从1745年起在浙江余杭大涤洞天洞霄宫任住持，撰有《周易参义》《黄老旨归》。有弟子陈仁思、李仁峰等。

清代杭州著名道士主要有：

戴清源（1662—1735），字初阳，号停云，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生于杭州仁和县，师事玄真子周太郎，性情宽和，为人方正，是金鼓洞龙门派第十代弟子。有诗二首存世。

高东篱（1654? —1768）^[2]，本名清昱，字东篱，祖籍山东宁海，寄居长白（今吉林长白）。《金鼓洞志》卷七《法嗣》则说他是“仁和（今杭州市）世家子”。康熙三十一年（1692）自台湾至杭州金鼓洞拜周明阳为师，获授《南华经》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获授《道德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此后又获授《华严经》《心经》《大学》《中庸》等。康熙四十六年（1707）获授大戒。据《金盖心灯》卷四《高东篱宗师传》：“周起初授以《南华》，高东篱受而伏揣，益自折节以事之。十三年后，周乃授以《道德》，且为标拔宗旨。旋授以《参同》《悟真》。未几，又授以赵注《学》《庸》《道德首章》《心经》全册，曰：‘此出世、人世真消息，简易易行。进此后，熟揣《周

[1] 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97、98页。

[2] 《金盖心灯》记高东篱宗师生于后金天命元年（1616），享年151岁。若以1616至1768年算，应是153岁。《三尼匡世说述序》说：“忆自弱冠时，得侍东篱老师于桐柏山。师奉天人，年已百有十余岁。”证以上段《自述》，“年百五十一岁”可能是“年百一十五岁”之误。若如此，则高东篱生于1654年，即清世祖顺治十一年。今本《金盖心灯·高东篱宗师传》所记年代明显有误，如谓“稽其初入道也，岁在壬申（鲍廷博注：康熙三十一年），出台湾而至浙，年已七十五矣（鲍注：稽师手注《台湾风俗考》三卷，成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亥之秋。周叙所述载又如此。盖师久居台湾者也）”。其中，“康熙二十四年乙亥”应或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乙亥，或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但壬申是戊申之误，以高东篱宗师生于1654年计算，则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戊申正好七十五岁。

易》，神仙之能事毕矣！’”看来，他深得周明阳的真传，深悟三教经典而总归“一心清净，自与道合”的龙门宗旨。雍正十三年（1735），受范青云之请，高东篱至天台主桐柏崇道观任讲席，其徒方镕阳（号一定）、沈轻云、闵一得等人同至，协理观事，由此启桐柏宫支派。^[1]高东篱著有《台湾风俗考》三卷。弟子众多，其中沈轻云、闵一得均对龙门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许清阳，字小童，号清阳，杭州仁和县人，金鼓洞龙门派第十代律师。少习儒学，参加科举考试屡次失败，遂归依道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金鼓洞师事周太郎，授予道业，有道行。后被杭州东城机神殿延请为住持。

骆一中，字圣哲，杭州钱塘县骆家庄人，金鼓洞龙门派第十一代律师。他中年归道，师事戴清源，性情朴实，担柴运水，独任其劳，精进道业，面壁苦修，彻夜朝礼，得到戴清源等众道人的好评。

沈轻云（1708—1786），名一清，又名一炳，字真阳（一作扬），号谷音，道号轻云子，蛻号太虚主人，浙江归安（今湖州）竹墩人。16岁时，于金盖山遇李虚庵，获授秘诗三首而有出家之念。17岁时于杭州金鼓洞师事高东篱，获授三天大戒，得东篱真传。高东篱的众多弟子中，“求其贤贤，相继得心解而力行者，惟轻云氏”。沈轻云学综三教，高东篱只是沈轻云的老师之一。后访道于高池（今武康山），遇贝常吉，交游友善，关系似在师友之间。沈轻云还有另一师承“泥丸真人”。闵一得自称，“余道得之于太虚翁，翁为驻世神仙”。沈师“所授余者，悉为泥丸真人口授”。关于泥丸真人所授的内容，闵一得自述：“余于嘉庆间（1796—1820），游于河上，遇长山袁君培，为述所授：一曰《太虚集录》，二曰《双修宝筏》，三曰《古法养生》，四曰《河上瑣言》。”^[2]泥丸真人所授内容，似乎就是这些或与此类似。沈轻云后住无锡正气庵三年，至松江复遇李虚庵。《金盖心灯》卷四《沈

[1] 《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卷下《第十代高大宗师传》，《藏外道书》第31册，第468、469页。

[2] 《金盖心灯》卷四《沈轻云律师传》，《藏外道书》第31册，第253页。

轻云律师传》云：

（师）究心儒书、耽性理，参《周易》五十余年。其得力在慎独，其致功在真诚，步趋语默，未尝心离中正也。晚岁通神知未来，洞悉三教一贯而谦让不自盈，亦未尝预示可否。人问吉凶悔吝，但据理以答之，不涉神异。^[1]

次年遇西河萨祖于天台桐柏山，获授符篆咒术和五雷法。乾隆三十一年（1766）离开天台山后至北京等多地，曾住持余杭大涤山洞霄宫。乾隆五十一年（1786）卒于射村道院澹泊斋。沈轻云门下有陈阳复（字云樵）、周阳本（字梯霞）、费阳得（字丹心）等，为龙门第十二代。其中陈阳复启余杭南湖三元宫支派，门下有阮来宗、杨来逸、钱来玉、鲍来金等。周阳本开余杭桐山半持庵支派。费阳得开归安（今湖州）射村开化院支派。

沈轻云的道教思想，颇重儒道融通。他曾对他人说：“有道德者有神通，无道德者无神通……关尹五千惟明道德，可知道德，体也，神通，用也。取其用而遗其体，适成其妖孽。君子则不然，廓其真灵，养其真气。积之宏，畜之久，及时流露，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妙。”沈轻云教人有十义，曰忍辱，曰仁柔，曰止敬，曰高明，曰退让，曰刚中，曰慧辨，曰勤，曰信，曰廉。闵一得谨受行持三十余年，并赞叹其师“道高且深矣”。闵一得75岁时还说：“师传天仙功夫，余于乾隆丙午岁，耳食于玄盖洞天，心袭以藏之，迄今四十有七年矣。”^[2]他认为沈轻云所授《天仙心传》，直指太上心宗，故拳拳服膺，体悟出《天仙心传》不外“虚寂恒诚”四字，这其实就是他所张扬的龙门方便法门的核心思想。此外，沈轻云传授给闵一得的还有《道程戒忌》等。

潘寅，字素靖，吴兴（今湖州）东泊人，杭州鹤林道院龙门派第十一代律师。他早年为杭州东郊百步塘水月庵的小沙弥，后归心道教，

[1] 《金盖心灯》卷四《沈轻云律师传》，《藏外道书》第31册，第247页。

[2] 见《藏外道书》第10册，第430页。闵一得的《古书隐楼藏书》中，有许多内丹著作及思想，多获授于沈轻云，如其最重要的《天仙心传》。

至金鼓洞师事孟逸阳，得法名一善，字素靖，从此修炼不断，后来因水月庵僧人化去，当地乡民诚意延请，不得已返回水月庵，但仍修炼道业不懈。

蔡阳善(?—1793)，字天一，海宁人，金鼓洞龙门派第十二代嗣师。他师事骆一中，于乾隆三十年(1765)任金鼓洞住持，时长25年，“作事周详，用人得当”，以身作则，“静则劳心，动则劳力”，主持新建或复建了许多道教建筑，对金鼓洞贡献很大。在他主持下，在富者捐助之下，扩建斗姆阁，增建文昌阁、玉皇阁、吕祖殿等，此时石壁上有好事者书“飞来野鹤”四字，道院因之而名鹤林道院。蔡阳善还在山下增建懒云坞，其内有报本堂、七宝阁等。“金果泉之题名，降魔岩之表众，懒云坞，报本堂，成自斯人；松山若干亩，禾田若干亩，置自斯人；鹤林为之一振，十方云水，日聚百人，无复有瓶罄之耻，是真能安我明阳周祖之堂构者也”。^[1]当然，这是得力于汪希圣、施俊文、张聚九、邵华乾、夏国华、潘连城、徐清来、江静嫻、江拱辰、王廷钧、吕国柱、丁叙园、丁静波、张叔蛟、骆一龙、金振山、汪峙中等富宦的捐助。这些捐资者中的第二代有一部分人还成了龙门派的居士，如张云瞻、张万程、张上锡、汪新余等。在这些护法的支持下，鹤林道院陆续购置了各类田产近百亩。这说明，鹤林道院“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任何资助，完全是凭依道众募集，士绅、信众施善而发展起来的”。^[2]这实际上也是清代很多全真道院和正一道寺庙宫观发展的实际情况，是道教从嘉庆年间复转为民间宗教后生存状态的经济情形。经过蔡阳善的努力，金鼓洞得到很大发展，能容纳十方云水道人数百。

清代名道还有玉皇山住持蒋永龄，这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详述。

此外，清代杭州出现了一批道士画家，主要是：任熊(1820—1860)，字渭长，号湘浦，萧山人，善人物、山水、花鸟、虫鱼、走兽，尤长于道佛画。沈澄，杭州道士，工于山水画。王乔年，字鸣远，

[1] 《金盖心灯·蔡天一嗣师传》，《藏外道书》第31册，第257页。

[2] 王文章：《略析朱文藻〈金鼓洞志〉的史料价值》，《中国道教》2009年第5期，第48页。

杭州奉真道院道士，善画花卉。徐国祥，余杭洞霄宫道士，善画兰竹。黄鹤，字含山，号青霞，又号跛道人，吴山玄妙观道士，善画兰竹。

总体看来，清代早中期杭州道教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其中全真道显得尤其突出。这一时期，杭州全真道与湖州、台州全真道人员往来密切，交流频繁，互动很多，其影响波及北京白云观等地，辐射全国。杭州全真道与它们一起，是构成清中期龙门派“中兴”的最主要地区，为全国全真道乃至道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清代晚期，杭州道教明显衰落。其主要原因，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对道教持否定态度，拆毁了不少道教宫观，如玉皇山福星观、余杭洞霄宫等被太平军毁于一旦。二是社会动荡，民生维艰，道教既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也难以得到民间的有力支持，资源匮乏。三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士大夫乡绅阶层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洋务和与西方相关的科技、思想，对道教不如过去那样重视，尤其在1900年后，对道教的尊重、同情多被批判、蔑视所取代，道教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逐渐丧失，只能在艰难中苦苦挣扎，困顿度日。

第三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社会历史背景

道教的衰落是从清代开始的。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认为：“自从清军入关，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1]究其原因是清代统治者并不信奉道教，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抑制道教的政策，其中将张天师的品级降低，最终取消张天师入京觐见的资格是影响较大的事件，道教终于再次沦为“民间道教”，其发展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近代以来，道教衰落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道教》叙述了其情状：“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

[1] 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62页。

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1]究其原因，有两个事件是对近代道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是咸同兵燹，其二是庙产兴学。

众多方志中所提到的“咸同兵燹”就是现在所说的太平天国运动，当时也称“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早期成立“拜上帝会”，在思想信仰上独树“皇上帝”的信仰，对其他信仰采用从物质上直接消灭的方式，每攻陷一地，便将庙观付之一炬，并将其神像都毁坏殆尽。同时在信仰上也采取禁绝的方式，即“不许僧道诵经拜忏”，“禁人间僧道追荐”。“尽管太平天国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从起事到兵败不过20多年的时间，但它对本已衰微不振的道教不啻是致命一击，中国道教处于江河日下之势。”^[2]

太平天国虽然对道教的破坏很大，但其影响却是一时的，在失地收复后，各地重要的宫观往往被重建。如杭州的玉皇山福星观，就是咸同兵燹时被毁，后于同治三年（1864）由蒋永林（一作龄）募化复建的。对近代道教，特别是民国道教影响深远的是庙产兴学事件。

一、庙产兴学事件对道教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庙产兴学（又称庙产办学、废庙办学）事件有两次高潮，都使道教遭受了沉重打击：“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庙产兴学’风潮，也使道教遭受了沉重打击。晚清政府及国民政府在兴办教育的旗号下，提出没收庙产以兴学的主张。大体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3年，为庙产兴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6年至1931年为其第二次高潮。”^[3]

庙产兴学的主张主要起自晚清的洋务派和维新派，曾提出“中学

[1] 卿希泰：《中国道教》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71页。

[2]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 徐敏：《中国近代道教文化论略》，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上《劝学篇》，认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族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1]此主张得到光绪皇帝赞同。

庙产兴学事件的实际发起人是维新派的康有为。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所上的《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提出，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每乡必有数庙，每庙必有公产。他建议光绪皇帝改庙宇为学堂，以庙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欧洲，责令儿童六岁以上者都必须入学读书。光绪接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在1898年七月十日的诏书中提出：“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同时又宣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七月十日之诏一颁布，立即在各方面引起反响。无论维新派还是保守派，后来都承认此举为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契机。这是历史问题，不是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不过对道教的影响是那些对庙产垂涎已久的贪官污吏、地方无赖，在所谓庙产兴学的幌子下，马上开始了掠夺侵吞庙产的行动。百日维新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庙产兴学的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庙产兴学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下去。

在庚子之变之后，清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其中就有以西式教育培育人才的政策。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堂谕旨，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后来清政府在各县设劝学所，作为县教育行政机构，下设学区，每学区设劝学一人。1906年，清政府正式奏准《劝学所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

[1]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2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26页。

地不在祀典庙宇，可租赁为学堂之用”。新政初期，政府重在提取不在祀典之庙产。但随着新政的推行，提取庙产的范围不断扩大，佛道二教的寺产、观产也在被提取之列。^[1]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庙产兴学的高潮。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这次的庙产兴学运动告一段落。

1926年到1931年为庙产兴学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26年是北伐开始之年，第二次庙产兴学的高潮与北伐的推进密切相关。北伐胜利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提议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为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等人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并且在各地组织了团体，开展庙产兴学运动。太虚、圆瑛等高僧大德以及各地著名居士纷纷以请愿、通电、著文等形式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政府保护寺庙财产。在全国佛教徒的一致反对、呼吁下，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再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但这并没有遏制住庙产兴学运动。

1930年，邵爽秋等人再次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到处成立促进会，煽动排佛。^[2]当时中国佛教会已成立，通过各种形式对邵爽秋等人的活动进行了有力抵制。1931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会前邵爽秋向代表提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要求会议立法推行，出席会议的太虚致书各代表强调佛教对社会文明与民族团结的意义，获得代表们的普遍同情与理解。在此基础上，由后藏地区（班禅）代表罗桑楚臣领衔，58人提交议案，要求政府保障汉蒙藏佛教徒的合法权利。该提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各省市将已占用的佛寺僧产恢复原状，并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再有侵占寺庙僧产者，一概依法办理。对此，国民政府表示，自从《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各省市对于寺产均依照条例处理，若一律恢复原

[1] 徐敏：《中国近代道教文化论略》，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2]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状，事实上已不可能，徒滋纠纷，实无裨益。对于后一项要求，国民政府于1931年8月颁布《维护寺产训令》，申明以后再有侵夺寺产者，依照法律办理。^[1]这样，已被侵占的寺产不可能返还，但现有的寺产得到了法律保护。此后，庙产兴学运动高潮渐过。^[2]

对浙江省等省份来说，庙产兴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事件。1935年，由于各地经常发生寺院根据《监督寺庙条例》，对已拨归学校的庙产提出异议，并诉之于司法，推翻原案收回庙产的事件，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河南七省教育厅联名提出以下意见：“凡以前拨用庙产，学校已经成立有案者，即应照常维持，不许破坏。至以后庙产，仍须遵照法令，不得擅自处理，俾于保障庙产之中，仍寓维护教育之意，教育前途，实利赖之。”^[3]也就是针对划归学产的庙产，纷纷进入司法途径，被寺庙寻求收回的事件，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七省教育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上述意见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已拨归学校的庙产，应该得到保护而不得拨回；二是根据相关法令，今后庙产在兴学上应该还有进一步的规定。对于第二点，七省教育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自1935年起，厉行《监督寺庙条例》第五、第八条的规定，实行登记及按期呈报，并遵照第十条的规定，另参酌佛教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规则第五条所定出资标准，就各地寺庙情形及财产多寡，具体规定兴办公益事业之额数，此项公益事业，在实施义务教育期间，暂时悉数移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4]

上述七省教育厅意见所提到《监督寺庙条例》第五条内容为：“寺庙财产及法物应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登记。”第八条内容为：“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

[1] 内政年鉴编委会编：《内政年鉴》（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3、124页。

[2] 马莉：《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23页。

[3] 转引自赵明娟：《20世纪上半叶浙江道教史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4] 同上。

第十条内容为：“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1]综合上述条例内容，可以知道七省教育厅也是依据《监督寺庙条例》中的法定内容推进庙产兴学的进程。这个事件对杭州道教应该是有影响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就曾经办过一个小学，名慈云岭小学，有40名学生和2名教师，但只举办一届五年。也就是这40名学生从一年级至五年级毕业后，该小学就停办了。从这个情形看，与七省教育厅提出的“暂时悉数移办短期小学”相吻合，慈云岭小学应该就是这个要求下的产物。

综观近代中国的庙产兴学运动，虽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但是对佛道两教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尤其对道教的存续与发展构成了釜底抽薪式的威胁。

二、民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

1913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规定：寺院财产管理由其住持负责；任何人不得强取寺院财产；寺院住持及其他关系人不得将寺院财产变卖、抵押或赠与他人，但因特别事故得呈请该省行政长官许可者不在此限。^[2]1915年10月，北洋政府又公布了《管理寺庙条例》，明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条例规定：“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但不得抵押或处分之，但遇有公益事业必要及得地方官之许可不在此限。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不遵守僧道清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戒，或予撤退。”^[3]该条例将寺庙住持的管理权利变为“义务”，将寺庙实际置于地方长官的管理之下，使得各种以公益为名侵占寺产的行为有了法令依据。^[4]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关于佛教和道教寺庙财产方面的法律，主要有1929年1月颁布实施的《寺庙管理条例》以及同年12月颁布实施的

[1] 《监督寺庙条例》，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53-1-3098。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92—693页。

[3] 同上，第697、698页。

[4] 马莉：《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监督寺庙条例》。而对道教有较大影响的还有1928年颁布《神祠废存标准》。

《监督寺庙条例》最后宣称：“民国十八年一月公布之《寺庙管理条例》于本条例施行日废止。”^[1]由此来看，《寺庙管理条例》只施行了不到一年时间，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条例，实际被广泛执行的当是《监督寺庙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很短，只有13条，其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确定了本条例的适用范围。首先是“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庙不适用之”，也就是《条例》主要适用于汉族寺庙。对于汉族寺庙，《条例》第三条提出三种寺庙不属于本条例的管辖范围：“一、由政府机关管理者；二、由地方公共团体管理者；三、由私人建立并管理者。”根据其内容推断，只有由信众集资建设，并由佛道教徒管理的寺庙，适用于《监督寺庙条例》。二是认定住持对庙产只有管理权，没有处置权。若要处置，需“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并且寺庙的收入不但每半年要公开一次，且只能用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三是确定“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

由于《监督寺庙条例》相当简略，只规定了寺产管理的基本原则，粗而不细，疏而不详，各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遇到了许多情况和问题，疑义很多，纷纷要求解释。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内政部相继对它进行了司法和行政解释，作为《监督寺庙条例》条款的补充。^[2]

应该说《监督寺庙条例》所涉及的主要是庙产的问题，而1928年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则涉及的是信仰的问题，其对道教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该《标准》规定：凡对于民族发展确有功勋者，对于学术有所发明、利溥人群者，对于国家社会人民有捍患御侮、兴利除弊之事迹者，

[1] 《监督寺庙条例》，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53-1-3098。原文为手抄，无标点。

[2] 马莉：《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9页。

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均予以保存。具体而言，伏羲、神农、黄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风雨雷神、土地、灶神、岳飞、关羽、吕祖等予以保留。

凡附会宗教实无崇拜价值者，意图借神敛钱或秘密供奉开堂惑众者，刻意依附草木牛鬼蛇神者，根据齐东野语、稗官小说、世俗传说，毫无事迹可考者，一律从严取缔。具体而言，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财神、送子娘娘、瘟神、赵玄坛、狐仙等予以废除。

“制定这个标准目的是保护正信，破除迷信。但在最广大的信众看来，有求必应，心诚则灵，‘伏羲’诸神与‘日、月’等神又哪里有什么高下、正迷之分呢？所以，此存废标准，非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而且在实践中行不通。”^[1]牟仲鉴认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显然对中国传统宗教缺乏科学的了解，把列入历代祀典的正规信仰同道教信仰完全混在一起，又毫无道理地把它们硬分成可存与可废两类，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2]所以该标准本于1928年10月备案，但各地执行时，经常发生纠纷，于是将标准改为参考。

浙江政府的宗教管理制度中，还有对非法道教的管理办法。浙江档案馆藏有《浙江省各区县防止非法道教流行实施办法》^[3]，其颁布时间约为民国37年（1948）1月。其颁布的原因是“本省各县近发现一贯道会之活动，该会原为敌伪组织……煽惑人民，危害民族……自应严加取缔”。也主要是针对“一贯道”活动猖獗而颁布的。《办法》共九条，其实没什么实际的内容，无非是发现非法道教组织要上报，严惩首犯，对于一般信众则有“能幡然悔悟，自动脱离，免予追究”等内容。但《办法》中列举了各种非法道教，则有一定资料价值，办法中列举的非法道教组织有“一贯道、孔孟道、空门道、一兴道、皇天道、孔盟会

[1]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 龚鹏程主编：《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第132页。

[3] 原文为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29-1-648。文字均为手抄，部分文字由于字迹模糊或是手写草体无法辨认。

等”，可知当时浙江省内秘密宗教至少有如上六个。

根据档案资料，杭州当时确有一贯道徒的活动。上述《办法》发布后，有一杭州市民对杭州的一贯道活动向当时的警局进行了举报。其主要内容称：“此种机关杭市亦有数拾处，人数众多，出没无常，诱骗妇女不可数计，每逢初一、十五或星期日必要开会集议，有时夜间又有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男女混杂，不知作何勾当，局外人会纵探悉，名曰一贯道。”警局收到举报后称：“一贯道近在杭市异常活动，总负责人号称点传师，其总机关设在杭市上珠宝巷三十号大墙门内楼上，分机关计有龙翔桥仁德里、众安桥、粮道山及杭县长桥、留下、泗乡等共十余处，每逢初一、十五或星期日必有集会，内容秘密，殊为可疑，且专以骗取金钱诱惑无知民众，请速将该总负责从宽处理究办。”然后“奉此遵即着派组员某前往侦查”，“据查复呈称该一贯道杭点传师共有四十八人之多，总点传师名鲍民泰，副总点传师名魏宝泰，其总机关设在杭市乌龙巷二十八号内，进楼上，戒备相当严密，非道人不得上楼……并搜集其书刊十一本。”^[1]从其所述来看，48个点传师，也即其约有48个分支组织，其规模应该是很大的。再从其有书刊11本来看，一贯道有相关教义的图书印行。

虽然“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也即民国时期的临时宪法《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非违背风俗及扰害社会秩序，不得干涉。”但纵观民国时期的宗教政策，主要的思路以管理和限制为主。纵观历代道教的发展无不与政权的扶持有关，在民国政府限制和打压为主的宗教管理政策下，道教发展举步维艰。又因为道教本身教义的原因及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从全国范围看，道教在民国时期只能勉强维持其生存。不过，民国时期杭州由于出现了高道李理山，所以杭州道教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相较全国来看形势尚可。

三、民国时期道教慈善事业概述

作为寺庙管理的主要法规《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规定：“寺庙应

[1] 浙江档案馆藏。引用时有节略。原文为手书草体，部分识读可能有误。

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如有违反，则按第十一条规定，“该管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职”。

1932年9月，国民政府依据《监督寺庙条例》，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寺庙必须每年分两次向政府缴纳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款项，用于民众教育、济贫救灾、育幼养老、公共卫生等公益慈善事业。由于所规定的出资比例较高，该办法在全国实施后，遭到中国佛教、道教组织的强烈抗议，内政部于1933年4月呈准行政院，通令全国各地“暂缓施行，候修改完妥后，再行呈核公布”。^[1]

1934年9月，中国佛教会拟订《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经内政部修正后，呈交行政院核准，由内政部备案，并通行各省市。对于道教寺庙，内政部也批准用该规则办理。修正后的《佛教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规则》于1935年春实施，替代原来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规定：100元未滿者出1%，100元以上300元未滿者出2%，300元以上500元未滿者出3%，500元以上1000元未滿者出4%，1000元以上者概出5%。^[2]

民国32年（1943）1月1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公函要求各省民政厅“组设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浙江省民政厅于是制定了《浙江省县市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组织章程》。^[3]这是民国时期浙江省寺庙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该《组织章程》有14条，其中包括了许多重要内容。首先，确定了委员会的人数和成员的来源等事项：“本委员会设委员七人，以左列代表充任之。1. 县市政府代表一人；2. 所属教会推派代表二人；3. 县市政府就地方自治人员中特派代表二人；4. 出资之各寺庙推定代表二人。”该条中第二款“教会系指佛道两教而言，其代表应各推一人”。委员会主席则由“本委员会委员互推”。规定每两月开会一次，如有紧急事项则由主席召集临时会议。其次确定了委员会的职权，共计三项：“1. 寺庙财产收益之调

[1] 内政年鉴编委会编：《内政年鉴》（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3页。

[2] 马莉：《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

[3] 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29-1-648。

查事项；2.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经费之征收保管及分配事项；3.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之计划实施事项。”第三则是规定了各种经费的使用和公益慈善事业收支问题，同时规定年终会召集各出资寺庙住持讨论兴办次年公益慈善事业计划。该《组织章程》最终由“浙江省政府公布施行并咨报内政部备案”。

民国时期道教较为衰落，故其慈善公益事业的规模亦不大，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一贯道、广州广化善堂和中国道教慈善至宝台等，杭州名道李理山在抗战初期收容七千难民的事件，也可载入史册。

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亦有一定影响的组织有红卍字会。世界红卍字会（简称红卍字会）始于“道院”，是道院的外围组织。道院于1916年由山东滨县人吴福永创立，以扶乩起家，也有静坐之功法，以“太乙真人”为最高神。道院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1921年，钱能训、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组织红卍字会筹备处，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其宗旨，后由内政部批准成立。^[1]道院与红卍字会是合二为一的表里组织，道院重内修，红卍字会则着重推展慈善事业。因为道院最先在济南建立，所以又称济南红卍字会为母院。道院成立之后发展迅速，并且获得军阀的支持传播各地，关内许多大城市几乎均有分会。^[2]红卍字会发展迅速的原因，与其核心人物杜秉寅有关。有学者认为：“对道院发展最为重要之人为清朝退职官僚杜秉寅。此人历任山东地区的知县、候补道台等职，与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光有旧交，在山东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17—1921年间，杜秉寅参加‘同善社’，负责济南分社的活动，主持的乩坛在济南最具影响。在刘绍基等人拉拢之下，杜秉寅开始参加静坐和扶乩活动，于是刘绍基寓中所设乩坛声势变得更为浩大。”^[3]杜秉寅与当时总统之弟的关系及其

[1] 陈明华：《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63—78页。

[2] 程杨：《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25页。

[3] 同[1]。

在济南的影响是促成道院及红卍字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浙江档案馆藏有世界红卍字会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世界红卍字会会纲》《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民国总会章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则》《世界红卍字会嘉兴县分会章程》等文件。^[1]

《会纲》为世界红卍字会总原则。《总会章程》是较《会纲》更为详细的纲领性文件，而《总会会则》则更多地阐明章程中的内容，其内容更加具体。《嘉兴县分会章程》则基本按《总会会则》的内容，变更部分名称而来。

《世界红卍字会会纲》分八纲共十九目，第一纲是“总则”，共两目，首目称“本会定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二目称“本会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红卍字会的名称和宗旨得以确定。第二纲为“组织”，世界红卍字会组织由各国总会（或主会）和分会组成，设总分会之地方还可设妇女总会及妇女分会。从中可见红卍字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第三纲为“会员”，只有一目：“凡经基本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为会员”。第四纲为“事业”，分为两类：一是“临时赈救”，二是“永久恤养”。第五纲为“经费”，经费分四种：一是“会员入会费”，二是“会员特别捐”，三是“补助费”，四是“劝募慈款”。第六纲为“会期”，分三种：一是“常会”，二是“特别会”，三是“大会”。第七纲为“会徽”，“各种标识均用白地红卍字，其式样另定之”。第八纲为“附则”，“会则及各项章程均依据本会纲另定之”。

据《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民国总会章程》“红卍字会中华民国总会（简称为中华总会）”，故浙江档案馆所藏《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民国总会章程》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则》为一个总会的章程和会则，并不是有“中华民国总会”和“中华总会”两个总会。《总会会则》较《总会章程》更为详细，以公益慈善事业为例，《总会章程》第二章“任务”称：“本会之任务分永久性及时临时性两项”，每项下各有四款内容。《总会章程》中的“任务”在《总会会则》中改称“事业”，其

[1] 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035-001-0107。

中“临时类”细分为六项，分别为：“（一）救济队；（二）赈济队；（三）收容所；（四）临时医院；（五）粥厂；（六）其他。”“永久类”更细分为二十一类，分别为：“（一）护世队；（二）学校；（三）报社；（四）恤养院；（五）医院；（六）育婴堂；（七）孤儿院；（八）残废院；（九）贫民工厂；（十）平糶局；（十一）产局；（十二）恤嫠局；（十三）恤老局；（十四）因利局；（十五）贷济部；（十六）栖流所；（十七）施诊所；（十八）施药所；（十九）施棺所；（二十）惜字处；（二十一）其他。”通过对比可知《总会章程》是较《会纲》更为具体的行动纲领，而《总会会则》是带有具体行动指导的文件。

有些学者往往将道院与红卍字会混为一谈，称道院即红卍字会，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道院是以扶乩起家的宗教组织，而红卍字会是道院创办的一个慈善组织。浙江省档案馆收藏有《世界红卍字会嘉兴分会理监事名册》，其名单及其职务和略历如表1.1。

表1.1 世界红卍字会嘉兴分会理监事名册^[1]

职 称	姓 名	年 龄	籍 贯	略 历
理事长	顾速明	五七	嘉善	嘉兴县商会理事长
常务理事	钱遂仁	五八	嘉兴	嘉兴永嘉木行经理
	汪育贤	六八	同上	萧山志和钱庄经理
	蒋扶青	六一	同上	永明电灯公司经理
	虞叶厚	五〇	同上	嘉兴救济院副院长
理事	钱伯英	七三	吴兴	前嘉兴帝国银行行长
	冯日宣	四九	嘉兴	嘉兴县参议员
	于怀仁	五四	同上	会计师
注：原件分两页，以下为第二页。				
	孙涵仁	五九	嘉兴	嘉兴姚庄总账房
	沈希平	四四	同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襄理
	沈炳文	四九	同上	上海泰记锯木厂经理

[1] 浙江档案馆藏，档案号L035-001-0107。

续 表

职 称	姓 名	年 龄	籍 贯	略 历
监事长	顾绍钧	五二	同上	律师
常务监事	吴允斌	五八	同上	律师
	周利人	五四	同上	嘉兴永嘉木行副理
监 事	田孝兰	五六	同上	招商局科长
	沈端夫	七二	海宁	永茂普号经理
	朱斐君	五六	嘉兴	中医
	祝浚明	四八	同上	上海其昌钱庄副理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红卍字会嘉兴分会理监事人员大多数人均有商业背景,从中或可以认定红卍字会主要的任务是慈善事业,招集商业背景会员的目的当然是方便筹集善款。从这个名单来看,红卍字会与宗教无关。从而可以认为红卍字会与道院不能相等同。

世界红卍字会成立之后,立即就着手于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红卍字会的分布相当广,遍及全国,各地都有其分会的存在。该组织刚成立的前两年发展速度惊人,1924年时,各地的分会就已达120多处。此后发展的速度有所减慢,但是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据熊希龄回忆,至民国17年(1928),“各省县暨日本神户等处设立分会约共一百五十余处”^[1],而到了1936年时进入到全盛时期,各处分会共达413处,可想而知如此众多的分会,在开展慈善活动时将是何等的声势浩大。^[2]

据程杨统计,上述21项永久慈善内容主要举办情况如表1.2。^[3]

表中所列的各项慈善事业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则》中所列临时、永久事业的款目基本等同,说明红卍字会组织严格地按照《会则》开展了慈善事业,是组织性较强的道教慈善组织。

[1] 周秋光:《熊希龄集》下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3页。

[2] 程杨:《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27页。

[3] 同上,第27、28页。

表1.2 红卍字会开展慈善活动情况

类 型	主要慈善内容	备 注
学校	包括小学、中学以及职业中专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红卍字会兴办的学校中还是以小学为主，以1941年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兴办了小学达85所	卍字中学：总会于1933年在北京西郊的青龙桥设立，专门接受各地分会送来的成绩较好的学生，但是由于1937年全面抗战的缘故，被迫停办
医院、施诊所、施药所	主要是实施义诊、施药、医疗等慈善活动	北京、牟平、泰安、上海、合肥等16处；各地分会共设诊所作为医院之准备者共计94处；常年配置中西药品设所施放者共计88处
残废院	专门收养肢体不全或因病残废之人	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牟平、察南各会共设6处
贫民工厂、贫儿习艺所	收纳当地被灾区贫民、贫儿，延请技师教以染织等工艺，以养成技术人才	莱芜、包头、烟台、泰县、曲塘、西安各分会均经设立
恤嫠局、恤产局	各会设局抚恤贫苦产妇及孀居嫠妇	计专设恤嫠局22处，恤产局14处；另，烟台、牟平两分院则附设于恤养院内
平糶局	各会遇各地灾歉民食不足时，购米粮开办平糶	共计设立7处
因利局、贷济所	各地设立因利局或贷济所贷给贫民小本营生，一月后无息陆续归还	共计设立48处
育婴堂、孤儿院、恤养院	对于各地无力抚养之婴儿，雇保姆看护，稍长入幼稚园或小学，成人后有人领回者听之，其男女孤儿院教以工作	各会设立育婴堂共计18处，孤儿院5处，恤养院3处
防疫所	各地遇有疫症发生时，备西药免费注射，并施送防疫药品	共计成立12处
慈济工厂	使贫民以工代赈，特设印刷所排印田会宣传慈善之文字	共计成立济南等4处
公墓、义地、施棺	专为帮助各地贫民死亡无力置棺营葬者而设	北京设有2处，其他分会设施棺所共40处
粥厂	每届冬令或紧急灾荒，凡贫民无力生活者则设粥厂以救济	北京历年例设粥厂2处，其他各地分会亦随厂以救济时随地或按年按季设立，每年约有40余处
冬赈	各地每至严冬，鉴于贫民饥寒交迫、无衣无食，除设粥厂外，筹集赈款、赈粮、棉衣，按户施放	

根据资料，浙江省除嘉兴有红卍字会组织外，杭州也有红卍字会组织。杭州玉皇山福星观李理山收容七千难民时，由于战争封锁，李理山以杭州红卍字会会长的身份，通过红卍字会与日军打交道将粮食运上山供难民食用，故可证民国时期杭州也有红卍字会组织。

第二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宫观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宫观概述

20世纪初杭州道教宫观寺庙的情况，我们根据民国5年（1916）续修的《杭州府志》进行整理。因为该书的“祠祀”一至五即卷九至十三和“寺观”一至五即卷三十四至三十八，一字不差全抄光绪二十四年（1898）编就的《杭州府志》，这就使得它成为研究1898年至1916年杭州道教唯一可以利用的比较全面的文献。1900年左右杭州道教主要宫观寺庙情况见表2.1至表2.10。

表2.1 府城（计100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府城（杭州城内）	轩辕黄帝庙	城东北隅	宋至道元年		原为忠清里通圣庙，又传为机神庙祀皇帝臣伯余	1
	先蚕庙	在轩辕黄帝庙内	清乾隆五十九年			2
	仓圣庙	吴山	清同治八年十月			3
	关帝庙	吴山承天观右	清雍正三年			4
	照胆台关帝庙		明万历年间		唐永福寺旧址，又多处别建	5
	文昌庙	吴山承天观	宋端平三年		又名梓潼庙，又一在西湖集庆寺侧，一在孤山四贤祠侧	6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府城 (杭州城内)	城隍庙	旧在凤凰山, 后移至宝月山	宋绍兴九年		原为永固庙, 宋绍兴九年移宝月山	7
	小城隍庙	保安坊	宋绍兴九年			8
	火德庙	吴山梓潼庙南	宋室南渡后			9
	水神庙	宝月山	明万历二十五年			10
	龙神庙	瑞石山	清雍正五年			11
	嘉泽庙	孤山之麓	宋乾道五年		后易名为莲池庵	12
	龙井龙王庙	凤篁岭	宋绍兴十八年			13
	会灵庙	涌金门外	宋庆元六年			14
	顺济庙	江干	宋绍兴三十年			15
	黄龙祠	钱塘门外扫帚坞	宋淳祐年间			16
	神雷庙	吴山东岳庙右	明天顺六年		俗称神霄雷院	17
	东岳庙	吴山	宋大观中			18
	古东岳庙	西溪法华山	宋乾道三年		为杭州岳庙之冠	19
	南岳庙	武林门外			元时别建在太平里	20
	太岁庙	吴山之巅浑仪台侧	宋朝	今废	旧名至德观	22
	英卫公庙	吴山	唐元和十年			23
	二圣庙	观桥东马军司西营			旧名仰山二王庙	24
	天曹庙	留下	唐长兴二年			25
	灵惠庙	城北江涨桥镇	梁大同二年			26
	崇善庙	城北皋亭山	梁大同二年		另有三处	27
	二郎神庙	忠清里				28
	显佑庙	仁和县	唐武德年间			29
	东嘉忠靖王庙	羊市街旌德观	唐代			30
	灵济庙	吴山				31
	潮王庙	芳林乡	唐长庆年间		又名石姥祠	32
	吕祖殿	吴山	清嘉庆九年			33
	天泽庙	西湖金沙港	宋嘉熙年间		又名履泰将军庙	34
	顺济圣妃庙	艮山门外	宋宣和五年			35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府城 (杭州城内)	天后宫	武林门内北隅	清雍正八年			36
	天妃宫	孩儿巷北	明洪武初			37
	昭贶庙	候潮门内浑水闸东	宋庆历二年			38
	安济庙	旧在荐桥门外	宋宣和年间		俗名祖庙	39
	灵惠庙	钱塘	宋建炎年间			40
	协顺庙	石冢	宋宣和中			41
	三夫人庙	定北乡	宋淳祐年间			42
	灵休庙	江干	宋绍兴年间			43
	葛相公庙	江干	宋绍兴初			44
	灵应庙	小麦岭	宋绍兴十一年			45
	惠应庙	吴山至德观右	宋室南渡初			46
	撒沙夫人庙	皋亭山	宋建炎年间		俗称半山娘娘庙	47
	运德海潮神庙	琵琶街	宋德祐三年		俗称龙吟庵	48
	惠顺庙	江塘	宋嘉定五年			49
	周宣灵王庙	褚家塘	宋嘉定四年			50
	英显通应公庙	庙子头	宋宝祐元年			51
	广灵庙	石塘坝	宋景定四年			52
	广福庙	盐桥	宋咸淳初			53
	金龙四大王庙	钱塘	南宋末			54
	晏公庙	武林门	周显德二年			55
	总管庙	清波门				56
	刘猛将军庙	吴山	清雍正二年			57
	茶槽庙	会城	明永乐年间			58
	吞金祠	葛岭下				59
	张烈妇祠	跨塘桥南				60
	刘烈女祠	江干南新桥畔				61
	八旗贞烈祠	驻防营杨家牌楼	清光绪三年			62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府城 (杭州城内)	申将军庙	临平斗门桥北				63
	嘉济庙	吴山	明隆庆三年		又名江东庙	64
	萧王庙	斯如坊三图	清雍正七年			65
	显忠庙	长生老人桥西	宋绍兴年间		又名霍使君庙	66
	旗纛庙	太平里普济桥东	明洪武三年			67
	葛仙翁祠	葛岭				68
	马滕庙	溜水桥			明万历三十六年重葺	69
	二郎祠	官巷	宋绍兴元年			70
	崔府君庙	忠孝坊	南宋			71
	广惠庙	钱塘门外	宋康定元年			72
	显应庙	杭州府治	宋宝祐五年			73
	华光庙	华光巷	宋嘉祐年间			74
	嘉应公庙	武云山				75
	至德观	吴山	宋端平年间御书匾曰“至德之观”	元、明曾重建	又名太岁庙	76
	东岳中兴观	至德观左	宋大观中			77
	通元观	七宝山东麓	宋绍兴年间			78
	三茅宁寿观	七宝山东麓	唐为三茅堂	今仅存三茅君小殿		79
	元妙观	石龟巷	唐为紫极宫，元改今名			80
	真圣观	元妙观左	后唐乾符年间			81
	佑圣观	钱塘兴礼坊	宋淳熙三年诏改为宫			82
	旌德观	羊市街	旧址为先贤祠，宋宝庆二年改为观			83
	宝极观	观桥西北	元延祐五年		观内有张三丰遗像	84
	仁和观	夹道巷	宋绍兴年间			85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府城（杭州城内）	紫琼观	盐桥东南	元至元年间		紫金观巷亦有紫琼观	86
	元贞观	宋礼部贡院西	唐中宗景龙二年			87
	元同观	八字桥西癸辛街	元至元癸巳建		入驻防城内	88
	重阳庵	吴山右	唐开成年间		清咸丰兵燹毁后在旧址建刘文达公祠	89
	紫阳庵	瑞石山	宋嘉定年间		清乾隆二十二年迁庵于宝成寺后	90
	长春庵	东西壁	元至治初		别建一今入驻防营内，又曰在相安巷；明弘治十一年赐真武像和玉枢经于庵内	91
	凝真庵	平安坊	元至正庚子			92
	三圣庵	菜市桥西	明嘉靖年间			93
	纯阳庵	褚家塘	元至正丙戌			94
	玉书道院	吴山	明天顺六年		俗称神霄雷院	95
	显真道院	东里坊庆春门内	宋建炎三年			96
	福佑院	褚家塘	周显德元年		今名皮市庙	97
	紫霄宫	云店寺侧	清乾隆辛卯		旧为瑞凝道院	98
	车岳中兴观	吴山				99
	承天灵应观	吴山			俗称三官庙	100

表2.2 海宁州（计26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海宁州	关帝庙	县西南镇海门内	梁天监七年		即庆善寺	1
	武帝庙	长安镇	清康熙十一年			2
	文昌宫	长安镇	清乾隆元年			3

续 表

府 县 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 状态	备 注	序 号
海 宁 州	旗纛庙	海宁所廨宇之后	明洪武二十五年			4
	城隍庙	县西北	清雍正十三年	今存		5
	潮神庙	城东小尖山之麓	清康熙五十九年	已毁		6
	海神庙	春熙门内	清雍正七年			7
	福宁宫	尖山西麓	清乾隆五年	已毁		8
	镇海庙	城南	明崇祯年间			9
	龙祠	长安	宋咸淳年间			10
	龙王庙	城南捍海塘	清雍正年间移建			11
	东岳庙	城东南	宋熙宁年间	已毁		12
	东岳行祠	县东南	宋真宗年间			13
	石王庙	县西北	清雍正十一年			14
	崇佑庙	县东北	宋绍兴十一年			15
	福济庙	县东金牛山下	宋绍兴年间			16
	天妃庙	县东	元泰定四年	今部分 尚存		17
	白马王土地庙	县北	明成化二十一年 重建			18
	金龙四大王庙	长安镇	乾隆二十二年			19
	晏公庙	县东北	元			20
	萧王庙	县西文进桥	元	祀元萧穆		21
	三皇庙	县治西北	元延祐五年	已废		22
	五土庙	县治东北	康熙四十三年重建			23
	禹秦二王庙					24
	泰王庙					25
	关帝庙	县西南镇海门内	梁天监七年		即庆善寺	26

表2.3 富阳县 (计11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富阳县	关帝祠	观山南麓	明万历七年			1
	文昌祠	在县学东,后移观山上	明	已废	清康熙十一年和十四年重修	2
	城隍庙	县治东	唐咸通八年	已废	明清曾重建	3
	仁惠龙王庙	宝山院	齐永明中	已废		4
	东岳庙	县东北一里小龟山上	明崇祯重建			5
	惠灵庙	县西一里	吴			6
	福佑庙	县北长寿里	宋咸淳四年,明洪武复建			7
	孙公祠	庆善里	汉			8
	东平王庙	恩波桥西二百步	唐			9
	玉虚殿	观山上	明万历三十七年		今春江第一楼	10
	赤松子庙	县东一十里				11

表2.4 余杭县 (计40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余杭县	先蚕祠	县治东北二里	清乾隆五十九年		嘉庆十二年重修	1
	关帝庙	县西数十步	数毁于火,清咸丰和光绪年间重建			2
	文昌阁	东关外	明万历二十年			3
	城隍庙	县治东半里许	明洪武初建		明清曾数度重建	4
	洞霄龙王祠	洞霄宫西虎后	宋建炎年间		宋明曾重修	5
	径山龙王祠	径山	宋孝宗年间			6
	龙王祠	县东半里				7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余杭县	白崖山龙王祠	县东北四十里				8
	齐亨龙王祠	县西北五十里				9
	东岳庙	县南五里凤凰山下	宋熙宁年间		明清曾重建	10
	惠泽庙	县南湖塘	宋		俗称三贤祠	11
	天曹庙	南湖塘			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增建、重建	12
	萧王庙	县东南十里萧王台上				13
	归府君庙	南湖塘	唐宝历年间			14
	白宫祠	县治土地祠东				15
	胡将军庙	县东南一里有奇			明洪武三年、清乾隆年间曾重建	16
	周府君庙	县南香泉坊内	宋绍熙年间			17
	旌德祠	凤山	明洪熙初年			18
	三皇庙	县前之西,后徙县东			明洪武四年度	19
	五显灵官庙	县五里东南隅市		明洪武二年徙至此	初建于安乐山	20
	南陵五圣庙	县治南三里许				21
	吕祖师庙	南湖东三观店前		旧在三官殿左室,清嘉庆十一年迁至此		22
	真君院	南建界	元至元初			23
	真武院	县西十里长沐湾			康熙十一年重修	24
	清真道院	东天柱岭青檀山之阳	宋咸淳年间			25
	凝真道院	九锁外墓坞	元至元壬午			26
	若虚道院	县市西	元至元戊子			27
	通明道院	县相坞	元至元己丑			28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余杭县	玉清庵	闲林市东	元大德己巳			29
	清真庵	石瀨	元至元庚午			30
	紫清庵	上坞青紫陇山下	元至元乙酉			31
	洞霄宫	县南十八里	汉元封三年		乾隆辛未冬几毁于火	32
	碧霞庵	舟枕山			旧名碧霞庵，乾隆二十六年重建	33
	太平庵	县北十五里白社界			清嘉庆二年重建	34
	洞晨观	县东郭河上安乐山	宋景定癸亥		系洞霄麻院	35
	元阳观	大涤山后	宋咸淳年间			36
	冲天观	县西西徐村			元至元乙亥重建	37
	朝元观	天柱上	宋咸淳年间			38
	龙德通仙宫	县市南南口	元至元癸未			39
	至道宫	县北三十里曹桥西	唐文明元年		初名福业观	40

表2.5 临安县（计26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临安县	关帝祠	一在拱极门、一在青山镇、一在长桥西	明万历三十七年		清光绪年间重建	1
	文昌阁	东门城内				2
	城隍庙	县东五十步			旧在县北，明洪武、清乾隆、光绪年间曾重建	3
	惠泽庙	县西四十里	宋淳祐八年			4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临安县	东岳庙	县治西七里福兴乡玉泉山下	清雍正年间			5
	钱王太庙	县治东三十步				6
	晏公祠	聚金门外	元			7
	三皇庙	县西南	元			8
	彭祖庙	县东北一十五里谷昌乡			苏轼曾题诗	9
	华光庙	县东谷昌乡				10
	土地祠	县治仪门外				11
	太平庵	恩波庄西郭坂				12
	元阳观	县西南三十里洋涨村	唐咸通十二年		明洪武二十四年并丹霞观	13
	妙庭观	县西北十五里临湖村	宋治平二年	久废		14
	丹霞观	县北方郭里	宋政和元年	今废		15
	紫霄宫	大源山去县南三十里	宋靖康丙午至宋绍兴十三年成观			16
	崇亲思孝宫	县南三十五里大源山	宋绍熙二年	今废		17
	道兴院	县东南四十里	宋乾德二年赐额		旧名新兴	18
	真觉院	县东十五里	宋乾德三年赐额		旧名建成	19
	福胜院	县西北二十里	宋乾德四年建		旧名福全	20
	崇觉院	县北三十里	宋乾德中			21
	紫阳宫	县西北四十里	梁大同二年			22
	崇道宫	县北二十里	唐垂拱四年			23
	元寂宫	县西四里	唐乾元中			24
	新兴宫	县西北三里	梁乾化元年		旧号龙德	25
	冲虚观	县西十五里	后唐同光四年			26

表2.6 於潜县 (计22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於潜县	先蚕祠	南阳山外, 附城隍庙后殿	清嘉庆六年	今存		1
	关帝庙	县治西二十步	清顺治前后			2
	文昌祠	旧附学宫				3
	文武帝庙	桃源山	清同治十年			4
	城隍庙	白云庵下			宋隆兴初年徙至县西酒务侧, 明清曾数度重建	5
	古治城隍殿	用前城后庄			清咸丰十年重建	6
	城隍行宫	北门外			清光绪十五年重建	7
	龙王殿	县南竹岭下				8
	东岳别庙	县西北三里观山				9
	昭应庙	县北四十五里	宋崇宁三年			10
	灵惠庙	县西南三十五里	宋绍熙四年			11
	孚惠王庙	县东北嘉前乡			即玉道宫	12
	皇甫府君祠	县治东十五里青顶山			南天目	13
	三皇祠	县西德应坊	明洪武元年			14
	药王庙	县南叶村庄	清光绪二年			15
	元帝庙	波前乡乌龙庙				16
	华光庙	西门外				17
	五显庙	西门外				18
	真君庙	县北三十二里象鼻山上	清顺治年间			19
	天师庙	川前紫溪庄			咸丰年间毁又重建	20
	齐王庙	波前泥钟				21
	仙姑庙	南山下			清光绪二十一年添建	22

表2.7 新城县 (计20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新城县	先蚕祠	小东门外	清乾隆五十九年			1
	关帝庙	城中十字街口			清乾隆、光绪年间曾重修	2
	文昌阁	县西南门	康熙四十年			3
	城隍庙	县治东南	明洪武八年		清嘉庆、光绪年间曾重建	4
	火德庙	城北门				5
	龙王庙	分为四处				6
	贝山龙王灵济庙	县东北二十里昌东乡				7
	仙女龙王灵庙	县西北四十里郑家山	宋乾道年间		即新妇洞	8
	鱼洲山龙王灵惠庙	县西北六十五里南新乡	宋淳祐九年			9
	潮神庙	塔山下, 又一在太平里				10
	东岳行庙	县西半里果园山麓	宋景德年间			11
	仓王庙	县署常平仓内				12
	广利庙					13
	金龙四大王庙	南门外一里	明天启四年			14
	东平王庙	社坛内				15
	三皇庙	县市登贤坊西				16
	神农祠	城东				17
	药王庙	许公祠侧				18
	元帝庙	北门内				19
	土谷祠	县治后宝兴坊	明			20

表2.8 昌化县 (计19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昌化县	关帝庙	城隍庙右				1
	梓潼庙	一在县东紫微岭, 一在县西门外	明万历中			2
	城隍庙	县西北一里			明洪武二年复建	3
	东岳庙	一在县东五圣巷内, 一在县西颊口凤凰岭				4
	东岳行祠	县南过溪二里	宋开禧二年		后并上清宫	5
	晏公庙	县西三里凤凰岭				6
	许由庙	箕山上				7
	萧王庙	县西九十里				8
	萧曹庙	县土地祠左				9
	东平王庙	县西三十里	宋			10
	三皇庙	县东门内街南		元末兵毁		11
	灵山行祠	县东南上清宫之东	宋庆元年间		徐偃王祠	12
	真武庙	县西凤凰岭				13
	华光庙	县西七十五里河路				14
	五显庙	县西三里石壁湾西晚村				15
	紫微道院	县东一里紫微岭	元延祐庚申			16
	上清宫	县东南一里	宋绍兴元年	已废		17
	宗源宫	县西南七里白山后	元			18
	真圣观	县西一里	元初改观		旧为佑圣庙, 今为城隍庙	19

表2.9 钱塘县 (计17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钱塘县	玉虚观	龙山	后梁龙德三年	已废		1
	四圣延祥观	葛岭	宋绍兴十四年			2
	显应观	涌金门外	宋绍兴十八年			3
	冲虚观	履泰山麓	宋绍定中	已废		4
	灵应观	小麦岭	宋宁宗时	已废	改为仁寿院	5
	旌德观	苏堤映波桥后	宋宝庆二年		今移至保安坊	6
	真圣观	六和塔侧	宋宝庆二年			7
	崇真道院	苏堤第四桥	宋淳熙四年	久废	今改为僧院	8
	神霄雷院	庆化山	宋淳熙年间			9
	真觉院	桃源岭	明嘉靖三十八年			10
	天医院	胭脂岭				11
	上清宫	雷峰塔北	宋淳祐年间	久废		12
	太清宫	小麦岭	宋绍熙元年	久废		13
	西太乙宫	孤山之南	宋淳祐年间	久废		14
	天清宫	青芝坞	宋宝祐年间			15
	明真宫	湖墅	宋嘉定年间		今移建钱塘仓北, 后改为三藏寺	16
	神仙宫	西溪	宋			17

表2.10 仁和县 (计10座)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仁和县	葆真观	县西南三里	宋绍兴初		后移建县东南二里	1
	南山道院	沈山南麓	宋景祐年间		又作玉真道院	2
	延生道院	城东四十里	宋淳熙元年		后并葆真观	3
	玉宸道院	长安镇	宋淳熙年间		元复建	4
	奉真道院	城西北	元至元二十九年建		俗名北道宫	5

续 表

府县名	宫观名	地 址	创建时间	存废状态	备 注	序号
仁和 县	玉虚道院	城东十里转塘	元至顺二年			6
	全真道院	城东四十里	元至正十五年			7
	元真道院	城西南六十步	明洪武二年		俗名南道宫	8
	永昌宫	长安镇石塘湾	清乾隆元年			9
	真圣堂	县东北六十里硖石镇	元至正十一年		明洪武年间并奉真道院	10

为了理解上表，有必要了解杭州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区变迁。清代杭州府管辖钱塘（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湖滨、清波街道及紫阳街道北部）、仁和（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庆春、天水、长庆、潮鸣街道）、富阳（今浙江省富阳市）、余杭（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市）、於潜（县治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新城（县治在今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昌化（县治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等8县，另有海宁州（州治在今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宣统三年（1911），钱塘、仁和县撤裁，由府直辖，杭州府辖6县1州。从上表可知，当时杭州府城（杭州城内外）有道教官观寺庙101座，海宁州有26座，富阳县11座，余杭县40座，临安县26座，於潜县22座，新城县20座，昌化县19座，钱塘县17座，仁和县10座，合计292座。除去已废者，实存272座。

进入民国时期，杭州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民国元年（1912）2月，废杭州府，以原钱塘、仁和县地并置杭县，直属浙江省，并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省以下设道，以清杭嘉湖道范围置钱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驻杭县，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登、昌化等20县。民国16年，废道为省、县二级制，撤销钱塘道，各县直属省。同年5月，划杭县所属城区等地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开始于此。同年10月市下设区，辖城区、西湖、江干、会堡、湖墅、皋塘6区。民国19年，杭州市改为13个区（第一区至第十三区）。民国23年合并为8个区（第一区至第八区）。民国24年，浙江省设立行政督察区，杭县属第

二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嘉兴（后迁德清），杭州市仍为省直辖。民国26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沦陷期间，原8个区改为7个区。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市政府、杭县政府迁回杭州。杭州市恢复8个区。民国36年5月，杭县改省直属。

民国16年，国民政府废除“天师”称号。1928年，中央颁布《寺庙登记条例》。1928年4月，浙江省政府颁布《寺庙财产登记暂行办法》，次年颁布神祠存废标准，6月杭州市政府登记公告的有玉皇山福星观、吴山城隍庙等60座。显然，由于杭州行政区划变化和采用了新的登记标准，所以道教宫观寺庙的数字发生了较大变化。

1932年，全省道教有宫观寺庙1041所。^[1]民国21年，据社会调查，杭州有宫观280所。^[2]但据《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只有175所。^[3]由于现存资料缺乏对调查实况和统计标准的说明，所以难以弄清两份统计之所以有差异的原因。

这一时期，杭州市各宗教的实力对比颇为鲜明，如表2.11所示。

表2.11 杭州市各寺观教堂财产及附属事业统计
(据民国21年杭州市经济调查文化教育篇)^[4]

教别	土地	房 产		附属事业		备注
		房屋	住宅	学校	慈善	
佛	8786	145	437	1	0	
道	629	12	91	0	0	
回	0	11	5	2	0	
耶稣	0	19	4	16	8	
天主	0	1	0	0	3	
总计	9415	187	543	19	11	

[1] 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印：《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教87《全省宗教团体教堂寺院数统计图》。

[2] 《杭州市志》第九卷《民族宗教篇》，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8、449页。

[3] 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印：《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教88《杭州市寺庙统计表》，杭州正中书局1935年版。

[4] 千人俊纂：《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房屋”和“住宅”的合计数不对，但原稿如此。

从表2.11可知，杭州各宗教大多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据《杭州市志》，主要情况如下：佛教办有益新小学，伊斯兰教办有穆兴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基督教办有中小男女学校16所，孤儿院3所，公益社3所，医院1所，施诊所1所，天主教办有育婴院1所，施诊所2所。道教没有。应该指出，上表办学方面的统计显然有疏漏。因为，1919年，玉皇山福星观在慈云宫创办初级小学，招收40名学生（均系河南流浪儿童），供读书、膳宿，后来一部分学生在福星观出家为道士。只是这所学校只办了一届五年即行终止。1929年，涌金门金华庙住持，联络杭城热心教育者，在庙的边殿创办了涌金小学，学生有百余人，设3个班级。该校抗战期间停办，1946年重新复校，1950年归口教育部门。不过，从上表确实可以看出，道教和天主教力量弱小。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最多者为基督教，最少者为道教，佛教在慈善事业方面也做得不多。总体来看，佛教、道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但对服务社会的意识较差，在兴办学校和举办慈善事业方面不够重视。不过，应该指出，上表除办学外的统计同样有疏漏。杭州道教界许多人士谙内外科医术，识中草药，会气功、推拿、针灸，有义诊、施诊、施药等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民国时，杭州著名道院有玉皇山福星观、葛岭抱朴道院、拱宸桥张大仙庙、大关明真观、马市街雷祖庙、城隍山城隍庙、孤山财神庙等每年夏季常备茶汤，方便人们饮用，对中暑病人施痧药、十滴水。1947年至杭州解放，杭州道教会还聘请中医师在涌金门金华庙坐堂义诊，并设中药房，对贫病求医者，无偿施诊送药。除施诊、施药外，杭州道教人士还举办多种公益事业活动。1944年，福星观道士及民工修建从阔石板到长桥8尺宽的道路0.5公里。平时，各宫观还力所能及地资助抗灾、扶贫。但是，因为这些施医送药等活动是间歇性的偶然活动，缺乏连续性和规模效应，所以难以被纳入上表中而统计到。

据《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杭州面积共650平方里（合162.5平方公里），有寺院教堂986所，平均两平方里（0.5平方公里）便有3所（房屋住宅不计）。上述五教僧侣共计8705人，占全市人口的1.54%。僧、道所有土地9415亩，占全市亩数的2.68%。五教中，佛、

道尤大。全市共有寺观庵堂956所，人数4412人，占全市人口0.84%，土地9451亩，占全市面积2.68%。1927年僧尼道数为3398人，1928年为3826人，1929年为3374人，1930年为3778人，1931年为4422人，1932年为4412人，五年之内增加一千余人。这就是说，1928年至1932年这四年，僧尼道人数增加较多。

1936年1月，内政部颁布《寺庙登记规则》。1936年9月，登记寺庙890所，较1929年登记少55所，因无僧道住持的寺庙遵照规定不予登记。^[1]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杭州市行政区划再次发生较大变化。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为浙江省直辖市，并为浙江省省会。原杭州市第一至第八区依次改为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区。1950年6月，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撤销。1951年12月杭县划属杭州市。1952年11月杭县又改为省直辖，杭州市复置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并增置古荡、上塘两个郊区，市共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笕桥、艮山、上塘、古荡10个区。1954年9月，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6个区建立47个街道办事处。1955年5月撤销古荡区，并入西湖区。1956年，撤销艮山、笕桥、上塘3个郊区。1957年4月，撤销中城区，所属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两区，此时，杭州市共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同年9月杭县划归杭州市。1958年4月，撤销杭县，原杭县的长命乡、瓶窑镇划归余杭县，其他35个乡、镇和余杭县的闲林乡划归杭州市。杭州市增置笕桥、临平、塘栖、三墩、上泗5个郊区，同年12月撤销，在所辖境域和江干、拱墅、西湖3个区的农村建置西湖、古荡、四季青、浙麻、

[1] “查民国十七年四月奉浙江省政府颁布《寺庙财产登记暂行办法》，即经遵照办理，正将结束间，又奉中央颁布《寺庙登记条例》，复经令飭前杭州市公安局办理至十八年办理完竣，共计登记寺庙九百四十五所。二十五年一月间奉内政部颁布《寺庙登记规则》，飭将寺庙重新登记。本府于同年三月一日起着手办理，至九月结束。计审查符合者共计八百九十所，较之民国十八年登记总数短少五十五所，因市内寺庙无僧道住持，遵令均免登记故也。”（千人俊纂：《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

塘河、笕桥、九堡、临平、亭趾、塘栖、东塘、四维、三墩、良渚、留下、上泗16个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底，原属宁波专区的萧山县、建德专区的富阳县划归杭州市管辖。1959年2月，撤销拱墅区，在原笕桥、临平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半山联社；原三墩、上泗、拱墅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拱墅联社。1960年1月，半山联社与拱墅联社合并改称钱塘人民公社联社，将所辖的笕桥公社划归江干区，又将原拱墅联社中4个街道和塘河公社划出，恢复拱墅区。同年4月至9月，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区分别成立5个城市人民公社。同年8月，桐庐县从金华专区改属杭州市，并撤销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临安县从嘉兴专区改属杭州市，同时撤销昌化县（含於潜）并入临安县。1961年3月，上城等5个城市人民公社恢复区人民委员会职能；临安县的余杭、仓前等7个公社（原余杭县所辖地）划归钱塘联社；钱塘联社所辖上泗、留下公社划归西湖区。同年4月，钱塘联社改制为余杭县。康桥公社划归拱墅区。同年12月，析桐庐县原富阳、新登两县地，重置富阳县。1963年5月，建德、淳安县由金华专区划属杭州市。至此，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个县。1969年初，撤销西湖区。原西湖区的南山、北山、西溪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拱墅区管辖。以原西湖区7个公社和灵隐街道、拱墅区3个公社、江干区5个公社和笕桥镇，建立杭州市郊区。1972年，恢复西湖区建制，将原西湖区所辖4个街道和西湖公社分别从杭州市郊区和上城、下城、拱墅区划回。1975年12月，原属江干区5个公社中的4个公社（除红卫公社）和笕桥镇从杭州市郊区划回。1977年，撤销杭州市郊区，将原辖古荡、留下、袁浦等10个公社划归西湖区管辖。1978年8月建立半山区。1985年底，杭州市共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6个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个县。1990年半山区撤销，原半山区并入拱墅区。

据1950年3月调查统计，杭州市有道教宫观78处^[1]，其中全真派的有44所，正一（原文中用正乙，实为正一的俗写）派的有34所，见表2.12。

表2.12 1950年杭州道教宫观情况^[2]

宫观名称	派别	地 址	住 持	人 数	备 注
福星观	全真	玉皇山	袁宗凯	33	
黄龙洞	全真	白沙泉	陈崇朴	6	
抱朴道院	全真	葛岭山	李玄林	1	
慈云宫	全真	慈云岭	管诚真	5	
张大仙庙	全真	拱宸桥	诸真培	2	
大王庙	全真	德胜坝	蔡理清	3	
嘉祿宫	全真	荡荡桥	杨明慧	1	
仁佑宫	全真	知足亭	张复元	1	
放生道院	全真	观音桥	仲子真	2	
朱金祝庙	全真	松木场	杨铁仙	3	
金鼓洞	全真	白沙泉	张理金	3	
甘王庙	全真	清泰门外	赵正亮	1	
元帅庙	全真	水澄桥	金至仁	1	
则神庙	全真	六部桥	蔡宗根	5	
北观音洞	全真	阔石板	姜诚缘	4	
登云观	全真	天真山	邱命顺	4	
明真观	全真	大关	陈永德	1	
火神庙	全真	西大街	袁宗凯	1	
宣茶观	全真	草营巷	蔡理清	2	
隆恩院	全真	茅廊巷	张理义	5	
佑圣观	全真	佑圣观路	王理莲	10	道姑

[1] 据1950年4月的《浙江省各市县宗教寺庙迷信团体调查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3-002-33）则为80所。

[2]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0—442页。

续 表

宫观名称	派别	地 址	住 持	人 数	备 注
千胜庙	全真	宋浇造巷	邱园朴	3	
东关帝庙	全真	万安桥	董理仁	5	
雷祖庙	全真	马市街	邱园朴	1	
西关帝庙	全真	万安桥	董理仁	1	
千古一人庙	全真	丰禾巷	倪至新	3	道姑
元帅庙	全真	皮市巷	吴宗志	1	
显真道院	全真	庆春街	徐圆方	5	
总管庙	全真	东街路	廖宗山	5	
凝真观	全真	忠清巷	何教彬	2	
洞真观	全真	小庙巷	舒诚毅	3	
水德道院	全真	屏风街	孙宗良	4	
报恩观	全真	孩儿巷	杨明根	5	
问心斗阁	全真	南山路	李明荣	2	道姑
关帝庙	全真	华芷寺巷	蔡诚矩	3	
玄妙观	全真	十五奎巷	高明慧	4	
东岳庙	全真	大马厂	蔡宗根	5	城南
古玄坛庙	全真	板儿巷	潘宗衡	6	
福神庙	全真	凤起桥	洪宗庭	2	
奉庆院	全真	三桥址	蔡理清	2	
玄真观	全真	凤凰山	陆宗信	4	
宝林庵	全真	环翠楼	沈宗法	4	道姑
伍公庙	全真	伍公山	袁宗凯	1	
东岳庙	全真	响水坝	李宗鑫	1	望江门
金草庙	正乙	涌金门	陆颂芬	7	
城隍庙	正乙	城隍山13	陈昌龄	10	
东岳庙	正乙	城隍山44	胡守凡	3	
太岁庙	正乙	城隍山	沈友村	8	
药王庙	正乙	城隍山39	孙赞春	4	
财神殿	正乙	城隍山38	孙赞春	3	赐福
仓圣庙	正乙	城隍山37	俞学恒	5	

续 表

宫观名称	派别	地 址	住 持	人 数	备 注
三官庙	正乙	城隍山37	施静安	2	
关帝庙	正乙	城隍山24	杨礼贤	1	
眼光庙	正乙	城隍山27	施静安	1	
玄坛庙	正乙	城隍山28	施静安	1	
天解殿	正乙	城隍山34	施静安	2	
白衣殿	正乙	城隍山22	杨礼贤	1	
财神庙	正乙	城隍山19	顾松龄	3	水陆
酒仙庙	正乙	城隍山12	倪道澄	1	
财神庙	正乙	城隍山11	朱宝奎	3	五猖
解神庙	正乙	城隍山14	赵师良	3	
文昌庙	正乙	城隍山9	赵师良	1	
圣帝殿	正乙	粮道山21	施静安	2	
云峰仙馆	正乙	粮道山19	吴湘霖	4	
丁仙阁	正乙	紫阳山10	丁顺有	6	
三茅观	正乙	紫阳山7	林元福	3	
古岳庙	正乙	三台山	王长庚	2	三台
宗阳宫	正乙	河坊街	陈廷德	1	
祖关帝庙	正乙	祖庙巷	翁崇兴	2	
财神庙	正乙	孤山	冯运连	7	西泠
东岳下院	正乙	中山北路	郑祥源	9	
宝极观	正乙	宝极观巷	俞学恒	1	
大中宫	正乙	草营巷	项德馨	1	
元帅庙	正乙	东牌楼	孙祖培	1	
大资福庙	正乙	海月桥	杨麟书	3	
麦庄庙	正乙	弄口乡	邵长生	1	
磁王庙	正乙	笕桥黄字村	张龙兴	2	
五界庙	正乙	信义巷	任锡奎	3	

1951年，道姑盛理旺（1995年任市道教协会副会长）管理抱朴道院。1958年，全市道教有宫观46所。此后，部分宫观被合并，部分房产

交房地产管理部门实行包租，吴山城隍庙等一批宫观被拆除，有的被移作他用。玉皇山福星观、慈云宫、葛岭抱朴道院、黄龙洞、金华庙保留。其中葛岭抱朴道院1964年由园林部门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华庙被占用，道教协会筹备会停止活动。1971年，黄龙洞由园林部门改为风景点。1982年，国务院把葛岭抱朴道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宫观。1983年，葛岭抱朴道院归还道教协会筹备会，杭州市政府恢复抱朴道院，拨补助经费以支持道院整修，安置老道士，吸收年轻道士，开展宗教活动，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游客。1984年，归还金华庙，作为道教协会会址。1985年4月，召开第一次道教徒代表会议，成立第一届道教协会。1995年时抱朴道院有道士、道姑30余人。

第二节 玉皇山福星观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一、玉皇山历史简述

玉皇山又称育王山，民国《杭州新志稿》称：“玉皇山亦称育王山，又名天真山，在九曜山南。高二二五公尺，为龙山之北支，壁立尖耸，特异诸山，登顶可览江湖之胜，山顶有玉皇山宫。”^[1]《杭州府志》则直接称其为育王山，其卷二十一《山水》称：“育王山，在龙山峰之最高者，有登云台，乃钱氏郊天之所，宋圜丘亦在焉（《一统志》），俗称锅子山（万历《钱塘志》），在南屏山东山麓有从臣斋宿题名石刻，有鸿雁池、乌菱池、司马温公祠，今废。下为籍田，名龟畴田。明为阳明书院（康熙《钱塘县志》）。山巅有玉皇庙，故称玉皇山，亦云育王（《神州古史考》），庙外设七星缸，满贮水其中，盖地据一城最高处，以水制火亦厌胜之义（《浪迹续谈》）。”^[2]明末清初

[1] 《民国杭州新志稿》卷二，第18页，《杭州史地丛书》第五册，杭州图书馆1985年影印本。

[2] [清] 龚嘉儒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国11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九九号》第2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559页。

以前，玉皇山可能没有后世这么有名，只是龙山的一个山峰，故明末以前的地方志关于龙山的记述或都与玉皇山有关。关于龙山，光绪《杭州府志》称，龙山在钱塘县南五里，一名卧龙山，又名龙华山。

玉皇山之开山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年间（712—756），时“建玉龙道院，造大罗宝殿”。五代时，“吴越王钱镠造玉皇庙。宋仁宗年间（1023—1063）重开山，敕建玉龙道院”。

南宋白玉蟾曾住持太乙宫，此事杭州之宫观志有记载。《武林玄妙观志》卷二有《白琼瑄仙师》一篇，记其“嘉定中至临安，上命馆之太乙宫，尝往来天庆观与诸道流吟啸，辄竟日。时高士陈永灏游武夷，仙师赠之以诗，未几飘然而去”。白玉蟾“住持太乙宫”在《西湖游览志》中亦有记载。^[1]玉皇山福星观现在还存有玉蟾还丹井，此井原为古迹，后湮没无存，民国时经李理山发现后重修。《杭州玉皇山志》卷八上有《李理山重修玉蟾还丹井铭》，叙述了其发现和建设还丹井的经过：

案：玉蟾还丹井，在福星观西院双桂堂前。相传为晋郭璞手凿，后白玉蟾到此，炼丹上升，故名。原有碑铭毁于劫火，只字无存，井亦湮塞。李紫东方丈主是观，于夜间见瓦砾中有光烂然，迹之，见石甃隆起，知为井基。大喜，命工人淘至数仞，水忽涌出，甘澄逾于他井，大旱不竭。千年古迹，一旦复显，洵可宝也。^[2]

其井圈所刻之文即《李理山重修玉蟾还丹井铭》，其中有“郭公景仙，手凿为井，养而不穷，其光璟璟。玉蟾长春，宋元代起，采药栖真，炼丹于此”之句，其中玉蟾指白玉蟾，而长春则是指丘处机。传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在玉皇山“尽心穷理”，参透格物本来面目，建白华丹井。

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玉皇山有罗普仁（即无为教又称罗

[1]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2] 《李理山重修玉蟾还丹井铭》，《杭州玉皇山志》卷八上，《西湖文献集成》第2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759、760页。

教之罗清)苦修十三春,“大悟、小悟”多次,被封为无为宗师。明嘉靖年间(1522—1566),敕建福星道院。据郁达夫游记《玉皇山》记述的玉皇山道士口述之玉皇山的历史称:“这山唐时为玉柱峰,建有玉龙道院;宋时为玉龙山,或单称龙山,以与东面的凤凰山相对,使符郭璞‘龙飞凤舞到钱塘’之句;入明,无为宗师创建福星观,供奉玉皇上帝,始有玉皇山的这一个名字。”^[1]据此则玉皇山之名实始自明末,此为一说,据《杭州市志》则玉皇山之名始自清初:“清初,因当时山顶建造了规模宏敞的道教玉皇宫,山以宫名,始称玉皇山。”因文献不多,尚无法考证两说究竟哪个准确。后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浙江总督李卫听道士言,在山巅开日月池,山腰置七星缸,造福星观。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置七星缸。咸丰十一年(1861)道观毁于战火。^[2]

二、蒋永林开创玉皇山基业及其传承

同治三年(1864)蒋永林(有的文献记作“永龄”)来玉皇山,苦心经营,得浙江民众和浙江安抚使杨昌浚的资助,于同治九年(1870)建成七星殿、大殿、二殿、三清殿、斗姆阁(又称斗姥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室、石牌坊、南天门等建筑群,开堂挂单接待四方道士。民国34年(1945),萧山来裕恂编有《杭州玉皇山志》,其卷十五云:

玉皇山之有福星观,创建至今二百数十年矣,中经发匪燹毁,片瓦无存。咸同以前,道侣杂居,以正一派为多。庚申辛酉星散。同治纪元后,蒋真人开山募建,始纯粹为全真正宗。

从上可知,全真龙门派居于福星观,始于蒋永林。《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记有蒋永林事略:

蒋永林,道号长青子,浙江东阳县人,为第十九代^[3]。幼

[1] 郁达夫:《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5页。

[2]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页。

[3] 此处亦称其为十九代,误,应为十八代。

即好道，父母为之授室，不愿，避入普陀，后至天台山崇道观，拜师冠簪。同治三年来省城之玉皇山。见山明水秀，结茅而居，供奉玉皇上帝。每辰无分寒暑雨雪，日行数十里，虔拜灵官，于是长官感动，为建复七星缸、大殿、二殿、客厅。后复募建南天门、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斗姆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室。遂乃开堂挂单，接待道众，四方云游道侣，皆得暂息，有丛林之象。各处绅耆慕道而来，请往余杭之洞霄宫、杭城之佑圣观、镇海之渊德观、嘉兴之玄妙观、钱塘四乡之东岳庙，蒋师悉为之整顿规模，后均派徒分往管理。

从中可以看见当时福星观之规模。蒋永林创建玉皇山诸宫殿始自清同治三年（1864）。此处没有提到蒋永林之卒年，但据《杭州玉皇山志序》：“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蒋律师羽化，继主观务为紫东道人（即李理山）。 ”则蒋永林卒于光绪二十二年。

关于蒋永林之传承，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法嗣·监院师》曰：

朱圆亨，平湖县人。拜永林为师，光绪元年（1875）八月，师往洞霄宫大涤洞，圆亨接理福星观监院，后派往诸暨牌头镇斗子岩龙王殿为住持。圆亨于同治十年（1871）辛未进京赴白云观受孟方丈戒律，考试张字第十六名，道号通彻子。

黄明怡，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人。系蒋永林徒孙。光绪四年（1878）戊寅岁往接佑圣观监院，光绪六年（1880）庚辰岁，因朱圆亨往诸暨，蒋祖师须往镇海、嘉兴，明怡乃回玉皇山福星观接理监院事。道号月中子。

据郁达夫《玉皇山》：“光绪年间，听说曾经有一位监院的道士——不知是否月中子？——托人编撰过一册薄薄的《玉皇山志》的，但它的目的，只在搜集公文案牍而已，记兴革，述山川的文字是没有的，与其称它作志，倒还不如说它是契据的好。”^[1]可知月中子黄明怡也曾编过一本《玉皇山志》。

[1] 郁达夫：《玉皇山》，《郁达夫说杭州》，第12—15页。

《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法嗣·分支各师》曰：

叶圆义，杭州府富阳县人，系蒋永林之徒，时圆义之徒何明德分在杭城白马庙巷内通玄观，又周明月在黄天荡圣帝殿，均募重建。

褚圆澄，系女道姑，钱塘县人，蒋祖师之徒，在杭城上板儿巷建玉清宫。

林明盛，义乌县人，系朱圆亨之徒，在海宁长安镇玉宸道院。

杨明溪，鄞县人，系朱圆亨之徒。

上述所录为《杭州玉皇山志》中蒋永林所传之弟子，而《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法嗣》中实际收录在杭州及附近县市的圆字辈道士共34人，明字辈道士共9人，因非蒋永林之徒，故均未录。但上述《分支各师》所录4人似都与玉皇山无关。

除上述《杭州玉皇山志》所记传承外，《道统源流》一书中亦提到了玉皇山的传承。民国时期，湖州金盖山古梅花观编有《道统源流》一书，其中《道统源流志（下）》一篇中有金盖山龙门派的传承，记至第二十五代信字辈，可以看作是《金盖心灯》的续作。其中第十八代、十九代、二十代有“外传”数人，其中记有与玉皇山有关的有四人。分录如下：

外传第十八代

蒋永林律嗣，浙江金华人，壮岁皈玄，后诣京师白云观迭受大戒，返至杭州玉皇山，于光绪壬午、癸未屡开坛说戒。曾任湖州弁山佑圣宫方丈。

外传第十九代

朱圆亨律嗣，浙江平湖人，受蒋永林宗旨，后亦在玉皇山开戒传道。

褚圆炳律嗣，浙江归安人，居弁山佑圣宫有年，后为主席。系蒋永林传法。

第二十代

孙明清律嗣，浙江归安人，在杭州玉皇山受戒，启河口

山顶武圣宫，兴建有力，系褚圆炳传。^[1]

从《道统源流》记述来看，蒋永林和朱圆亨应该属于玉皇山福星观的道士，而褚圆炳和孙明清都是与玉皇山略有关系。其中褚圆炳是蒋永林的亲传弟子，并长驻在蒋永林任过方丈的湖州弁山佑圣宫。而孙明清是褚圆炳所传之弟子，但只是在玉皇山受戒，而后离开玉皇山，“启河口山顶武圣宫”。

关于蒋永林之传承，笔者于2009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在玉皇山福星观作田野调查时，找到了为其弟子所承认的玉皇山的传承。是日，观中作七月十五日超度亡灵之斋醮仪式，观中列出了很多灵位，其中包括了福星观近几代羽化的祖师、先师之灵位，将这些灵位记录下来，则就有了福星观自晚清以来的传承。

在所列灵位的壁上，有阎王像，其下分左中右三部分排列灵位，其中间部分共有26块灵位，都是关于福星观或相关教派的灵位。灵位分上下两排，灵位情况如表2.13，因为所有落款均为“阳上玄门弟子高信一率杭州市全体道众奉祀”，故省略。

在其他两处还有两块关于同一位龙门道士的灵位，分别为：

升度龙门正宗第二十四代上诚下宝黄大炼师之灵位，阳上玄门弟子高信一率杭州市全体道众奉祀；

升度龙门正宗第二十四上诚下宝黄大师之灵位，阳上孝徒王信光奉祀。

[1] 庄严居士编：《道统源流》，民铎报社、古梅花观、各支分坛发行，中华民国18年版，《道统源流志（下）》，第86、87页（各篇分段编页码）。

表2.13 玉皇山福星观2009年七月十五斋醮仪式灵位排列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宝高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四代上宗下觉王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洛季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四代上诚下明朱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安吕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四代上诚下养周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德包大炼师之灵位	在祠各姓各派前亡后故形魂淑魄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一代上至下祥晃大炼师之灵位	葛岭抱朴道院前羽后化各位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十九代上永下林蒋大炼师之灵位	福星堂上新门正宗前羽后化各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二代上理下山季大宗师之灵位	佑圣堂上龙门正宗前羽后化各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凯袁大炼师之灵位	城隍山历代正一吴山法派各大先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真王大炼师之灵位	杭州市各观各庙各派各姓前羽后化各位道长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三代上宗下云陈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九代上圆下亨朱大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二代上理下莲王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四代上诚下显王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二十二代上理下旺盛大炼师之灵位	吴山正一法派上师下明朱大炼师之灵位
龙门正宗第十三代上宗下柔吕大炼师之灵位	吴山正一法派上国下政曹大炼师之灵位

总结上述记录，玉皇山龙门派晚清以来传承如表2.14。

表2.14

代	道士
第十八代	蒋永林 ^[1]
第十九代	朱圆亨
第二十代	黄明怡
第二十一代	晁至祥
第二十二代	张理太 ^[2] 、李理山、盛理旺（女）、王理莲（女）
第二十三代	吕宗柔、陈宗云、王宗真、袁宗凯、包宗德、吕宗安 ^[3] 、 李宗洛、高宗宝、王宗觉
第二十四代	王诚显、周诚养、朱诚明、黄诚宝
第二十五代	高信一、王信光（黄诚宝之徒）

2009年七月十五所祀灵位中第二十代是空缺，第二十代黄明怡据《杭州玉皇山志》补，第二十二代张理太据《当代日报》补，除此之外，上述名单均出自所祀灵位。

根据灵位所记，李理山尚有师兄弟（姊妹）三人，为张理太、盛理旺、王理莲。宗字辈有九人，诚字辈有四人。信字辈知道姓名的有两人，一位是现道协会长高信一，另一位是王信光，且都自称为“阳上”，均在世。杭州有道士王友根，笔者曾于2009年上门寻访，但据楼宇之物业管理处称，其早几年把房子变卖后搬走，故未谋面，王友根或即王信光，王友根为俗家姓名，信光为道号。

灵位中尚祀吴山正一法派、佑圣堂。按吴山即杭州城隍山，灵位中有吴山正一法派的两位道士的名称，分别是朱师明、曹国政。据民国35年（1946）《杭州道教会发起人名单表》，朱师明，杭县人，31岁，为吴山城隍庙右司住持。而李理山亦是杭州道教会的发起人之一。

[1] 蒋永林在龙门派中为十八代，其传戒律师为十九代，此处以龙门十八代计。

[2] 据《当代日报》1951年4月24日第2版《潜伏道教匪特李理山就逮后道教徒一致表拥护并集会控诉李匪的种种罪行》增加，具体讨论见《李理山生平事迹简述》。

[3] 李理山平反案，吕宗安曾提出上诉，高宗葆（西湖区法院档案室所藏之档案为“葆”字）曾撰写《几点意见》，现相关卷宗藏于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

杭州以前有佑圣观，现在杭州上城区尚有佑圣观路。笔者小时候就在杭州佑圣观路小学上学。此处的福星观和佑圣观都称“堂”，其他如杭州曾大为有名的龙门金鼓洞支派，在《金鼓洞志》中也称自己为金鼓堂，则福星观和佑圣观都可能曾是龙门支派的所在地。据《杭州市道教会全真会员名册》（1946年11月）^[1]，王理莲（女）为佑圣观住持，盛理旺（女）也驻锡于佑圣观。名册中又有梁理素（女）为佑圣观知客，则当时佑圣观应为坤道院。

如前所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蒋律师羽化，继主观务为紫东道人（即李理山），从此玉皇山开始了李理山之时代。

三、玉皇山福星观之发展

以下四张照片出自沈弘的《天城记忆》（与罗伊·休厄尔同著，第



图2.1 1920年左右的福星观

[1] 杭州市档案馆藏。

112页)、《西湖百象》(第192、194、19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称此为1920年左右的福星观,但未必是确定的,存疑待考。

(一) 玉皇山福星观建筑与经济概况

玉皇山福星观是道教全真派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香火旺盛,远近闻名。玉皇山自蒋永林起建有七星殿、大殿、二殿、三清殿、斗姆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室、石碑坊、南天门等建筑。

据《杭州玉皇山志·志余》记载,蒋永林建福星观,第一殿所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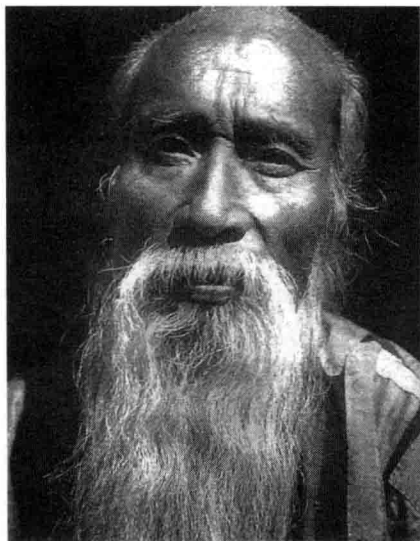


图2.2 民国时期玉皇山一名老道士^[1]

真武殿,其原因是“蒋祖师梦真武帝”:“本观开山祖师方丈蒋永林律师,建福星观头殿真武,所以然者,因有一夕忽梦见真武放龟入湖驱蛇入江,故先建真武殿,至今乡老尚多传说如此。”李理山主理观务后,挖掘了“天乙池”,开辟了“紫来洞”,使玉皇山成为满山葱翠、殿宇庄严的洞天福地。队克勋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专著《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中国民间崇拜——对

于中国纸神的研究》),其中有“Celebrating the Birthday of Yu Huang Shang Ti”^[2]一节,描绘了其参与正月初八考察玉皇山上香的经过,其中基本将玉皇山福星观之神像之位置写明了,根据其描写,结合对现在玉皇山福星观的地理位置,笔者绘制了当年玉皇山福星观的大

[1] Peter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Cox E Wuman Ltd, London, 1961, P.118.

[2] 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 1940, P.26—28.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为队克勋的签名赠送本,捐赠日期为“Sept.1, 1941”。

殿神像位置图，见图2.3。具体的该篇文字见本篇第四部分《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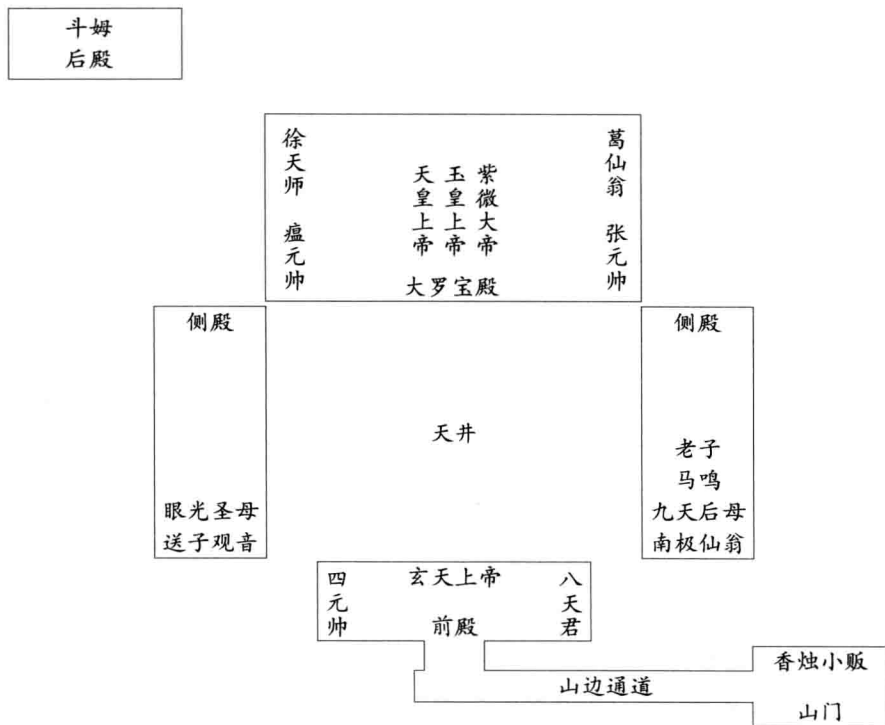


图2.3 根据队克勋《中国民间崇拜》所绘福星观简图

据《王芳回忆录》，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到玉皇山参观。该书描写了玉皇山上塑像的情况：“一次，我陪他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1]这个描写可作为上图的补充，但其地点不详。

玉皇山的经济状况一向较好，从李理山从杭州抱经堂购买古籍“数年之间，耗资数万元”及郁达夫记述的“现在的道观，却是最近的监院紫东李道士的中兴工业，听说已经花去了十余万金钱，还没有完工哩”^[2]来看，“玉皇观当时是中国比较富足的一个寺

[1] 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2] 郁达夫：《玉皇山》，《郁达夫说杭州》，第12—15页。

观”^[1]。

福星观的道士也要参加农业劳动，并称其为“农林化”。“农林化者，即是以农业生产，并森林种植，筹备道粮，自食其力，不专求人，然后品格清高，外界不致轻视，所谓农业，亦不限定耕田种地，收获米麦豆菜，凡植物可以充饥，药草可以疗病者，皆在农业范围以内。森林不限定松杉大木，凡茶叶竹笋，棕榈桐子，各种果木，只教土地相宜，皆可试种”。^[2]顾彼得曾多次造访玉皇山，他记载：“李住持总是坐在阴凉处的一把躺椅上，喝一杯寺观自己种的绿茶。”^[3]“由于喝了太多道观里自己种的龙井茶，晚上我躺在房间里难以入眠。”^[4]玉皇山自己种植龙井茶，正合于以上“农林化”之说。“农林化”既是玉皇山道士的生存之道，也包含了玉皇山道士对道的理解与实践。“农林化”提出者是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其在1942年撰写的《复兴道教计划书》提出了“农林化”的主张，而李理山是其赞同者和实践者。

1951年李理山被军管会逮捕时，其财产被没收，据李理山《上诉状》，其中有黄金20两、美元100元、布200匹、书籍8000部等大批物资。^[5]从中可见至新中国建立后福星观财产亦颇丰。

（二）玉皇山福星观主管的道院

蒋永林时代，福星观就主管了一些其他道观，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五，蒋永林任方丈时“各处绅耆慕道而来，请往余杭之洞霄宫、杭城之佑圣观、镇海之渊德观、嘉兴之玄妙观、钱塘四乡之东岳庙，蒋师悉为之整顿规模，后均派徒分往管理”。民国以后，李理山就任福星观方丈，因其影响很大，故亦有多处道院由其接管。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玉皇山主管之道院如表2.15所示。

[1]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

[2] 《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九《志余·农林化》。

[3] 同上，第111页。

[4] 同上，第33页。

[5] 据李理山《上诉状》，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

表2.15

序号	主管道院	时 间	原 因
1	西湖乌石峰金鼓洞	民国十余年	原住持仇宗通为本观支派,羽化后,由本观派人管理
2	葛岭抱朴道院	民国25年秋	染业公所派代表奉聘请书于本观李紫东,要求接管抱朴道院 ^[1]
3	吴山南麓元妙观	民国16年	该观地界空地为人霸占几尽,原有住持无法清理,遂由十方道众请李紫东接管
4	吴山第一峰伍公庙	民国24年7月	杭州第一区公所区长陆启致聘书,请本观李紫东为该庙住持,管理庙务
5	仁和仓桥朱天庙	民国20年	里人及道众,公推本观李方丈接管
6	杭州西大街 ^[2] 火神殿	上年 ^[3]	庙产为保管委员会所管理,上年地方人士公请本观李紫东为住持,于是知照周伯雄君将图照交出
7	武康筹山升元观	民国26年	武康乡公所收其产,住持黄宗庆请本观李紫东接收,以处理之。后经交涉,该县县长将管理权交与李紫东,为该观住持,时旧历甲戌年也
8	余杭金筑坪天柱观	民国12年	余杭学界议收其产,后与洞霄宫并案办理,乃请本观李紫东接收
9	大涤山洞霄宫	民国12年	余杭学界将该院田地山场,归学校收管。后经交涉,该县地方绅董,乃请本观李紫东接收管理
10	镇海渊德观	民国17年	军队驻扎,道务莫振,观中什物,亦多损失。于是方丈张明照及道众与地方人士来请本山李紫东接管

10处道观,除金鼓洞一处本为福星观支派,原住持羽化后,可能没有合适人选,故仍由福星观派人管理,其余有五处,都是道观有较大的麻烦,观或将被收,或已被占,而请李理山出面交涉,最终都成功交

[1] 梅福与葛洪被染布坊奉为祖师,其原因是梅福和葛洪被认为是染料、颜料及染布方法的发明者,所以抱朴道院才会由染业公所管理。

[2] 西大街即现在的武林路。

[3] 当指本志撰写之前一年,撰志为民国34年,则接管之时当为民国33年(1944)。

涉，并接管。又有四处都是公推或政府出面请李理山接管。从中可以看出李理山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或与其与政府要员有诸多联系有关。

（三）玉皇山福星观之善举及上海分院的设立

李理山的影响力，与其不遗余力地进行善举有一定的关系。李理山的善举分两个方面，一是从宗教和谐的角度进行的善举，二是以公众为对象的善举。

1. 宗教和谐。

三教合一是宋元以来全真道一直提倡的思想，而李理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其方式是在经济上帮助其他宗教的信徒。顾彼得记录了玉皇山道观一年一度的宗教间的一次聚会：“这是一个阴郁的冬天的日子……玉皇观的院子里站满了和尚和尼姑……几乎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营养不良，形容消瘦，但他们的体态是敏捷而有生气的。……李主持在宗安和其他一些道士的陪同下来到院子里。僧侣们尊敬甚至热情地向他们致意，李住持请大家坐下来开始用饭。随后，他和宗安一桌挨一桌地递到每一位客人手里一个小小的红包，一个装着钱的表示礼节的红色小包。”^[1]

根据吕宗安的解释，“这是道观为自己的佛家兄弟，尤其是那些贫苦的兄弟们安排的每年一次的聚会，道观为贫苦的出家人准备一顿热饭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帮助，以此来表达同情和对其他宗教休戚相关的情意”。当然这种关切不仅仅是对佛教徒。顾彼得说：“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来到这里需要他们的帮助。”^[2]

当然过年的这种聚会，不免有些形式化，但作为宗教领袖，李理山需要通过一些表现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和理念，这些形式是必要的。

2. 善举与福星观上海分院的建立。

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七《善举》及其他文献记载，玉皇山福星

[1]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

[2] 同上，第54页。

观经常之善举主要是资助贫困家庭及施药。

顾彼得在其书中记述了李理山及其弟子们的较为特别的资助方式：“李住持的道士们经常悄悄地去看望一些处于困境中的家庭，喝茶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红包。这类的行善决不会张扬，也不会被当作是积德的一种方法，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作为只是因为道。”^[1]

关于施药，福星观“每年于夏季在慈云岭^[2]及禹王庙等处，备有茶汤以供行人渴饮，又备有中国痧药几种及十滴水与时疫救急等药，以防行人之猝然感冒与传染者”。^[3]

上述两项是一般寺观常见的善举，而福星观较为特别的一项善举是，其曾经开办过一所西式的学校。学校为小学校，其名称为“慈云初级小学校”，学校为寄宿，“学生膳宿、书籍、灯火、茶水等费，概由本校供给”，有教师两名。不过由于经费的原因，学校只办了五年，40名学生毕业后，便停止开办了。

玉皇山福星观可以载入国史的善举则是抗战初起举办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七千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杭州沦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钱塘江边南星桥一带，房屋全部烧毁，只剩一片废墟。江边的老百姓，无衣无食，扶老携幼，挣扎在死亡边缘，流亡逃难。李理山道长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出于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感情，他毅然停止了宫观宗教活动，带领道众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敞开了紫来洞道院，收容了一千七百多名上山逃难的难民。犹恐居住不下，又发动道俗群众一百数十人砍倒山上的毛竹与树木，紧急搭建起几十间茅棚，让难民栖身安定下来。福星观对难民的“供给”，包括“每日两粥，任其饱食，不加限制，茶水不断”。^[4]这许多难民，一日两餐，吃饭用粮的数字很大。坐

[1] [俄]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2] 慈云岭与玉皇山相邻。慈云岭亦有道观，名慈云宫。

[3] 《杭州玉皇观志》卷十七《善举》。

[4] 同上。

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粮很快便颗粒无存，眼看要断炊了。李理山组织人力下山运粮，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困难重重。有的被查出，日寇说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人被折磨，粮食也被抢去。李理山不畏困难冒险下山，通过日寇层层封锁，到杭州市去找当时的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会请求支持。请红卍字会出面打交道、开证明，红卍字会翻译章兰亭作为联系人，在李理山与日寇之间进行联系，终于解决了粮食运送的问题。有时是粮食上了山，他自己却是空腹回到观中。虽然如此艰难、危险，而他依然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理山道长爱国爱民、济人之难的高尚品德，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卓越，因而在道教界及民间也深受尊敬。^[1]

由于为难民筹措粮食的过程中，李理山通过红卍字会与日寇有过接触，这些事件日后却成为李理山被逮捕的证据之一。其判决书中称：“杭州沦陷时期，被告以办难民所为名，与日伪红卍字会汉奸翻译许兰亭及日寇宪兵相勾结……被告曾邀请日寇上山，酒肉款待进行慰劳。”^[2]所谓事急从权，为了七千国人的生计，与日寇周旋，无论过程如何，其结果是解决了七千人的生活所需，七千条生命得以延续，李道长可谓功德无量。

难民所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杭州的战争逐渐平息下来，难民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渐次减少，玉皇山的难民收容所才告结束。

对于难民，福星观除解决吃饭问题外，“有衣服不周者，本观购备照给，新旧均有，不令受冻”，“本观备有紧要西医药水及本国痧药，间有延请医生开方服汤药者”。^[3]故福星观的开销浩大。山上香火既停，香资功德收入断绝，渐渐难以为继。李理山道长于是派徒弟吕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创建了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

[1] “据吕宗安《回忆抗日战争期间玉皇山紫来洞改作难民所的经过》及闵智亭道长所述李理山生平编写”的《李理山》资料整理而成，此资料在网上有多人转载，但不知其最早的出处及作者是谁。

[2] 杭州西湖区法院所藏档案资料《（55）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号》。

[3] 《杭州玉皇观志》卷十七《善举》。

据李理山呈上海社会局的《呈为申请庙产登记事由》称：“自民国二十六年因遭抗战军兴，杭州山上香火游客绝迹，道众生计无法维持，不得已于廿八年春，来申筹划租屋于本市西康路五八八弄三百号，开设分院承接经忏香火。奈因地方偏僻，所入不敷出，只得另图相当之处，乃于廿九年春在武定路三十二弄二十号设立第一分院，继续经忏香火等事，所有收入除开支外，悉数维持杭州各庙道众等兹奉。”^[1]

从上可知，在上海开设的福星观分院共有两处，根据《登记表》^[2]，第一处西康路的称“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第二处武定路的称“杭州玉皇山第一分院”，此处亦是上海道教会的会址。又据登记表，两处道院的创始人均为“李紫东”，而“代理人”均为“吕宗安”。这件事，顾彼得在其书中也有记述：“大概两年后的一天……宗安说他已经在杭州和上海之间往返逗留好几个月了，把一些器具和财物搬过来，因为他们在上海开建了一个玉皇观的分观。……寺观位于西康路下方的一条小巷子里，背靠着一座大佛寺。……李理山住持仍然留在玉皇山，宗安来当上海这座分观的住持。”^[3]

关于福星观上海的几家分院，据上海《静安区志》，于“解放初期收歇”，具体时间则没有详细说明。上海市档案馆收藏有一份吕宗安与雇员的《解雇协议书》，是吕宗安代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上海第一分院”与“许夏根”“余如梅”解雇书。在前述《登记表》中，两人均为“茶役”，其待遇为“薪工膳宿”，可见是住在观中的工人。此解雇书的呈送时间为1952年1月19日。故上海福星观分院的收歇时间可能是1952年初。

（四）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

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的习俗不知道起于何时，按理正月初九日才

[1] 上海市档案馆藏。

[2] 全称是《上海市社会局宗教团体及寺院申请登记表》，民国35年2月填写。上海市档案馆藏。

[3]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187页。

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杭俗怡情碎锦》中有“正月初九玉皇山”一条，称“玉皇圣诞进香，出清波门，过长桥，转向南，上山由路亭转右，沿上有七星缸、镇火方。再上山门，大殿在边，顶头有炼丹台，其山腰过路亭至天真山下麓天隆寺、八卦田”。^[1]《杭俗怡情碎锦》因文中有光绪二十八年字样，故其撰写的日期约为1902年。也就是直至清末，上玉皇山烧香是正月初九。但到了民国时期上香似变成了正月初八。《申报》民国10年（1921）2月16日《杭州快信》中称：“今日省城赴玉皇山进香男妇不下万余人，车水马龙，不绝于道。劳动界人利市三倍、官厅禁止宿山、派队彻夜巡逻。”1921年2月16日为正月初九，不过当日报纸所述，当是前天的事，故该文所述应当是正月初八的事情。但按理文中应该称“昨日”才对，但文中又称“今日”，殊不可解。故1921年时上玉皇山烧香的习俗究竟是初八还是初九，这一篇简单的报道不能够确证。但出版于1940年的《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2]（《中国民间崇拜——对于中国纸神的研究》）明确记述了正月初八玉皇山上香的事。虽然书的出版时间为1940年，但其记述的年份应早于该年，我们估计应该在1937年杭州沦陷前。因为抗战初起，玉皇山成为难民所，宗教活动暂时停止，故不会出现文中所述的相关内容。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正月初八到玉皇山上香的习俗正式形成，但不清楚从正月初九玉皇圣诞上香演变为正月初八的确切原因。

《中国民间崇拜——对于中国纸神的研究》一书作者为Clarence Burton Day（队克勋），根据其在书上的头衔，队克勋为当时杭州之江大学的西方文学与比较宗教学的教授（Professor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Hangchow Christian

[1] [清]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稿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六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 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 1940. 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为队克勋的签名赠送本，捐赠日期为“Sept. 1, 1941”。

College)，这本书是其对浙江及杭州地区民间信仰田野调查的成果。

队克勋在书中将玉皇大帝称为玉皇上帝，其来源可能与其收集到的一张“纸神”有关（见图2.4）。该画像额题为“玉皇上帝”。并且队



图2.4 《Chinese Peasant Cults》扉页中一张民国时期的“纸神”——玉皇上帝

克勋将该画像放在了该书书名页前的衬页中，并在画像下称玉皇上帝为“Chief of all Taoist Gods”，即所有道教神仙的统领者，说明队克勋非常重视这一张画像。

该书中有“Celebrating the Birthday of Yu Huang Shang Ti”^[1]（庆祝玉皇上帝的生日）一篇，记述了队克勋亲自参与正月初八上香的过程。原文为英文，译文为沈弘翻译^[2]，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 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 1940, P.26—28.

[2] 译文来自沈弘：《论队克勋对于杭州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田野调查》，《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2期，第45—61页。沈弘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文中括号为本书作者所加，其文字本为原作者在文中所注的中文，翻译成中文时直接使用了原来的中文注文。队克勋在书中记述道：

农历的正月初八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人们要崇拜道教中的最高神——（玉皇上帝）。所以在玉皇上帝生日的这一天，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杭州人在攀登玉皇山的石阶。这座山就在闸口村和闸口火车站的后面。在（玉皇山）山顶的竹林环抱之中，矗立着专门奉献给玉皇上帝的福星观。

我们跟随着香客的队伍上山，快到山顶时，有一队士兵下来，从我们的身边经过，跟去给玉皇上帝祝寿的香客们混杂在一起。与其说他们有任何尊崇玉皇上帝的欲望，倒不如说他们对此感到好奇。乞丐们抱着瘦得出奇的孩子躺在福星观大门前讨钱。在道观内的第一个院落里，各种小贩都在兜售食物、蜡烛、焚香和纸钱。

跨入福星观新装修过的前殿之后，香客们会把蜡烛和焚香放在（玄天上帝）的面前，而对于大堂两侧的（八天君）和（四元帅）等巨大神像，他们只是偶尔才会瞅上一眼。

来到作为主殿的（大罗宝殿）之后，香客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前来祝寿的玉皇上帝了。大殿的中央就是统御万天的玉皇上帝之宝座，左右两旁分别是统御万雷的（天皇上帝）和统御万幸的（紫微大帝）。这三位都戴着挂有一串串珍珠的长方形皇冠，玉皇的皇冠上有十三串珍珠，而其他两位的皇冠上只有九串。大殿里在这同一天受到崇拜的还有其他几位道教的神仙，左侧是（徐天师）和（瘟元帅），右边是（葛仙翁）和（张天师）。在祭坛上放置着橘子、香蕉、苹果以及香炉。在祭坛和神龛之间还矗立着一个可放置三大排蜡烛的巨大烛台架。当香客们列队从那儿经过时，他们都会把自己买来的蜡烛放在烛台架上，以作为尊崇道教神仙的信物。

在侧殿中也要举行同样的崇拜仪式，供奉在观内右侧的是（老子）、骑白马和持蚕茧的（马鸣）、（九天圣母）、

（南极仙翁），在左侧接受烧香的是（眼光圣母）菩萨和（送子观音）像。

跟随持香的香客们走入后殿之后，我们发现位于中央的是星斗之母——（斗母），给她烧香便可消祸免灾，不患任何疾病。福星观的道士们在早上十点和下午两点会专门做两次法事。

当烧香的妇女们拜完了各路菩萨之后，她们就会在人群边缘上的桌子旁边，一边念经，一边忙碌地折叠着功德钱，或聚在水坑前，用寺庙里的仙水来洗眼睛，以治愈疾病或预防疾病。

下午四点左右，身穿红袍、头戴冠冕的道长站在祭坛前开始领诵，一边轻轻地敲击一个十英寸高的铜磬，以保持诵经的节奏。在他身后站着两列道士，有的摇铃，有的敲（木鱼），还有其他敲击铃锤、钹、小锣或响板的道士。他们默默地站在那儿，等道长念完经之后，他们又默默地跪下来，在蒲团上慢慢地磕三次头。在铜磬的伴奏下又一次集体诵经之后，所有的道士们都开始围着祭坛绕圈子，先是顺时针走，然后又逆时针走，还是继续有铜磬的伴奏，但是大家却不再诵经。当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之后，每一队的领头者又要鞠三次躬，而其他道士们则按先前的位置站好。

整个仪式一般都要重复一两次，但并没有变化，之后该仪式就结束了。但是从外面来的香客们便接着开始他们各自崇拜玉皇上帝的仪式，其中有许多香客是远道而来的。有些香客会在福星观的客房里过夜，并且为晚上或第二天黎明的法事而付钱，或是为了替自己赎罪，或是为死去的亲戚超度，或两者都有。第二天，他们又会踏上那漫长而累人的归程，但一想到他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宗教职责，并为最后审判日积累了不少功德，心里便感到非常高兴。

队克勋记述了正月初八玉皇山的一天，其中除了香客们的情况，仪式的大致情况外，通过其记述还了解到福星观的神像的大概情况，这是一篇非常宝贵的民国时期玉皇山福星观的资料。

四、玉皇山道教走向复兴



图2.5 民国时期一张杭州的玉皇上帝像^[1]

1954年，玉皇山福星观进行了修葺。《当代日报》记述了修葺中的一个小插曲。其报章标题为《包炳记油漆作承包玉皇山大殿油漆工程偷工减料》。其内容是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编辑同志：本市包炳记油漆作向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承包玉皇山大殿及双桂堂全部油漆工程时，偷工减料……依照规格应该用桐油石膏，但该老板却以猪血石膏来代替……”而后杭州市人民政府建设局责令其“除油漆剥落严重部分当即责令重做外，并已令其登报悔

过”。^[2]从侧面可以证明1954年重新修葺福星观的事实。但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人民政府建设局负责了玉皇山的修葺工作，则此时福星观或已经被政府所接管。

1958年，杭州市政府对全市的约46所宫观进行了合并，保留了5所，为玉皇山福星观、慈云宫、葛岭抱朴道院、黄龙洞及金华庙。福星观尚在保留之列，但1964年起，交由园林部门管理。^[3]此后玉皇山一直与道教隔绝，山顶虽然保留了原福星观的一些建筑，但一直作为茶楼在

[1] 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 1940, P.132.

[2] 《当代日报》1954年1月8日，第2版。

[3]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9、444页。

经营。

直至2006年左右，园林部门将山顶之福星观之原址和山麓之老玉皇宫原址发还给杭州道协，杭州道协于是开始筹建福星观大殿，于2007年年末建成开放。

由于杭州有正月初八上玉皇山烧香的习俗，而杭嘉湖地区及苏南民众也有至杭州烧香的习俗，故玉皇山从2008年起，每年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十左右这段时间，上山烧香之人可谓人山人海。杭州的报纸曾作过报道称：“本报讯，今天（2009年）是正月初八，按老杭州传统，是去玉皇山登高‘烧头八香’的日子。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头七天，共有11.48万人登玉皇山，比去年增加9.23%，在收费景区中排第二，仅次于灵隐寺。凤凰山管理处说，春节七天花玉皇山，很多是外地游客组团。正月初八，才是杭州人上山的高峰期。”^[1]

从上面的报道可以看出，玉皇山上香火旺盛，烧香的人络绎不绝，福星观正月的收入可能就达百万元以上。笔者曾数次上玉皇山考察，观中除提供香烛外，还供奉灵位，抽签解签，适时还有斋醮仪式。如2009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就有一场黄箓斋，具体名称为“中元度幽之期恭就本道观祖师坛前，启建黄箓追荐度幽普济法会”。其内容有“三元灭罪度亡济幽法忏一部”及“萨祖铁罐祭炼壹堂”。所祈请的神仙为“三界高真岳府众圣”。榜文落款为“太上道宗门下，奉行事小兆臣高信一”。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作为道教特征的斋醮仪式已经在玉皇山恢复，而山上的香火旺盛，香客来源很广，且人数众多，使得福星观收入颇丰。从种种迹象来看，玉皇山道教正在走向复兴。

第三节 余杭洞霄宫的历史

大涤山古名大辟山，在浙江余杭县西南。清代宣统《临安县志》卷一《舆地志·寺观》记载，汉元封三年（前108）建宫于大涤洞前。此

[1] 《都市快报》2009年2月2日，第3版。

说当不实。宋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四《大涤山洞天》条说：

“或言：此山清幽，大可以洗涤尘心，故名。”^[1]道教将其列入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四，名大涤玄盖洞天。元代邓牧《洞霄图志》卷三《大涤洞》条引《茅君传》说：“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涤玄盖之天，周回四百里，内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校灾祥之所，姜真人主之。”^[2]司马承祯《天地官府图·三十六小洞天》说：“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周回一百里，名曰天盖涤玄天，在杭州余杭县属，姜真人治之。”^[3]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三十六洞天》中说：“天柱山大涤玄盖洞天，一百里，在杭州余杭县天柱观。”^[4]据此，道书将余杭的大涤山、天柱山（与大涤山相对）和临安的天目山视为同一洞天。天柱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五十七福地。^[5]

据记载，从三国时代起，已有道士居大涤山、天柱山修道。《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尸解部二》记载：“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之将尽，天下向乱，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矣！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洞霄图志》卷五记载，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十三岁时游华阴山，在石室中得到石函，内容为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后晋室动乱，于是到余杭大涤山，依林为舍，独居十余年。^[6]《晋书·隐逸传》也记载了郭文的事迹，说：“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其舍，携与俱归。飏赠以物，不纳，辞归山中。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逃归临安，结庐舍于山中。病卒，葛洪、庾阐并为作传。”^[7]《洞霄图志》卷五还记载，许迈，字

[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6页。

[2]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22页。

[3] 《天地官府图·三十六小洞天》，《道藏》第22册，第201页。

[4]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三十六洞天》，《道藏》第11册，第58页。

[5] 《天地官府图·三十六小洞天》，《道藏》第22册，第201页。

[6]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33页。

[7] 《晋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40、2441页。

叔玄，一名暎（多作映——引者注），后改名玄，字远游。与许逊、许穆为再从兄弟。初立精舍于垂溜，东晋永和二年（346）移入临安西山，即今大涤山。“登岩茹芝，渺然自得，有终焉之志”，后莫测其所终。^[1]

至唐代，大涤山道教开始兴盛。除张整、叶法善、司马承祯等游历此山外，住山道士亦多有著名者。潘先生，名字不详，遍游山川，止于天柱山。唐高宗闻其名，弘道时（683）敕建天柱观使居之。朱君绪，字法满，余杭人。年十八入道，居玉清观，后拂衣入天柱山修道，所编纂的《要修科仪戒律钞》十六卷是唐代道教戒律建设的代表作。暨（翼）（卢）齐物，字子虚，师玉清观朱君绪受法篆，随入大涤山精思院。创垂象楼三间，又名书楼，积书数千卷，日以著述为事，后不知所之。吴筠，字正节，华阴人。开元间（713—741）南游，后止于余杭天柱山。于大历十三年（778）作《天柱观碣》（又名《天柱山天柱观记》），常行教于江汉，同年卒于剡中，归葬天柱山西麓。白元鉴，西川成都人。玄宗幸蜀时，为威仪道士，住上皇观。后周游山川，止于余杭天柱观。居四十年而逝。作有《大涤十咏》。夏侯子云，从峨眉山来，师从司马承祯十数年。承祯卒，乃于大涤山中筑药圃，种芝术之属。天复间（901—903）归隐东峰，不知所在。闾丘方远，字大方，舒州人。年二十九，师香林左元泽^[2]，既得道，乃遍游名山，后止于余杭天柱山。钱武肃王师事之，号玄同先生。唐景福二年（893），为筑室以居之。乾宁二年（895），钱镠与之相度地势，改建天柱观。昭宗屡诏不起，赐号妙有大师。曾撰《太平经钞》二十卷行于世。郑元章，字博文，十五岁入道，依真系大师李归。景福二年，与闾丘方远同居天柱山精思院。昭宗赐号正一大师冲素先生。后卒于精思院。^[3]

大涤山之宫观，当以天柱观为最早。邓牧《洞霄图志》卷六《天柱观记》云，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于大涤洞前建坛，唐高宗弘道

[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33、434页。

[2] 《洞霄图志》卷五《大涤山》，《道藏》第5册，第92、93页。

[3]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34—438页。

元年（683），命道士潘先生于其地建天柱观。五代末，改名天柱宫。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称洞霄宫。天圣四年（1026），认定大涤洞天为天下名山洞府之第五。^[1]

宋代，大涤山道教十分兴盛。《洞霄图志》卷五列有宋代列仙、高道二十余人。这里略述其中著名者。冯德之，字几道，河南人。少习儒业，书无不读，京师号“冯万卷”。后弃家入道，皇帝下旨让他住杭州洞霄宫。宋真宗敕修《道藏》，令知郡戚纶、漕使陈尧佐，选其与冲素大师朱益谦等在洞霄宫修校成藏以进，张君房辑其精华曰《云笈七签》。^[2]唐子霞，政和间（1111—1117）入道洞霄宫。性嗜读书，尤长著述。政和二年（1112）撰成《大涤洞天真境录》。后远游，不知所终。喻天时，字齐仲，号蟾华子。自幼肄业洞霄宫。政和间，以诗科试中选，精于天文、历数、讖纬、医药之学。宣和年间（1119—1125），敕住信阳军神霄万寿宫。淳熙三年（1176）卒，归葬于大涤山栖真洞侧。陆维之，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余杭人。隐于大涤山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称之。高宗召见，辞疾不赴，高宗览其所作诗，甚为称许。贝大钦，号懒云，南宋末人，奉诏住持洞霄宫，建洞晨观。此外，石自方、叶彦球、李明素、陈希声、俞延禧、王思明、龚大明、孙处道、周崇道等，曾经先后主持洞霄宫。^[3]又有何士昭、王林、杨乃诚、陈良孙、王思明、朱真静等在大涤山的道士见诸史载。两宋时，除洞霄宫不断修葺扩建外，在余杭还新建了若干宫观。例如，洞晨观，南宋道士贝大钦建，景定三年（1262）赐额。冲天观，初名上清道院，后经扩建，咸淳九年（1273）赐此额。^[4]

入元，大涤山道教继续发展，著名道士较多。张希言，第三十三代天师张守贞之孙，曾住持龙虎山演法观，敕授冲妙大师号，江州都道

[1] 同上，第452页。

[2] 闻人儒纂辑：《洞霄宫志》，载张智、张健主编《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第17册，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33页。

[3] 同[1]，第439—449页。

[4]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463—465页。

正，管领余杭大涤山洞霄宫。^[1]宋咸淳（1265—1274）初，宣醮内廷，赐号妙有大师。元至元戊寅（1278），授崇道冲应清真大师号、洞霄主席，后兼领太乙宫。^[2]朱特立、吕贵实在天柱岭建清真道院，至元十四年（1277）受元帝封号。贝守一（1199—1280），号月溪。“通经史，贝大钦初洞晨观，命开山，领袖斋道千余人，筑居避喧丈室。久之，迁九锁外山庵”。元至元戊寅，序升主席，授凝真抱素大师号。^[3]周允和（？—1285），字谦弗，号清溪。年十八岁，入大涤，师冲妙先生。郎如山（1226—1297），字鲁瞻，自号一山，世为余杭望族。幼礼大涤山洞霄明一先生杨公、明一师凌公，又师刘先生。年十八，任事于洞霄宫。宋景定间（1260—1264），居延翔馆，赐号总教大师。元至元丁丑（1277）开西湖崇真观。逾年，领洞霄宫主席，兼西太乙宫，掌浙西道教。^[4]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升本道道录、洞霄宫提举知宫。元贞元年（1295），奉旨提点住持洞霄宫兼管本山诸宫观事，大德元年（1297）卒。^[5]朗如山有徒杨清一（1248—1299），字元洁。“蚤遇明师，精于符法”，初为东太乙宫法师，后“改升西太乙宫，继朗公席”。^[6]沈多福，字介石，至元年间（1264—1294）住大涤山，大德（1297—1307）初，住持洞霄宫，对修复大涤山宫观出力甚多。^[7]他的徒弟孟宗宝编有《洞霄诗集》。舒元一，临安人，先后任洞霄宫副宫事、浙西道教提举、洞霄宫提举知宫、洞霄宫住持提举知宫，筹建元清宫。元代除对大涤山原有之洞霄宫、冲天观等进行修葺外，又新建有若干宫观：元清宫，始建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落成于

[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2] 张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余杭县志》，见《中国地方志丛书》第56号第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55页。

[3] 同上，第455页。

[4] 同上，第455、456页。

[5]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465页。

[6] 同[3]，第456页。

[7] 《大涤洞天记》，《道藏》第18册，第161、163、164页。

大德三年（1299），有寥阳殿、璇玑阁等。^[1]白鹿山房，初为唐吴筠所构石室，宋道士陆维之筑舍，元道士沈多福扩建为道院，成于大德九年（1305）。^[2]清真道院，建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有屋五六十楹。^[3]叶林（1248—1306），字儒藻，一字去文，号本山，杭州钱塘人，有道行，有诗作。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人，自称三教外人，又号九鉴山人，世称文行先生，著作有《洞霄图志》《游山志》《杂文稿》及诗文集《伯牙琴》等。

《洞霄图志》卷一《宫观门·道院》中记载，洞霄宫内正一派有三个支派，即三院，上清、精思、南陵。后分为十八斋。左庑七斋，即山隐、山素、岫隐、嵩隐、怡云、栗隐，为上清院派，回紫为南陵院派。右庑四斋，即清隐、谷隐、盘隐，也是上清院派，清虚则为南陵院派。正面七斋，即壶隐、橘隐、悠然、闲隐、学隐，为上清院派，怡然、碧壶，为精思院派。^[4]上清院派出自閭丘方远，南陵院派奉祀许逊真君，有可能是净明道的分支之一，精思院派出自唐代高道朱君绪。^[5]总之，都属于正一派。

元末，洞霄宫遭兵火。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起，贾守元、吴逢源、龚自然、曹元隐等道士耗时二十余年重建，大体恢复旧貌。继有道士周应常、詹道成等在此修炼。明末，“今半颓残矣”。^[6]

清康熙元年（1662），有道士孙道元（1604—1677）及其弟子吴象岩、陈戴墨、翟翥缙、魏大成、陆尔仁、徐国祥等正一清微派道士在此修道。其中徐国祥，字端仁，自号大涤山人，仁和（今杭州）人，“幼好道书，事陆浦沾为师，天性淡泊，知识清旷。时往来洞霄，有

[1] 《大涤洞天记》，《道藏》第18册，第161、162页。

[2] 同上，第161页。

[3] 同上，第164页。

[4] 《洞霄图志》，知不足斋影印本。

[5] 《中国道观志丛刊》第16册《洞霄图志》，第122、86、119、120页。

[6] 张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余杭县志》，见《中国地方志丛书》第56号第1册，第209、210页。

振起元宗之概”。^[1]

从康熙年间起，开始有全真道士进入大涤山。首先是金筑老人。关于他的情况，《金盖心灯》卷二《金筑老人传》记载，金筑老人，“字号三见而三异：《洞霄闻人志》载，盛青崖，江南桐城人，明末进士，隐天柱观；《杨氏逸林》载，樵云氏者，桐乡人，姓盛，名未详。明末进士，值世沧桑，高隐大涤，自号退密山人。《菰城拾遗》载，异人金大涤，学富五车，尝自比管、乐。明亡遂隐，初休金盖山之白云居，更号樵云，既归老于天柱金筑坪。……著作颇多，石庵辈梓以行世”。^[2]诸书记载不一。金筑老人为清初隐君子之一，曾从王常月受戒，为龙门派第八代弟子。他在浙江余杭金筑坪启天柱观派，以浙江余杭金筑坪天柱观为传道中心。潘太牧，字牧心，吴兴世家子。明末入天柱山金筑坪，清康熙三年（1664）受戒律于金筑老人，为龙门第九代，越二十一年逝。^[3]潘太牧传第十代王清虚（号洞阳），王清虚传第十一代潘一元（字天崖，余杭人）。此后承传不详。

贝本恒（1688—1758），字常吉，淮阳人。年十七，礼武当袁正遇为师，度为道士。《长春道教源流》和《余杭县志》均称贝本恒“师之学，宗郝（太古）真人，先明易道之源，晚造神仙之域”。据《诸真宗派总簿》，华山派字辈前二十字为：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由此可推断袁正遇为托名郝太古为祖师的华山派第十四代弟子，贝本恒则为第十五代弟子。袁过世后，贝本恒至茅山乾元观求王常月律师授修真戒律。此事当不确。因为此时王常月早已不在人世。不过，贝本恒有龙门派的学源则是无疑的。因为《道统源流》记载，贝旭阳律师名清升，原名常吉。先皈依郝祖所开华山派，得名同仁，后遇樊师于武林，又皈依龙门。后主大涤山洞霄宫讲席。^[4]康熙

[1] 张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余杭县志》，见《中国地方志丛书》第56号第2册，第462、463页。

[2] 《金盖心灯》卷二《金筑老人传》，《藏外道书》第31册，第205页。

[3] 《道教文献》第10册，（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2页。

[4] 庄严编：《道统源流》卷下，上海民铎出版社1929年版，第9页。

五十八年（1719），贝本恒“结茅于武康（按：浙江旧县，1958年并入德清）之高池山，参元静炼，得祖炁符篆，施符济人，祈者回应”。^[1]乾隆十年（1745），余杭邑侯及乡绅延请他人主洞霄宫。明末以来，大涤山道教渐趋衰微。在贝本恒的住持下，于乾隆十六年（1751）做了一些修复洞霄宫的工作，但是年冬季，洞霄宫无尘殿再次遭遇火灾，从此无力修复而废圯。贝本恒曾以治病、禳疫、叱虎等闻名，又曾组织编《洞霄宫志》，惜已佚。贝本恒弟子有童仁敷、李仁凝、陈仁恩、陆清微、杭雯等。其中，陈仁恩号大涤山人，于易学颇有造诣，著有《周易参议（微）》《黄老指归》二书，对《阴符经》也有所钻研。^[2]李仁凝在贝本恒过世后有可能师事龙门派第十一代律师沈轻云为师。嘉庆五年（1800），陆顺豪游洞霄宫并撰《游洞霄宫记》。此时住守洞霄宫者为贝本恒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吴一泉、张礼恭等。^[3]他们在半个世纪中，在龙门派炽盛的环境中延续了华山道脉。与陈仁恩同时期的住山道士还有陈阳复，是龙门派第十二代弟子。^[4]

此后，1847年夏天，洞霄宫遭遇洪涝灾害，损失较大。咸丰十年（1860）九月，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部与地方团练在洞霄宫一带激战，村民七百余人被杀。洞霄宫道教遭遇重大创伤。光绪年间，龙门派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入主洞霄宫。光绪十三年（1887）夏出土了宋真宗所赐“金宝牌”。光绪二十二年（1896），玉皇山福星观方丈蒋永林开坛传戒，洞霄宫有16名道童受戒，说明此时洞霄宫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明清以来，洞霄宫可谓每况愈下，逐渐衰微。民国10年（1921）左右，洞霄宫住持毛道士被何道士雇凶手腾道士杀害，道众星散，山林田场被夺占，部分被改为学校。余杭地方绅董请玉皇山福星观方丈李理山派员接收管理，经两年左右的交涉诉讼，民国12年（1923），终于夺

[1] 民国重刊《余杭县志》、《长春道教源流》均载此事。

[2] 张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余杭县志》，见《中国地方志丛书》第56号1册，第210、211页。

[3] 同[3]，第211页。

[4] 洞霄宫墓葬群中有“皇清龙门第十二代陈归阳复号推云炼师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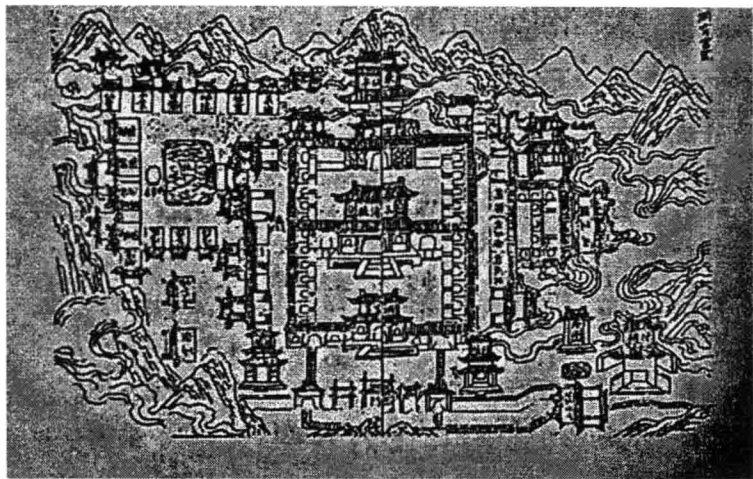


图2.6 《洞霄宫志》洞霄宫图

回被占山林田场。李理山派其徒弟陈宗云（1904—1972）到洞霄宫做当家。当时在洞霄宫的道士，除了陈宗云外，主要是朱理和、王锦山、孙宗良、石宗良、刘福来、王明显等，此外还收留了一批逃荒出来的幼童。此时的洞霄宫已非常破败。有文提及：“顾华表、丰碑、岩墙、危栋，大率颓圯、摧剥，多不足观。遍游其宫，则蔓草碍步，晃葛崙途。举古来胜迹，而一一汨没之，诚足令人临风浩叹也。”^[1]另一篇文章中也说：“现在是炉不绕烟，烛奴无焰，衰落得不堪言状了。”^[2]1936年10月18日，蒋介石一行人到西天目山时曾在洞霄宫短暂停留。1937年农历春节前后，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再次造访洞霄宫。1938年4月，洞霄宫遭遇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众多房屋被烧毁。1942年，玉皇山福星观道士高信一到洞霄宫，协助陈宗云管理宫务。1949年后，陈宗云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拘留审查一年。此后洞霄宫上下大殿、金筑坪庙宇被拆毁。历史上曾经繁盛多时的洞霄宫，最终荡然无存了。

[1] 管锥：《洞霄记游》，《红玫瑰》1926年第46期。

[2] 小道士：《余杭洞霄宫有三牌，金字牌就是急脚递》，《十日戏剧》1937年第13期。

第三章 民国时期归属于道教的民间信仰及活动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老东岳庙

东岳庙祭奉东岳大帝，即泰山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神正庙在泰山，其他各地祭祀之处则为“行宫”“行祠”“别庙”。东岳庙不仅在杭州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道士所居或管理之处。据1950年调查，杭州当时还存在78所道教宫观，其中有4座东岳庙。城南大马厂和望江门响水坝的两座各有全真道士5人和1人，吴山、中山北路的两座各有正一道士3人和1人。^[1]中山北路东岳下院的祖庙就是著名的老东岳庙，由郑氏道士家族管理，因其所在地当时属杭县，所以没列入这个统计中。老东岳庙历史悠久，是杭州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道教庙宇之一。

一、老东岳庙的历史概略

（一）兴建及东岳祭祀在杭州的发展

据《咸淳临安志》，钱塘县西溪法华坞中的东岳祠建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2]这就是后来俗称的老东岳庙，是杭州最早建立的东岳

[1] 《杭州市志》，第439—442页。法华山东岳庙所在地当时属杭县，因而不在于杭州市的统计中。

[2]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896年版，第490册，第30卷第11页，及第73卷第10页。

庙之一。宋之前虽然泰山之外已经有一些东岳庙，但数量并不多^[1]，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加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2]，东岳神遂有帝号，东岳庙也开始大量出现。江南是两宋以来东岳庙繁盛的地区之一，作为南宋国都的杭州，在南宋末期至少已经有六座东岳庙。《梦梁录》这样描写当时的东岳庙和神诞盛况：

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州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唯汤镇、临平，殿庑广阔，司案俱全。吴山庙居辇毂之下，人烟稠密，难以开拓，亦胜昙山梵宫内一小殿耳。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答赛心悽，或专献信香者，或答重囚带枷者，或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或僧道诵经者，或就殿庑举法音而上寿者，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又有勾者，于吴山行宫献彩画钱幡张挂殿前。其社尤盛，闻之此幡钱属后殿充脂粉局收管。^[3]

《西湖老人繁盛录》也记载云：

东岳生辰，都城社陌甚多，一庙难着诸社酌献，或在城吴山行宫烧香，或在城南昙山烧香，或在城北临平烧香，或在城东汤镇烧香，或就城西法华山行宫烧香，诣庙皆如此。社陌朝拜，钱幡社至日开正阳门，献钱幡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长，献物在外。^[4]

从以上两段描写可知，当时杭州的东岳祭祀已经非常普及和兴盛，城中心和城郊各方都有东岳行宫。这些庙的大小规模不一，建于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吴山东岳庙位于人烟稠密的城中^[5]，香会最盛，

[1] 田承军：《江南地区东岳庙研究》，《泰山文化》，第89、90页。

[2] 《宋史》第102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6、2487页。

[3] [宋]吴自牧：《梦梁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3、14页。

[4] [宋]耐得翁：《西湖老人繁盛录》，见《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5] 关于宋代杭州吴山东岳庙，参见[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451页。

城郊汤镇、临平的东岳庙则规模齐全，由这些描写推测，法华山东岳行宫初建时规置一般。

嘉定十七年到宝庆三年（1224—1227），老东岳庙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修缮和扩建，刘霄《法华山重修东岳庙记》（1227）叙述如下：

法华一庙，去都城仅三十里。岁久漫漶，颓毁殆尽，而士民之归向者不改其故。始蒙宁国王先生化缘，修换正殿柱木。继有居氓祝松年捐今塑岳圣像，整辑廊庑神物。厥后因卧病日久，其家密祷于庙。是夕，松年梦至其所，受神人告戒，许以募缘增创修复。既寤，厥疾顿愈。亟以其事白之东屏阁李侯、崇侯。自嘉定甲申仲秋，少师大丞相枢使鲁国史公、洎都提举太尉王公受顾命定策，委之奔走，迨成功迄事，幸无旷失。常惧无以仰报君相之恩。一闻松年是请，默有所感，欣然领略，施钱三十万，具疏倡率，因是人皆乐施。起于嘉定甲申之九月，成于宝庆丁亥之三月，跨历三载，工用毕备。上而栋宇檐甍，下而衢陌街石。几案供具之属，色色整办。创立祠宇者四，以奉随祀等神。凿井汲泉，施疗病者。总计所费逾数万缗。规模制作，悉增于前。盖神之欲兴于斯地也，必假梦兆以警于人。今复以诚应之，则神之施报将有大造于我者。^[1]

由以上碑文可知，当庙祝松年募捐，士大夫相助，南宋权臣史弥远（1164—1233）施钱和具疏倡率，士绅民众合力，使法华山东岳行宫得以修缮和拓建。经过这次重大的工程，东岳行宫有四个殿宇，主祀、随祀俱全，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另外，当时庙里据说有能治病的泉水，拓建中开凿一口井，以便疗疾。

（二）江南东岳神祭祀的一个中心

此后法华山东岳行宫还在不断发展，明代万历间（1573—1620），

[1] [清] 吴本泰：《西溪梵隐志》第4卷，（台湾）新文丰出版社，第7、8页。

布政使秦懋观^[1]在正殿后增建了大中宫，“以奏神仪”。^[2]另外从明末《西溪百咏》的描写“前有著衣亭，后有梳裹楼，两廊列仪卫甚肃”^[3]，可以看到东岳太后娘娘祭祀、东岳大帝冥府衙门七十六司的民间信仰的兴盛，及其和国家祭祀的并存。^[4]老东岳在兴建四百年后，已经发展成为杭州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东岳庙，郎瑛（1487—1566）《重修东岳行宫碑记》（1565年）曰：

（东岳）庙居三焉：一在邑中吴山，一在郭外八盘岭，一在法华山。去城三十里，人心趋向于此为最。祈寿者往焉，招魂者往焉，追远者往焉。雨暘不时，惑于天疫疠灾，伤尤于怪，皆赴诉而祷之。至于暮春三月，发育盛矣。千宝以神之功用，著为诞辰。民俗因之以赛会，杭民执帛进香趋庙而络绎道路者，昏夜无休焉。^[5]

清《钱塘县志》曰：西溪法华山下东岳庙“至今为杭郡岳庙之冠，庙志甚肃。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相传神诞，远近麇集焉”。^[6]

清代是法华山东岳庙的鼎盛时期，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杭州，成为江浙一带一个重要的东岳祭祀中心，清代中期兴起的秋季东岳朝审

[1] 据《重修嘉宁宝殿碑》（1925年），见《中国城市道教资料集》下册。秦懋观于天启（1621—1627）末知临安府，《大清一统志》第479卷，见《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9658页。

[2] 《重修东岳行宫碑记》（1925年），见《中国城市道教资料集》。

[3] 【明】释大善：《西溪百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33页。

[4] 有关东岳祭祀的双重性，见Kristofer Schipper, Note sur l'histoire du Dongyue miao de Pékin, in J.-P. Dieny (ed.) *Hommage à Kwong Hing Foon, Etudes d'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Chine*. Paris :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95, p.255—269. 赵士瑜：《国家正祀兴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21—23页。

[5] 【清】吴本泰：《西溪梵隐志》第4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页。

[6] 康熙《钱塘县志》，转引自雍正《西湖志》第15卷，《西湖文献集成》第5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2、1243页。

庙会期间有不下十万香客。法华山东岳庙还在杭州草城（营）巷、天水桥（中山北路）及桐庐等地建了下院（分庙）^[1]，很可能由此祖庙被称为“老东岳”。^[2]它在清代屡经灾难，仅见记载的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遭火灾，乾隆（1736—1795）初年被水淹，道光九年（1829）嘉宁宝殿毁于火灾。^[3]咸丰十年（1860）和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军队两度攻克杭州，城内大多数寺庙都被毁灭。^[4]老东岳处于城外，两遭兵燹，虽庙得以幸存，但“仅存下神像和殿庭”。光绪元年七月十一日（1875年8月11日），焚烧投文时，忽来旋风一阵，火星飞入戏台上所堆的冥钱，引起失火，延至大殿，“仅请出大小神像十三尊，而上青宫大殿、大中宫、延寿司、地狱及各房头，共屋一百四十余间，已尽化为灰烬矣”。^[5]光绪十五年（1889），大水将庙中靠近山脚的三楹屋全部冲毁。^[6]然而每次灾祸，庙都是毁了再造。光绪元年大火灾后的第二年（1876），老东岳就恢复了“基址崇宏，规模壮丽”的原貌。

从清末的戊戌变法（1898）开始及民国时期，道教遭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排斥和打击：“废庙办学”、“破除迷信”、取缔迎神赛会等大规模反宗教运动^[7]；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8]，一些道教的或与道教密切结合的崇祀，包括东岳大帝被列入应废除之类，打击道教的活动由此而合法化。在这

[1] 《申报》1894年4月27日，桐庐下院情况据老东岳道士回忆。

[2] 此俗称始见于清代，如《申报》1873年10月15日。

[3]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浙江省立民教育实验学校1936年印行，第4页。

[4] 马时雍主编：《杭州的寺院教堂》，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5] 《岳庙被焚详叙》，《申报》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六日（1875年8月26日）。

[6] 《坍屋伤人》，《申报》光绪十五年六月三十日（1889年7月27日）。

[7] 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Vincent Goossaert, “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2), 2006, p. 307—336.

[8] 见《民俗》1929年第41、42期合期，第127—130页，附录《内政部的神祠存废标准令》。

些打击和取缔下，城乡庙宇锐减，迎神赛会衰落。^[1]面对禁令，老东岳的道士和香会竭力维持庙宇香火。1923年到1925年，老东岳庙进行了比光绪年代规模更大的修葺，这也是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次大工程，“凡大中宫前殿、后宫、皋门、应门、左右员司、内外廊庑”等，都进行了修缮，“丹腹庄严，法相彩髹。一新似从前”。^[2]当时报纸赞誉：“杭州东岳庙雄伟閼丽，罕与伦比。”^[3]整个庙宇占地十亩，有房屋一百多间，神像三百余尊。^[4]（图3.1）《说杭州》介绍其规置如下：

西溪法华山庙坞之东岳庙俗称老东岳，香火尤盛。庙依山层建，规模之大为诸庙之冠。头山门祀四天王，二山门祀二十四天君。入正门，左列诸福神，右为海上仙山。两庑为七十二〔六〕司，司各有神主之。俗传速报司之神为岳武穆，最著灵异。凡有冤屈者于此处设誓盟心，表明心迹，其报应最速云。再拾级而上为正殿，殿之北宇为善神。其后有侧门进入地狱，有血污池及黑白无常等鬼神像。殿之南宇为十殿阎罗、地藏王菩萨等。后进为内殿，有五岳行宫，圣母宫，太子、公主、驸马诸宫。来此烧香者不绝于途。庙内摩肩接踵，香烟缭绕，即残烛、箔灰岁可达数千斤之多。庙前有懊来桥，为人死后鬼至此而始知死，懊来此也。^[5]

此外，从30年代后期到民国末年，战争和经济衰退也制约了老东岳的活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朝审完全停止。抗战后1946年和1947年朝审得以重新举行，随后因解放战争又停止。但进香活动

[1] 李学昌、董建波：《20世纪上半叶杭县迎神赛会衰落因素浅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0卷第5期，第50页。

[2] 《重修嘉宁宝殿碑》（1925年）。

[3] 《杭州东岳庙之两大怪剧》，《申报》1926年9月9日。

[4]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浙江省立民教育实验学校1936年印行，第4页；郑发楚：《西溪民俗文化缩影——老东岳庙会考证报告》，内部资料，2007年印行，第16页。

[5] 钟毓龙（1880—1970）：《说杭州》，见《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663、664页。

一直持续到1958年老东岳庙被关闭、随后拆毁。^[1]在多灾多难的民国时期，老东岳庙始终保持着江南东岳大帝祭祀中心的地位，也一直是杭州秋季香汛最盛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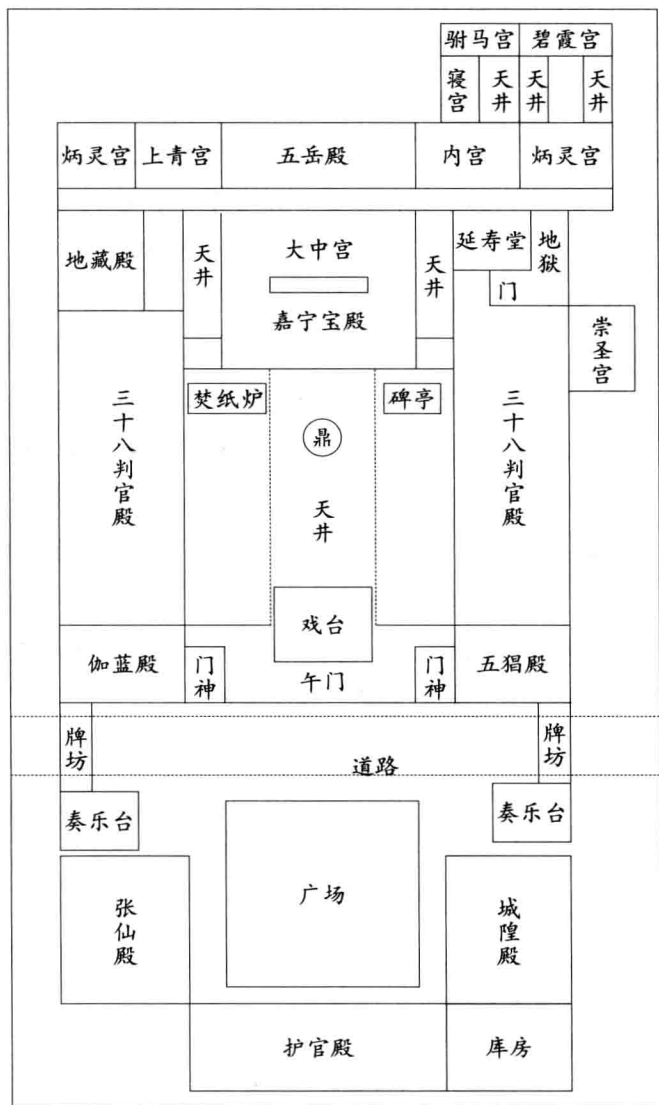


图3.1 清末民初时期老东岳平面示意图
(转引自郑发楚调查考证报告)

[1] 20世纪90年代由东岳村在原庙遗址附近逐步重建。详见方玲《杭州老东岳庙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2008年第12期，第3、4页。

二、“本庙香火郑道士”

（一）正一道士家族

老东岳庙的闻名与兴盛是与其道士分不开的。在1959年被拆毁前很长一段时期，它由郑氏道士家族管理，庙中“本庙香火郑道士”^[1]之案也标志着郑家对老东岳香火的所有权。^[2]

郑家从道历史及何时成为老东岳庙的管理者，因宗谱失传，目前无文献可考。据族人相传：

在老东岳庙始建前，在法华山下的一座破庙里，住有一对郑姓夫妇，祖籍河南荥阳，东晋时南渡，后迁徙浙江浦江，大约北宋时再迁杭州西溪定居。他时常慨叹，想把庙貌刷新。一天，郑氏梦中遇见了神道，嘱咐他在某月某日动工建造庙宇。醒来时，觉得非常奇异，自忖不但地方上没有力量，就是抓紧募化，也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只好姑且自便。不料到了某月某日，建庙的木材、砖瓦等物，源源运到，说这是庙里的道人募化所得。道人自己不知道这事情的究竟，认为有神帮助，就主持其事，把庙建筑成功了。从此，郑姓族人成了老东岳的管理者，并信奉道教，为正一派。^[3]

这段传说，与1936年《老东岳庙庙会调查报告》^[4]中所记几乎相同，但调查报告只提“道人”，没有郑姓之说。另外，从前面介绍的1227年《法华山重修东岳庙记》，可知其修建“假梦寐以募缘”确有其事，但当年的庙祝姓松而不姓郑。在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郑姓为东岳庙管理人的最早记载是1565年《重修东岳行宫碑记》，当时的庙祝叫郑仕成。由此可见郑氏家族掌握老东岳的管理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此据老东岳道士回忆，林用中等《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6页则记为“本庙香火案郑”。

[2] 有将老东岳庙误为宗祠、家庙者，见大津洞山《杭州の佛迹调查》，《浙江文化研究》1944年第39号。

[3] 据道士口述及郑发楚《西溪民俗文化缩影——老东岳庙会考证报告》，第16页。

[4]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7页。

《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解释如下：“因地产是郑氏宗业，因此郑姓子弟都环庙居住，子孙繁衍得渐渐地多了，于是形成老东岳市镇，他们是列于土著的地位，这庙也因此归郑姓管理，道士都是郑家各房子孙。”^[1]

郑氏祖先有四个儿子，全族因此有四大房：永庆堂、衍庆堂、余庆堂、荣庆堂。^[2]清代四大房之下已经繁衍成48支房（户），民国时期又发展到52支房。^[3]这个发展也意味着道教仪式活动的兴盛，因为要有香火来源、经济上独立才能自立门户。四大房各有房长，大房的房长任族长。房长、族长都是道士。至于家族中道士的人数^[4]，据现在老道士的回忆，当时每房的道士人数不一，多的两三个，少的一两个，个别的房没有道士，因此52支房可能最多有百来个道士。在民国时期，各房子孙除了当道士之外，已经有不少人从事其他职业，如中医、教师等，也有从政的，民国后期杭县的县长、留下区的区长都有郑家的人。

郑氏道士都是在家族内培训、传承的。除了拜师，族内还办小道士班，将郑家青少年组织起来，由老道士传授基本的道教知识和科仪。

（二）道士的活动

老东岳庙由郑氏家族各房共同管理，族长有最高的决定权，如各房之间有纠纷、冲突，由族长裁定、解决。庙里的香火收入完全属于郑氏，平时五十二房（户）轮流去庙里值殿事，当天的香火收入归值殿事的那一房（户）。在春香和秋香时节，各房道士都“道装入庙，从事庙内布置、管理、放焰口、做道场、诵经等工作”。

老东岳道士提供延生和超度的科仪服务。大型仪式都在庙里举行，“三月生辰桃李献，四民死忌纸钱陈。清明祭扫男携妇，都向空廊哭

[1]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7页。

[2] 《杭州西溪东岳郑氏认祖归源书》。

[3] 同[1]，第17页。

[4] 《杭州东岳庙鬼世界现形记》，《申报》1947年9月5日，称有三百多人，这显然是个夸大的数字。

鬼神”。^[1]小法事则在各房所设的道坛里做，如福庆二房的坛称“元宝殿”。对于超度，正常死亡的法事在丧家举行，道士上门服务。当涉及非正常死亡或需要超度祖先，其法事才在老东岳庙举行。另外对生前在东岳大帝之前“投文”，许愿舍身服役的人，死后家人将其牌位送到老东岳，由道士引进山门、放焰口。牌位可以寄托在庙里，也可放在各房的“阴公所”。做科仪时如家族人员不够，就请附近乡村的道士参加，称之“客师”。在香汛期间，各房都得请“客师”，多的一房要请十几个，他们吃住都在郑家各房。

在春秋香汛期间，除了组织和做法事，道士们还忙于接待香会，因为郑氏各房有很多香会、班户的客栈，每批香客住两三天，这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香会、班户住哪一房取决于接待的质量，在竞争中，各房都很重视和班户维持好关系，以稳定香火来源。据老道士郑有文回忆，他那一房每年农历六月去嘉兴、塘栖、临安等地“接香客”，即去看望香头，即香会的会首。当时是摇船去，前后要半个月。道士带一些质量好的日用品作为礼物，如毛巾、肥皂、剪刀等送给香头，“如果不去看望他们，好好对待香客，他们就跑到别的房去了”。农村香客的费用可用米支付，可以赊账。到农历十一月，道士再次去看望香头时，由香头去各家收米，道士再集中用船运回杭州。

农历七月十五朝审结束后，来老东岳庙的主要是散客，秋收之后农村人便忙于祭祀，因而农历八月也是老东岳道士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平时道士们除了上述的事务，应邀去吴山城隍庙和附近乡间做法事，精通医术的，还为香客咨询和治病。

三、香会组织

香会是老东岳庙的重要基础。这些团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香会，另一类为班户。“香会不拘时日，班号则有定期”^[2]，班户除了

[1] [明] 释大善：《西溪百咏·东岳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33页。

[2]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1页。

进香日期固定之外，在庙会组织系统中还有其固定的职责。

（一）舍身人及班户

班户的成员都是舍身人，即在东岳大帝前领了“投文状”，许愿投充大帝案下，“生前惠办公益，故后随班听用”。^[1]班户的规模大小不一，小的几百人，大的几千人，甚至上万。清代的史料估计老东岳庙的班户成员总数“不下数十万”或“约十余万”。^[2]

班户在清代有四十八种类之说^[3]，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则云共有七八十种。^[4]

班户在在有内外之分，内班承担帝宫、后宫中各职，外班则为衙门中的各种差使。内班又有男女之别^[5]，“东岳大帝及炳灵太子的一切，则由男班主持。东岳娘娘及太后娘娘的一切，则由女班主持”。^[6]赛会或朝审典礼时在东岳大帝案下机关执事人数有限，因此在班户中充当员役视经济贡献而定：

投文后，每季须出分〔份〕金若干，出金多者，即渐升用。出钱少者，随时挨补。职分之高下，一视其出钱之多寡。^[7]

此外还有一些班户专门承担庙会期间的公益服务，如茶会，“在道中设立茶棚，招呼其他香客进内喝茶、吃粥、吃馒头、歇夜”。^[8]

班户除了来自杭州本地及其近郊的，还有江浙沪一些城乡地区，如嘉兴、湖州、上海、苏州、松江等等。班户有以地域组成的^[9]，班户

[1] 关于投文状，详见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14页。

[2]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第10页；《压倒石亭》，《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十六日（1881年8月10日）。

[3] 《阎罗出会》，《申报》光绪八年七月十九日（1882年9月1日）。

[4]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11页。

[5] 《省无益说》，光绪四年六月十日（1878年7月9日）。

[6] 《东岳大帝废后》，《杭州新报》1940年5月19日。

[7] 《杭州法华山近闻》，《万国公报》1875年第352期，第23页。

[8] 同[4]，第13、14页。

[9] 《述杭州法华山成衣沈二进香惨死事》，《申报》1873年10月15日。

也有以行业组成的。参加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缙绅之家、儒冠之子”、手工业者、“衙门人、生意人、乡下人”等等，连清代驻防杭州的旗人也有其班户。^[1]如浙江鄞县的班会，是由“浙中大贾某及各宪衙书役”发起的，在清末有各阶层成员不下数万人。

（二）班户的角色和作用

班户是老东岳庙的主人，殿堂房屋是由其募资兴建的，因此房产属于各班户，维修也归他们负责。^[2]从1925年的碑文可知，清嘉庆十四年（1809）四所盐商和大中宫的舍身人集款资改建嘉宁宝殿，道光九年（1829）被火灾烧毁灭后，又由这批人修复。光绪元年（1875）特大火灾后，是上青宫、大中宫班户使庙宇恢复了原貌。^[3]1923年到1925年整个庙宇的修葺，是由大中宫班户首倡，其他班户共同募资而实现的。另外，富裕的班户还在老东岳庙附近造了不少房屋，作为办公所和“寓楼”，庙会期间供本班成员住宿，平时则租给人家居住。^[4]

班户也是老东岳庙节庆活动的主体。庙会的办公机关是以东岳大帝朝廷机构的形式设置的，分科、房、厅、班四级。科房厅的头目，大多是郑氏家族和当地的人，各班的员役则大部分为班户的香客。1936年《老东岳庙庙会调查报告》介绍了这个庞大的组织机构：

系统方面，有科、房、厅、班四级，仿照明清时代的衙门制度。在科的方面，分为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等六科。六科之外，又有吏总科、户总科、兵总科、工总科、知印科、总六科等名称。在厅的方面，有先锋厅、票事厅、中军厅、巡捕厅、旗牌厅、传宣厅等。在房的方面，有库房、稿房、案总房、校卫房、侍卫房、提刑房、宝藏房、签押房等。在班的方面，名目繁多共有七八十班。^[5]

[1] 《禁止杭州东岳庙朝审议》，《申报》光绪六年六月十四日（1880年7月20日）。

[2]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7页。

[3] 《重修嘉宁宝殿碑》（1925年）。

[4] 《述杭州法华山成衣沈二进香惨死事》，《申报》1873年10月15日。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17页。

[5] 同[2]，第11、12页。

庙里大小神明，从装塑神像到神诞赛会等，都由班户负责。1882年的《申报》有关于装塑包公神像的一则报道：

今岁各号公议，醵金捐集为包公装塑一像。爰在下城孩儿巷之永福寺内雕成檀像，饰以锦衣冕旒。于七月朔日开光，即借寺中供奉三日。于初四日辰刻抬神出迎，其前导之仪仗舆从人等，共有六七百名。城内遍历一周，乃出武林门，由古荡、炮台山一路直至东岳之行殿驻蹕。是日会中人虽众，并无新奇出色之处，乃妇孺之来观者，竟至填街塞巷，咸以谓包公会从无见过也。^[1]

除了迎神赛会，“解天饷”，即向东岳大帝纳税（交纳纸钱）也是老东岳庙班户一项重要的仪式活动。江南地区向东岳大帝解饷的活动起源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2]从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在东岳神诞、城隍会和中元节等期间城镇都有众多的“解天饷”活动。^[3]老东岳庙秋季朝审的解饷规模和影响尤大，《杭俗遗风》记述如下：

法华山者，供奉东岳大帝，地在沿山十八里之中，每逢三元朝审，人家多有解饷，冥镪一项，汇缴甚多，皆男女舍身者所施也。舍身者各有字号，每号千数人不等，大约通计人数，不下数十万人。^[4]

秋季的“解天饷”在清代时中元节前两个月各班户就开始准备：

自五月端节后，所谓书吏之男、侍女之妇，各手捐簿，往来城乡劝捐，以多为贵，其状若痴。盖谓经捐之饷，纳于

[1] 《阎罗出会》，《申报》光绪八年七月十九日（1882年9月1日）。

[2] 关于道教的象征性税收系统，参见Vincent Goossaert, *Bureaucratie, taxation et justice. Taoïsme et construction de l'Etat au Jiangnan (Chine), XVII^e-XIX^e siècle*, *Annales*, 65^e année, N° 4, 2010, p. 1014—1020.

[3] 巫仁恕：《明清江南东岳神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以苏州民变为讨论中心》，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湾）经联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71—175页。

[4]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库中，以资遣散狱中羁魂，使归故土。经捐之人，例得平余多，亦因之而多，存留库中，给批为凭。及本人死后，持凭向取，则冥间无虑贫乏。故劝捐者各自争胜，愈多愈妙。^[1]

到朝审时，各班户在班期前或当日将冥饷隆重地运到老东岳庙，存储于库中，以供东岳大帝在晚间分拨给各省孤魂。^[2]

朝审持续十六天，每天以一个字号做代表。各号办事人员，是由各科房厅班轮流执掌的，各号的班户都得遵守约定，风雨无阻。尤其是各班户的香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是不会缺席的，由此保证了朝审庙会的规模和顺利进行。杭州本地的班户进香当天返回，外地的班户会停留两三天，去其他庙祭祀和游玩。光绪十三年《申报》报道了当时城内班会赴老东岳庙朝审的情形：

东岳朝审者，好事者为之也。自七月初一日起，按日分班结队赴庙。其船均停泊松木场，会中人至松木场登舟，径抵水口上岸，大约总在午前。各逞供设醮华美香烛纸锭之繁多，陈设既定，午餐尽毕，各以香烛膜拜祈福，以献私忱。至晚，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晚膳毕，群集殿上，行朝审礼。男女杂沓，冠裙交错，有不吐呵气成云，挥汗如雨者。迨礼毕，则已四鼓，或假寐或坐，谈待黎明时，尽坐原船回城。而出城者，则又络绎如昨矣。^[3]

四、节庆仪式

在老东岳庙的祭祀节庆活动中，最闻名的是东岳大帝神诞和秋季朝审。

（一）东岳神诞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神诞南宋时在杭州已是很普遍的节庆。从1565年碑文可看到，老东岳庙的东岳大帝诞辰庆典到明代已经发展成为杭州规模最大的盛会之一，“杭民执帛进香趋庙而络绎道路者，昏夜无

[1] 《论东岳朝审》，《申报》光绪四年七月十日（1878年8月8日）。

[2] 《西湖新语》，《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八日（1896年8月16日）。

[3] 《之江秋雁》，《申报》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二日（1887年8月30日）。

休焉”，到了清代则更为繁盛：

每年三月二十八相传神诞，建设斋仪，极其华盛。而远近士女麇集，因以为春游焉。^[1]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君诞，从定光桥进路者，为古东岳庙，从古荡进路者，亦为东岳庙。是日，百戏竞集，观者如堵，所为杂剧、清乐、耍调、小说、蹴鞠、拳棒之属，令人应接不暇焉。^[2]

东岳神诞时郑氏家族所有的道士聚集在庙里共同举行祭祀。班户除了礼神之外，还进行赛会。清代赛会时，东岳大帝出游城乡内外，历时三天：

法华山离武林门十五里之遥，山上建有东岳庙。每年三月，会中人抬偶像出游，越三日始返。本年第一日，先由留下镇至大关，历湖墅各处，诣草城巷下院暂宿。次日入城，宿天水桥下院。第三日复出城回殿。自元帅会禁止后，东岳会不举行者有二十余年矣。此次忽兴高采烈，踵事增华，以致观者塞途，几难插足。会中旗牌伞扇，俱用黄色。对子马二十四匹，万民伞四十余顶，香亭一座，家将二十四名，身穿五色短袄，头戴英雄帽。又以幼童扮成宫监八名。此外，则为龙灯二架、高跷十余人、小抬阁二架、铜炉二座。^[3]

在地方官府禁止赛会的政令下，清末东岳神诞赛会几度被迫停止。民国期间，游神还时有举行，但时间路线都大为缩短，只限于老东岳庙周围，神轿到西溪路新凉亭供棚为止，在那儿供奉一段时间后按原路返回庙里。^[4]

[1] 康熙《钱塘县志》第13卷。

[2] [清] 龚嘉儒修，李榕纂：光绪《杭州府志》第76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据1922年铅印本影印，第1531页。

[3] 《杭谚》，《申报》1894年4月27日。

[4] 郑发楚：《西溪民俗文化缩影——老东岳庙会考证报告》，第18页。

（二）朝审

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两个月之久，杭州忙于中元接祖、鬼节祀孤^[1]，“家家放瑜珈焰口，村村举盂兰盆会”。^[2]老东岳庙的朝审是其间最集中和盛大的祭祀活动，从农历六月三十日到七月十五日，每天举行朝审，来自杭州和其他地区的班户香客有不下十万人。十六日的朝审规模似乎形成于清代中期^[3]，每日有一个字号做代表，从老福号和新福号，古坤号、老坤号和正坤号这些字号来看，朝审的规模有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东岳大帝朝审模仿清代秋审，“谓天下鬼犯至此月由省府县城隍、各土地解上岳帝勘审，而给以银两。审后仍发回原处”。^[4]届时将公案布置就绪，东岳大帝宫中诸执事人排班侍立，大帝神像从宫内抬出升宝座，“继则书差各按承行，奔走上下”。朝审的主要程序和仪式^[5]如下：

1. 朝参：城隍、土地神到东岳大帝案前朝见。初宣各省府州县城隍谒见，有数人上阶，高唱某城隍进。乃宣天下各坊图土地朝贺，高唱如前。^[6]举行时由两个代表人一来一往的交互朝见。

2. 听审：即审疯子。这是一种治疗疯疾的仪式，通过替身的运用和神判^[7]，使因含冤饮恨而病者的悲怒得以排解，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1926年9月9日《申报》描写了当时举行的审疯子仪式：

法先束刍为人状，数人扮作皂隶，驱痴子与草人跪东岳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第19、20页。

[2] 《杭州东岳庙之两大怪剧》，《申报》1926年9月9日。

[3] 《压倒石亭》，《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十六日（1881年8月10日）。

[4] 《禁止杭州东岳庙朝审议》，《申报》光绪六年六月十四日（1880年7月20日）。

[5]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9、11页。

[6] 《禁止东岳庙朝审议》，《申报》光绪六年六月十四日（1880年7月20日）。

[7] 有关这类“告阴状”研究，参见康豹《汉人社会的神判仪式初探：从斩鸡头说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88期，第173—203页。关于东岳神信仰与伸张正义，参见巫仁恕《明清江南东岳神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以苏州民变为讨论中心》，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湾）经联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49—206页。

帝前。殿上立一人，若承审员替县知事开民刑庭一般。殿下皂隶先笞草人数百下，始询汝之发痴，究因何故，有何冤仇，从实禀来。相传痴子必大声呼痛，如笞己臂者然，而朗朗自述发痴原由，及前生孽报等事。若不自知，殿上乃判以罚鍰。因是不痴者甚多。若痴子不愿自述，皂隶乃曳之囚于地狱中。久久始出复讯，必得真情。痴子亦愈云。今年所讯者，一为某豆腐店之子，一为某姓之女。^[1]

（三）发冥饷

民间信仰认为，东岳大帝将冥锭分发给其管辖的冥间各省，以遣送无主孤魂回籍。阴间分省随同阳世，清朝时18省，北洋时期为22省。分发冥锭时各备文书，通知城隍神，并派土地神等司弹压焚化。1926年的情形有报道如下：

一人衣冠整肃，侍立东岳帝之侧，高呼某省领饷，即见一人手捧一灯，灯上有牌，书某某省数字。后随一人，手执长幡，如金童玉女者然。又有数人，扮作皂隶状，手铁索银铛有声。数人俱跪神前，口中喃喃有词，略谓某某省一切无主孤魂，恳求大帝赐发饷银等语。侍立者又高声呼曰：“发某某省饷银十八万”（今年计发浙江饷银十八万、江苏二十万、福建十五万……）。随掷下令箭一枚，殿下人乃持此箭，至发饷数处领冥镗银数大簍，至包孝肃公殿前焚之。相传焚时火焰作惨绿色，虽大风之日，纸钱毫不飞扬。偶有作蝴蝶飞，挥以令箭，火光立定。盖鬼凜神威，不敢抢也。甲省既毕，乙省继之。^[2]

除了向各省发冥饷之外，班户会有一些特殊的请求。如太平军攻占杭州城时，人口死亡众多，太平天国后官府、民间一直岁时致祭、惠顾幽魂。1895年杭州疫疠流行，在老东岳朝审时：

庙中人以城内自车桥至教场桥一带大街两边房屋俱毁于兵，此处之鬼难免馁而求食，爰具禀请于岳帝拨付余镗二十余

[1] 《杭州东岳庙之两大怪剧》，《申报》1926年9月9日。

[2] 同上。

万，以惠无主孤魂。左近人家闻之，亦皆踊跃捐助。兼以好事者又向他处募化，共得冥镪四十万，前夜三更后发往此处焚化。左近人家闻之。亦皆踊跃捐助，兼以好事者又向他处募化，共得冥万镪四十万。前夜三更后发往此处焚化。^[1]

第二年对同一地点，班会又提出了请求：

有老坤号案书程某，以兵燹之后，钱塘门一带自车桥起至祖山寺前止，以及汪敦园、广福营等处房屋俱被焚毁，一片荒场，时闻鬼哭，盖粤匪破城时攻打旗营，以此为战场，死于炮火刀枪者不知凡几，因思各省孤魂皆被恩泽，独本省殉难忠魂□致向隅，心甚不安。于是推桑梓之谊，稟请岳帝分拨冥饷二十余万，发交该书领回。并出告条晓谕，飭令本处土地，定于十五夜子时分路焚化。^[2]

老东岳庙的朝审发冥饷仪式也为其他地方所模仿。如杭州忠义祠，是为祭祀太平天国时当地数十万死难者而敕建的，列入祀典，每年春秋由官宪致祭，地方士绅亦于每年农历十一月间请僧道为死难者超度。光绪十二年（1886）忠义祠于农历十一月初五至十一日启建普利道场时，除了祠内设杆坛七所，僧道并集，还仿照老东岳庙的大朝审，先期迎请东岳大帝及其司官。初八日道士做法事后，东岳大帝发给冥饷，并由各司官监坛弹压。其间绅士云集城中，游观者填街塞巷。^[3]

以上活动虽含迷信色彩，却是民国时期风情民俗的反映，是道教的主要活动形式。

四、清末和民国时期对赛会和朝审的禁止

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表明，虽然清朝的法律禁止迎神赛会^[4]，但杭州

[1] 《慵愚可笑》，《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1895年9月18日）。

[2] 《吴山秋眺》，《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日（1896年9月8日）。

[3] 《募启录登》，《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1886年12月14日），《道场热闹》，《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1886年12月16日）。

[4] 魏文静：《明清迎神赛会屡禁不止与商业化——以江南迎神赛会经济功能为中心的探讨》，《历史教学》2009年第14期，第31、32页。

太平天国前被彻底禁止的赛会很少。太平天国后，一些被毁的庙开始重建，迎神赛会逐步恢复，地方政权的政策转向限制、削减赛会。清末戊戌变法掀开了废除庙宇、破除迷信运动的序幕，地方的宗教政策开始急剧转变。进入民国时期，否定排斥宗教的运动更为加剧，政府运用强制措施推行破除迷信的政令，对赛会、庙宇大规模取缔。^[1]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老东岳神诞赛会是在同治年间（1862—1874）随着对元帅会禁止而停止的。元帅名温琼，为道教神，东岳大帝的部将，以驱瘟逐疫著名。^[2]旌德观（老元帅庙）农历五月十六日的温元帅会，是杭州最为华美热闹、声势浩大的赛会之一，其出行长达一天一夜，“男女观者，举国若狂”。太平天国（1851—1864）后，温元帅会恢复举行不久，就成为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主要对象。同治七年（1868）赛会前夕，巡抚杨石泉（1826—1897）“因省中兵勇甚伙，恐其滋事，日地方凋敝已甚，元气未复，何可作此劳民伤财之事。当飭府县出示严禁，且以宪示勒石置之庙中著为永禁”。^[3]禁令的对象是规模浩大的赛会^[4]，老东岳的神诞会也因此停止。^[5]随后将近三十年中，温元帅会经历了几次稟请弛禁、恢复赛会又重新禁止的变动。^[6]老东岳的神诞赛会则中断了二十多年，其间朝审也遭到过禁止，但第二年即得以恢复。由此看来，老东岳庙在官方禁止元帅会后，采取低调谨慎的态度，停止东岳神诞赛会长达二十多年，也是为了避免朝审活动遭遇同样的命运。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在连续两年疫病流行的情

[1] Vincent Goossaert, *The local politics of festivals: Hangzhou, 1850—1950.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Conference, Decembre 2—3, 2011, at NYU.

[2] 《地祇上将温太保传》，《正统道藏》。

[3] 《弛禁出会》，《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廿二日（1882年7月7日）。

[4] 禁令并不针对温元帅祭祀本身，因而城中皮市巷永宁院的温元帅在禁令后每年照例出巡，见《虎林纪事》，《申报》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88年6月29日）。

[5] 《杭谚》，《申报》光绪二十年三月廿二日（1894年4月27日）。

[6] 同 [1]。

况下，农历三月老东岳庙恢复举行东岳胜会，当时持续了三天。^[1]第二年，杭州瘟疫肆行，死者众多，各类禳疫病仪式活动不断。农历三月时“居民拟借神道设教挽，某绅请于抚宪以赛东岳胜会，抚宪以示禁在安，未便准行”。^[2]但甲午战争（1894.7.25—1895.4.17）后几个月，政治气氛比较缓和时，经过谈判，东岳会不仅得以改在农历七月举行，而且还持续了两天：

瘟疫流行已一月有余，尚未能止，每日死者指不胜数，居民欲借神灵之力以驱疫鬼。本月十九日抬东岳神像出游，前导执事俱用黄色马道二十余匹、香亭一座。其扮作家将、皂班、禁役、刽子之类者不一而足。又有持钢叉者十余人，沿街勇跃。后八人抬五岳朝天式轿一乘，神像端坐其中。轿后蚕旗一面，上书“泰山青府驱邪降福”字样，遍行城厢内外。以一日不能周历，二十日复行。如故沿途男妇观者如堵，居然举国若狂。赶会场而卖点果者咸占利市三倍。^[3]

1895年后，东岳神诞赛会不再见于新闻报道，但它从来没有中绝。本文上一部分已经介绍过，民国时期老东岳小规模、在庙宇周围的游神活动还时有举行。

至于规模和影响更大的老东岳朝审，从报刊史料可以看到，在光绪年间之前，关于朝审主要是描述性的报道。到了光绪初年，则出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指责老东岳庙朝审是江浙盂兰会之举“所最谬者”，“耗费钱财”“废事失业”“坏风俗”等等，对于官府不禁朝审。光绪四年《申报》的一篇文章认为：

大吏及地方官，以其无大害于民，亦不申禁。且假神道以惑人，适为风俗所宜，因亦无有绅衿肯首发请禁作罪过事，以逢怒于岳神者。而况衙门中人，实皆在会，弥缝掩饰。虽地方官吏，向曾略闻其事，亦苦不知究竟，无敢公然作

[1] 《杭谚》，《申报》光绪二十年三月廿二日（1894年4月27日）。

[2] 《三竺钟声》，《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日（1895年9月20日）。

[3] 《赛会两志》，《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1895年9月18日）。

难者。^[1]

光绪五年（1879），谭钟麟（1822—1905）调任浙江巡抚，官府态度开始变化，第二年中元节前夕，正当通城之人募捐冥镪之际，谭钟麟下令对老东岳庙朝审“严飭禁止，且永不准行”。^[2]但这个禁令只实施了一年，光绪七年（1881）谭钟麟升任陕甘总督，于是当年老东岳庙不但恢复举行朝审，而且因为七月逢闰，再行朝审。^[3]

此后到清朝末年，尽管老东岳朝审一直是风俗改良宣传中的靶子^[4]，但没有出现新的禁令。到了民国时期，朝审活动成为破除迷信的对象。

民国时期老东岳朝审第一次被禁是在1912年大规模的反迷信运动后，1913年5月杭州因爆发反袁世凯革命运动而戒严，随后浙江都督朱瑞（1883—1916）下令禁止中元赛会：

阴历七月间，凡老东岳朝审祀孤种种为杭俗必不可免之迷信，现值戒严期内，朱都督深虑匪党混迹，致扰秩序，特令卫戍司令警察厅及嘉湖各县先期示禁。并于阴历七月初一起，酌派得力兵警分往法华山及拱埠一带分道截阻，毋令麇集来省，以免滋生事端一面由县知事出示晓谕周知云。^[5]

从以上“必不可免之迷信”，可以看到当时地方政权面对朝审祀孤的规模及其在杭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以“深虑匪党混迹，致扰秩序”为由，禁止老东岳庙的这些活动，但这个禁令显然没能持久。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国民革命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巩固过程中，又掀起一个新的破除迷信高潮，“自革命军人浙后，首倡破除迷信”。^[6]1927年7月，浙江省政府则直接以“破除迷信”之名下令禁止老东岳庙朝审：

[1] 《论东岳朝审》，《申报》光绪四年七月十日（1878年8月8日）。

[2] 《禁止杭州东岳庙朝审议》，《申报》光绪六年六月十四日（1880年7月12日）。

[3] 《重行朝审》，《申报》光绪七年七月九日（1881年9月2日）。

[4] 《浙江风俗改良浅说》，1910年。

[5] 《禁止中元赛会》，《申报》1913年8月2日。

[6] 李学昌、董建波：《20世纪上半叶杭县迎神赛会衰落因素浅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0卷第5期，第50页。

浙江省政府令以杭县老东岳庙及三台山等，每有投文朝审之举，关系迷信等情，昨转令行公安局禁止，略谓查破除迷信。^[1]面对这个禁令，老东岳庙设法与官方协商谈判：

今年市政府因庙内男女杂沓，良莠难分，故于前数日出示禁止。但以地方习惯根深蒂固，一时欲铲除而无余，正非易事。稜经几方之请，公安局长与市政当局允许只准进香，不许朝审。故往年之夜间，通宵达旦，热闹异常。今年则日间尚有市面，夜间则寥落冷静。但每日所焚之银铤及香烛，统计总在五千元以上。故一进庙之内、殿之上则烟云缭绕，令人有目有难张之叹。^[2]

由上可知，虽经几方出面向官方交涉，1927年的朝审还是被禁止举行，但显然随后要求弛禁成功，似乎一两年后，除了审疯子之外，朝审的其他仪式活动都恢复了。^[3]从1936年的《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可以看到，朝审依然保持着16日的规模和十万香客的盛况。

从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杭州到1945年抗战胜利，朝审庙会活动完全中止。1946年朝审得以重新举行，但因为民间元气尚未恢复，香汛只及战前的十分之三，1947年达到了十分之五。在《申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年民众的仪式需求及其老东岳道士的态度：

阴历七月是一个人为鬼忙的季节，杭城西北的东岳庙，这半月已成了神□的鬼世界，上千上万的善男信女，都远道到道观来烧香。到老东岳的香客，很多是哭哭啼啼的，因为他（她）们是为爱子、丈夫，或亲戚，伴他们渡过地狱苦难，寻求解脱，然后才能使活人心里获取安慰。外地来的，他们有的是招死了的亲戚回家去；本地的，有的是送流落在杭的“流浪

[1] 《市政府禁止打醮》，《申报》1927年7月22日；《杭州快信》，《申报》1927年7月27日。

[2] 《烟云缭绕法华香》，《申报》1927年8月11日。

[3] 夏廷棫1928年的文章没有提到老东岳朝审被禁止，参见夏廷棫《关于杭州东岳庙》，《民俗》1929年第41、42合期，第77、78页。1936年的调查报告有审疯子自北伐以后禁止一说，参见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第8页。

鬼”回故乡去。而这一切是要向东岳大帝“送批”的……

今年香市一如往年，老东岳庙最热闹的几天仍然是上海人撑的市面，老坤号和正坤号化钱最多。香客肯多化的在道士是最好的，但郑道士的意见却出人意外，他对于这些香客们最热心的“阴阳合办”等工作，都认为是封建遗毒而已。记者几次打听这事，都被他不屑一谈地把话题掉转去了。^[1]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杭州地区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控制和管理，以“妨碍治安”“破除封建迷信”“改良社会”等理由继续取缔朝香等活动，侵占庙产，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抗战后是国民党政府对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最为激进的时期。^[2]尽管目前还缺乏战后涉及老东岳庙这方面的具体资料，但从上述道士的言论和谨慎态度，已经可以领略当时的政治压力和气氛。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公庙

本书的公庙主要是指民间信仰中，被纳入道教或与道教关系密切的神祇与庙观，通常指城隍庙、土地庙、财神庙、关帝庙等。其他如天后，即妈祖，也是东南沿海之地常祀的神祇。杭州还奉朱天君，是一个较为独特的信仰，也将在本节中论述。

一、朱天君

朱天君为江南地区的信仰，其信仰范围大约是在江浙一带。上海、杭州、绍兴、湖州等地均是其信仰的地区。周作人在其回忆文章中说：“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持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

[1] 《杭州东岳庙鬼世界现形记》，《申报》1947年9月5日。

[2] 杨焕鹏：《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210—216页。

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1]

马叙伦记述说：“英玉欲赴（上海）梅白克路松柏里朱天庙进香，属余为导。及至其处，烛火香烟，目为之眩。……朱天大帝者，实则明崇祯皇帝也，故塑像右手持环，左手持棍。邵裴子说：棍以象树，环以象结绳，正拟思宗自缢也。惟此间庙像颈悬人头一串，杭州无之……杭俗祀朱天甚虔，持斋一个月。杏媿谓上海人持朱天斋，世世相传，不得废也，否则有灾。余谓此皆居丧不食酒肉及示子孙不忘之意耳。”^[2]

据上，朱天君实是崇祯皇帝，杭州当地的记载也是如此。《杭俗遗风》记曰：

朱天君，相传为明之崇祯帝。吾杭胜国遗民，祀之以志亡国之痛者也。因当时处满清专制威权之下，不敢显言故君，故托言之。四月二十四日，为天君生辰。是日实为吾杭人初得噩耗之日，即用以为纪念。近年以来，变本加厉，迷信之徒，则茹素；好事之徒则集会。又有出会巡行之举，会中地戏、高跷、清吹、台阁，极一时之胜。虽不如元帅之盛，亦足哄动一时。但其赛会，不仅一处，神会中之财力如何，即可出行，以故接二连三，皆有朱天会。其中以下会桥、柴垛桥两处为最热闹。^[3]

朱天君神诞之期为四月二十四。民国《乌青镇志》也记述：“民国年间，乌青镇四月二十四日‘俗传朱天君诞，近今香烟亦盛’。”^[4]据《杭俗遗风》记述的杭州朱天君的神诞之期也是四月二十四日。关于此事，《申报》也有记述：“杭人崇奉朱天君，极为诚敬，甚至朱漆器具，一概弗用。自三月二十八日起，至五月初八日止，较之苏人之茹雷斋者，有过之无不及焉。……四月二十四日为神诞之期。”^[5]也就是朱

[1] 周作人：《阳九述略》，收入《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50页。

[2] 马叙伦：《朱天庙》，收入《石屋余沈》，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3] 转引自曹本冶、徐宏图：《杭州抱朴道院道教音乐》，（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0页。

[4] 董世宁原修，卢学溥续修：《乌青镇志》卷十九《风俗》，1936年版，第12页。

[5] 《僧道断语》，《申报》1897年6月8日。

天君之信仰，在其生日前后需斋戒四十日。

这个风俗《中华风俗总志》也有记载：“杭州人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萨。每当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诞日，满城香火供奉，盛极一时。庙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设于他庙，无一独立者。妇孺尤信仰，四月内必茹素斋戒，谓之朱天素。夷考佛经、《封神》，皆无此菩萨，而又独为杭州所有，异哉！或谓朱天者，谓诸天也，其说不足信。殆清初，遗民追念胜朝，托名崇祀，其说或稍近欤？按民间流行讽诵之《太阳经》，即追念明故帝也。”^[1]

按理朱天君信仰可以算是民间信仰，基本可归入道教，而其神像的供奉也多在道教庙观，所以朱天君是道教的神仙。朱天君信徒很多，香资也异常丰厚，以至于佛教中人也想分一杯羹。《申报》曰：

四月二十四日为神诞之期。男妇进香者，络绎不绝，并有香忭等会数起，固羽土之一大进益也。近年以来，僧寺尼庵美其香火之盛，亦于殿中装塑神像，改朱天为诸天，遍贴招纸。先期发贴邀请大檀越，往彼拈香。于是道家者流，深恐利源为其所夺，历叙神之灵应素昭及其出身，声明并非佛教中神，不得供于庵寺，望诸檀越弗为僧尼所惑。刊单分送，缙流中亦出单与之辩驳。噫，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即区区香火之资，而二氏必欲相争，若此亦可见世风之日下矣。^[2]

从其香火之资多到佛教人想出一个谐音的“诸天君”来争夺香火，可见其信仰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

前面《中华风俗总志》所述有两个地方可作商榷。其一“或谓朱天者，谓诸天也，其说不足信”，其说是正确的，但没有说明其出处，从《申报》中可知“诸天”之称来源于佛教的“创造”，其目的是为了争夺香火。其二“庙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设于他庙，无一独立者”，或是有误的。民国时期，朱天君的供奉各庙均有是不错的，但将朱天君作为主神供奉的是有的，仁和仓桥之朱天庙就是供奉朱天君为主神的道庙。

[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2] 《僧道断语》，《申报》1897年6月8日。

朱天庙本名水德道院，因其供朱天君，故被俗称为朱天庙。《玉皇山志》中记载有玉皇山福星观接管朱天庙之事。《玉皇山志》曰：

五曰仁和仓桥朱天庙。又名水德道院，里人概以朱天庙呼之。该庙素来为全真派道士主管，前蒋永林之徒有冯圆安者，在仁和仓桥水德道院为住持，其后姚明亮、朱宗成更迭充当住持。因其庙址在仁和仓桥，河上架木筑室以供朱天君，后于某年不戒于火，恢复无期。于是民国二十年（1931）时，里人及道众公推福星观李方丈接管。自接管以后，将仓桥河左首地基挑平，瓦砾畚除，建筑楼房壹幢，供天解星君，称为天解殿。楼上为拜忏之坛，楼下香客游息之所。河上架木为梁，不筑屋舍，只通两边行走之路。其右首为朱天庙，亦仅楼房壹幢，实限于地基，无可扩充也。

该庙1950年尚在，据《杭州市志》记载的该年统计资料，水德道院属全真道士管辖，地址在屏风街，住持为孙宗良，当时有道士四人。屏风街即为仓桥附近的一条小巷，故其庙址称为仓桥或屏风街，都是无误的。屏风街现仍存，但庙已不存。

杭州至今仍有供奉朱天君的庙堂，至少有两处，其一为抱朴道院，其二为城郊的一座村庙，其庙名“三官堂”，又名“如松庙”。抱朴道院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批开放的道观，当时在杭州是唯一的一所道观，观中供奉神像很多，其中供奉有当年在杭州影响较大的朱天君是很正常的。三官堂是一所村庙，其中佛道神像均供，在一所不大的村庙中，还给朱天君留有一个位置，说明了朱天君信仰在民间的深入程度。

三官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是杭州骆家庄、浦家桥、三坝三个村的村庙。新中国成立后被拆，后复建，又由于城市建设，现又重建于余杭塘河边。该处无路所以也无门牌号码，其地址离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不远，或可作为其地址。

三官堂现址有《三官堂复建碑记》，记述了其历史：

三官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历经二百多年风雨和沧桑，是骆家庄、浦家桥、三坝及周边乡民进行佛事活动之地。三官

者：天官、地官、水官也。……民国年间，庙宇颓废，乡绅郑明正、陈逸仙慷慨相助，修复庙宇，并有僧人住持。五十年代，三官堂拆除为废墟。改革开放后，乡人自筹资金，重建三官堂。一九九三年扩建之八百平方米，届时古树蔽日，香火旺盛。二〇〇八年因市政府实施余杭塘整治改造工程，三官堂被临时搬迁，在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复建三官堂，于该年十二月落成，成为余杭塘历史文化节点。

看今朝，三官堂宽敞明亮、竹树夹岸，一派水乡湿地佳境。百姓齐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稷安昌，子孙永福。刻之坚石，永昌百年。

杭州市西湖区骆家庄、浦家桥、三坝

公元二〇〇九年元月立

据《碑记》，三官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具体年份据匾额则为“一七三五年”。民国年间三官堂也有修复的情况，是由两名富绅出钱修复。现三官堂左中右共三间，中间为大殿，供奉有多个神像，西边是经堂，东边是管理人员住处。大殿有两块匾额，一为正中的“三官堂”匾，另一块在西边，较小，为“如松庙”。或是原来村内有两个庙，现复建后合一了，由于三官堂名气更大，故总称为三官堂。



图3.2 三官堂外景（韩松涛2011年8月摄）

大殿中供奉有如来、三官、药师佛、观音、朱天君、关公（周仓、关平）、土地。其中朱天君之形象如各种资料所述“右手持环，左手持棍”（见图3.3）。

三官堂现在仍有较多的宗教活动。2011年8月28日（七月廿九）^[1]三官堂就有一个地藏王菩萨生日的佛事活动。活动有一定的规模，参与者有近百人。主要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在大殿，由一名穿红衣袈裟的法师领头念经，这位法师或是外面请来的。有八位身穿黄衣的人负责敲木鱼、敲钟、上香、引导等杂务。这八位黄衣人似是村民或是三官堂管理人员临时客串的。有三四十名中老年妇女跟着法师叩



图3.3 余杭塘河三官堂之朱天君塑像
（韩松涛2011年8月摄）

头念经。有数人明显是会念经的，很流利地跟着红衣法师念，大部分人不会念，只是跟从大家一起做仪式。另一部分人是在西边经堂边念经边折纸元宝。按杭州人的习俗，边念经边折的元宝是菩萨会收的纸元宝，这样的纸元宝烧的时候会起一阵旋风，将纸灰向上卷走，俗称是菩萨收走了。折纸元宝的人也有三四十人，每念一句经，在纸上点一红点，约在纸上点四个红点，一个纸元宝折成。

2011年9月上旬某一天，三官堂有一场道教的仪式。该场法事缘起是受现住在小区的一位原村民委托，举办一场法事。原本法事应该在家做的，但现在小区房地方狭小，又易干扰邻居，故到三官堂来做。法事

[1] 地藏王菩萨生日应该是七月三十，但是该七月无三十只有廿九，故以该天为地藏王菩萨生日。

似由村民担任，并无外请的道士。众人首先用八仙桌和条凳在三官堂大殿西侧搭好了仪式所用的场地，并在上位供上了神像，共七位，以上面三位下面四位的方式排列。笔者走近看了神像，明显是三清四御。然后有绸布做成的帘子挂在竹竿上，做成门的样子，上绣元帅、门神及《西游记》中的人物。负责吹打的有八名村民，年龄从三十来岁到五六十岁都有，有锣、鼓、号、钹、镲等乐器，其中还有长号，约有一米长。

从以上宗教活动可以看出三官堂佛道活动混杂不分，显示了其作为村庙的典型特征。

二、土地庙盐桥蒋老爷

《杭俗遗风》中有“三个半”一条，提到了杭城香火最盛的庙观：“杭州最盛香火之庙，名曰山上三个半，山下三个半。山上城隍庙、三官庙、太岁庙为三个，其半个即眼光圣母催生送子癍疹痘神庙。山下旌德观元帅庙、琵琶街龙吟庵、盐桥蒋老爷为三个，其半个即柳翠井巷熙春庙。”^[1]其中所提之“盐桥蒋老爷”是杭州的土地神，其香火为杭城最旺的庙观之一，可见其在杭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据《申报》：“俗传本月（六月）初九日为盐桥广福明王寿辰。神姓蒋氏，本邑人。向操米业，以岁荒平糶，毁家济难，歿而为神。功在一方，宜其庙食千秋也。”^[2]“杭州各庙土地神，每逢诞辰例有朝阙谢恩巡社之举。”故蒋老爷的诞辰，也以巡游赛会的方式进行。“初八日庙中司事舁神像出巡，先至贡院前朝拜北阙，复至祖庙巷广福祖庙拜谒祖先。相传此庙即神之旧居，供奉蒋氏先祖于此，故须拜谒。谒后由上祖庙巷出枝头巷，遍行社下然后回殿前。导旗牌廿余对，鼓乐一班，香亭一座，敕印马一对，清音一班，暖轿一乘，后面各班衙役十余起。然后创设禁卒，文武判官排队而行，神像坐于显轿，以伞扇蔽之。虽无各样助会，然亦楚楚可观。所过之处，居民咸焚香点烛，在街旁迎迓观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第155页。

[2] 《武林赛会》，《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95年8月5日）。

者，拥挤异常，几致填街塞巷，亦一时之盛事也”。

不过，两年后，由于官府的禁令，巡游被迫停止，但仪式仍在举行。“杭州访事人函云：杭州盐桥广福庙土地蒋神，相传于六月初九日诞辰。每届悬灯结彩，演剧十余日。男妇进香者，热闹非常。初八昇神出巡，有朝阙游社及拜谒祖庙诸典。今年本拟照旧举行。前因杭州府林太守查某元帅会时，发下告条云。凡迎神赛会聚众敛钱者，拿获重办不贷，遍贴各庙门前。是以此会亦不敢踵行，仅在庙前空场行拜阙谢恩之礼，并由掌案书执笏至祖庙中寂谒蒋氏先祖。前导仅用灯牌二对，鼓乐一班，锣帽伞扇而已。省中男妇方欲一扩眼界，而如此简略，殊不足观。乘兴而来，未免扫兴而返。惟庙中铺设俱极华美，并雇清音滩簧南词在彼弹唱，略有点缀耳。”^[1]



图3.4 三官堂土地神像（韩松涛2011年8月摄）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杭州的土地神应该有多个，而“蒋老爷”是香火最旺的一个。关于一般土地神的装束，前述三官堂内尚有土地神像，见图3.4。

三、伍公庙与城隍庙

杭州吴山俗称城隍山，因城隍庙在吴山上而得名。以杭州市1950年的统计来看，吴山及周围仍有近二十座道观，由于1950年为民国后一年，所以基本可以认为这些道观都是民国时期所存在的。

[1] 《会景寂寥》，《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廿五日（1897年7月24日）。

表3.1 1950年杭州市吴山及周围道观情况

宫观名称	派别	地址	住持	人数	备注
伍公庙	全真	伍公山	袁宗凯	1	
城隍庙	正乙	城隍山13	陈昌龄	10	
东岳庙	正乙	城隍山44	胡守凡	3	
太岁庙	正乙	城隍山	沈友村	8	
药王庙	正乙	城隍山39	孙赞春	4	
财神殿	正乙	城隍山38	孙赞春	3	赐福
仓圣庙	正乙	城隍山37	俞学恒	5	
三官庙	正乙	城隍山37	施静安	2	
关帝庙	正乙	城隍山24	杨礼贤	1	
眼光庙	正乙	城隍山27	施静安	1	
玄坛庙	正乙	城隍山28	施静安	1	
天解殿	正乙	城隍山34	施静安	2	
白衣殿	正乙	城隍山22	杨礼贤	1	
财神庙	正乙	城隍山19	顾松龄	3	水陆
酒仙庙	正乙	城隍山12	倪道澄	1	
财神庙	正乙	城隍山11	朱宝奎	3	五猖
解神庙	正乙	城隍山14	赵师良	3	
文昌庙	正乙	城隍山9	赵师良	1	

吴山上的俗神最早的是伍公庙所奉的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相传伍公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为杭州最早的真人神庙，素有“吴山第一庙”之称。传吴夫差十二年（前484），伍子胥被夫差赐死，投尸江中。吴人敬仰其忠烈，尊为潮神，建伍子胥庙、胥王祠，立坟墓，历代祭祀。据《西湖游览志》卷十二，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杭州刺史卢元辅于吴山重修忠清（伍公）庙，并作《胥山铭序》略曰：“有吴行人伍公子胥，陪吴之职，得死直言。千五百年，庙貌不改。汉史迁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谬也。伍公绝楚出疆，在平为未宦臣，在奢为既壮也，坎壕伏节，乞师于吴，五战至郢。……虽非命祀，不让渎济。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从此，忠清庙香火更盛，成为杭城道教一大圣

地。民国24年（1935）由玉皇山福星观接管。上述表中所列伍公庙住持袁宗凯即是福星观方丈李理山的徒弟。

吴山城隍庙有省、府之分。省城隍庙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祭祀周新。周新，广东南海人氏，明朝时曾任浙江按察使，为人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人称“冷面寒铁”，后来受奸臣诬陷，被明成祖杀害，引起朝野不满，百姓愤怒。明成祖为平民愤，称梦见周新做了城隍，于是立庙吴山，封其为城隍，于是杭州城隍便为周新。现在庙已不存，原址上建的是城隍阁，与原来的城隍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杭州府城隍庙是南宋绍兴九年（1139）从汴京迁来，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加封为“辅正康济广德显圣王”。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杭州知府杨孟瑛对府城隍庙进行整修后，撰写了《杭州府城隍庙记》。^[1]上述两城隍庙现均不存。

1958年“大跃进”时，吴山城隍庙等一批庙宇被拆除，伍公庙、城隍庙也在拆除之列。虽然城隍山上的庙观都已不存，但杭州俗将吴山称作城隍山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吴山上曾设立了火警瞭望台，居高临下，观察火情，杭州就有了“城隍山上看火烧”的俗语，意思与隔岸观火大约相近吧。

明代新建城隍庙后，吴山上两个城隍庙的香火就盛于其他庙观，虽然庙于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了，但城隍山上烧香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直到近年，这个传统仍在继续。城隍山上大大小小十几处烧香的地点。来烧香的大部分都是住在城隍山附近的居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有大批的市民上山烧香。有些已经上山烧香二十余年。50年来已经不存在可供烧香的庙宇了，但习俗仍在。从中可以看出，民俗传承的力量是很大的。

约2006年，吴山上复建了三座道观，分别是药王庙、中兴东岳观和伍公庙。虽然三个庙均没有交由杭州道协管理，但总算是恢复了数个历史的景点。其中伍公庙的情况见图3.5、图3.6、图3.7。

[1] 武德安等编著：《吴山》，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2页。



图3.5 吴山伍公庙大门（韩松涛2007年摄）



图3.6 伍公庙内潮神殿外景（韩松涛2007年摄）



图3.7 伍公庙潮神（伍子胥）像（韩松涛2007年摄）

四、天后宫

天后即妈祖，现今在福建、台湾、广东一带尤为信仰。关于妈祖的最早记载，是南宋洪迈的《夷坚志》支景卷九《林夫人庙》曰：“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著。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珎，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

杭州城北有天后宫，并有“光绪辛巳岁（1881），钱唐丁氏雕”之《城北天后宫志》，属名“钱塘丁午辑”。该书辑有《福建省志》及《圣迹图志》两个《本传》，综合两个本传可知，“天后，莆林氏女

也”；“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也。始生时，地变紫，有祥光异香”；“自始生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命名曰默幼”；“十三岁时有老道士元通者往来其家，见后喜曰：若具佛性，应得度人正果，乃授后元微秘法，后受之悉悟诸要典，十六岁窥井得符，遂灵通文化变化，驱邪救世，屡显神异”；“长能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间。宋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升化。是后尝衣朱衣飞翔海上，里人祠之”。

妈祖初次由皇帝加封是在宣和癸卯（1123），“特赐顺济庙号”，绍兴元年（1131）始封为妃，称“灵惠妃”，元至元十八年（1281）册封“护国明著天妃”，故此时起称天妃。《西湖游览志》曰：“天妃宫在孩儿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康熙十九年（1680）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二十三年又进封“天后”。自此妈祖亦称天后。同治七年（1868），城北天后宫进行了重修，丁申撰有《重修天后宫碑记》。^[1]

从上述来看，天后宫至少有两处，一处 in 城北，一处 in 孩儿巷。而据清翟灏《艮山杂志》：“杭城内外，旧有祀庙凡四。”一在艮山门外，一在吴山三茅观东侧，一在孩儿巷西，一即现下城天主教堂处。^[2]其中艮山门外的顺济妃庙元末已经被毁。上述四个妈祖庙其实还不包括城北天后宫。城北天后宫按明嘉靖《仁和县志》记载：“天妃宫，在德胜北，以奉顺济圣妃。”故杭州的妈祖庙至少有五处。钟丽萍甚至认为杭州的妈祖庙古今以来或有七处^[3]，虽然部分可考，但今都不存。

[1] 《城北天后宫志》，《藏外道书》第20册，第376、377页。

[2] 钟丽萍主编：《流淌的文化——拱墅运河文化概览》，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3] 同上，第159页。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组织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及其经济状况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士人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1932年《杭州市经济调查文化教育篇》^[1]，此前缺乏统计，不得而知。

[1] 见千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千人俊(1901—1982)，字庭芝，号梅园，浙江宁海人。1925年任宁海县教育会会长。1927年北伐军过宁海，随余文宪部赴杭州，任二团指导员。不久返宁海，任县党部青年部长。旋入上海远东大学国文系、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读书，毕业后获文学士学位。1936年赴杭州，任《之江日报》主编。1941年任宁海县政府政工指导室主任。翌年任县“抗日动员会”书记长，组织抗日宣传。此后长期在杭州、天台、黄岩、三门、宁海等地任中学教师或校长，课余仍勤奋钻研学问，曾兼任宁海县修志馆编纂、浙江省通志馆采访等职。1944年经全国学术委员会批准，授大学国文副教授职称。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宁波四中任教，后因历史原因退职回家。千人俊致力于地方志资料的搜集和编写工作，共纂修省内外志书3辑62种1176卷。第1辑24种566卷，计有民国杭州、绍兴、永嘉、嘉兴、缙云、永康、龙泉、仙居、上虞、奉化、青田、黄岩、天台、临海、淳安、温岭、慈溪、兰溪、海宁、金华、余姚、桐庐、诸暨、高阳等县市新志稿。第2辑20种341卷，计有民国临安、东阳、江山、遂昌、云和、常山、开化、安吉、吴兴、德清、武康、长兴、丽水、宁海等县新志稿和《宁海漫记》《宁海续志》《宁海三记》《宁海四记》《宁海五记》《宁海六记》等。第3辑18种269卷，计有《民国新宁区志》《续编浙江通志稿》(浙江方志目录有记载)，鄞县、杭州、嘉兴、定海、仙居、镇海、象山等县的漫录或漫记，义乌、乐清、崇德、海盐等县的新志稿，并有外省四川、江苏、广东、山东部分省的县志稿。其著作之丰富，为近代地方志所罕见。著有《盘溪诗草》《天台游草》《金陵杂志》《括苍游草》等诗作多卷。

表4.1 杭州各寺观教堂徒众统计^[1]

教别	寺院教堂数	男徒众	女徒众	总数
佛	676	2128	1170	3298
道	280	833	281	1114
回	1	503	454	957
耶稣	25	1132	1217	2349
天主	4	542	445	987
总计	986	4488	3567	8705

据1936年出版的《浙江新志》^[2]载，全省有道教信徒15530人，各市县可考者，杭州市有1114人（其中男性833人，女性281人），鄞县162人（男126人，女36人），常山160人（全部为正一派），永康有五六十人，江山有97人（男84人，女13人），天台余杭各不下数百人（多系龙门派），宣平、乐清等县几于绝迹。杭州市道教信徒人数占全省总人数的7.17%，这一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从表4.2可见，民国时期，道教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不动产仅仅比佛教差，比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为好。

[1] 据民国21年（1932）《杭州市经济调查文化教育篇》，见于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

[2] 姜卿云编：《浙江新志》，杭州正中书局1936年版。姜卿云（1904—1985），字心白，兰溪圣山乡横塘村人。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毕业，旋入上海法学院攻法律。毕业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执委会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浙江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又任宪国民大会代表、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当选为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湾，旋经香港至北京。任北京制药厂高级工程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著作有《浙江新志》《食治本草》。

表4.2 1932年杭州市宗教情况统计^[1]

	道 教	佛 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信徒人数	1114	3298	957	987	2349
田产 (亩)	326.49	4634.67			
地产 (亩)	162.48	389			
山 (亩)	112.95	3457.6			
荡 (亩)	27.55	305			
房屋 (所)	12	145	4		23
房屋 (间)	91	437	16		
凉亭 (座)	2	5			
戏台 (座)		2			
楞严坛		1			
寺观庙 (所)	280	676	1	4	25

这一时期，杭州市各宗教的实力对比颇为鲜明，如表4.3所示。

表4.3 杭州市各寺观教堂财产及附属事业统计^[2]

教别	土地	房 产		附属事业		备注
		房屋	住宅	学校	慈善	
佛	8786	145	437	1	0	
道	629	12	91	0	0	
回	0	11	5	2	0	
耶稣	0	19	4	16	8	
天主	0	1	0	0	3	
总计	9415	187	543	19	11	

同样是1936年干人俊编纂的《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载：“杭州市共有教徒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其财产有田三百二十六亩四分九

[1]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7页。

[2] 据1932年《杭州市经济调查文化教育篇》，见干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卷二十四。

厘，地一百六十二亩四分八厘，山一百十二亩九分五厘，荡二十七亩五分零五毫，房屋十二所计九十一间，凉亭二座，此外尚有寺观二百八十所，供其主持、其他画符、施术、烧香、做斋，各项收入尚不兴焉。平居所事，看管观宇，修理道像及代信徒作诸祈祷。”这里的人数和不动产的数字显然是直接沿用自《浙江新志》。与佛教相比，道教的经济状况要差一些，但比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要好很多，可惜的是，信徒人数却比后三种外来宗教少很多。不过，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主流思潮发生变化，受全盘西化的观念影响或出于崇洋媚外的心理，出于趋新求异的心理，人们更乐于相信或承认自己是从西方传来的宗教的信徒；二是这些统计只调查了道士人数，对道教的居士和那些只是偶尔到道教寺庙从事信仰活动的人并未统计在内，还有散居民间，偶尔从事道教活动的非职业道士，显然也没有统计在内；三是道教世俗化严重，道教有自身的特殊性，要准确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道教信徒，往往比其他宗教困难得多。

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民生凋敝，1932年至1950年，杭州道士人数急剧减少。据《杭州市志·宗教》（第九卷）记载，杭州解放初，1950年全市宫观仅剩下78所，道士217人，其中道姑14人，非住庙道士80人（门眷26人，应赴54人）；另外，在社会上从事吹唱的“道士”约有150人，其生活来源主要靠香火、经忏，或从医及摆摊做小贩等。^[1]这说明，道士在这一时期主要生活于社会下层。从本书前面所引民国时期道士的照片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比较艰苦，生存压力比较大。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传戒活动

传戒、授箓是道教对拟成为道士的信徒进行考核，如考核通过则正式吸收为道士的宗教仪式。传戒仅对全真道而言。正一派类似对道士的考核活动称为授箓。传戒又称开期传戒，指从开坛传戒到传戒圆满的整个过程。道士出家，初入道观者为道童，在子孙庙拜师学经，蓄发结

[1]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7页。

辩。诵习《早晚功课经》《三官经》《玉皇经》《玉皇宝忏》《斗科经》以及作道场之经咒。等到了十方丛林开坛传戒之时，子孙庙的师父便荐其赴丛林受戒。全真派之正式道士，必须经过受戒仪式，受戒即表示接法，为正式之法嗣。

全真道传戒始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方丈开创全真丛林，在北京白云观首次公开设坛传戒。他承袭全真派戒法科仪，讲说《初真戒》《中级戒》《天仙大戒》，合称“三坛圆满大戒”。王常月说：“学道不持戒，无缘登真箓。”

道教宫观有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两种组织形式。

子孙庙多称为“小庙”，可以收徒弟，代代世袭相传。子孙庙管理职权不明，教务没有预设的规划和程序，庙观的主要负责人（住持）是师徒传承，管理方式也是当家、主要负责人（住持）一人说了算。小庙不论规模多么大，只能称小庙而不能称常住，更不得悬挂钟板，没有传戒权利，一般不接纳别处道友前来挂单。假如子孙庙悬挂钟板，日常作务以钟板为号令，就具有半十方丛林的性质，就得允许道友挂单留单接众，安排十方道友以相应的职务。这时它就称为“子孙丛林”或“子孙常住”。这就是说，悬挂钟板的子孙庙是升了格的庙宇。1949年前国内的子孙常住，著名的有千山无量观、山东云蒙山白云岩、河南中岳庙、陕西龙门洞、四川青城山天师洞、武当山紫霄宫、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天台山桐柏宫等等。

十方丛林又称“十方常住”。“常住”这一名称早在金、元时期道士的著述中就可经常看到。道教庙宇的大门通常叫作“山门”。“丛林”是山林茂密之意。深山老林往往有修道之士隐居其中，常住也往往不乏高人逸士。深山老林万物丛生，十方常住道众会萃。故常住有丛林之称。十方常住日常作务和举止行动都有节制规矩，是陶溶品性、学习道教规法威仪的场所，所以丘处机主张道人要住庵，即“常住”。十方丛林的庙宇中悬挂钟板，日常作务以钟板为号令，道众由子孙庙收的徒弟前来挂单留住而组成。他们在丛林互相参学，受戒结束或学习结束后通常就返回原来的子孙庙，故十方丛林的道士流动性很大。

十方丛林有传戒特权而不得私收徒弟。十方丛林的宫观性质是属于全国道教徒公有的，地不分东西南北，派不分正一和全真，凡是道教徒都有享受挂单居住的权利，同时人人都有保护的义务。十方丛林备有全国三山五岳各宗各派的“字派”，凡常住挂单道友，号房、客堂可按簿查对法派，留单转执事。宫观人员中不得相互拜师授徒，亦不得以师徒相称。十方丛林宫观，自古以来财产就属于公有，常住道士就是主人，宫观就是所有常住道士栖身修持之所。丛林宫观的人员（常住道士）来自四面八方，所以注重民主公议，制度管理；用人制度是民主选举，唯才是用；十方丛林中的所有道士均为道祖“太上爷”的弟子，所以相互间地位平等，过去北京白云观的老道长相互间均按其姓氏称之为“张爷”“王爷”“李爷”“赵爷”，即是此意。

十方丛林有着一整套系统的管理体制，常住道士在丛林中分别担任不同的执事，分工细致，各负其责，共同维护丛林的正常秩序。各管理职位的职责如下：

方丈：道教十方丛林的最高领导者，也称为“住持”。道教传说海上有一名为方丈的神山，上面有仙人居住，所以其所居丹室亦称为“方丈”。不过，为道众广泛公认的是另一种解释。《庄子·天下篇》成玄英疏：“方，道也。”《大戴礼记·本命》：“丈，长也。”即对有道行的长辈的尊称。方丈具有开坛传戒、普度弟子的职责，所以对方丈的选拔很严格，必须受过三坛大戒，而且接过“方丈法”，德高望重、戒行精严，受全体道众拥戴，才能推选为方丈。如《三乘集要》所说：

“方丈乃人天教主，度世宗师，演龙门之正法，撑苦海之慈航，常怀传贤之心，素无吝道之意，作全真之模范，律门之纲领，非有道之师，不可立也。”

监院：俗称“当家”，道教丛林主持一切事务者。监院由全体道众推选，可以连选连任。如果本丛林无此人才，可以到其他宫观去请。监院若不称职，方丈有权撤换之。对监院的品德，《三乘集要》说：“监院乃常住之首领，道众之宗主，必须才全智足，信道明德，仁义谦恭，宽宏大量，弱己卫众，柔和良善，明罪福因果，功行俱备者，乃可当此

大任。”

监院之下是执事。执事有若干分类。

其一是“三都”，即都管、都讲、都厨。

其二是“五主”，即静主、堂主、殿主、经主、化主。

其三是“十八头”，即庄头、库头、堂头、钟头、鼓头、门头、茶头、水头、火头、饭头、菜头、仓头、磨头、碾头、园头、圃头、槽头、净头。

客、寮、库、账、经、典（点）、堂、号，叫做“八大执事”。这在全国各常住都是相同的。客是客堂，是常住中的一个大家寮口。客堂中的执事人员叫“知客”，负责接送来往宾客及参访道友。知客不一定只是一个人，根据宫观规模往往有三个或五个不等。知客也分先后秩序，最先的叫头单知客，其次为二单、三单……原来的头单知客，或转别的职务，或起单走了，原来的二单就成了头单。在无“总理”人选，即总理职位空缺时，头单知客实际上担负着总理职责。总理通常都住客堂，既协助监院、都管统理内外公务，也是众知客的首领。寮是寮房，也是丛林中的一个大家寮口。寮房的执事人员叫“巡察”。巡察主管丛林人事安排。巡察同样根据丛林规模大小，可以不止一个人，往往也是三个五个不等，也有头单二单的先后秩序。巡照，职责是监察丛林内外一切事务。在无巡照或纠察的人选时，头单巡察就得实际担负起众巡察的首领责任，入住寮房。通常情况下，各大常住设巡照不设纠察，设纠察不设巡照，只在传戒时才巡照、纠察齐设。库是库房，负责人称为库头，事务忙时可设副手一名协助工作，名贴库。账是账房，执事名称就叫“账房”。管理账目，一般只设一人，有的常住设内账房和外账房两名，其分工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和出纳。经是经堂，经堂执事称经师，经师首领是高功。如果丛林内设经主这一职位，则经主住经堂内。典是典造（有的常住称点座）。典造是大厨房的首领，负责办理斋馐饮食。大厨房是常住重要寮口，是道众司命，最为辛苦，所以丛林的规矩中往往给典造以“保单”“保香”的特权。大厨房也是常住最大寮口，饭头、菜头、大小火头、水头，贴案、杂务等都是大厨房的执事。堂

是十方堂，有的常住叫云水堂。北京白云观在1949年前设十方堂、云水堂两个堂口，单日挂单道友送云水堂，双日挂单道友送十方堂。十方堂或云水堂执事称作堂主。号是号房，负责对挂单道友进行考问、登记。号房也称迎宾，执事称作号房或迎宾。^[1]

十方丛林还设有其他重要执事。例如，海巡负责查理工事及调解纠纷，监修负责庙宇维修并兼管庄农，公务管理房地山田及借贷还贷诸事，主翰负责书写文稿、绘图等事，书记负责书写表疏、信函（主翰和书记职责相近，故往往两者混用不分，但在大的十方丛林中则分为二职）。十方丛林内，高功、提科、表白、都管、都讲、都厨、静主、堂主、殿主、经主、化主、库头、总理、知客、巡照、巡察、海巡、监修、公务、迎宾、主翰、书记、典造、账房等，往往称为道教十方丛林“二十四位大执事”。都管、总理、巡照、纠察、客寮统称为“首领执事”，其凡需施行内拜客的，统称“果茶执事”。也有把客寮库账称作内四寮，经典堂号称作外四寮的。除上述执事外，还有杂役执事，统称为散单执事。如夜巡、洒扫、钟板、巡田、巡山、老人堂主、官木匠、官裁缝、副殿主、行堂、待者、知随、小典造、买办，庄稼院子有场头，武昌长春观有高功经等。

此外，丛林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专门的执事。但是，十方丛林的执事名称都是大同小异的。

兹把常住主要执事及所隶寮口^[2]制图如下（见图4.1）。

从图中可见，十方丛林的管理体制是很严密的。监院、都管等职位的人选，必定是品行端方，戒守谨严之士，一受道众委托，往往兢兢业业，唯恐做不好事而遭其他道众貶骂，一旦任职期满，多自觉让贤，甘居人下，很少有“恋栈之徒”。风尚所及，一些韬光晦迹之士，平常不露锋芒，遇到监院、执事有无法解决之事，往往临难不惧，尽力协助解决。待困境渡过，则两袖清风，他方云游，从不显耀自己的功德。事实上，十方丛林的管理原则是民主和大公无私，这是十方丛林之所以几百

[1] 闵智亭：《道教仪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3页。

[2] 同上，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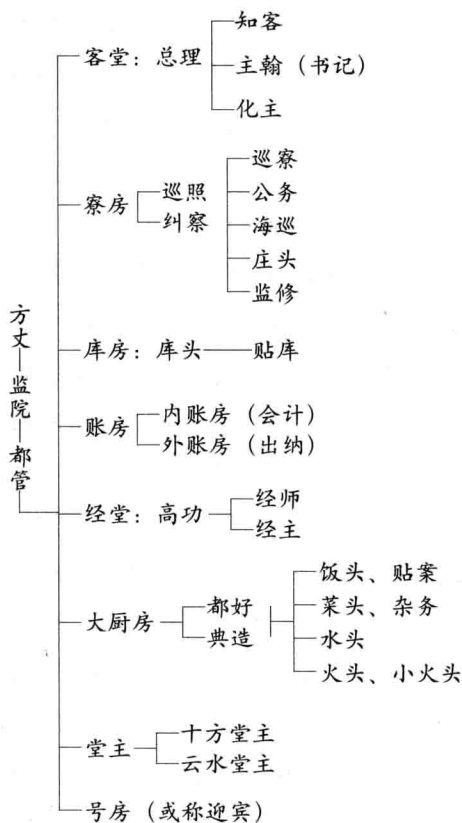


图4.1 常住主要执事及所隶寮口

年沿袭不败的重要根源之一。传统上，道士普遍认为：哪个省的十方丛林兴旺、规范严，哪个省的道风就好。这说明十方丛林的规范对道教道风的影响是很大的。

十方丛林附近往往设有方便小庙或房舍，如北京白云观的外茶房、山东济宁州常清观的青霞洞、河南南阳玄妙观的庄房、陕西八仙庵的油房、楼观台的巡田庵、湖北武昌长春观的安家湾庄房，等等。这是因为有些道士经典生疏，到丛林挂单时背经不熟顺，临时暂住于此以便熟习经典。另外，乡间或外县道士来省城办事，通常也居住于这里。这种临时暂住，传统上称为“借单”。

清末民初道教十方丛林主要是沈阳太清宫，山东长清观，北京白云观，河南玄妙观，陕西八仙宫、楼台观、张良庙，四川二仙庵，湖北长

春观，江苏常州玄妙观，上海白云观，宁波佑圣观等等。

前已述及，只有全真道的十方丛林才能传戒，但正一道道士可以自由参加。自从张天师不发度牒以后，许多正一道道士开始参加全真道的传戒活动。但是，道教内部默认，即使他们精于传戒仪范，也无权当十方丛林的住持。这是因为道派不同之故。

清代，朝廷对各地区传戒持续的时间和传戒人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清初朝廷准许北京地区每次受戒人数可达2000人，传戒时间可长达100天。1800年以后受戒人数逐渐减少，到了清末每次受戒人数只剩大约500人，传戒时间也缩短到53天。民国以后，中央政府对每次传戒的人数和时间没有规定。北京白云观保存的一本《登真篆》（戒坛考偈之后按名次排列所编的名册）记录了从1871年至1927年中其他各道观共传戒15次以及各道派传戒的人数。其中龙门派有2523人，是最多的，几乎所有超过100人的大型传戒都属龙门派。其次是华山派，传戒505人。其余39个道派从名称上看都属正一道，如茅山宗在1924年传戒一人。^[1]北京白云观是全真龙门派的祖庭，也是举办传戒活动最多的道场。清代嘉庆以来至清末传戒28次，民国则分别有二年、八年、十六年共3次。其他各地曾举办传戒大法会的宫观至今可考或传说者有：成都二仙庵、沈阳太清宫、南阳玄妙观、杭州玉皇山、千山无量观、西蜀川省梓潼宫、陕西景福山、华阴玉泉洞、青城山天师洞、千山五龙宫浙江净名道院、浙江乐清羊角洞、浙江镇海渊德观等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光绪八年、九年、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5次传戒。传戒宫观需在道教界有较大影响力且有足以支撑传戒费用的经济实力，还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受戒人必须年满16岁，一般应在普通小庙里至少住满一年。戒子受戒接法讲究一个“缘”字。到拟受戒的十方丛林，经审核登记入册后，入住该十方丛林，过十分严格的宗教生活，听传戒律师宣讲戒律，诵读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等三堂大戒的条文。戒期为50天至100天。传戒期间要进行“考偈”，即考试：受戒弟子分清名次，按《千字文》次序排序，传戒圆满后，编入《登真篆》。头四名受戒人有资格成为十方

[1] 吉冈义丰著，余仲珏译：《道教的多面性》，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丛林的方丈。第一、二名受戒人授与法简，注明他们的道派和师承。获得戒名后，自愿遵守戒律不犯规戒，经审查合格，发给“戒牒”，以为凭据。道童受戒后取得道袍、度牒、饭钵和规，便成了正式的道士，以后或住丛林，或住小庙，或云游参访，行动自由。

光绪丙申年（1896），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举办了一场传戒活动。本次活动有书面文字记载，名为“玄都律坛浙江省古杭玉皇山福星观传戒录”。全真道的醮坛称为“混元宗坛”，用“道经师宝”印。全真道道士授受戒律的法坛，即戒坛，称为“玄都律坛”。正一派醮坛称为“万法宗坛”，用天师之印，即“阳平治都功”印。正一派授箬的法坛称为“箬坛”。正一派因有龙虎、上清、灵宝、茅山、净明等宗派，各派的授箬有差异，故总体看来比全真道的传戒复杂。

玉皇山本名玉龙山、玉柱峰。据说唐代有人到山上采松花见玉帝显圣，于是改名玉皇山，在山中部建玉皇宫，在山顶建福星道院。后毁于战火。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蒋永林经多方筹措，在官民各方支持下，经多年努力，终于复建福星观，蒋永林任方丈。此时福星观自视为十方丛林，实为子孙丛林。

本次戒坛参拜的道教神有两组，每次从高至低依次如下：

三清三境三宝三天教主、四御四阙四圣四皇上帝、西天竺国圆明道姥天尊、南极长生大帝元圣天尊、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大帝、南无报应教主无量寿佛、都天纠察护法灵官、九天云厨司命灶君、本坛护法土地尊神；

先天教主玉清圣境道宝元始天尊、玄中教主上清真境经宝灵宝天尊、混元教主太清仙境师宝道德天尊、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天皇大天尊勾陈高上帝、万星教主紫微高上帝、万地之主慧宫高上帝^[1]、玉清真王南极长生大帝、寻声赴感太乙救苦天尊、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西天竺国圆明道姥天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官九府应感天尊、真武祖师报恩教主金阙化身荡魔天尊、东厨司命灶君元和定福天尊、先天主将一炁神君护法灵官应化天尊、清净法身满空圣众、太上无极大道感应意

[1] 这里的万地之主慧宫高上帝即下面图中所述的万地之主后土高上帝，也即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掌阴阳，育万物，被称为大地之母。

万净天。^[1]

位置安排如图4.2所示。

传戒的高道通常是十方丛林的方丈，授戒时称为“传戒律师”，又称为“传戒本师”“律师”。戒坛在哪一座十方丛林，就由哪方丛林的方丈担任传戒律师，负责为戒子（即受戒道士）讲说戒律、传授戒法。但并非任意，律师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受满三坛大戒，在同等条件下，最好是上一坛戒子中获受“天字第一号”的戒子，接过“方丈法”，戒行精严、德高望重的方丈始可荣膺此职。也就是说，不仅要学问好、人品好，还要有功德、有办事能力、能服众望。如本次传戒的律师、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福星观方丈蒋永林（？—1896），是受监院陈明峻及院内外道众之请，在光绪七年（1881）远赴北京白云观从孟永才律师授戒法后才择期开坛传戒的。

律师人选确定后，要聘请配合律师传戒的八大师人选：监戒（坛）大师专门负责监督戒坛威仪，禁止戒子违犯戒规，对不法者有权责罚。证盟大师负责为戒子解说教义经典、经忏威仪等，回答戒子疑问。以上传戒律师、证盟大师和监戒大师合称“戒坛三师”，是戒坛大师中最主要的三位。保举大师一般由开坛传戒丛林的监院担任，专门负责保举、保戒、保香的大师。演礼大师负责传授戒子登规演礼及戒坛威仪等。登篆大师专门负责为戒子取道号，填写《登真篆》。提科大师负责诵经拜忏及经堂事务。引请大师，又称“迎请大师”，负责主持戒坛大型斋醮科仪，担任高功。纠仪大师负责纠正戒子仪规。能请得一批护坛大师（专门负责保护坛场秩序的大师）尤佳。此外，还有道值师（每日领取方丈所示“道值签”，巡视各寮，查处犯规戒子的执事，一般由海巡、巡察、巡照等轮流担任）等，协助律师传戒。上述人员在律师的带领下，贯彻以“戒”为师的精神，依据教义、坚持传统原则，面对现实，对传戒活动进行具体策划，即安排传戒活动中具体的程序和内容。本次传戒的八大师都是在玉皇山福星观参加过前三次授戒的，说明福星观此时确已完全具备传戒的人才条件（见表4.4）。

[1] 两组神仙名称有重复，不知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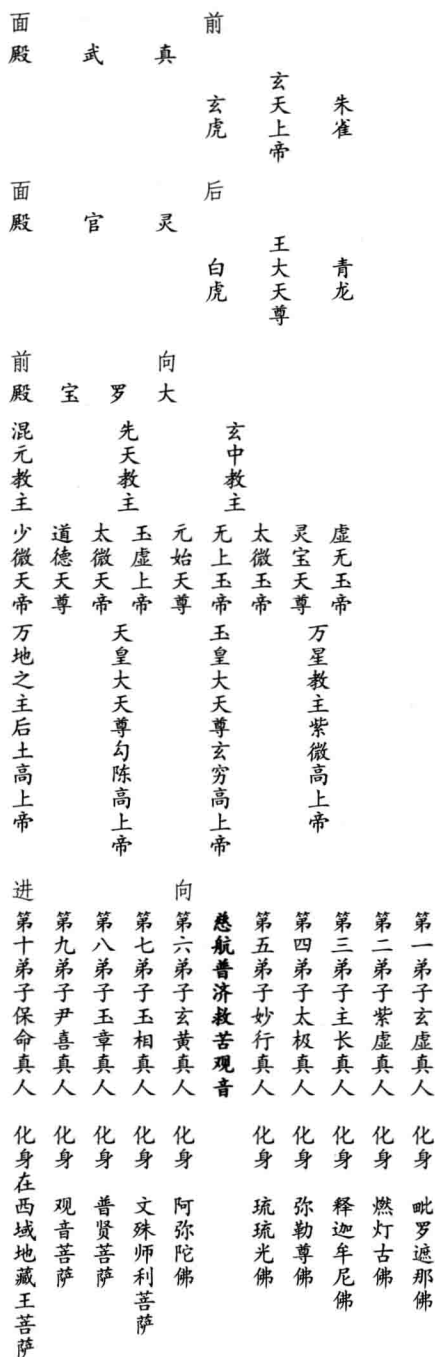


图4.2 戒坛神谱

表4.4 光绪丙申年福星观传戒大师情况

职位	姓名	籍贯	备注
传戒大律师	蒋永林	浙江东阳	戒子 5 人
证盟大师	冯明安	江南省江宁府上元县	
监戒大师	姚明亮	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	
保举大师	方明根	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	
演礼大师	李明升	浙江省金华府东阳县	
纠仪大师	陈明诚	浙江省温州府临安县 ^[1]	
提科大师	林明清	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	
登 大师	沈明坚	浙江省嘉兴府海盐县	戒子 4 人
迎请大师	沈明福	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	

戒子经历“初真”“中极”“天仙”三坛大戒，恭听方丈大师传戒讲经说法后，戒子的身份地位就有了变化，即从俗人变为有道士，方丈大师更因此变为“方丈大律师”“人天法主”。道门传统上认为，“人天法主”可以代天说法；而经受“三坛大戒”后的戒子，依据《初真戒·入戒要规》的规定：受天仙戒者称为妙道师，受中极戒者称为妙德师，受初真戒者称为妙行师，同戒晚辈者称为同衣，上座称为先师。全真戒坛实际上就是全真道士学戒律、学知识、学科仪、学文化的特殊课堂。经过受戒的全真道士，不仅获得了戒牒，拥有了施行道术、主持醮仪等宗教活动的相应神权，更重要的是掌握了道士的道德规范。如《登真箓》序言中说：“夫戒乃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励后学舍妄归真，禁止之辞也。”其大要，“总不外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箴”。通过受戒，明了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全真道士。所以，传戒对受戒教徒提高素质帮助很大。从道教整体来看，则是以道教传统准则规范教徒的言表举止，对全真道整体起到引导适应、整合规范、树立形象和展示风貌的积极作用，进而通过道士影响于世俗民众。本次传戒的主旨是“惟愿处处田禾熟，家家保安康，人人离苦难，个个登彼岸”。这是符合上述

[1] 此处“温州府临安县”有误，临安县属杭州府。

传戒目的的。

本次传戒活动，第一部分前四名戒子是：

龙门/天字第一号/冯明光/云程子。年50岁。丁未相。八月初八日辰时建生。系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氏。在隆恩院出家。度师石圆林。

龙门/地字第二号/王明镜/精彻子。年48岁。己酉相。四月十六日巳时建生。系浙江台州府太平县人氏。在温州府乐清县方岩山玉蟾仙宫出家。度师陈元蟾。

龙门/元字第三号/沈明贤/修正子。年40岁。丁巳相。吉月吉日吉时建生。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氏。在杭州府城内卧龙山仓颉祠出家。度师赵圆方。

龙门/黄字第四号/金至詮/得诚子。年22岁。乙亥相。八月初十日戌时建生。系浙江省台州太平县人氏。在温州府乐清县方山玉蟾仙宫出家。度师王明镜。

第二部分前四名戒子是：

龙门/天字第一号/陈明德/惺悟子。年54岁。癸卯相。八月十六日酉时建生。系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在鄞县福泉山仙照观皈依。度师徐圆星。

清静/地字第二号/滕通根/本修子。年51岁。丙午相。十一月十一日辰时生。系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氏。在浙江省王山观音阁皈依。度师蒋真林。

龙门/元字第三号/俞理春/兴发子。年33岁。甲子相。十一月初八日辰时建生。系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在鄞县福泉山出家。度师王至松。

龙门/黄字第四号/宓理应/群生子。年23岁。甲戌相。二月十一日辰时建生。系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氏。在本杭观音洞皈依。度师金至孝。

本次传戒共传戒子346名，涉及龙门等11个宗派，其中龙门派戒子最多，达279名，占80%，清静派弟子其次，33名，占9.5%。

表4.5 光绪丙申年福星观传戒各派戒子人数

	龙门	茅山	紫阳	榔梅	华山	随山	茂山	遇山	崙山	南无	清静	戒子人数
第一部分	187	2	6	1	7	4	1	3	1	3	0	215
第二部分	92	0	0	0	0	1	0	4	1	0	33	131
合计	279	2	6	1	7	5	1	7	2	3	33	346

上述11个门派中,龙门、华山、随山、遇山(遇仙)、崙山、南无、清静均属于全真道。紫阳派为张伯端所创,通称为金丹派南宗,元代中期后汇入全真道。属于正一派的只有榔梅派和茅山派。需要说明的是榔梅派。

榔梅派又称武当本山派。创始人孙碧云。《古今图书集成》卷二八七引《武当山志》载:孙碧云,终南关西人。幼年颖悟,愿学仙人,入西岳华山追希夷之迹,岩栖穴处,服气养神。探黄老经旨、《周易》、《参同》,与夫儒释子史,罔不熟诵。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征至京师,赐衲衣,供斋供,馆于朝天宫。次年赐还华山。永乐十年(1412)成祖复召至,赐诗一章,敕授道录司右正一,命住持武当山南岩宫。永乐十五年(1417)卒。有《碧云集》行世。孙碧云据传为张三丰嫡传弟子,获授“炉外丹”即天元大丹和长拳十三式。永乐年间创建榔梅派并传丹士数人。榔梅道派为武当本山一脉。北京白云观内藏《诸真宗派宗谱》记载该派派谱:“碧山传日月,守道合自然,性理通玄得,清微古太元,真静常悠久,宗教福寿长,庆云冲霄汉,永远大吉昌。”明末,有六儒生同求道于太和山,紫竹林处遇丹士。经苦苦拜求,方破戒收纳入室,这就是后世“六家意”的来由。柯、韩、董、赵、薛、宗六儒士,在太和山紫竹林,日拳夜练,仰飞禽之身,吸走兽之形,会意于鱼龙之变幻,后建“鱼门六家意”拳。鱼门六家意,又参老少二坤道十二女型,合为“八门金锁拳”。榔梅鱼门拳,柔软而缠化,吞吐而崩弹,有鱼争龙凤之态,虚灵而玄妙。鱼门拳开爻走卦,行圈围弧,不失道家之度。演练时,舒坦条畅,气调筋养。

至今保留的“明掌”“绵掌”“七星手”“下西川”“八法”“绵掌套八法”“浪步游场”，以及“无极图”“八珍图”“六合图”“大步图”等来自于鱼门拳一脉。榔梅功还有内炼动功，即在十段锦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八元一气功”，在祖师“勒阳关”基础上，为助药饭炉而演变出来的“阴阳二气功”等。清朝建立后，六儒士下山隐名，流迹湖北咸宁、武昌山坡、葛店一带，以教学度日。道光年间（1821—1850），由柯姓为代表，嫡传咸宁彭貽条。由赵姓为代表，嫡传武昌儒士赵凡清。彭嫡传葛店（今湖北鄂州市）陈光洲。赵嫡传山坡胡连。武昌葛店斗牛观，今为鄂州市葛店斗牛观，“县西九十里，葛店街南”。斗牛观兴盛时为子孙丛林，曾开坛传戒。民国14年（1925）武汉长春观传戒时，《登真纂》中载有榔梅派道士受戒者8人，为“福、庆、寿、长”（辈谱）四代，均来自鄂州葛店斗牛观。斗牛观在1949年后已毁为耕地，道脉濒于绝迹。另有一脉传于河南省之县。康熙《武昌府志》及柯逢时纂《武昌县志》中均有记载。

龙门派前二十五代字辈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在上述戒子中，永字辈有5人，圆字辈有18人，明字辈有92人，至字辈有71人，理字辈有29人，宗字辈有16人。

清静派前四十代字辈为“全真通玄理，大道德无为，性合灰尸解，只此百功夫，虚静明常应，宏仁守至诚，嗣教宗元化，悟本自遐龄”。上述清静派戒子中，明字辈有1人，玄字辈有1人，通字辈有31人。

本次戒子的籍贯：浙江271人，福建5人，江苏5人，江西5人，江南3人（徽州府、苏州府、宁国府），湖北9人，湖南2人，安徽4人，四川2人，广东1人，山东2人，直隶1人。说明本次受戒的戒子主要来自浙江本省。

表4.6 戒子年龄

年龄 (岁)	10—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不详	合计
人数	9	31	54	93	100	40	10	10	347
百分比 (%)	2.59	8.93	15.56	26.80	28.82	11.53	2.88	2.88	100

347名戒子中，以40—49岁、50—59岁两个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5.62%，即一半还多。年龄分布呈现以50岁为中点，两头逐渐减少的纺锤状。最小者14岁，最大者79岁。按照传统的规定，戒子最小年龄是16岁，但这里却出现了14岁的戒子。这个年龄当道士，很难掌握和理解道教的教理教义。79岁的戒子，由于年老体衰，也很难掌握和理解道教的教理教义。14岁和79岁戒子的存在，说明这时道教界人才匮乏。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主办传戒活动的道庙拟以传戒为扩大教内影响、增加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所以来者不拒。

从《登真篆》整理出这一时期杭州道教寺庙的名单及戒子人数如下：福星观5人，隆恩院1人，府城内卧龙山仓颉祠1人，仁和仓桥水德道院3人，城隍山吕祖殿26人，余杭县洞霄宫16人，金鼓洞1人，凤凰山观音洞14人，余杭县天柱山金筑坪1人，湖墅大王庙9人，玄妙观1人，杭城观音关静修宫8人，小云栖孝慈庵1人，萧曹庙1人，乾元观1人，涌金门外问心斗阁渊真道院2人，炼性斗阁1人，城隍山登云洞3人，杭城太平门庆喜庵1人，大悲斗阁1人，立心斗阁1人，报恩斗阁1人，慈云岭玉皇宫2人。戒子人数最多的前三名道教寺庙是城隍山吕祖殿、余杭县洞霄宫、凤凰山观音洞。

本次受戒，蒋真林为度师的戒子最多，达34人，其中龙门派戒子4人，清静派弟子30人。同一位度师，为何弟子既有龙门派，也有清静派？可能的原因是度师受学多门，既有龙门派的师承，也有清静派的师承。类似的例子还有度师胡通为，其弟子2人为清静派，1人为龙门派。其次，冯圆安为度师的戒子有18人。蒋长青为度师的戒子有14人。蒋道林为度师的戒子有7人。湖州姚明亮为度师的戒子有23人。

从上述可见，玉皇山福星观的本次传戒活动，参与人数众多，戒子来源地遍及众多省份，戒子的门派归属也很多，说明福星观此时在江南乃至全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度师蒋永林确实可谓德高望重。这些戒子受戒后散归各地，是各地全真道教发展的骨干人才。

福星观的其他四次传戒活动，因缺乏文献，其详情不得而知。通过五次传戒活动确定了以蒋永林为首的玉皇山福星观道士与浙江乃至江南

多地全真道士之间的道统关系，奠定了玉皇山福星观在浙江乃至江南地区的中心地位，推进了全真道的发展。

第三节 杭州市道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清末至民国时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这给各种社团组织的滋生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清政府的消失，过去的政府宗教管理组织也消失了，宗教界面临“庙产办学”这一生死攸关且从1898年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历时近40年的政治运动，道教界响应政府要求成立组织以便接受管理的号召，同时也为了自保并处理内部公共事务，联合起来组建社团组织。在道教界，这就是民国2年（1913）开始在多个地区相继出现的道教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本书兹就杭州市道教会作一抛砖引玉的研究工作。

省内道教会以杭州成立最早，乐清道教会次之，创于民国27年，有会员304人，有田36亩。海宁县道教会创于民国36年，有会员521人。^[1]

一、杭州市道教会的酝酿

民国3年（1914），杭州道教正一派成立道教会，后停止活动。民国16年，以杭州正一派道士为主体，仿效佛教界从1924年开始酝酿，1927年3月建立“江浙佛教联合会”而建立“江浙道教联合会”。^[2]会长为清朝翰林孙锵，副会长为潘赤文，骨干主要是：参议员张景贤、老东岳道士郑友福（杭县国民党党部委员）、老东岳道士郑禅生（杭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城隍山道士沈友村、城隍山道士施静安。这些领导骨干多有政治背景，可以推断这个道教会主要是正一派道士在庙产办学运动背景下为保护庙产而发起成立的。它的主体是老东岳庙和城隍山，由于缺

[1] 《浙江通志稿》第101册《宗教》，第5、6页。

[2]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杭州民族宗教志》，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乏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开展活动应该比较困难，成立之后开展过哪些活动，文献无征，无从知晓，很可能成立不久就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民国26年（1937），全真派与正一派联合组建杭州道教会。关于此会筹备，《杭州市道教会筹办会通告》说：“为通告事照得信教自由，载在党纲，缘道访崆峒黄帝执弟子之仪礼，问柱下孔子，兴犹龙之欢，开中夏之文明，先东华而垂教，发明哲理，牖启后人，数千年来，蔚为中华之国粹。惜乎流传日久，精义淹没，后人奉行不善，几有一蹶不振之势。理山等痛其凌夷，亟图挽救，爰将依照宗教团体组织法创设道教会，得以整顿教务，研究哲理，改革陋习，转移社会——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杭州市执行委员会核准发给许可证书，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假座梅花碑佑圣观开筹备会议，并由杭州市党部委员石有绪，指导员杨竟子，杭州市政府监督委员吴仁山均准时出席——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1]次年四月，该会正式成立。《杭州市道教会通告第一号》中说：“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成立筹备会，办理会员登记手续，至本年四月二日召开成立大会呈奉。杭州市政府党部委派石有绪、吴仁山到会指导、监督，当场选举李理山、张景贤、沈友村、胡守凡、梁崇松、陆颂芬、施静安、荀明忠、陈宗振为理事，陈昌龄、杨演斋、俞学恒为候补理事，黄宗枝、黄宗庆、周鼎华、张元桢、周信玄为监事，昌宗业、张元松为候补监事。——同月二十七日，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推举李理山、张景贤、沈友村为常务理事，黄宗枝为常务监事。由常务理事互推李理山为理事长。决定杭州市十五奎巷玄妙观为会址。启用图记，开始办公。——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2]据此，民国26年，全真派与正一派联合起来，成功组建杭州道教会，会长为福星观住持李理山，会址在江干区十五奎巷玄妙观内。成立之后开展工作的情况，因文献无征，不得而知。同年12月21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杭州，因停止活动而自行解散。由于这届道教会从成立到自行解散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活动不多，故本书把它视为杭州市道教会的酝酿阶段。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5。

[2]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

二、杭州市道教会的成立

民国35年（1946）9月，道教界再次酝酿重建杭州市道教会，于9月6日形成发起人名单。如表4.7所示。

把这批发起人与日军入侵杭州前的道教会名单对比，日军入侵前的道教会理监事共19人中，参与此次发起工作的只有李理山、张景贤、沈友村、胡守凡、陆颂芬、施静安等6人，其余13人均未参与。两阶段间隔仅8年，这13人中的大多数肯定尚在世，其间原因，史料缺乏，难以推断。1946年9月14日召开杭州市道教会发起人座谈会，成立筹备委员会。李理山为筹备主任，筹备员有陆颂芬、胡守凡、沈友村、陶全觉、徐圆芳。总务组：陆颂芬为会计，沈友村为事务。组训组：胡守凡、徐圆芳。9月28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10月26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11月7日，杭州市长周象贤发布指令成立杭州市道教会。会址在涌金门金华庙内。

杭州市道教会以遵奉黄老玄旨、总理遗教，发扬固有道德，接受现代思潮，昌明教旨，刷新教规并团结道侣信士协助社会福利推行慈善公益为宗旨。对此宗旨，《浙江省杭州市道教会宣言书》作了更为详细的阐发。之所以要建立杭州市道教会，是因为：“盖道教为中华固有之国教，国有变更，道无变更，教亦无变更，惟因时而制宜耳。”^[1]建立杭州市道教会，就是因应当时情势的举措。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政治。对此，后文将有阐述。

它认为，道教在当时有存在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盖老子抱一为式，以清静自然为宗，其学说多从根本解决，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它看来，老子参透了人性和社会的根本，能从根本的层次提出解决人类社会种种问题的方案。尤其对当时正在宣传的民主、自由等理念，早有清晰的阐发：“揭橥后世自由平等之真相，而虚悬其镜像以相待。”“欧

[1] 《玉皇山志》卷十九《浙江省杭州市道教会宣言书》，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1册，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页。

表4.7 杭州市道教会发起人名单

姓 名	性别	籍贯	年龄	学历	经 历	现 职	通讯处
李理山	男	南通	73	研究 道经	住持玉皇山多年	福星观方丈， 战前杭市道教 会理事长	玉皇山福星 观
张景贤	男	杭县	55	略知 经义	住持宝极观三年	宝极观住持， 常务理事	三元坊保康 路4号
沈友村	男	崇德	52	略知 经义	住持太岁庙22年	太岁庙住持， 常务理事	城隍山40号
陆颂芬	男	崇德	54	粗识 经义	住持金华庙25年	金华庙住持， 理事	涌金门23号
胡守凡	男	吴兴	36	粗通 文字	住持东岳庙14年	东岳庙住持， 理事	城隍山40号
施静安	男	桐乡	56	略识 经义	住持承天观5年	承天观住持， 理事	城隍山24号
陈崇朴	男	东莞	52	略识 经义	住持黄龙洞20年	黄龙洞住持， 理事	西湖白沙泉 10号
杨明银	男	山东	76	略识 经义	住持报恩观25年	报恩观住持	孩儿巷86号
陶全觉	男	绍兴	67	粗识 经义	住持张大仙庙17年	张大仙庙住持	拱宸桥大仙 弄1号
朱师明	男	杭县	31	粗识 经义	住持城隍庙10年	城隍庙右司住 持	城隍山13号
蔡理清	男	杭县	57	粗识 经义	住持宣荣观3年	宣荣观住持	湖墅草营巷 52号
孙九皋	男	崇德	52	粗识 经义	住持旌德观30年	旌德观住持	东牌楼元帅 庙
何教彬	男	衡阳	65	粗识 经义	住持天真山登云观 多年	登云观住持	江干天真山 1号
徐圆方	男	昌泰	32	粗识 经义	住持显真道院多年	显真道院住持	庆春路
翁崇兴	男	桐乡	44	粗识 经义	住持祖关帝庙10年	祖关帝庙住持	祖庙巷祖关 帝庙
孙赞春	男	安徽	46	粗识 经义	住持药王庙24年	药王庙住持	城隍山39号
陈昌龄	男	嵊县	55	粗识 经义	住持城隍庙30年	城隍庙左司住 持，战前杭州 市道教会监事	城隍山13号

西所谓国家、社会、世界三大主义，太上之言均涵蕴之；他日人群愈进化，则太上之言益信而有征矣。”它甚至认为，西方哲学的精义，老子《道德经》中早有论述了：“欧洲之先觉，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梭格拉第各种学说，及晚近之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神》、康德之《魂学》、赫胥黎之《天演论》，其中精理名言，太上之经早已见及。”^[1]这一观点，说明此时的道士对西方哲学是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以人权、法治为基本精神的。战国时期，韩非子以《老子》作为法家思想的哲理基础，说明老子思想中确实有法治的思想蕴涵。不过，由此断言上述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老子《道德经》中都已经具有，显然失之于实。基于这一基本观念，它对当时世俗的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一是“老氏之教，晦语愚民，清谈误国”。二是“西学讲竞争，老教重谦让；西学崇刚强，老教居柔弱；西学务急进，老教则曰不敢为天下先”。^[2]在它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

道教存在的价值，其二是“且也道之为教，又平易近人，而恢诡奇怪、妄诞不经之事弗与焉”。这也是针对当时部分人对道教的错误认识而言的。对那些容易让人攻击道教“恢诡奇怪、妄诞不经”的道教内容，它认为均非道教真正的主体内容，“以符篆为道者，是道贼也”，“以服食为道者，是道魔也”，“以炼养为道者，是道障也”，“更有深林寂壑，个癖烟霞；蓬莱方丈，谬托神仙”。它尤其批判那些“惟以募化为生涯，经畿为事业，在人类中为寄生物，为附属品”的道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盛行反传统、反宗教、反迷信，废除淫祠邪祀，让道教生存颇为艰难。那么，真正的道教是什么呢？“穷性命之理，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使万善同归，共登道岸也。”^[3]道教每一次大的变革，往往都伴随着道与术的重构，尤其是对

[1] 《玉皇山志》卷十九《浙江省杭州市道教会宣言书》，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1册，第949页。

[2] 同上，第950页。

[3] 同上，第952页。

术的系统的清整与重建。这里把“穷性命之理”的自觉自利推广到觉他利他而行善，相对于传统的“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宗旨而言，应该说是对道教宗旨的一次革命，只不过，似乎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信仰性意义淡薄了不少。传统道教众多的术似乎也没有存身之所了。而且，道教会成立后会员们也进行经济募捐，显然没有按照宣言书所说的去做。事实上，道教如果不进行经济募化，生存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所谓“真正的道教”的使命如何完成，宣言书并未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1]尽管如此，这毕竟表明杭州市道教会的领袖们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革新道教，为道教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杭州市道教会是居住于杭州的道士的社会团体。《章程》第五条规定：“凡在本市道士，如有未经入会者，得由劝宣导组劝导入会。”按社会团体组织的规定，是否入会是个人的自愿选择，他人不得强制。但章程的规定，似乎有勉强之意。它似乎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道士不愿意加入应该怎么办。

关于杭州市道教会的组织架构，章程规定：理事9人，候补理事3人，监事3人，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中设常务理事3人，互推1人为理事长。监事会设常务监事1人。章程规定，理事会执行大会决议案及日常会务并对大会负责。

杭州市道教会理监事于1946年11月14日在监誓人监誓下宣誓就职。誓言为：“余谨以至诚奉行黄老玄学，遵守国家法令，忠心努力于本职，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严厉之制裁。谨誓。”这体现了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道教自觉地赞应政务，推行教务的愿望。杭州市道教会16名理监事的情况如表4.8所示。

[1] 这份宣言书诸多内容源于民国元年在北京白云观建立中华民国道教会的建会文件《道教会宣言书》（白永贞编撰，黄国富等编译：《铁刹山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31页）。

表4.8 杭州市道教会理监事履历 (1946年12月)

姓名	年龄	籍贯	学历	经历	现任职务	通讯处	备考
李理山	73	江苏南通	研究教义	住持玉皇山多年	玉皇山福星观方丈	玉皇山福星观	理事长
沈友村	52	崇德	研究教义	住持太岁庙21年	太岁庙住持	城隍山40号太岁庙	常务理事
陆颂芬	54	崇德	略识经义	住持金华庙25年	金华庙住持	涌金门33号金华庙	常务理事
朱师明	31	杭县	略识经义	住持城隍庙10年	城隍庙福善道院住持	城隍山13号	理事
徐圆方	32	江苏昌泰	略识经义	住持显真道院多年	显真道院住持	庆春路显真道院	理事
卢碧亭	39	杭市	粗通经义	管理洋坝头巷门眷多年	阴阳门眷	洋坝头巷56号	理事
胡守凡	36	吴兴	粗通经义	住持东岳庙14年	东岳庙住持	城隍山44号	理事
何教彬	65	湖北衡阳	粗通经义	住持天真山登云观多年	登云观住持	江干天真山1号	理事
张元楨	65	杭市	略识经义	在本市应赴多年	应赴经忏	下华光巷106号	理事
陶全觉	67	绍兴	略识经义	住持张大仙庙17年	张大仙庙住持	拱宸桥大仙弄1号	候补理事
宣心耕	30	杭市	略识经义	在本市应赴多年	应赴经忏	庆余桥7号	候补理事
施静安	56	桐乡	研究玄学	住持三官庙35年	三官庙住持	城隍山24号	候补理事
施诚易	39	江苏	略识经义	在皇山学道多年	福星观书记	玉皇山	常务监事
徐吴成	43	杭市	略识经义	在本市管理门眷多年	阴阳门眷	东街路1062号	监事
茹荣春	36	杭市	略识经义	在本市管理门眷多年	阴阳门眷	白叶树下23号	监事
杨明银	76	山东	略识经义	住持报恩观多年	报恩观住持	孩儿巷86号	候补监事

表中诸人均均为男性，均未参加过政治工作。

除理事会外，杭州市道教会设立执行机构具体办理相关事务，对理事会负责。执行机构分为五个股：总务股主持文牒、会计、庶务、交际、保管文书等事项。组训股主持会员登记、调查统计、训练等事项。宣导股主持采集历代有关道教文化资料，编纂典籍，参加公众运动等事项。福利股主持一切慈善救济、教育等事项。调解股主持调解会员间的矛盾、纠纷等事务。章程规定，各股设股长一人，副股长二人，由理事兼任，必要时可由理事会聘任其他人员充任。各股可视情况经理事会同意后雇佣办事员若干人。

章程规定，杭州市道教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会员大会每年春季定期举行。平时事务由理事会处理。每月15日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

《章程》第十九条规定，杭州市道教会的经常会务是：团结精神，推行政令；激劝社会，纠正衰靡；阐扬教义，刷新教规；提倡道德，启发良知；协助公益，赞襄慈善；恢复古迹，复兴名胜。

《章程》第二十条规定，杭州市道教会的特别会务是：设学校辅助教育，施药材救济贫民，设图书馆收集道教经籍供人浏览，设阅报室收集现代刊物供人研讨，劝戒烟酒会提倡节约与卫生运动，设收婴所救济遗弃婴儿，设瘞埋队肃清路尸遗骸。章程说明，举办这些事业须视本会经济情形次第进行。

杭州市道教会把会员分为基本会员与普通会员两类。基本会员实为集体会员，即庙观。普通会员实为个人会员，即道士个人。基本会员内的道士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杭州市道教会而成为普通会员。此外，章程规定，杭州市道教会还有三类编外会员，即维护会员、辅导会员、赞助会员。根据相关条文理解，这些编外会员主要是道教界之外不以教务活动为职业、愿意为道教事业做贡献的信教人士。但这三类会员的资格、入会条件、权利与义务等，章程中均无相关规定。

从表4.8可知，杭州市道教会是各主要道观的联合体，包括全真和正一两派。杭州市道教会的上层由各主要道观的住持构成。其中，玉皇山福星观是核心，因为福星观住持李理山是理事长，福星观书记施诚易

是唯一的常务监事。

杭州市道教会由全真会和正一会构成。其中，全真会有会员87人，其中有坤道6名，其余为乾道。在全真会员中，有住持30人，全真客师53人，全真2人（“全真客师”与“全真”有何差异，如何区分，文献无载），全真信徒1人，无国民党党员。年龄最大者77岁，最小者仅14岁。其中，住玉皇山者有28人，孩儿巷11人，报恩观9人，隆恩院6人，佑圣观路3人，说明这五地为全真道士聚居地，尤其是玉皇山全真道士众多，占有压倒性优势。会员职务有住持、代理住持、总理、洒师、经师、寮房、客师、知客、榔头、堂主、库房、正经主、巡山、阁主、皈依、行堂。这些职务大多来自于玉皇山作为较大的全真丛林道院的制度安排。全真派寺观共39所，其中住持加入道教会的33所。这33所寺观及其住持列表如下，另有6所无住持加入，见表4.9。

表4.9 杭州市道教会全真派寺观住持^[1]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会资格	现任职务	住址	备考
李理山	男	73	南通	全真住持	玉皇山福星观住持	玉皇山	
陶全党	男	67	绍兴	全真住持	拱埠张大仙庙住持	拱宸桥	
仲圆樑	男	40	安徽	全真住持	放生道院住持	湖墅	
昌宗业	男	67	江苏	全真住持	关帝庙住持	湖墅小河	
王理莲	女	32	苏州	全真住持	佑圣观住持	佑圣观路	
徐圆方	男	32	太仓	全真住持	显真道院住持	庆春路	
邱圆朴	男	37	山东	全真住持	千胜庙住持	千胜庙	
何教彬	男	65	湖北	全真住持	登云观住持	天真山	
刘诚仁	男	45	河南	全真住持	升玄观住持	玉皇山	

[1] 本表据《杭州市道教会会员名册》（民国35年12月份）（实为全真会员名册）整理而成。在杭州市档案馆所藏有关杭州市道教会的档案材料中，徐圆方的籍贯出现了江苏泰昌、昌泰、太仓三个说法。这三个地名在江苏都有，但目前未找到别的文献资料来证实徐圆方的籍贯究竟是哪里。

续 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会资格	现任职务	住址	备考
张理金	男	57	陕西	全真住持	今古洞代理住持	玉龙山今古洞	
赵正亮	男	45	山东	全真住持	甘王庙住持	清泰门外	
陈崇朴	男	51	广东	全真住持	黄龙洞住持	玉龙山	
李明荣	男	60	杭县	全真住持	问心阁住持	涌金门外	
陈宗林	男	49	台州	全真住持	施将军庙住持	众安桥	
张理义	男	52	江苏	全真住持	隆恩院住持	茅廊巷	
蔡宗根	男	33	江苏	全真住持	财神殿住持	六部桥	
董理仁	男	55	江苏	全真住持	东关帝庙住持	万安桥	
李宗鑫	男	54	湖北	全真住持	东岳庙住持	望江门外响水桥	
廖宇明	男	34	江苏	全真住持	总管庙住持	东街路	
陆泰贵	男	73	江苏	全真退院住持	总管庙客师	东街路	
王宗真	男	46	河南	全真住持	朱天庙住持	下仓桥	
蔡理清	男	57	杭县	全真住持	大王庙住持	湖墅	
潘宗卫	男	55	台州	全真住持	玄坛庙住持	板儿巷	
钟诚敬	男	61	绍兴	全真住持	元帅庙住持	皮市巷	
周宗月	男	52	东阳	全真住持	北圆通观住持	玉皇山脚北观音洞	
舒诚毅	男	43	江苏	全真住持	洞真观住持	小庙巷	
洪宗庭	男	62	天台	全真住持	福神庙住持	西大街	
杨明银	男	76	山东	全真住持	报恩观住持	孩儿巷	
王宗觉	男	63	诸暨	全真住持	慈云宫住持	玉皇山脚	
陈永清	女	50	江西	全真住持	阙石板望仙亭住持	长桥阙石板望仙亭	
倪至新	女	61	湖南	全真住持	千古一人庙住持	丰禾巷	
姚至铨	男	74	四川	全真住持	仁佑宫住持	大关知足亭3号	
余信禄	男	33	山东	全真住持	姆阁阁主	玉皇山福星观	

此外，在《杭州市道教会新会员名册》（1947年7月呈）中，全真

派住持新增加：劳理贵，女，35岁，籍贯江苏，孝义庵住持，东街陈卫营，道教会证书号258号。

表4.10 无住持参加杭州市道教会的全真观庙会会员名册^[1]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学历	现任职务	住址	备注
姜诚缘	男	44	四川	略识经义	北观音洞客师	长桥阔石板	
崔宗贤	男	28	热河	粗通文字	真武殿主	玉皇山福星观	
张妙修	男	77	山东	粗通文字	金波庙客师	太平坊金波桥	
沈诚琳	男	46	孝丰	粗通文字	凝真观客师	忠清巷	
凌永铨	男	40	崇德	粗通文字	明真宫徒	湖墅大关	
陈宗阜	男	38	台州	粗通文字	雷祖殿客师	马市街	

这样，综合以上两表，全真寺观共计40所。

有趣的是，全真会员名单中有学历一栏。学历分为研究教义、粗识经义、略识经义、粗识文字四个等级。87名会员中，研究教义者仅有1人，即福星观方丈李理山，粗识经义者也仅有1人，即张大仙庙住持陶全觉（但在理监事履历表中他的学历为略识经义），略识经义者32人，粗识文字者53人。从学历中可见，学历划分标准不够明晰、客观，主观性较强，尤其是研究教义与略识经义的区分较为模糊。整体来看，道士的文化素质不太高。

正一会有会员96人，全部为男性。年龄最大者70岁，最小者15岁。其中正一住持21人，正一应赴47人，正一门眷27人，正一客师1人。这里应赴、门眷、客师的区别，史料无载而不详。其中“门眷”，有学者研究绍兴堕民时指出：“是指堕民为主顾家的人生礼仪场合和四时八节举行趋吉避邪的巫术活动来讨取赏钱赏物的特权”，可能形成于明代，清代乾隆时期已特权化和产业化。^[2]绍兴距杭州不远，绍兴门眷当与杭州类同。国民党党员1人，另有一人是否党员未填，不明。其中住城隍山者有20人，均为住持，表明当时城隍山为正一派聚居地。住彭家埠人

[1] 本表据《杭州市道教会会员名册》（民国35年12月份）整理而成。

[2] 俞婉君：《绍兴堕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数为14,均为正一应赴,表明彭家埠为应赴聚居地。正一派会员名单中无学历一栏,可以推测,在当时的理事会看来,正一派道士总体文化素质不高,没必要区分。

正一派寺观共25所,住持参加杭州市道教会的有23所,见表4.11。

表4.11 杭州市道教会正一派住持情况^[1]

姓名	年龄	籍贯	入会资格	现任职务	住址	备考
胡宁凡	36	吴兴	正一住持	东岳庙住持	城隍山44号	
陆颂芬	54	崇德	正一住持	金华庙住持	涌金门	
王昌恒	36	崇德	正一住持	守一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倪道澄	17	杭市	正一住持	长春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陈致和	18	杭市	正一住持	长生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赵师良	54	杭市	正一住持	清秀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朱师明	31	杭市	正一住持	福善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陈在田	30	崇德	正一住持	元庆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顾松龄	16	崇德	正一住持	永固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周道源	19	杭县	正一住持	古朴道院住持	城隍山城隍庙	
林元福	59	义乌	正一住持	三茅观住持	紫阳山	
陆荆山	57	崇德	正一住持	三官庙西房住持	城隍山23号	
施静安	56	桐乡	正一住持	三官庙东房住持	城隍山26号	
俞学恒	47	崇德	正一住持	仓圣庙住持	城隍山37号	
沈友村	52	崇德	正一住持	太岁庙住持	城隍山40号	
朱文彬	70	崇德	正一住持	西泠财神殿住持	孤山	
孙赞春	57	安徽	正一住持	药皇庙住持	城隍山39号	
杨麟书	29	海宁	正一住持	大资福庙住持	江干	
张景贤	55	杭市	正一住持	宝极观住持	宝极观巷	
孙九皋	52	崇德	正一住持	旋德观住持	东牌楼	
陈昌龄	55	嵊县	正一住持	宝定道院住持	城隍山19号	

[1] 本表据杭州市档案馆藏全宗旧16-1-25正一会员名单整理而成。

此外，在《杭州市道教会新会员名册》（1947年7月呈）中，正一派住持新增加：翁崇兴，男，年龄49岁，籍贯桐乡，祖关帝庙住持，住址为祖庙巷，道教会证书号为56。

表4.12 无住持参加杭州市道教会的正一派寺观^[1]

姓名	年龄	籍贯	入会资格	现任职务	住址	备注
周连锵	42	杭市	正一门眷	永宁院门眷	永宁院1号	
朱宝奎	26	杭市	正一应赴	城隍庙知客	城隍山城隍庙	

综合上述，正一派寺庙共计26所。

综合以上四表，有道士加入杭州市道教会的道教观庙共计66所。据1950年3月调查统计，杭州市有道教宫观78处^[2]，其中全真派的有44所，正一派的有34所。由此可知，虽经杭州市道教会组训股劝导，也至少有12所道教庙观没有参加杭州市道教会。但参加的比例高达85%，说明杭州市道教会作为杭州地区道教界的管理组织还是有较高代表性的。

会员入会审查，通常是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即可办理入会手续。但从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来看，其程序是：先立志愿书，认定派别，正式皈依，具保登记，然后派员调查，经过审查，没有问题者即可入会。

杭州市道教会成立后，会员人数屡有变动。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五次例会（民国36年3月22日召开）经过讨论，不同意一名4岁小孩入道，理由是智识未开。同意收新会员7人。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七次例会（民国36年5月15日召开）同意收新会员18人，其中有坤道1人。理监事联席会议第八次例会记录（民国36年6月15日召开）收新会员21人。第十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9月15日召开）同意收闽智亭等5人人会。第十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10月15日召开）同意收新会员5名。第十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12月召开）同意收新会员3人。把

[1] 本表据杭州市档案馆全宗旧16-1-25正一会员名单整理而成。

[2] 据1950年4月的《浙江省各市县宗教寺庙迷信团体调查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3-002-33）则为80所。

《杭州市道教会全真会员名册》《杭州市道教会正乙会员名册》《杭州市道教会新会员名册》（1947年7月呈）相加，再加上1947年7月以后记录新收会员人数，则至1947年底，杭州市道教会应该有会员282人。从《杭州市道教会新会员名册》（1947年7月呈）的道教会会员证书号最大达323号来看，杭州市道教会会员人数最多时应该超过323人（目前不清楚集体会员是否发放证书，如发放，必须除去集体会员至少39所）。但实际上，据1949年3月的杭州市道教会会员名册，只有会员131人，说明有近一半之多的会员脱会。而据1950年统计，杭州市有道士217人^[1]，其中坤道14人，非住庙道士80人（含阴阳门眷26人，应赴54人）。其中原因，下文将作分析。

三、杭州市道教会的运作

杭州市道教会所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道教界内部管理

对于庙观内部管理，道教会规定，庙观内不允许男女混住，庙观不许住家属。^[2]对于内部矛盾的处理，道教会规定，某派会员有事则由该派理事处理。^[3]道教会认为，道姑不允许担任法师，理由是不合教规。^[4]为整顿会风，道教会在成立后进行了两次会员重新登记，一次是1948年8月^[5]，另一次是1948年12月^[6]。

[1] 据1950年4月的《浙江省各市县宗教寺庙迷信团体调查表》则为220人。据1952年7月15日《杭州市佛教道教青年信徒情况》为217人。

[2]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七次例会记录》（1947年5月15日）。

[3]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征收员、调查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记录》（1947年11月3日）。

[4] 《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征收员、调查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记录》（1947年11月3日）提及，佑圣观道姑任法师不合教规，决议请双方到会调解。

[5]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二十一次例会记录》（1948年8月5日）。

[6]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二十五次例会记录》（1948年12月5日）。

（二）拟筹建浙江省道教会

道教会曾拟致力于筹建浙江省道教会，以本会理事为当然发起人，另外再邀请一些社会名宿参加。^[1]至少从1947年6月到1949年3月杭州市道教会的文档中没有相关记载来看，似乎筹建之事没有具体落实。但奇怪的是，东阳市档案馆藏有发布于1947年7月15日的《浙江全真道教会章程》。^[2]其中提及由杭州全真道士及“信仰本教各界名流”组成，似乎还未真正扩展到全浙江省。其中还提及“本会与正一派之道教联合会可联贯而不可合作”，则似乎正一派也成立了浙江正一派道教联合会。但文献无征，难以证实。至少可以推断，杭州道教会中全真占据主导地位，正一派不满，所以两派联合建立统一的浙江道教会一时难产。此外，杭州市道教会第九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提及上海市道教会来函，说明它与外界的横向联系业已展开（福星观上海分院住持李理山既是杭州市道教会的理事长，也是上海市道教会的理事长，杭州市道教会与上海市道教会的联系当因此而起）。第十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民国36年8月15日）中提及全国道教会发起人筹备处来函请报选代表参加，决议以杭州市道教会的名义参加，以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

（三）编纂文稿

第九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中提及，浙江省通志馆索要道教历史资料，决定编写并要求各县道教丛林、吴兴道教会等开始启动工作。第十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10月15日召开）记录提及，各县道教史资料多数报送到达，拟交省通志馆。第十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11月15日召开）决定由理事施静安负责办理史料之事，拟用费5万元。理监事联席会议第十五次例会（民国37年1月30日召开）记录中说，施静安编《道教史》完，正副三册，稿本已交到道教会。此稿据推测应当交给浙江省通志馆，但浙江省通志馆所编《浙江通志》的道教部分非常简略，当未采信道教会提交的资料。这些资料，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监事联席会议第八次例会记录》（1947年6月15日）。

[2] 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443-001-020《东阳县道教会卷》第54、55页。

笔者多方搜寻未果。

（四）社会公益活动

杭州市道教会所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主要是施诊送药和兴办教育两项。

关于施诊送药，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七次例会（民国36年5月15日召开）决定夏天施诊送药：先请内科、妇科、儿科中医师钟礼壖每日在会址即涌金门金华庙施诊，如有少数无力购药之人，由会临时设法解决，无偿施诊送药，待经费筹划完整后再行扩大，施诊所即日成立开放。第十六次例会（民国37年3月5日召开）“同意本会会员医师钟礼壖种牛痘”。这种举措一直持续至道教会停止运作。

关于兴办教育，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三次例会（民国36年1月15日召开）记录，决定设立杭州市道教会第一小学校董事会，第一小学设在火神庙，要求对校舍进行修理。第十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民国36年8月15日召开）决定成立启清小学（应该是在第一小学的基础上新办的）校董会，下学期开始招生。第十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民国36年9月15日召开）提及，启清小学从火神庙迁移至会址，拟进而迁至湖墅草堂巷宣荣观，即元帅庙。

四、杭州市道教会与政治的关系

日本军队入侵杭州前的杭州市道教会，即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杭州市道教会筹办会通告》中已经明确提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杭州市执行委员会核准发给许可证书，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假座梅花碑佑圣观开筹备会议，并由杭州市党部委员石有绪，指导员杨竟子，杭州市政府监督委员吴仁山均准时出席。”^[1]《杭州市道教会通告第一号》中说，杭州市道教会成立时，“杭州市政府党部委派石有绪、吴仁山到会指导、监督”。^[2]这说明杭州市道教会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较低。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杭州市道教会在《宣言》中即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有清晰的论述。它认为：“夫宗教为立国之要素，与道德、政治、法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5。

[2]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

律相辅而行。”“有教以固国，有国以护教，国与教相维系而不可分离也。”^[1]宗教与政治都应该认识到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宗教应该与政治保持和谐的关系。

杭州市道教会的《章程》，也经过了当时杭州市长周象贤的修改。即将原条文“本章依据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2条之规定订定之”等字删除，改其文曰“本会组织区域以杭州市行政区域为区域”。又把第十一条“本会会员如有行为不端违反教旨或煽众滋事损害会誉者一经查觉，轻则开除会籍，勒令出境”之“勒令出境”四字应予删除，以示人民居住自由。^[2]

《章程》第九条规定，会员如不佩用证章，“不得在本市境内充任庙观住持，承接或应赴醮坛经忏及一切功德事项”。对会员的惩罚措施，《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本会会员如有行为不端，违反教旨或煽众滋事，损害会誉者，一经查觉，轻则开除会籍，重则革除道籍，报请主管机关处分。”这一规定说明，杭州市道教会具有革除会籍的权力，这是无可非议的。关键的是，它还具有“革除道籍，报请主管机关处分”的权力，这说明它是在自觉地配合政府进行道教界的管理工作，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延伸。这就意味着，它对政府具有比较高的依赖性。对此，还可从《章程》第十一条的规定中看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为本会会员。一有违反政令之言论及行为者。二曾经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三有不良嗜好及不守教规者。四患精神病者。”其中前两条均说明道教对政治的高度依赖性。此外，历次杭州市道教会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均报送杭州市政府，新会员名单同样报政府备案。杭州市道教会重新登记会员，重发会员证书和会员证章，固然有内部整顿的目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是配合国民党政府内战时期的社会整肃。

由于对政治有较高的依赖性，杭州市道教会在面对自己无法解决

[1] 《玉皇山志》卷十九《浙江省杭州市道教会宣言书》，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1册，第948页。

[2]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市长周象贤关于成立杭州市道教会的指令》（1946年11月7日）。

的公共问题时，也只能求助于政府。例如，门眷沈元林到会告发吹唱道士徐宝记妨碍其营业，杭州市道教会先是请法院判决^[1]，拖延8个月没有解决问题，只好请市政府解决。^[2]再如，杭绍剧春秋社吹唱道士组成员不是正式道士，也没有加入杭州市道教会，依据经杭州市政府批准的《杭州市道教会章程》，不加入杭州市道教会的道士不得在杭州市范围内从事道教活动，所以，杭州市道教会认为，杭绍剧春秋社宜解散吹唱道士组，至少不能承接经忏业务。^[3]杭州市道教会认为，本会会员分全真、正一、门眷三派，批殓扫煞业务为阴阳门眷专营业务。非会员及迹近类者绝对不得在本市承接经忏法事（善坛公醮不在此约）。杭绍剧春秋社吹唱道士组之会员非正式道士，但杭州市道教会显然没有权力要求杭绍剧春秋社解散道士组，它只能求助于政府。经过市政府的调解，作出决定，杭绍剧春秋社吹唱道士绝对不能承接批殓扫煞业务，唯城外历年所之吹唱道士得准例外（其名单由春秋社胡秀绵提请社会科调查属实通知杭州市道教会）。^[4]

从杭州市道教会只有一名会员是国民党党员，成立之后没有对政治局发表过观点，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也未参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5]来看，杭州市道教会对政治的依赖，实为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管理、控制之下，因生存所需而不得不对政治有依赖性，并非内在地热衷于政治。

五、杭州市道教会的经济状况

杭州市道教会没有得到政府的经济支持，其赖以运作的经济来源主要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事联席会议第三次例会记录》（1947年1月15日）。

[2] 同上，《第十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1947年9月15日）。

[3] 同上，《第十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1947年8月15日）。

[4]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00169-175，《杭绍剧春秋社纠纷解决（市长周象贤令等）》（1947年9月27日）。

[5] 理事长李理山在解放后因反革命罪入狱一案，1986年12月25日以杭西法(85)刑申字第38号刑事判决，撤销(55)杭西法刑字第12号刑事改判，对李理山错案予以纠正。

来自于会费。《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会费分为经常费和特别费两部分。

经常费区分基本会员、普通会员、门眷、经忏四项而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基本会员,以庙观为对象,分特、甲、乙、丙、丁五等按月征收,特等6万元,甲等3万元,乙等1万元,丙等5000元,丁等1000元。特等的庙观为玉皇山福星观、金华将军庙。甲等的庙观为吴山城隍庙。乙等的庙观有10所,即千古一人庙、隆恩庙、拱宸桥张大仙庙、吴山东岳庙、下仓桥朱天庙、吴山三官殿、吴山太岁庙、吴山药王庙、佑圣观、黄龙洞。丙等的庙观也有10所,即明真宫、显真道院、报恩观、天真山登云观、千圣庙、西泠财神殿、吴山雷祖殿、总管庙、南城东岳庙、江干大资福庙。丁等的庙观有16所,即西牌楼元帅庙、吴山仓圣庙、祖关帝庙、三茅观、宝极观、凤栖桥福神庙、北观音洞、金鼓洞、葛岭山葛仙庙、皮市巷元帅庙、响水坝东岳庙、湖墅东岳庙、湖墅大王庙、湖墅放生道院、众安桥施将军庙、板儿巷玄坛庙。这种等级划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这些庙观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甲等是经济状况最好的,乙等、丙等次之,丁等最差。上述庙观总计39所。前述全真、正一派住持的庙观在会员名单中共计65所,表明还有26所庙观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缴纳基本会员费。普通会员每人每月1000元,门眷每一牌子每月3000元,经忏每堂1500元,日夜作2堂计。理监事就职典礼暨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以上各项如币值有变动时由理事会临时增减通告。事实上,此后这些收费标准确实屡有变动。经忏收入如有隐匿不报,查实后,第一次加倍缴纳,第二次经忏收入全部充公。第三次取消会员资格,不得向外承接经忏。前项惩戒金及经忏收入检举人当给予二分之一奖金。经忏应先向收款人登记缴纳会费后方可举行。应赴会员的待遇:承包时暂以每工6000元计,班头对应赴概以七折支給,多则类推。^[1]此外,从相关文档中可知,除上述费用外,会员入会还要交会员登记费。这项费用的标准也屡有变化,如表4.13所示。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00090-94,《杭州市道教会会议录》(1946年12月14日)。

表4.13 杭州市道教会收费标准变动^[1]

时间	基本 会员费	普通会 员登记 费(每 人)	普通会 员经常 费(每人 每月)	门眷 收入 (每一 牌子)	经忏收 入(每众)	经忏收 入(每 堂)(日 夜算2 堂)	支出 标准	出处
1946.12	基本会员: 以庙观为对 象,分特、 甲、乙、丙、 丁五等按月 征收。特等 6万元,甲等 3万元,乙等 1万元,丙等 5000元,丁 等1000元		1000	3000		1500		《章程》
1947.5.15	原额增加 十分之五		1500	原额 增加 十分 之五	16000	2000		理监事联席 会议第7次 例会记录
1947.9.15	庙观八月 份为90000 元者增为 180000元, 余类推		3000	9000	30000	4000	职工薪 酬,工役由 180000元 增为300000 元。余类推	理监事联席 会议第11次 例会记录
1947.10.15		10000						理监事联席 会议第12次 例会记录
1947.11.3	庙观照原 额加五成, 如10月份甲 等为180000 元则11月份 为270000元			10000	4000	5000		全体理监事 征收员、调查 员召开临时 紧急会议
1948.1.30	基本会员加 五成		5000	15000		8000		理监事联席 会议第15次 例会记录

[1] 表中除特别注明外,货币单位为法币元。

续 表

时间	基本 会员费	普通会 员登记 费(每 人)	普通会 员经常 费(每人 每月)	门眷 收入 (每一 牌子)	经 忏 收 入(每众)	经 忏 收 入(每 堂)(日 夜 算 2 堂)	支 出 标准	出 处
1948.3.5					160000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16次例会记录
1948.5.5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加倍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18次例会记录
1948.6.5					400000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19次例会记录
1948.7.5	原额增加 两倍	30000	90000		600000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20次例会记录
1948.8.5	原额增加 两倍	90000	270000		1300000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21次例会记录
1948.10.16		10000	30000	90000	600000	30000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23次例会记录
1948.11.15					5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24次例会记录
1948.12.5	基本会员15 金圆,临时 会员10金圆							理监事联席会议第25次例会记录

会费中的特别费分为维持费和事业费两项。维持费视会员的能力分认。事业费向维护会员、辅导会员、赞助会员及本会会员临时筹募。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聘请金润永、韩锦生^[1]、戎光久^[2]、陈宪和、堵申父^[3]等五人为维护会员。关于这两项，从道教会有关文档中找不到更详细的相关记载，无法作更清楚的说明。

根据杭州市道教会会议暨理监事就职典礼、历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兹整理出杭州市道教会经费账目如表4.14所示。

- [1] 韩锦生，多方查找资料无果。疑为都锦生之误。都锦生，1898年2月12日生于杭州西湖茅家埠。自幼喜画风景，喜摄影，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留校任图案课教师。他大胆创新，将西湖风景转变为织锦；1921年，亲手织出《九溪十八涧》，次年创办都锦生丝织厂。1926年，《官妃夜游图》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获金奖。到1931年，其门市部已遍布全国13个大城市。杭州沦陷后，都锦生丝织厂被迫停产，将机器转移到上海法租界。1938年举家迁往上海。1943年，都锦生患脑溢血逝世，年仅45岁。
- [2] 戎光久，宁波人，多益处酒家创始人之一。多益处酒家成立于民国19年（1930），是由宁波人戎光久与亲戚、族人集资开办的。初名为“多益处半餐馆”。因为当初宁波有一家菜馆名为“多益处”，生意十分红火。如此取名表达了当时店主希望生意兴隆的美好愿望，也含有要让顾客得到益处之意。该酒家原址在杭州市延安路解放路口，起初以卖米粥为主，配有酒菜。由于粗粮细做，经济实惠，加上日夜经营服务周到，常常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多益处半餐馆”积累了资本，做出了名气后，于1929年拆迁改造为5间3层的大型菜馆，并改名为“多益处国菜馆”，经营种类酒、菜、面、饭、米粥、小吃样样齐全。其特色菜肴有爆鳝片、斩鱼圆、番虾锅巴等闻名杭城。新中国成立后“多益处国菜馆”改名为“铭一处酒家”。1958年杭州调整商业网点时迁移至下城区中山北路。1980年建成三层楼房，装修一新。
- [3] 堵申父疑为堵福先，字申父，会稽人，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学员，砚石收藏家，秋瑾生前邻友，也是章太炎熟友，著有《鉴湖秋女侠》《秋瑾小传》。曾于民国16年5月至10月任余姚县长。

表4.14 杭州市道教会经费账目^[1]

时间	收上期 结余	本期 收常	本期 收经 忏费	本期 登记 费	收入 合计	本期 支出	本期 实存	理监事 联席会 议纪录 序次	备 注
1946.11.14					2208870	2035240	173630	1(注)	
1946.12.15	658500	206000	56500		921130	723900		2	
1947.3.22	307000			15000	708500			5	
1947.5.15	951150	425000	96500	45000	1717650	653600	1064050	7	
1947.6.15	1064050	362000		1053000	1531050		723450	8	
1947.7.15	723450	1347500		10000	2080950		989550	9	
1947.9.15	685450	1095500			1789500		740950	11	
1947.10.15	740950	1049000				1042500	747450	12	
1947.11.15		1712000				2075300	183100	13	
1947.12.15					2057500	1594000	646650	14	
1948.1.30	646650	1107500					179750	15	
1948.3.5					1177000	516000	773850	16	透支1444850
1948.4.20					2393000	3618500		17	透支773850, 欠1999350
1948.5.5					3665000	2330000		18	又付上月透支 1999350, 欠696350
1948.6.9		3105000				3420000		19	上月透支 664350, 欠969350
1948.8.5		3430000				13480000		21	支上月透支 1768350, 欠15878350
1948.9.5		18584000				21800000		22	支上月透支15878350
1948.10.16					255340000	61810000		23	上月透支 190943500000, 欠55374350
1948.11.5					72230000	9900万		24	支上月透支 55374350, 欠82144350
1948.12.5					2.62金圓	145金圓		25金圓	上月透支7.38金圓
1949.2.9						1853.5		26	透支179.76, 欠2000.32

注：“1”为理监事就职典礼。

[1] 本表中除特别注明外，货币单位为法币元。

从表4.14和相关记载可知，民国36年（1947）全年经常费总收入为12438500元，总支出为13006850元，收上年结存497500元，收登记费300000元，收理事长费100000元，收补领证费50000元，以上共计13386000元，以上存179750元，支付2855000元，收经常费1021000元，收登记费10000元，透支1444850元。^[1]由于缺乏相关文献，对于道教会的支出项目，除了职工薪酬一项从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中可看到支出标准外，其余支出项目及支出的数字无从知晓。

民国末年，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非常迅速^[2]，民生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对主要以会费来维持运转的杭州市道教会只得不断提高会费征收标准，甚至到了半个月就提高一次收费标准的地步。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降低会员交费的积极性。理监事联席会议第十六次例会（民国37年3月5日召开）记录中就提及，会员交费不积极。上文提及，至1947年底，杭州市道教会应该有会员242人；据1950年统计，杭州市有道士217人。但1949年3月的杭州市道教会会员名册中只有会员131人，说明有近一半之多的会员脱会。沉重的会费负担，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到了1948年10月，会员大会的经费已经无法从会费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00125-126，《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第十五次例会记录》（1948年1月30日）。

[2] 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和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圆），1942年货币采用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圆券，按1948年8月的物价可买5升米，到1949年5月，1元金圆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已变成130金圆券了。参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3518985.html>，2010年9月3日。另参见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394页。1949年5月9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公告，用人民币取代金圆券（参见陈国强、龚方乐主编《浙江金融史（1949—1999）》，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征收而得，只好由各理事分担。^[1]到了1949年2月，道教会透支179.76金圆，欠2000.32金圆，不得不向施药费中借经费度日。由于经费匮乏，道教会已经到了难以运作、濒临解体的地步。^[2]所以，原定于1949年3月15日召开的会员大会，因经费欠缺而无法召开。1949年5月3日杭州正式解放，杭州市道教会于是自行解散。

六、结 语

杭州道教会显然是杭州近代道教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杭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它虽然真正运作的时间不长，但也是有意义的。它的理事长李理山与张天师等合作组建中华道教会，它是中华道教会的团体会员之一。李理山曾于1946年7月在上海，以1939年3月创建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上海分院为据点，组建上海市道教会^[3]，会员为数多达832人^[4]，对上海道教乃至全国道教都有广泛的影响。杭州市道教会在建立之后做了一些推进道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事，对协调道教内部关系做了一些实事，开展了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它的建立与运作，对浙江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在它的影响下，平阳、乐清、东阳、嘉兴、海宁等县纷纷建立当地的道教会组织。它对此后浙江道教乃至中国道教的发展都有影响。例如，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次年2月新建的杭州市道教协会筹备会基本上是以它的班底为基础的，如李理山仍然担任筹备会主任直至被捕入狱。它的会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全宗旧16-1-24，00057，000147，《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二十三次例会记录》（1948年10月16日）。

[2] 同上，《杭州市道教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二十六次例会记录》（1949年2月9日）。

[3] 1946年7月始创，9月7日申报，11月15日获得批准，次年3月15日举行成立大会。据上海市档案馆档案sc0001-0005《上海市道教会履历表》载：李理山任理事长，张维新等4人为常务理事，曹梅生等14人为理事，朱秋泉任常务监事，朱镜清等4人任监事，周国淞等9人为候补理事，周介康为候补监事。另秘书、书记、会计各1人。

[4]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c870，《上海市社会局宗教团体及寺院申请登记表》。

员闵智亭（汉族，1924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全真派道士）1941年出家入华山修道，入全真华山派；先后挂单于西安八仙宫、武汉长春观和杭州玉皇山。1992年起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98年至2010年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学院院长、中国宗教与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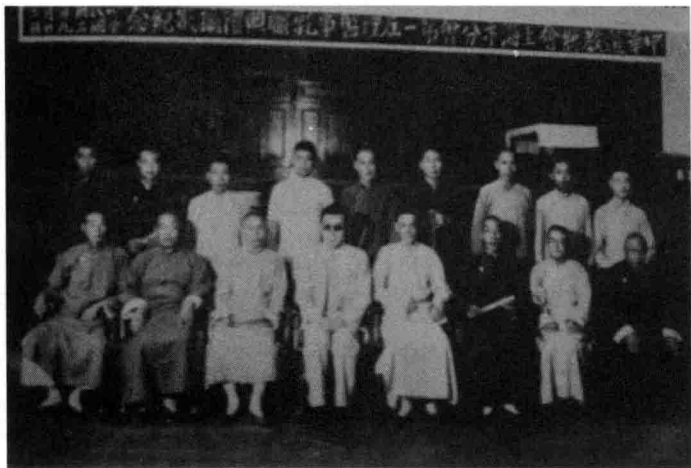


图4.1 中华道教总会上海市分会第一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合影（1944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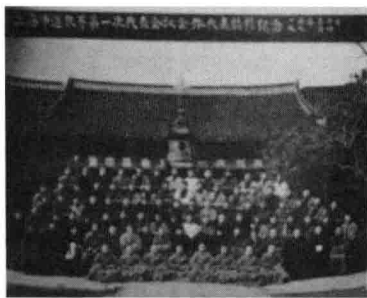


图4.2 左图为上海市道教会理监事会议合影照片，其中前排左起第5位为李理山。右图为上海市道教会全体代表会议合影照片^[2]

[1] 陈莲笙：《道教常识问答》，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2] 同上，第188页。

第五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高道

第一节 李理山的事迹及其对道教的贡献

一、生平事迹简述



图5.1 前排左起严洪清、李理山，后排左起陈铁海、周介康^[1]

李理山，号紫东。《杭州玉皇山志·序》曰：“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故李理山也称李紫东。^[1]

李理山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之民国35年（1946）2月之上海市社会局《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登记表》所填

李紫东为“七十四岁”。又据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所藏之《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号》（1955）李理山为“八十三岁”。依杭州风俗，所称岁数一般用虚岁，即出生之年为一岁，以后每加一年则加一岁，故李理山当出生于1873年。

李理山祖籍江苏南通。上海市社会局《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院》登

[1] 《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记表李紫东为“江苏南通县”^[1]人，而据《杭州市道教会名册》及《上海市道教会名册》所填李理山籍贯均为“南通”。《杭州玉皇山志》卷序中亦称“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籍南通”。故李理山籍贯应为江苏南通县人。《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号》（1955）^[2]称其为“江苏镇江”人，不知何据。

又有称李理山字紫东，号徂徕，河北人，则不详其所出。^[3]

据《玉皇山志》李理山在福星观出家人道。李理山之师或为晁至祥。据2009年农历七月十五，福星观所供奉之灵位，李理山为龙门二十二代，二十一代“至”字辈只供奉有晁至祥一人，故推测李理山之师为晁至祥，但不确定，当有其他文献同证时，方可确定此事。

关于李理山主玉皇山观务的时间，《杭州玉皇山志·序》曰：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蒋律师羽化，继主观务为紫东道人，道人姓李，名理山，紫东其号也。籍南通，本观弟子，中年曾云游四方，民国八年己未，道众公推为本观方丈，受任以来，即力图恢廓，始则修山路、砌山礅而造山寺，作山房，后乃筑亭迭石，布置井然。其次则开紫来洞，辟太极园。

以上文内容观之，文有歧义。从第一句看，似乎是李理山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蒋永林羽化后，就主福星观之观务。但一是此时李理山才24岁，且蒋永林之后有圆字辈、明字辈、至之辈，之后才是理字辈，为何蒋永林羽化后，会将观务交于晚自己四辈的年轻弟子？这是非常有疑问的。

而从后面的“中年曾云游四方……”一段文字来看，则似乎李理山于民国8年（1919）就任方丈后才主持观务的，民国8年时，李理山为47岁，虽然合于其“中年曾云游四方”后回观任方丈的情况，但一般材料均记述其年轻时即主玉皇山观务，故不能据此文认为其在民国8年就任

[1] 民国时废州、市，只设省、县二级，故南通县实际相当于现在的市。

[2] 杭州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

[3]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704页。据顾志兴所述，“李理山字紫东，号徂徕，河北人”是据张崧《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

方丈后才主持观务的。

据上海档案馆所藏之上海社会局民国36年（1947）《上海道教会登记表》，“理事长李理山”之履历为“杭州玉皇山住持四十年”。以《杭州玉皇山志》所述李理山任住持为民国8年，即便是举约数，到民国36年也只有近30年。据《杭州市志》，蒋永林羽化后，其弟子朱圆亨主观务^[1]，其时间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据吕宗安称，李理山于1913年起就做了福星观的当家。^[2]

又据《当代日报》称：“大王庙的蔡理清控诉说：远在一九一八年，玉皇山前住持张理太就是被他用种种威胁的手段赶出去的，从此他就以住持自居。”^[3]

根据上面所有的文献推测如下：主持观务的朱圆亨或其继任者任命张理太为福星观住持，而任命李理山负责具体事务，以1947年时李“住持四十年”推测，李于1907年左右开始主持观务，而后于1913年起成为“当家”，其职务或是“监院”。^[4]此后，李理山与住持张理太起了争执，而后于1918年将张理太赶出了福星观，并于第二年，即民国8年时被推为方丈。

李理山1927年左右开始收书，藏书室名为丹井书屋，藏书中有天问、占候、堪舆、奇门、六壬等六大类书。抗战起，停止买书。^[5]或是因开办难民所经费紧张所致。

民国26年（1937），杭州正一派与全真派联合组织杭州道教会，会长为

[1]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页。

[2]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藏吕宗安为其师评反而提交给“上海市宗教局领导同志”的《报告》。

[3] 《潜伏道教匪特李理山就逮后道教徒一致表拥护并集会控诉李匪的种种罪行》，《当代日报》1951年4月24日第2版。

[4] 据一份“据吕宗安《回忆抗日战争期间玉皇山紫来洞改作难民所的经过》及闵智亭道长所述李理山生平编写”的《李理山》数据称，李理山职务为“杭州玉皇山福星观监院”。

[5]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收入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杭垣旧事》，杭州市政协2001年印行，第36、37页。

李理山，会址在江干区十五奎巷玄妙观内，日军侵占杭州时解散。^[1]

杭州沦陷时期，李理山曾于1938年办难民所，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主管分院》，称“在杭州办理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难民总数达七千余人”^[2]，约艰难维持了一年多，因“时局稍靖”，“遂行解散”。因为开办难民所而导致经费不足，故李理山于1939年赴上海开办分院。据《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八：“先是己卯（1939）曾设立分院，于上海西摩路底，已于是年五月开办，嗣因地偏屋隘，善信往来不便，复于次年（1940）庚辰，在武定路筹设分院，人皆称便，即于是年修建落成，八月吉日开光，以此院为第一分院，以彼院为第二分院。”因开办难民所，李理山以红卍字会会长身份与日军有接触，其具体联系人是翻译章兰亭。^[3]通过交涉，将粮食运上玉皇山供应难民。

抗战胜利后，杭州与上海两地均恢复成立道教会，民国35年（1946）11月，恢复杭州道教会，会长李理山。会址在涌金门金华庙内。1949年3月，改选理事会，李理山为理事长。1947年3月15日，在正一天师张恩溥的组织 and 倡议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市道教会”，李理山任理事长。一般都认为李理山与张恩溥并为全真与正一两大宗派江南之道教领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原道教会停止活动。1950年2月，筹备杭州道教协会，有理事21人，主任李理山，会址在杭州涌金门金华庙内。

1951年4月16日，因私藏枪支三支及子弹110发等问题，李理山被杭州军管会逮捕，于1955年12月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因没有安排人民陪审员组成审判庭进行审理，导致程序不合法，于1956年4月7日发回重审。于1956年10月22日判徒刑10年，且判没收财产不予发还。其法定

[1]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第447页。

[2] “收容难民七千余人”为各种资料所引用。但同书卷十七《善举》又记为“三次收容难民，第一次三千余人，第二次一千二百余人，第三次一千四百余人”，则三次相加为五千六百余人。可能是此三次是规模较大的三次收容，其余平时尚有零星收容之难民，故有七千之数。

[3] 据杭州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号》（1955）。

释放日为1961年4月15日。^[1]但未到释放日，李理山即卒于狱中。关于其确切的卒年没有记录材料。一般均称其在1956年判决后“不久病故于狱中”。

1985年，李理山之徒吕宗安，时任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上海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多次向杭州西湖区法院去信申诉。李理山的另一徒弟高宗宝也于1986年11月5日写了《关于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一案本人以下几点意见》，替李理山申辩。西湖区法院先是于1986年12月25日对原判决“予以纠正”，后又于1987年4月16日发《（1987）杭法刑监字第61号》终审判决书，“对李理山反革命案予以纠正。本件系终审判决”。^[2]



图5.2 吕宗安与顾彼得^[3]

[1]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一九五六年度杭法刑上字第228号》。

[2] 此段文字中数个文件均藏于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

[3] Peter Goullart: *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John murray, London, 1961, P.118.



图5.3 1920年左右玉皇山道士照片（或是李理山与吕宗安，不能确定）^[1]

二、道术与方术

李理山为一代道教领袖，在福星观出家入道，他既精道教教义及斋醮科仪，又擅长医术，且精道教内家拳技，体魄矫健，对于奇门等数术亦有研究。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李理山所学之道术与方术较多，分述如下：

（一）斋醮科仪及道术

李理山精于斋醮科仪，《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斋醮》就记述了玉皇山及上海分院举办的经常性或临时举办的斋醮。经常性的有“皇经胜会”，“《皇经》者，《高上玉皇本行经》也”。因福星观主要供奉玉皇大帝，故经常性举办的即是《玉皇本行经》之斋醮，最隆重的是每年正月初九玉皇圣诞日，而每月初九亦“斋供礼拜，依科祈祷”。玉皇

[1] 沈弘：《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山福星观临时举办之金篆大醮多达数十次，《杭州玉皇山志》卷十六所记主要有：1939年“杭州玉皇山上海分院祈祷平安日道场”，“祈祷世界太平特设八一大醮”等。

李理山在斋醮中，往往是主持者。据当年与李理山交往过的俄国人顾彼得《神秘之光》一书就记有一次李理山主持的斋醮仪式：

今天夜里有一个隆重气派的仪式，是那位老妇人专门为她的亡夫祈求安息的仪式。……11点刚过，大钟敲响了，道士们从左右侧廊里出来，匆匆向大殿走去。每一个道士都穿着一件宽松的深红色法衣，头戴一顶黑丝帽。李住持走在最后，他穿着一件厚厚的金色长袍，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华贵的冕冠，就像一朵半开的莲花，在这朵神秘之花的花心里闪烁着一颗美丽的宝石。……李住持双手握着他的白玉节杖，向主神深深地敬礼膜拜。他用响亮清澈的声音祈祷……^[1]

李理山的其他道术，主要是《神秘之光》记述的李理山之徒弟吕宗安、高宗宝等人进行的一个“看守一盏生命之灯”的法术。

这个法术的缘起是“（上海）老茶商王先生的长儿子。他已经病了几个星期，外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今晚不行了。他的家里人请我们帮助他”。仪式的时间是“晚上八点钟，我们要为他点亮一盏灯”。法术中的“油灯被一个深筒状的玻璃罩罩着，放在一个大黄铜碗里……微弱的火焰处还有一道小巧的丝质屏风，隔绝了道士们的呼吸”。

仪式的过程很曲折，开始时“他们三人绕着油围成一个圈，精神全然集中，嘴里轻轻念着祷文”。但中途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火星还在缩小，似乎就要灭了，又燃起了一个亮点”。不过最终这次法术成功了。“他们三人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他们的意念完全收敛于心灵最深处。午夜过后，淡蓝的火星开始哧哧忽闪，我看见它更亮了。慢慢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光亮就像是在成长，直到最后变成一个金

[1]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115、116页。

色的火星，依然很小，但却明亮而平稳。‘危险过去了，他现在睡着了。’宗安喃喃低语。三人疲倦地坐到凳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挽救了一个生命”。这次成功也得到了病人家人的确认和感谢，“次日晚上，王先生的家里寄来一封电报，就是病人已经恢复过来，并感激这座寺观”。^[1]

据笔者了解，这个法术似乎不是一个治病的法术，可能是一个续命的法术。笔者曾在峨眉临济门掌门人傅伟中先生处了解到他会一种“奇门借寿法”的法术，其作用是借寿续命，仪式所用的方式为共点烛八支，周围七支以象征北斗七星，中燃一支为本命之光，另外要使用水晶球和香炉之物。这个仪式与上述玉皇山的“看守一盏生命之灯”的法术有共同之处，故有上述的推断。

（二）医术

李理山会医术，《杭州玉皇山志》卷二十《志余·于异人》记载了李理山之医术传承：

于昌瑞，字教海，湖北人。弱冠随左宗棠军营效力，以功渐升至统领，在新疆军台，亦有年所。后起功成身退之念，投卜喀塔山修道。紫东游陕西时遇之，年已九十余。能以针治病，陕西人称为神针于疯。紫东师事之，学得针法，亦能诊疗。后于来浙，曾到玉皇山数次，其人行路如飞，从上海至杭，历四时而至云。

《杭州玉皇山志》记载李理山中年曾云游四方，此于昌瑞当是其中年云游至陕西时所拜之师。

（三）武术

李理山亦会武术，现任玉皇山住持高信一曾提到过李理山会武术之事。顾彼得也曾记载其亲眼所见李理山之徒击剑之事：“小道士拿来两柄老剑，宗宝和另外一个道士开始击剑比赛，为大家提供一个饭后消遣

[1]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176—179页。

的节目。”^[1]

王松泉记李理山曰：“幼喜习拳，造诣之高，蜚声武林。大江南北四方从学之人甚多……由于道长精通拳术，虽老而气足神旺，每日上下山岗，别人气喘如牛视为畏途，道长却神态自若如履平地。夜间不上床眠卧，通宵盘膝静坐。”^[2]王松泉1913年生于绍兴，1928年起到杭州旧书店抱经堂做学徒^[3]，而李理山自1927年起十年内为杭州抱经堂之常客，故王松泉与李理山应是熟识，其记载当无误。

《申报》的一则记载则更确证了李理山会武术的传闻。据民国13年（1924）1月12日《杭州快信》：

玉皇山住持李理山，前月被匪拦劫，幸该住持精通拳术，身畔携带现钞甚多，未被劫去。九日，西湖理安寺僧蕴石，又由沪运回银币千余，夜间被盗搜劫一空，杭地检厅今日派检察官谢鸿恩驰往履勘。

据上述所言，李理山于1923年12月被盗匪拦路抢劫，因其会武术，身边之财物未被劫去，可见其武术有相当的功底，并可用于实际的击技。

（四）数术

据记载，中国道协副会长闵智亭曾于1947年至玉皇山福星观拜访^[4]，并师从李理山道长学习天文星象学及奇门遁甲，李理山则传其星象图一幅^[5]（见图5.4）。则李理山于数术亦有相当的研究。顾彼得记

[1] 【俄】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111页。

[2]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收入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杭垣旧事》，第36、37页。

[3] 王巨安：《杭州旧书业三杰考》，《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3期（总第111期）。

[4] 张兴发：《仙踪渺黄鹤 人事忆白莲——记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大师》，《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

[5] 笔者于2012年10月遇闵智亭徒孙嘉一道长，称闵道长传下来一幅星图，与《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所收“浙江杭州玉皇山李紫东石刻天文星图碑”相同，所传比《图录》所收多一首《步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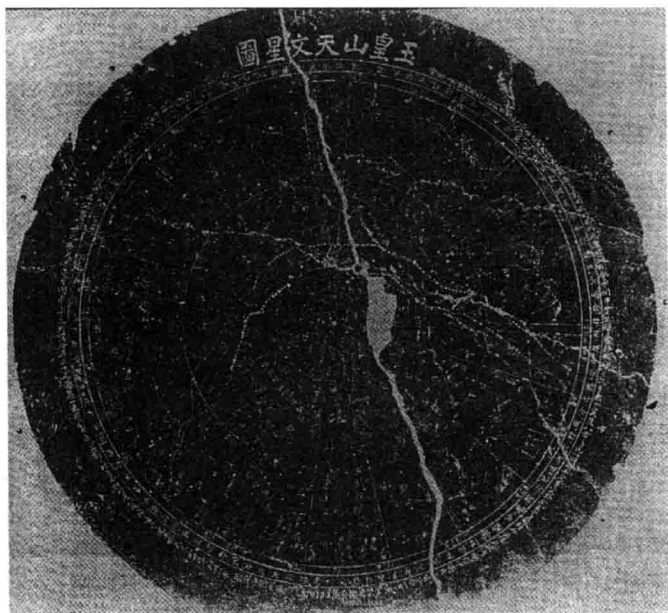


图5.4 浙江杭州玉泉山李紫东石刻天文星图碑

载了李理山对其的预言，如果李理山之预言从道术中来，则李理山之内丹之学应该有相当之基础。不过由于李理山会星象及奇门，此预言或是李理山从顾彼得的八字或面相手相中来，故归于此处。

李理山对顾彼得的预言是：“现在不要想着离开上海到别的陌生的地方，你当前的工作是好的，尽量坚持下去。以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像秘书那样工作——我不能说得很清楚。你会去中国的西部，在那里你会找到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你会快乐的，尽管你会遇到麻烦和危险。你应当磨练忍耐力和审慎的观察力，保持一颗和平的心。”几年后，李理山的预言得到了证实，顾彼得记述道：“几年前李住持向我预言的一切得到了证实。1939年，通过孔祥熙的夫人，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最有权力和影响的女人，我被派往西藏边境开创中国工业合作社。”之后，李理山又对顾彼得将来的事进行了预测，说“顾彼得的生活有周期地进行着变化，每过七年将会有一次新的变化”。^[1]虽然顾彼得没有说

[1] [俄] 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第183、188页。

这段预言是否准确，但从顾彼得所著书中写到这段故事来看，则无疑李理山的这段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

（五）道学与文采

李理山对道经的研究有相当的水平，据民国杭州道教会的名录，全真会员名单中有学历一栏。学历分为研究教义、粗识经义、略识经义、粗识文字四个等级。87名会员中，研究教义者仅有1人，即福星观方丈李理山。也就是李理山对道经与教义的研究达到了“研究”的水平。我们从《申报》的一则新闻中可得到旁证。《申报》民国19年（1930）3月28日有《志管先生之丧》一文，其中称：

无锡管趾卿先生为实业界先驱，任西门子洋行华经理职垂二十年，遇事决断，片言立辨，德人素骄夸，对先生则无不心悦诚服。非先生之天赋异禀，其乌能臻此。不幸去岁为病魔所扰，于腊尾遽归道山，生平乐施与，性慷慨，其作古也，识与不识，莫不悼之。

二十三日为开奠出殡之期。黄陆路上，素车白马，途为之塞，吊者千人。王正廷、虞洽卿等与焉。丧居自走廊以至厅堂满悬挽联绸幛。挽语以玉皇山福星观主持李理山一联为最长。句云：“公为世福星，仁恩普被平生已溺已饥，好施不倦，金谓吉人天相，必享遐龄，何期数载沉疴，终乏灵丹，竟弃尘寰悲永诀；天奋我同志，中路沦亡十年相扶相助，护道弥虔，素钦玄旨精深，定操善果，他日三生石畔，重逢旧雨，毋忘风月证前因。”书于丈匹绉绢，字亦不俗……

文中死者管趾卿先生虽然称其为无锡人，但从“王正廷、虞洽卿等与焉”可以看出，其葬礼所在地当是在上海。则无锡当为管趾卿的故籍。文中称李理山所写之挽联为此次葬礼中最长的，从其实际内容看，其文采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故用此来旁证李理山于道教教义达到研究水平，至少从文字功底上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次，从李理山敬赠挽联也可以看出李与死者生前关系应该相当不错。则李理山与上海实业界关系应该相当深入，这是李理山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旁证。

三、交友与任职

（一）与道教界的交往及创建道教会

李理山作为江南道教的领袖人物，与道教人物多有交往。根据文献记载他与张恩溥、陈撄宁、闵智亭等道教名人都有交往或合作，并创建了杭州与上海两地之道教会。

民国26年（1937），杭州正一派与全真派联合组织杭州道教会，会长为李理山，会址在江干区十五奎巷玄妙观内，日军侵占杭州时解散。^[1]民国35年（1946）11月，由于抗战的胜利，恢复了杭州道教会，会长仍是李理山，会址改为涌金门金华庙内。据《杭州市道教会正乙会员名册》（1946年11月份），正一会员96人。《杭州市道教会全真会员名册》（1946年11月份），全真会员85人。^[2]

1946年冬，为发展道教，巩固嗣汉天师的地位，张恩溥在上海三茅阁延真观邀集道教界名流开会，标榜以“宗教为重，团结为重”，消除宗派之间的不和、成见和歧视，提出先建立由地方主要道观主持的地方道教会，再建立他主持的全国道教会。依靠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住持李理山的经济和人力支持，同时依靠当时上海民政局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1947年3月15日，成立了上海市道教会，该会以“研究玄学，阐扬教义，刷新教务，联络道友感情，发展宗教事业”为宗旨。李理山任理事长，保安司徒庙住持正一派张维新、桐柏观住持全真派艾朗轩、松灵道院正一派王朗泉、清虚观住持全真派严洪清等为常务理事。另设理监事和候补理监事29人，包括陈莲生、李锡庚、陈铁海、吕宗安、张源锬等，又设秘书、书记、会计各一人，会计为李理山之徒吴宗起。^[3]

同年4月，也就是上海市道教会成立一个月，该会就印发了由陈撄宁起草的《复兴道教计划书》。计划书提出了“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修养、农林、科仪”等九个方面的复兴道教的

[1]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九卷，第447页。

[2] 杭州市档案馆藏。

[3] 《上海市道教会理监事履历表》，上海档案馆藏。

计划。这份《计划书》出自陈撷宁的手笔，足见其在该会中的精神地位是相当高的。^[1]而作为理事长的李理山，当与陈撷宁有较多的交往。

1947年秋后，张恩溥与李理山协商发起组织全国性道教会，张恩溥要求筹集经费由上海市道教会承担，全国道教会由他负责，李理山同意上海市道教会承担经费，但全国道教会要由他负责，张恩溥协助。二人意见对立且互不相让，此事遂成为泡影。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道教会自行宣告解散。

闵智亭，号玉溪道人，原籍河南省南召县，生于1924年。1992年任中国道协副会长。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务委员，同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会长。闵智亭曾在玉皇山求学，并随李理山赴上海。

1947年，玉溪道人（闵智亭）坐船从武汉至上海，辗转来到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从福星观方丈李理山道长学习天文星象学及奇门遁甲，不久担任起了福星观的知客。1949年，玉溪道人随李理山来到上海白云观，担任外账房执事（出纳），并配合上海文管会补修白云观珍藏的《正统道藏》。由于他对道教经藏的熟悉，这一工作开展顺利，由此他结识了道教界知名人士陈撷宁、蒋宗逸、丁福保等先生。^[2]由此可知，闵智亭实是李理山后辈，在李理山的安排下，闵智亭与这些沪上的道教界名人相结识。

（二）任红卍字会会长

据李理山《上诉状》自称，其“抗战前至胜利时担任杭州、上海道教会理事长，杭州红卍字会长等职”。^[3]杭州沦陷时期，李理山因办难民所事项，通过红卍字会翻译章兰亭与日军有联系。^[4]

红卍字会，又称道院。1916年，山东省滨州市人吴福永创立“道院”，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1921年，

[1] 刘延刚：《陈撷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06页。

[2] 张兴发：《仙踪渺黄鹤 人事忆白莲——记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大师》，《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

[3]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藏李理山《上诉状》。

[4] 《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一〇号》（1955），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

钱能训、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组织红卍字会筹备处，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其旨趣，后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成立。道院与红卍字会是合二为一的表里组织，道院重内修，红卍字会则着重推展慈善事业。

山上开办难民所最需要的就是粮食，由于粮食为战争时期的军需品，所以在敌占区运粮是寸步难行的。由于语言不通，李理山设法请章兰亭出面打交道、开证明，还要巧作掩护，才能把救济粮送上山。或是章兰亭曾被认定为汉奸，故李理山判决书中有“以办难民所为名，与汉奸翻译章兰亭勾结”一条罪状。^[1]

（三）与政府要员的交往

李理山与当时政府要员多有联系，李宗仁、蒋经国、何应钦、白崇禧、朱家骅、胡宗南、宣铁吾、余汉谋、竺鸣涛、沈鸿烈、罗震天、王云沛、郑文隐、毛万里等人均游历过玉皇山，而李理山则“殷勤招待”。^[2]李理山又与蒋经国、余汉谋、竺鸣涛等共同摄影留念。这些照片在1955年李理山判刑时，还被用作证据。故1986年高宗葆在《几点意见》中的第五点意见，就提到了蒋经国与李理山合影的问题，称当时李理山坐而蒋经国站，是蒋尊老。^[3]与李理山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军统杭州站站长章微寒及其私人秘书赵淑良，李理山收其二人为“道教归依弟子”。

四、李理山之丹井书屋

王松泉初时为杭州抱经堂之学徒，满师后任修复部主任，自1928年至1932年在杭州抱经堂任职，与经常至抱经堂购书之李理山相识。其写有《民国杭州藏书家》一书，记述了李理山之藏书情况：

李理山藏书室名“丹井书屋”。民国16年（1927）左右

[1] 《年度杭西法刑字第一二号》（1955），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

[2] 同上。

[3] 高宗葆：《关于玉皇山李理山反革命案几点意见》（1986），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

开始搜书，足迹遍及杭市各书肆，为城站“抱经堂”常客。因去来频繁，店主朱遂翔接待如上宾，故稀见之书辄留以待。日积月累，所藏渐丰。尤喜收购有关天文星象之旧抄本，不惜重价，广为罗致。藏书中有天问、占候、堪舆、奇门、六壬等六大类之书，均系明版旧刻旧抄少见之书。数年之间，耗资数万元。如此购书，在杭城旧书业中咸认为罕见。道长还邀请精于修书之人整修装帧，编制分目，实嗜书有癖之一奇人也。抗战起，停止买书。……紫东先生之藏书，1952年由浙江图书馆接收保藏，但有的当作废书处理，其中有不少是木刻医书。^[1]

顾志兴为研究地方藏书史的专家，其记述李理山丹井书屋称其“藏书总数达三万八千余册，约七万余卷”，又提及李理山收有原本之《四库全书》中的《明文海》十册。文中称，据张崑《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叙及，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咸丰兵燹，民国间书肆尚有少量原抄本流传，“尚有《明文海》十册在杭州福星观李道士处”；又言“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士李但徕藏有阁本《明文海》十册，卷数起迄未详，前同义乌事（应为“前同事义乌”——引者按）朱君中翰见告如此”。^[2]如此则李理山尚藏有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原抄本《明文海》十册。^[3]

又据李理山之《上诉状》自称其藏书为“古今各种书籍捌仟余部”，其中包括“上海白云观所藏明代正统道藏经壹部捌仟卷”。^[4]李理山所述之“部”之概念当是“种”，其册数及卷数当如顾志兴所述。

[1]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收入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杭垣旧事》，第36、37页。

[2]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704页。

[3] 李理山案平反后，浙江图书馆将当年没收之丹井书屋之藏书发还给杭州道协，据高信一讲，其发还之图书与前相比多有缺少。而上述之《四库全书》原抄本《明文海》十册，当不在发还之列。

[4]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

第二节 其他高道和道教学者在杭州的活动

一、陈撷宁与弟子胡海牙



图5.5 陈撷宁（图片源自胡海牙、武国忠主编《陈撷宁仙学精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陈撷宁，安徽怀宁县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全真龙门派第19代居士，道号圆顿子。清末秀才，安徽高等法政学堂肄业。早年身体病弱，虽多方求医，未见疗效，遂潜心事道，遍历道教名山。民国初年，历时三年在上海老西门外白云观阅《道藏》全书。20世纪20年代，居于上海，联合道友从事地元烧炼试验，并得效验。又进行扶乩，也得到验证。30年代，先后任《扬善半月刊》《仙道

月报》主笔，创立仙学。50年代，先赴杭州，讲授中医学理，传习静功修持，并任浙江文史馆馆员。后移居北京，历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和第3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撷宁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孙不二女丹诗注》《〈黄庭经〉讲义》《口诀钩玄录》《〈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道教起源》《〈太平经〉的前因与后果》等。^[1]

陈撷宁初到杭州约在1915年。1912—1914年，陈撷宁花了三年时间，在上海老西门外白云观通读了《道藏》。由于读《道藏》时间由白云观定为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故陈撷宁在这三年中也有时间同参佛理。1912年，月霞法师在上海频伽精舍讲演《楞严经》《圆觉经》《妙法莲华经》，陈撷宁与高鹤年居士等在此同参佛理。1913年至

[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四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415页；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撷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引言》及附录一《陈撷宁自传》。

1914年间，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办华严大学，亲授华严教义，所作《维摩经讲义》便由陈撷宁一手抄写。后来华严大学迁往杭州城外海潮寺，陈撷宁又随至杭州参学佛理。^[1]关于陈撷宁至杭州的具体时间，《中国道教史》认为：“（陈撷宁）1915年转而研究佛学，在杭州城外海潮寺佛教华严大学住了一段时间，同年秋天又往北京寻找专做修养功夫之人，无所遇。”^[2]则陈撷宁在杭州居住地是杭州城外海潮寺，时间不足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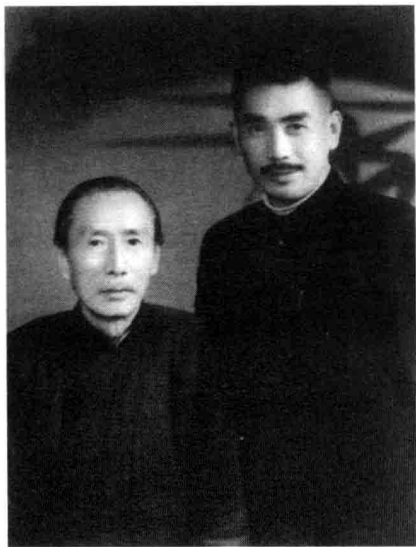


图5.6 陈撷宁与胡海牙（图片源自《陈撷宁仙学精要》）

陈撷宁二至杭州是在1935年。该年，陈撷宁携马一浮、张竹铭两人多次出游浙、苏、皖。古人修道讲求“法、财、侣、地”，缺一不可，故陈撷宁希望觅一处可隐居之地进行修炼。同行之马一浮为国学大师，时被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并为浙江大学作《大不自多》校歌歌词，1949年后曾任浙江文史馆馆长。张竹铭为上海翼化堂善书局主人，医师，也是《扬善半月刊》的创办人。此年出游所到之地安徽省为黄山、九华山，江苏省为茅山，

浙江至少有天台及杭州之富春江。陈撷宁认为：“若以苏、浙、皖三省山水比较而观，不能不推浙省第一。”^[3]而陈撷宁心目中的最佳修道地点，即是浙江省富春江上游。陈撷宁《致湖南宝庆张化声先生书》曰：“游浙省富春江，登严子陵二钓台，直上八百级，俯仰绿水苍岩，悠然

[1]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撷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四册，第377页。

[3] 洪建林编：《仙学揭秘——道家养生秘库》，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

神往。”^[1]

陈撷宁三至杭州是在1946年，起因是收胡海牙为徒。1946年，经张竹铭、孟怀山两位师兄介绍，胡海牙在杭州佑圣观依古制正式拜陈撷宁为师。拜师仪式甚是隆重庄严，供奉的牌位是：道祖轩辕黄帝、道宗太上老君、魏伯阳祖师、吕纯阳祖师、张紫阳祖师。此后，陈撷宁即常在沪杭间往来。如1950年冬，胡海牙即邀陈撷宁赴杭讲授《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等。

1953年4月，胡海牙再次邀陈撷宁至杭，陈撷宁此次迁至杭州，住于胡家。1953年10月，陈撷宁的老友马一浮时任浙江文史馆馆长，因了解陈撷宁的学识，其资历符合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文史馆馆员的资格，遂举荐其为浙江文史馆馆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厅提议，并经审查委员会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聘请陈撷宁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为工作方便，陈撷宁将户口迁杭，落于胡家，此时陈撷宁也可算是杭州人了。1957年春，应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之邀，陈撷宁在该院讲习静

功，并就此写了《神经衰弱静功疗养法问答》《静功总说》《治遗精病的特效法》等篇。

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陈撷宁先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遂于1957年冬离杭赴京。由杭进京后，陈撷宁一直住在白云观东院一独立院落内，从此以后再未离开过这里，直到1969年5月辞世。^[2]

陈撷宁入室弟子中，最为他所看重的是胡海牙。胡海牙1914年4月19日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酷慕成仙，19岁时入山学道，先在江浙一带访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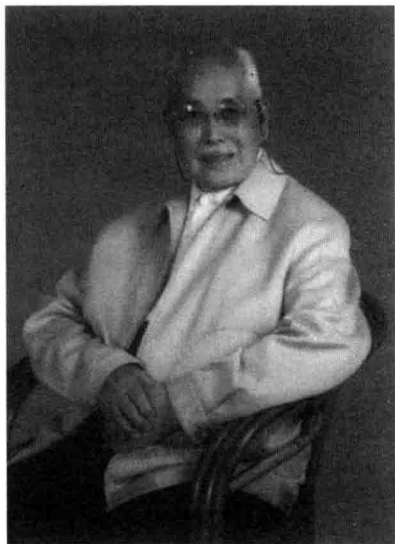


图5.7 胡海牙（图片源自《陈撷宁仙学精要》）

[1] 《扬善半月刊》，1936年10月。

[2]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撷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第107、118—127页。

求道，后隐居于金华双龙洞结庐修炼。后从道兄孙抱慈处获见一期《扬善半月刊》，而后便与陈撷宁书信往来不断。自1946年拜陈撷宁为师后，一直追随师父，至陈撷宁1969年去世，两人相从二十余载，尽得陈氏仙道真传，胡海牙“作为‘最后一个人室弟子’，他无疑是陈撷宁最器重、最得意，同时也是最成功、最忠实的弟子”。^[1]陈撷宁将其文稿尽付于胡海牙，胡海牙先后将其整理出版，是陈氏所倡仙学的继承人和研究者。胡海牙也是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曾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

二、闵智亭与杭州

闵智亭，号玉溪道人，1924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俗名闵广铨。父亲闵鹏万从儒经商，母亲朱氏操持家务，生活过得比较殷实。1941年日寇将战火烧至南阳，使闵氏产业彻底破产。当时还有半年即将高中毕业的闵广铨被迫辍学，心中对日寇充满了仇恨。在随学校撤离南阳去西安的途中，被西岳华山的神奇与雄伟所吸引，加之家学渊源，平素喜读《留侯传》及陶渊明诗词，常有出世之想，于是在华山毛女洞拜刘礼仙道长为师，出家修道，宗奉全真华山派，道名玉溪道人。1985年，玉溪道人被中国道教协会聘请到北京，主持中国道教协会道教知识专修班教学工作，并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副秘书长。同年11月，担任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兼秘书长。1987年12月，担任西安市道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担任全真传戒大师。1992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副会长。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务委员，同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会长，兼任中国道教学院院长、陕西道教协会名誉会长、西安市道教协



图5.8 闵智亭

[1]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撷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第108页。

会会长、西安八仙宫监院。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务委员，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还当选过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陕西省人大第七、八、九、十届代表，西安市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届常务委员。

闵智亭曾于1947年至1949年在杭州寓居两年，这两年对闵智亭来说，是人生的重要一站。

1947年，玉溪道人为了探寻道门奇人郎然亭，坐船从武汉至上海，辗转来到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与郎然亭老道长结识交流后，虽然没有学到多么高深的知识，却使他明白一个道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神仙也是在修持中不断完善升华自我的，所以人应该志向远大，不断追求崇高和完美。带着这些认识，玉溪道人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常住了下来，先后从清白道人周济学习绘画和书法，并跟随半角山房古琴大师徐元白学习古琴弹奏。此时，他还得到了社会学家马寅初的指点和福星观监院李理山道长的点化，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学和道学知识，不久担任起了福星观的知客。后据一名陕西前来拜访的道士称，闵智亭在杭州期间还加入了当时著名文人的结社——蝴蝶社，说明闵智亭文学艺术的造诣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1949年，玉溪道人随李理山道长来到上海白云观，担任外账房执事（出纳），并配合上海文管会补修白云观珍藏的《正统道藏》。由于他对道教经藏的熟悉，这一工作开展顺利，由此他结识了道教界知名人士陈撄宁、蒋宗逸、丁福保等先生，在社会学和道学上再次获得了一次升华。^[1]

[1] 张兴发：《仙踪渺黄鹤 人事忆白莲——记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大师》，《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

第六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影响及意义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对民俗的影响

宗教对民俗影响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宗教节日的民众参与。南宋之《梦粱录》曰：“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1]说明杭州的民众对宗教节日的参与热情是很高的，宗教节日往往成为杭州数万甚至是数十万民众共同参与的盛会。

从资料来看，民国杭州风俗的资料不多，现存的资料以晚清时期为主，主要有《杭俗遗风》^[2]一书，写于咸同兵燹之后的同治二年（1863），详述了杭城洪杨之乱前的盛况。其书《序》中称其“足续梦粱之录”，可见时人对其评价很高。又有《杭俗怡情碎锦》^[3]一书，似是《杭俗遗风》的补遗之作，其撰写年代不详，但稿本中有“光绪廿八年”的字样，则其书写于1902年之后。此外，《申报》中有数十篇晚清时期杭州与民俗相关的道教资料。

虽然资料以晚清为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其勾勒出民国时期与道

[1] [宋]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2]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

[3] [清]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稿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六号》。

教相关的民俗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民俗是有其传承的，从最新的资料到民国初年其实只有近十年，而最远的资料也不过50年，其都在一代人内发生的事，其传承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第二，民国时的1936年有一篇关于杭州法华山老东岳庙会的调查报告，其中所述庙会的盛况与1863年所著之《杭俗遗风》中所述的法华香会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可以断定晚清的“法华香会”在民国时期被继承了下来。1940年又有队克勋关于玉皇山福星观正月初八上香的调查报告。从这两个点上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认为晚清的杭州民俗在杭州基本得到了传承。第三，杭州的道观情况来看，民国5年（1916）《杭州府志》中关于《寺观》一节全抄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杭州府志》，可知晚清时存在的宫观到民国时期几乎没有变更，而《杭州市志》又录有1950年杭州道观的情况。上述所述之重要道观大多数在1950年依然存在，则我们可以断定杭州作为道教活动的中心的道观，从晚清至民国末年变动很小。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本节将主要使用晚清民俗资料，辅以不多的民国资料对民国杭州道教对民俗的影响作一个描述。

一、杭州庙会赛会的功能

宗教节日在民俗中往往形成以香会和赛会形式的民众聚会。这种民众聚会除了宗教功能外往往还有其他诸多功能，如娱乐功能、经济功能。迎神赛会的出现或消亡与前述三个功能都有关。但是上述原因应该综合起来考虑，就是广大民众其实需要的是一场可以狂欢的盛会，这个盛会必定要有自己关心并愿意参与的内容，这就是庙会参与者作为群体的一个心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群体的需求是更为广阔的。如果一个庙会既有信仰本身，又有精彩的节目可看，又要好吃好玩，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其中。在晚清民国时期，或许只有庙会或巡游的形式搭台，众多的节目和商贩参与，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参与一场盛会的需求。可以说，是这些功能的综合，促成了一场民众的狂欢，任何一个单一的功能可能都调动不了数万人或数十万人参与的热情。与其说宗教信仰影响了民俗，不如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共同体，两者相互依存，这种

集信仰、娱乐、经济活动于一体的形式存在，才是信仰得以继续和扩大的一个载体。集会还会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出现，主要的是治安问题。

（一）宗教功能

宗教功能是宗教节日原初的功能，也是香会或赛会形成的基本原因。不同的香会，其参与者是否都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参与进来，是不相同的。以杭州三月三日真武圣诞和九月初旬的九皇斗坛来讲，其信众是较多的。而某些赛会巡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参与其中，吸引他们的只不过是巡游队伍有精彩的表演而已，故其娱乐功能可能是其主要的部分。

（二）娱乐功能

宗教节日中的节目，从最原始的功能来讲，是娱神的。有学者认为：“信众在通过各种仪式活动向祠神表达祈谢、忏悔等宗教情感的同时，祠赛社会也在祈神、娱神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据学者研究，宋代之后城乡神庙祭祀与戏曲文化逐渐结合，中国戏曲的形式、内容和演出场地也日趋成熟。”^[1]戏曲与道教的关系确实是相当紧密的，徐宏图曾就其关系作过详细的论证，认为道教仪式是戏曲的来源之一。道教仪式本是娱神的，古代祠庙中戏台大多数是正对大殿的，其位置就是娱神功能的一个主要证据。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其娱人功能逐步加强后，戏曲也就独立于道教仪式之外独立存在了。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其形式再次演变为宗教节日在庙中演戏的风俗。《申报》曾记述，“杭州盐桥广福庙土地蒋神，相传于六月初九日诞辰，每届悬灯结彩，演剧十余日，男妇进香者，热闹非凡”。但该年由于官府禁止以宗教节日敛财，故该年蒋神庙活动不如往年精彩，但也“并雇清音、滩簧、南词在彼弹唱”。^[2]这颇有娱神的上古遗风。在杭州，娱人的活动并不止演戏一种，如元帅会巡游中就有“高跷、炉子、龙灯、幡竿、清吹等项，尤有仙童、猎户、马夫、妇道、台阁、船灯、侍卫、小高跷十样景并各式故事，均以小孩装扮，再

[1]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2] 《会景寂寥》，《申报》1897年7月24日。

有拜香愿扮斩犯二种”。^[1]

（三）经济功能

在明清时期，庙会常被人与庙市等同，这是因为庙会对商品交易有很大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庙会具有很强的经济性功能。^[2]杭州晚清民国时的庙会经济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杭俗遗风》中所称部分香会，不以“会”称之，而以“市”称之，分别有“天竺香市”“下乡香市”“三山香市”，就可见一斑。据《杭俗遗风》中描绘的“下乡香市”：“昭庆寺前后左右各行店面均皆云集，名曰赶香市。……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夏秋冬三季敌不过春香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无不挨肩擦背者也。予坟亲李玉堂住居留下，其房分有业竹篮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钱生意，即此而推各式生意，诚有不可胜计者矣。”^[3]照文中所述，春香之一季的生意，占了一年生意的一半以上，大约短短一月的香会对于生意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笔来源，庙会的经济功能可见一斑。

（四）治安问题

《申报》中记述了较多的杭州庙会与香会的治安事件。第一件事与九皇斗坛有关：

杭之伏虎庙系新落成者。其新设斗坛热闹更甚于初六日，度关纷至沓来。坛中司事及求度人等寔不过十之二三，余皆游手好闲之辈、寻花问柳之人也。当度关时，不论男妇老幼，均随道士而度。其时争先恐后，拥挤异常。有小家妇四五人均被挤倒地，簪环首饰无一存者。鬓发云披，锦裙泥染，大供游人笑谑。闻一妇小腹已受伤云。世之有妻妾子女者，胡不痛示而严禁之耶。^[4]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二七号》，第33页。

[2]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3] 同[1]，第24、25页。

[4] 《斗坛挤倒游女》，《申报》1874年10月29日。

第二件事与三月三真武信仰有关：

杭垣于三月初一日起，至初三日止。如宝极观、报恩观、水德殿等处，盛行香会。……又闻初二日晚既过，各处妇女陆续到庙，以坐为宿。其时灯影明亮，钗影参差。敬香人更纷纷如织盖，不必烧高烛而已照红妆也。无赖辈为窥艳计，均执火把四处照耀。火星时有迸裂吹落，而妇女之发髻衣裙间，有被火灼损者。适一妇人坐于宝极观之殿后，年只二十余，无赖辈故以火近其身，衣角骤焦。但闻人丛中一声救火，殿后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庙中住持急唤多人进内。无赖辈方渐引散。视殿后妇女大半披发，仓皇莫措，盖簪珥首饰均食攫去矣。回见暗角中，此二十余岁之妇蹲做一堆。取灯照之，则发如飞蓬，身上只剩单裤。住持急着人至其家，取到衣裙雇舆送回。问为何家宅眷。住持曰：“我虽识之，然不能为君等告也。”试思救火出声之后，众人拥挤之中。为该妇设身处之，真有不堪述及者。彼佞□者，独何心哉。^[1]

第三件事与元帅会巡游有关：

杭州访事人云：本月十七日下皮市〔观〕仙馆赛温元帅会。……官巷为通衢要道，市肆蝉联。妇女之游观者，均在各铺门前鹄立。轻薄子弟见此花香粉腻，不觉心醉神迷，品足评头，留恋不能去。某氏妇适当会过之际，觉有人摘取头上之簪，回顾间翡翠压发一枝已不胫而走。人山人海，无从追觅，惟有连唤奈何而已。琵琶街窄若羊肠，檐牙栉比。舞竿者不提防将檐口瓦片挑堕。适一十二三龄孩子过其下，以致头颅砸碎，鲜血淋漓。父母闻之，急扭舞竿者与之饶舌。后经旁观者再三劝解，始各罢休。^[2]

治安问题并不是宗教节日才有的问题，任何大规模的聚会都会有类似的事件出现。所以以治安事件的发生为理由，讨论迎神赛会的兴废其

[1] 《香会纪盛》，《申报》1876年4月6日。

[2] 《赛会记余》，《申报》1894年6月28日。

实是不客观的。

二、杭州道教庙会及赛会

《杭俗遗风》中《时序类》列有从正月至十二月杭州民俗中聚会出行的大事，共三十个，其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俗神有关的有十五项，可见宗教对民俗影响是很大的。这十五项中，与道教节日或宫观有关的有九项，可见杭州道教对民俗节日的影响要大于佛教。

在这九项中，有较多民众聚会参与的，也是道教重要节日的主要有：“三山香市”中的“三月玄天上帝诞辰”“法华山东岳庙会”；“元帅会场”中各庙温元帅巡游；“九皇斗坛”的礼斗延生祈福。部分道教的庙会，其来源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此外《杭俗怡情碎锦》中增加了“正月初九玉皇山”，原因是《杭俗遗风》写的是咸同兵燹之前的杭州风俗，而玉皇山是在兵燹之后由蒋永林复建后才名动当时的。《杭俗怡情碎锦》约写于清末，与《杭俗遗风》的时间约差四十年。这说明“正月初九玉皇山”是四十年间新产生的杭州风俗。

法华山东岳庙会在1936年，也即日寇侵华前一年仍盛况空前，林用中与章松寿其时在杭州对法华山老东岳庙的香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写了《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1]，让我们可以整体地了解了法华山七月十五香会的盛景（该报告见本书附录）。1940年出版的《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中国民间崇拜——对于中国纸神的研究》）也记述了正月玉皇山上香的事。由于关于玉皇山福星观和法华山老东岳庙的研究都已经在前独立成章，故在本节中不再赘述。

（一）玄天上帝诞辰

玄天上帝即真武神。真武，古称玄武，为北极紫微大帝座下四将之一。北极紫微大帝又称北帝，唐代有北帝派，其北帝及座下四将天蓬、天猷、翊圣、玄武为北帝派主要的神灵，至宋代为神霄派所继承。在自

[1]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收入《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1936年印行。

宋太宗而下至于宋钦宗的历代奉祀加封中，他们已经被打造成了北宋帝国的保护神。北宋时，崇奉真武的习俗以汴京为中心，盛行于中原地区并逐渐向四方辐射。宋室南渡之后，北方金人的威胁、压力越来越大，统治者希求真武神护佑的心情愈加迫切，因之，统治者在大加封号的同时，亦大力营建祭祀真武的宫观，临安（今浙江杭州）遂成为崇奉真武的中心地。^[1]

杭州的真武香会可上溯至南宋时期。三月三日为真武诞辰，在当时既是以真武诞辰而设的香会，也是临安民众的节日。南宋《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曰：“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贡之社。”^[2]由皇帝“降赐御香”举办的大型法事活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三月三日真武圣诞节的进香，以佑圣观的最负盛名。《梦粱录》曰：

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成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3]

三月三真武诞辰而形成的“真武节”，反映民间信仰的浓烈程度。不仅是有资财之家设醮祈恩，贫者亦积极参与其中，虽然只是“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盛况，为当时之最。

至晚清咸同年间，真武香会在小和山者，与法华山、天竺山合称

[1] 梅莉：《宋元时期杭嘉湖平原真武信仰》，载连晓鸣主编《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90页。

[2] [宋]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9页。

[3] [宋]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46页。

“三山香会”。“三山香会”名称的由来是：“每逢三月间，城里乡绅以及大家富户之妇女约伴烧香，名曰翻三山。盖云尽一日之长，烧三山之香也。”^[1]也就是三山相距并不十分遥远，一天之内可以烧遍三山之香，故称“三山香会”。三山中，天竺香会为佛教香会，而其余二山为道教香会，从中可见民俗信仰往往是不分佛教道教的，只管神仙是否名气大，是否很灵验，是否得到众人的共同崇信。

《杭俗遗风》小和山之香会曰：“小和山者，供奉玄天上帝，其地出钱塘门，沿山十八里至留下，再二十余里至山，城中各行均有香会，纠分聚往，多在松木场下船，至水口灵官上山只十余里。或数十人，或百十人一起。凡三月光圣诞前后，络绎去者何止千百十起。总以两日为期，其香烛以及饭食均系头家所备。”^[2]从中可以看出，真武香会在小和山的人就有约数万人以上。其进香是有组织的，也就是“城中各行均有香会”，香会是以百业行会组织的。《杭俗怡情碎锦》也记述有《三月初三小和山》的杭俗，并称“小和山庙名金莲寺，所以……各处烛山荷花灯名金莲放光”。^[3]从中可知小和山的真武香会是以金莲寺为中心的。《申报》记述了光绪年间三月三日真武香会的盛况。《香会纪盛》篇曰：

杭垣于三月初一日起，至初三日止，如宝极观、报恩观、水德殿等处盛行香会。皆于殿上悬设灯彩，罗列果品，拜斗礼忏，日夜无间。门外则高挂一七星大黑旗，又七星黑小旗，或四或六或八。男女之赴会者，攘往熙来，殊形杂沓。多有坐庙中三四时许，名为宿山。或殿上，或廊下，椅凳纷排，履舄交错。

相传初三日为圣帝寿诞，庙内之拥挤，则又于初二晚间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第27页。

[2] 同上，第26页。

[3] [清]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稿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六号》，第6页。

为更甚。且一庙中多有香会三四处、五六处，各分门户，不相闻问。惟张挂陈设，则彼此相竞，夸多斗靡，穷丽极妍。

宝极观于晚间望之，灯光烛天，高接牛斗，盖不异奎光之焕发也。又闻初二日晚膳既过，各处妇女陆续到庙，以坐为宿。其时灯影明亮，钗影参差。敬香人更纷纷如织盖，不必烧高烛而已照红妆也。无赖辈为窥艳计，均执火把四处照耀，火星时有迸裂吹落。而妇女之发髻衣裙间，有被火灼损者。^[1]

《申报》记述的是杭州城内的真武香会，其设香会的有宝极观、报恩观、水德殿等，其烧香者，也都是有香会组织的。每个宫观各有数个香会，各个香会之间不相往来，但却“张挂陈设，则彼此相竞，夸多斗靡，穷丽极妍”，有相互斗富的情形。

妇女参与香会是杭州香会的一个特色。前小和山香会记述有“城里乡绅以及大家富户之妇女约伴烧香”，城内香会则记述“各处妇女陆续到庙，其时灯影明亮，钗影参差”。香会之时“大家妇女大轿润管，随带仆妇丫鬟，其头面之装饰，衣裙之鲜艳，穷工极巧，斗丽争华，不啻嫦娥下降，仙女临凡”，当时有一联形容云：“腾云驾雾娉婷女，玉叶金枝窈窕娘。”香会不仅是一个拜神的日子，亦是妇女难得的盛装出门的聚会，这也是宗教节日民俗化后的特点之一。

（二）“元帅会场”中各庙温元帅巡游

杭城所奉之元帅为温元帅，为道教四大护法元帅之一。道教四大护法元帅的名号有数说，一说为“马灵耀、赵公明、温琼、周广泽”，二说为“岳飞、赵公明、温琼、康席”，流传最广的是“马灵耀、赵公明、温琼、关羽”。^[2]无论哪种说法中，都有赵公明、温琼两人。赵公明，一般都是以武财神及门神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民间俗称“元帅”，不特加姓氏的话，都是指温元帅温琼。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称温元帅姓温名琼，字子玉，浙江温州人，生于汉顺帝时，东岳大帝闻其勇，招为东岳十太保之一，故温琼又称温

[1] 《申报》1876年4月6日。

[2] 范恩君：《道教神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太保。“东嘉之名敬而畏之”。后封为“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杭城对温元帅有自己的传说：“地祇元帅封东嘉忠靖王，姓温。传说系前朝秀士，来省中乡试，寓中夜闻鬼下瘟药方井中，思有以救万民，即以身投井，次日人见之捞起，浑身青色，因知受毒，由是封神。五月十八诞辰，十六出会，名曰收瘟，由来旧矣。其井在羊市街，地方随后起庙，井即在神座下，庙名旌德观。”^[1]也就是在杭州的温元帅传说中，温琼死于旌德观下的井中，而于其上建了旌德观。杭城元帅庙有数处，而以旌德观为老庙。

“旌德观，此为老元帅。城中尤有数庙，惟旌德观称为有财有势老元帅。忠靖观在上仓桥，为督宪香火院，为有势无财仓元帅。童乘寺在清和坊，为有财无势童元帅。甘泉寺在府前，为穷凶极恶甘元帅。尤有活脓倒臭^[2]皮元帅，以其庙在皮市也。”^[3]前已所述，杭城民间所称元帅即是指温元帅，故省去温姓。文中所称之“老元帅、仓元帅、童元帅、甘元帅、皮元帅”是杭城当时的俗称，其实所指的都是温琼，根据地点不同加了不同的别称而已，并不是杭州有各姓元帅出现。

温元帅之信仰，最受人关注的是其赛会巡游，时称“出会”。其巡游声势浩大，“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此为杭城第一大阵场也”。^[4]其为第一大阵场的原因是“出会，惟旌德观老元帅各衙门均助大班一起，抚台以下皆然，惟杭捕府有大肚皮刽役四个。本庙仪从无役不备。助会有打本庙衙者，有各庙时衙约有四五百起之多”。旌德观老元帅出会，有官方的支持，都会“助大班”一起，也就是官府自抚台以下各衙门均出仪仗一队，加入巡游队伍。甚至还有真正的刽子手也加入巡游队伍，而不是由人假扮的，这也是杭城赛会巡游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本庙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第32页。

[2] “活脓倒臭”为杭州方言，四字连用，形容很臭。不过方言中根据其发音应该为“活龙倒臭”，其作者或为用字与臭的意思相近，故用了“脓”字，也许是声母“L”和“N”不分，故称“脓”字。

[3] 同[1]，第32、33页。

[4] 同[1]，第33页。

及各庙也都会有队伍加入，每个队伍扮一个故事或典故。各处相加竟然有四五百组人，巡游队伍人数“何止万千人”，可见其巡游的声势是多么浩大，难怪有“不远千里而来者”。

咸同之后，元帅会便会禁止举行。《杭俗怡情碎锦》中记述了其事：“元帅会因滋事，在谭中丞任时，勒石禁止，至今不举行。”^[1]但却没有说明其原因。但据《申报》：“李制军抚浙时，途遇是会，见有十数骑皆穿黄马褂，戴孔雀翎，不禁勃然大怒。立石元帅庙门外，永远禁止。”^[2]“穿黄马褂”是清代的一项至高荣誉，黄马褂是要皇帝赏赐才能穿的，而孔雀翎则是官员的朝仪。民间巡游居然有穿黄马褂、戴孔雀翎之事，李巡抚当然会“勃然大怒”，从而在旌德观外立石永禁。关于立石时间，1887年的《申报》称“查此会自经勒石永禁后，迄今二十年未敢举行”。^[3]可知“勒石永禁”之事约在1867年前后。在此期间任浙江巡抚的李制军，当为李瀚章，其于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八年（1869）任浙江巡抚。则立石禁止元帅巡游的即是此人。

不过，虽然立石禁止，但仍挡不住民众的迎神赛会之热情。既然旌德观不准迎神，“杭人遂改于永宁院敬神祈福”，不过由于有禁令在，一开始“犹未敢舁神出游也”。^[4]然而事情过去近二十年后，杭城民众“始以驱逐瘟疫为名，出游各处”。如前所述，杭城元帅有皮元帅是在皮市巷，而永宁院所在，是在中皮市巷，而今永宁院成为一条巷的名称，与皮市巷相交。故《申报》称：“杭城旌德观，于五月十六日奉温元帅出巡。查此会自经勒石永禁后，迄今二十年未敢举行。每岁但奉永宁院内皮元帅一巡而已。”^[5]

但是皮元帅出巡远不如老元帅来得更有代表性。民众奉老元帅赛会巡游的热情很高，从而也大大增加了民众的胆识和智力。《申报》云：

[1] [清]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稿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六号》，第10页。

[2] 《杭垣胜会》，《申报》光绪十三年五月廿四日（1887年7月14日）。

[3] 《杭城赛会》，《申报》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1887年10月2日）。

[4] 同[2]。

[5] 同[3]。

“杭人视禁谕内，有五月十六日元帅会云云。遂谓改期巡赛，不为犯禁。”也就是民众钻了禁文的空子，说不准五月十六元帅会，那么不在五月十六时巡游，不应该算犯禁。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旌德观老元帅于八月初十奉老元帅出巡。但光绪十八年（1892），官府又下令不得巡游，其原因是“去年因各处烧毁西人教堂，恐匪徒乘机窃发，地方官预期出示禁止”。^[1]不过数年后，赛会又照旧举行，《申报》记载的最后时间的元帅会为光绪二十年（1894）的巡游。

1894年以后至民国末年的温元帅庙会巡游情况资料非常少。民国时期虽然从政府政令来看，并不支持宗教和赛会巡游的民俗，但进入民国后，清代官员立石永禁的效力已经作废，以杭城人赛会巡游的热情来看，巡游赛会将是少不了的了。关于皮元帅之庙会，《杭州运河风俗》中只是如此简略地提到了一个事件：“据老人回忆，1941年的温元帅诞辰日，还曾在皮市巷的童乘寺举行过一次隆重的祭典，煞是热闹。”^[2]这个信息表现出非常多的内容。一是民国时期，温元帅会仍在举行；二是元帅会已经不是每年举行了，不然不会只对1941年的元帅会有印象；三是对于民国汪伪政府时期（或称日占时期）杭州的道教资料非常之少。该条口述资料的存在，为杭州汪伪政府时期道教相关研究提供了一条宝贵的资料。

关于巡游，都会有巡游的路线。《申报》记述了元帅会的三次巡游路线，其中两次为皮元帅的巡游路线，一次老元帅的巡游路线。

1. 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廿四载皮元帅巡游（见图6.1）：

奉永宁院元帅神像，于十六日午刻出庙，穿过皮市巷，经小营巷，绕头发巷，出联桥大街，过和合桥，转同升坊，迤□过有玉桥、登云桥，由永宁街、长庆街直出，向东大北门北行，过坝子桥，由东大街向南，过章家桥回西，转珠宝巷向北，经皇诰儿巷向东，由皮市回庙。

2.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廿二载皮元帅巡游（见图6.2）：

[1] 《禁止赛会》，《申报》 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892年6月6日）。

[2] 顾希佳：《杭州运河风俗》，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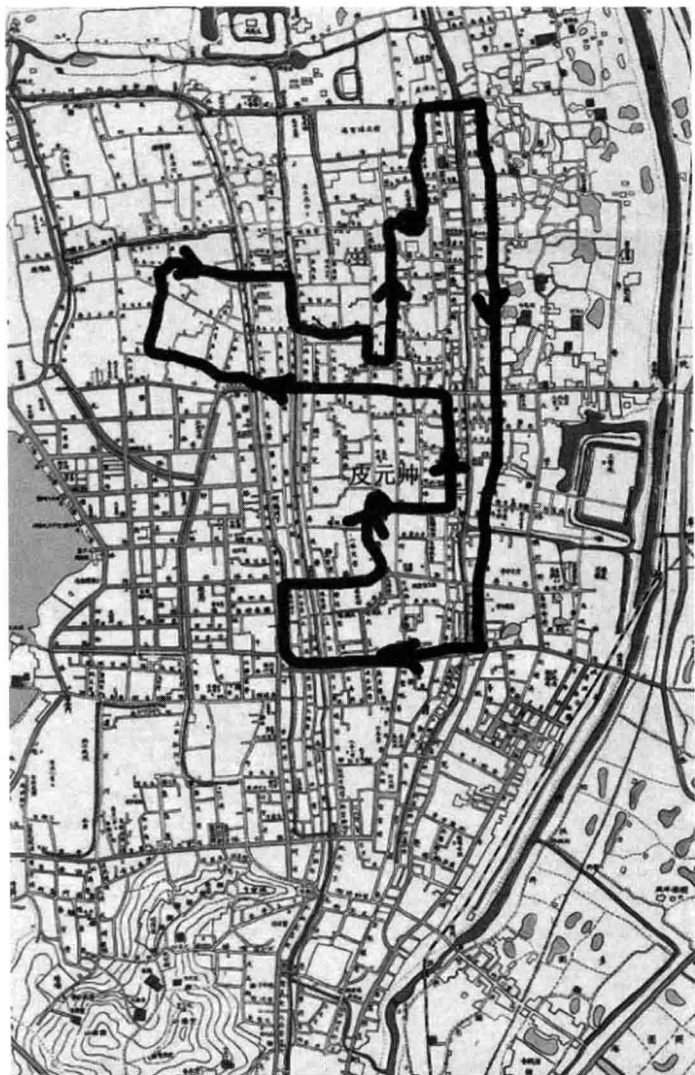


图6.1 光绪十三年皮元帅巡游路线

出殿向北转头发巷，经联桥、和合桥，过果使衙门北行，斜出广福营，绕竹竿巷，转同升坊大街，过有玉桥、登云桥，进祠堂巷、柳营巷、长庆街，由六克巷、忠清里、大东门直街，至助圣庙更衣毕，出磨盘井巷，向北过坝子桥东大街直上，过章家桥，经荐桥直街，折至丰乐桥向东，进皮市巷回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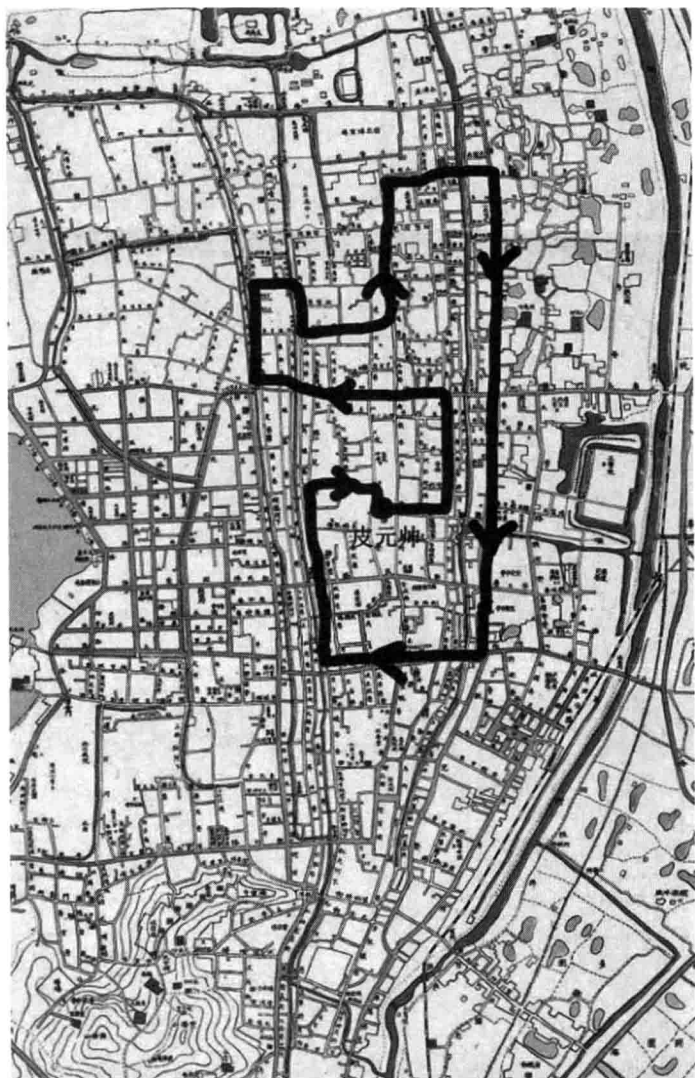


图6.2 光绪十四年皮元帅巡游路线

3.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初十六载老元帅巡游（见图6.3）：

出西辕门，经上板儿巷，由狮子巷，过车驾桥、荣镇楼部院、仓桥大街直下，进太庙巷，由瑞石亭出城隍牌楼，经大街转至望仙桥，进袁井巷，绕镇东楼，由金钗袋巷，过演教寺、洋市街，出姚园寺巷，过斗富二桥，由梅花碑进城头巷，绕管驿后、佑圣观巷、荐桥直街，经珠宝巷、丰乐桥、炭

桥大街直上转后市街，出太平坊直上，由大井巷司前过道院巷、塔儿头府前运司河下，由闹市口进延龄门，出井市楼，绕饒部前，过教场桥向东，过贯桥大街向南，过北桥、仙林桥，由祠堂巷转长庆街、大福清巷、联桥直街，进忠清里，至助圣庙更衣毕，由磨盘井巷，直北过坝子桥东街直上，回庙时已三更将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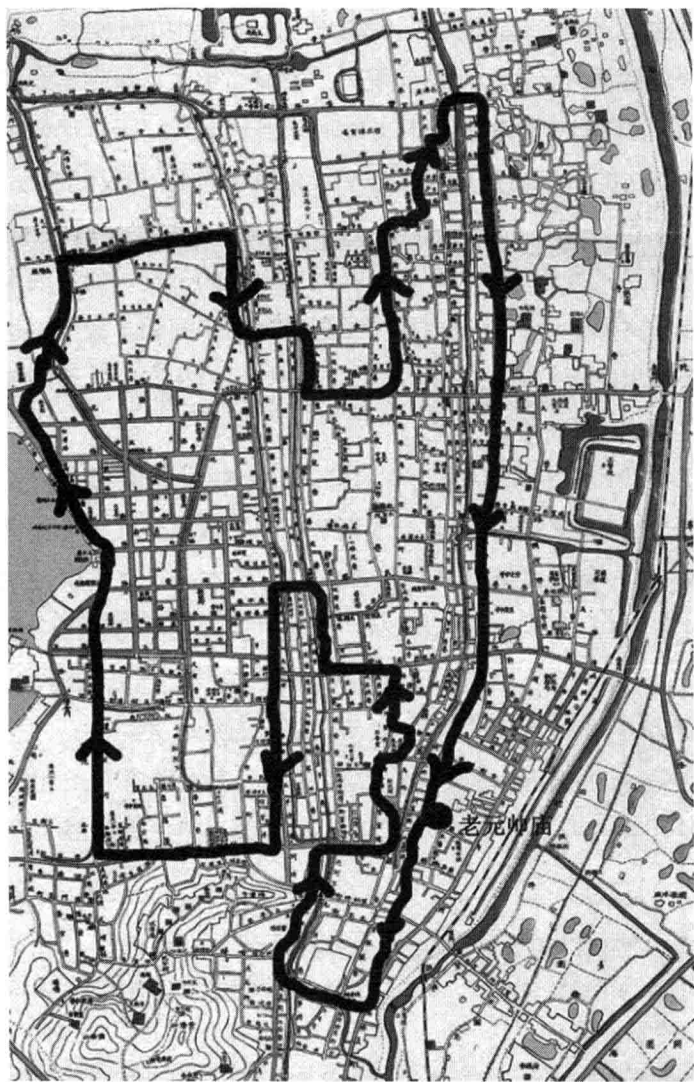


图6.3 老元帅巡游路线

从巡游路程的长短就可以看出老元帅的影响大大超过皮元帅。老元帅的巡游基本是将杭州城绕了一圈，而皮元帅只是在城中心地带巡游一回，两者影响的差距由此显现。

（三）“九皇斗坛”礼斗延生祈福

北斗七星加左辅右弼，即称之为“九皇”。^[1]九皇斗坛即是以崇奉北斗以期延生的信仰，而北斗七星又与十二地支生人相配，不同年生人需供奉自己的本命星官。其信仰在杭州至少可上溯至南宋。

刘长东认为元命信仰又称为本命信仰，并引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诗证之。^[2]本命信仰的首要基础为干支计时，当是干支纪历所延伸出来的一种信仰，其次的基础当是星命及与星命相结合的阴阳五行学说。

元命信仰分两种：一是以干支都相同为本命年。由于天干地支合成六十花甲子，故至六十一岁，则又见其出生的干支，如范成大之诗称“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二是以地支相同为本命年，也是现在民俗最为常用的计算方法。中国十二地支与生肖相连，故民间往往以属相相同之年称为本命年。

到了宋代，宋代皇室的元命信仰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刘长东认为“宋代皇帝的本命斋醮很可能始于真宗”，“真宗时已有专建皇帝本命殿之制矣”。^[3]皇帝的本命殿中供奉的内容是本命星官位牌，《宋会要辑稿》礼五之二二曰：“皇帝本命纯福殿见安奉至尊寿皇圣帝丁未本命星官位牌，乞依礼例设置皇帝丁卯本命星官位牌，一处安奉。”^[4]本命星官之信仰与《道藏》所收约宋代新出两部道经有关。

《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收有《太上玄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其内容为斗姆生九星官，其文曰：“斗姆沐浴于九曲华池

[1] 范恩君：《道教神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2] 刘长东：《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4—64页。

[3] 同上。

[4] 《宋会要辑稿》礼五之二二。

中……怡养神真，修炼精魄……放无极微妙光明，洞彻华池，化生金莲九苞……现九皇道体，一曰天皇，二曰紫微，三曰贪狼，四曰巨门，五曰禄存，六曰文曲，七曰廉贞，八曰武曲，九曰破军。”又曰：“天皇、紫微……二星分作余晖，为左辅右弼。”^[1]此经为斗姆生九星官的神话。另有更为重要的一篇经文为同在洞神部本文类所收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道藏提要》认为“是经盖唐宋初道流扶乩降笔”。^[2]此经《道藏》收有三个注本，其作注之人都为宋元之人，《道藏提要》认为《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出于宋初，是极有可能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与元命信仰有关的内容是北斗七星与十二地支生人的配属关系，其经文曰：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太星君（子生人属之）

北斗第二阴精巨门元星君（丑亥生人属之）

北斗第三真人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属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纽星君（卯酉生人属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贞纲星君（辰申生人属之）

北斗第六北极武曲纪星君（巳未生人属之）

北斗第七天关破军关星君（午生人属之）

北斗第八洞明外辅星君

北斗第九隐光内弼星君^[3]

上述九星与《太上玄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中所列斗姆所生九星基本相同，或是出于其后。按《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本命与地支相关联。《道藏·正一部》有《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其中列出了六十甲子神的名号，所属从官，并其所属北斗七元星君。不过《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只有正文没有序跋，难以了解其创作的年代。《道藏提要》称“《隋书·经籍志》著录《元辰历》一卷，或与本篇有

[1] 《道藏》第11册，第345页。

[2]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3] 《道藏》第11册，第347页。

关”^[1]也只是猜测之语。前引《宋会要辑稿》称宋帝所列是“丁未本命星官位牌”，按北斗七元星君只计地支，而宋帝所列为“丁未”本命星官，则其所列或是六十甲子神位牌，因其从属于北斗七元星君中之一位，或会同列星君位牌。七星又出于斗姆，或也会有斗姆之位。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说：“帝王下及庶人，尊卑虽则殊途，命分俱无差别。凡夫在世，迷谬者多不知身属北斗，命由天府，有灾有患，不知解谢之门……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克害……或上天谴责，或下鬼诉诬，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须投告北斗，醮谢真君，及转真经，认本命真君，方获安泰，以至康荣更有深妙，不可尽述，凡见北斗真形，顶礼恭敬。”^[2]经中所说，北斗星官信仰，帝王与庶人“命分俱无差别”，或是宋代皇帝信奉元命的原因之一。同时宋室南渡，元命信仰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吴自牧称南宋杭州御前宫观大抵“以奉元命”，是南宋一个独特的现象。不啻各代帝后尽有专殿，有的且有多处（如理宗在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四圣延祥观、开元宫皆有元命殿，度宗亦在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三茅宁寿观、开元宫有元命殿，寿和圣福皇太后则在西太乙宫、万寿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有元命殿）。与南极、北斗的过度奉祀合而观之，不能不说帝后本身的安危在南宋皇室得到了高度重视。这固然不排除元命信仰发展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与靖康之变的阴影有关。靖康之变以帝国破灭、帝后北迁的惨剧，把帝国与帝后的安危抬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程度。于是乎，帝国保护神与生命保护神双双得到了令人注目的重视。^[3]

至晚清时期，元命信仰被杭州民众所继承，演变为称为“九皇斗坛”的信仰形式：

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止，杭城人家有大半吃素净厨。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共有斗坛三百余处，均系在家人纠纷设

[1]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1019页。

[2] 《道藏》第11册，第347页。

[3] 段玉明：《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载连晓鸣主编《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5页。

供。其中铺设点缀，此强彼胜。每晚拜忏至三四更不等。有名讲究者，初六七朝天上表，遍贴招知。并招儿童过关。

士女之游斗坛亦一大胜会也。山下宗阳宫、通玄观、旌德观等处为最。山上金龙阁、准提阁、火德庙、上下宝奎坛，其余数十房头均有所用。桌帟幡幔以及所点蜡烛均皆黄色。^[1]

九皇斗坛在杭城设有三百余处，可见其盛。因为斗坛之设是基于本命信仰的，也就是为自己本命祈福，故这三百余处都是“在家人”所供设。斗坛所涉及的道观很多，有宗阳宫、通玄观、旌德观、金龙阁、准提阁、火德庙、上下宝奎坛等处。十天之中，初六、初七两天为朝天上表之日期。坛的颜色均用黄色。

《申报》中也有数处提到杭城的斗坛盛况。《斗坛挤倒游女》篇曰：“杭城于九月初一日起，至初十日止，盛设斗坛，亦犹天竺之香市、东岳之朝审也。礼忏拜斗，供天施食而铺设饮饌，更各极其精巧。”^[2]将九皇斗坛与观音圣诞之天竺香市、七月十五法华山东岳庙会两大杭城盛会相提并论，可见九皇斗坛亦是盛况空前。《斗坛纪盛》^[3]篇曰：“每岁九月初一日起，至初九日止，俗谓为九王诞。有持斋者，有礼忏者，咸佞佛以祈福，举国若狂。”此处称初一至初九日止，且称“九王诞”，与杭城所称不同，文中称“不独苏省为然也”，可知其是江苏的风俗，是时上海是属于江苏的，《申报》又是上海的报纸，所以九王诞很可能是上海的风俗。与杭州风俗相近，但略有不同。

又曰：“杭城自九月朔日起，各庙皆摆设斗坛，以斋天而供佛。或拜忏，或度关，各项皆热闹异常。各立坛名，各司乃事。其一切费用，皆由捐募而得。坛前摆列铺设，均各争奇斗巧，不肯稍让，以致游人拥挤异常。而裙屐蹁跹，簪环络绎，正不止履舄交错而已也。其最易滋事之时，则为坛中度关做朝二事。其时挥汗成雨，联袂成帷，踵相接肩相

[1] [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第43、44页。

[2] 《申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日（1874年10月29日）。

[3] 《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六日（1877年10月22日）。

摩，恐后争先，与热闹戏场无异。”从中可知，九皇斗坛最主要的仪式为“度关”和“做朝”。度关或即前文所称招儿童之“过关”，做朝或即是前文所称之“朝天上表”。又曰：“其仓桥之日新坛，于初六日度关。”可知当时仓桥有一坛曰“日新坛”，而度关的时间亦与朝天上表的日期相近，为初六日。

至光绪中，斗坛的习俗仍存。《申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斗坛纪盛》篇曰：“杭城之好事者，每届九月初旬有礼斗之举。坛设于大庙之中。自初一为始，至初十日止，日间宣诵各经。晚间拜忏以期延生解厄。城厢上下，共计十余处。无不斗巧争妍，以悦游人之目。其坛以吴山之太岁殿宝敬坛为第一。坛中人皆系藩署、书吏，集资较厚。地又宽敞，摆设一切除各样灯彩外，陈列古玩多端以故。士女如云往来，不绝其次。则城隍庙之玃衡坛，地虽稍窄，而铺陈亦极精雅。他若中兴观、神霄雷院、金龙阁，及东园之机神庙、中城之日新庙亦楚楚可观，均于上月晦日熏坛。旬日之中，红男绿女结队来游者，真不可胜数也。”^[1]文中称有“十余处”，与前面所称“三百余处”估计是统计口径不一。按后文，十余处当指道观数而言，而前面所称“三百余处”是指庙中所设的坛数。所设坛之官观以“吴山之太岁殿宝敬坛为第一”，而其他“城隍庙之玃衡坛”，“中兴观、神霄雷院、金龙阁及东园之机神庙、中城之日新庙”则亦为信众聚集之处。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虽然历史短暂，但也有多方面的意义。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杭州。首先，民国时期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是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道教在全省道教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次，杭州道教的动态对全省具有示范性的影响。例如，杭州道教会建立后，对全省道教影响很大，在它的带动下，平阳、乐清、东阳、嘉兴、海宁等县道教会纷纷建立起来，以李理山为理

[1] 《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七（1895年10月24日）。

事长的杭州市道教会发起组建了浙江省全真道教会。再次，玉皇山福星观方丈李理山到上海建立了福星观上海分院，以它为基础，发起组建了上海市道教会，并与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合作，积极筹建中华全国道教会并做了很多工作，无奈因时局变化而无果。最后，杭州在民国时期虽然不是首都，但由于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浙江一系官员在民国军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杭州距离首都南京较近，所以，杭州在民国时期城市中的地位很重要，很多对道教有兴趣的社会名流到杭州都会参访道教宫观，如蒋经国曾到玉皇山福星观拜访过方丈李理山并与他有合影。杭州道教在民国时期全国道教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很多道教界的名流都到过杭州，例如张天师曾多次到杭州参访或从事法务活动。

民国杭州道教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杭州道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它保存了一批道教的宫观寺庙，如玉皇山福星观、抱朴道院、黄龙洞等。这使得道教在建国初能有一定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能迅速恢复，如抱朴道院在80年代初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开放的21所道教重点宫观之一。其次，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会为建国初杭州市道教协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50年2月建立的杭州市道教协会筹备组的领导班子基本上就是民国时期杭州市道教会的班底，如过去的理事长李理山继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过去的常务理事沈友村、陆颂芬任副主任委员。再次，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杭州道教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例如，1985年建立的杭州市道教协会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道士并加入了道教会。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对新中国建立后的道教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杭州。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全国道教也是有影响的。例如，陈撄宁在民国时期曾经居住于杭州研究道教，与杭州乃至浙江道教有紧密的多方面联系，新中国建立后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旋即参与筹建中国道教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闵智亭曾在民国时期担任玉皇山福星观知客，是杭州道教会会员，后来离开杭州，1992年起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98年至2010年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学学院院长、中国宗教与和平委员

会副主席等职。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对当今杭州的经济文化建设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表现在：其一，杭州以古代道观命名的地名至少有数十处之多，至今存在与还在使用的道教地名还有十多处。如龙翔路、龙翔桥、龙翔里都因南宋龙翔宫在此而得名，开元路因开元观而得名，佑圣观路因佑圣观而得名。此外，万寿亭街、助圣庙巷、直仙坛巷、城隍牌楼巷等也都是以当年所在的道观来命名的。所以，不研究杭州道教历史，就无法理解这些地名。其二，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杭州传统文化的内涵，提升杭州的文化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儒、佛、道三部分，我们要把杭州建设为生活品质之城并保持其作为浙江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缺乏对杭州道教的研究和认识，那显然将是一个重大缺憾。其三，杭州目前正打造休闲之都，道教的养生理论和种种实践方法正是休闲的重要内容，而且抱朴道院、玉皇山福星观等道院正好地处旅游景区。正如拙作《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1]等文章指出，道教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丰富、提升旅游的形式与内容，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对杭州道教的研究，必定能作为杭州旅游发展的部分文化背景和理论指导，对杭州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四，道教的香会、庙会 是杭州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民国时期香会、庙会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使得香会、庙会在今天的发展，能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发展商业贸易、休闲旅游，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发展文化产业，传承传统文化，产生健全的积极作用。^[2]其五，研究民国杭州道教，可以充分地认识道教，为杭州进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基础。

[1] 孔令宏：《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 孔令宏：《区域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其产业化发展》，《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26—32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一、图书文献

1. [清]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稿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六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2.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手抄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七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3. [清]龚嘉倬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国11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九九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4. 《城北天后宫志》，《藏外道书》本。
5.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 《杭州史地丛书》，杭州图书馆1985年影印版。
7. [俄]顾彼得著，和晓丹译：《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宋]吴自牧：《梦粱录》，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 《杭州玉皇山志》，《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10. 《内政年鉴》编委会编：《内政年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1. 曹本冶、徐宏图：《杭州抱朴道院道教音乐》，（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

12.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 范恩君：《道教神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14.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
15. 刘延刚：《陈撄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巴蜀书社2006年版。
16.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7. 卿希泰：《中国道教》，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18.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 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9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
21.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2. 王松泉：《民国杭州藏书家》，收入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杭垣旧事》，杭州市政协2001年印行。
23. 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5. 庄严居士编：《道统源流》，民铎报社、古梅花观、各支分坛1929年印行。
26. 《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2年版。
27. 连晓鸣主编：《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 林正秋：《杭州道教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29. 闵智亭：《道教仪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30. 许圣元：《洞霄宫》，内部资料，2002年印行。

31. 马时雍主编：《杭州的寺院教堂》，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二、论文文献

1. 陈明华：《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 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收入《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1936年印行。
3. 刘长东：《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 马叙伦：《朱天庙》，收入《石屋余沈》，上海书店1984年版。
5. 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收入《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王巨安：《杭州旧书业三杰考》，《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7年第3期（总第111期）。
7. 郁达夫：《玉皇山》，收入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8. 张兴发：《仙踪渺黄鹤 人事忆白莲——记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大师》，《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
9. 段玉明：《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载连晓鸣主编：《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三、学位论文

1. 赵士林指导，马莉著：《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2. 孔令宏指导，赵明娟著：《20世纪上半叶浙江道教史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 田海林指导，徐敏著：《中国近代道教文化论略》，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4. 周秋光指导，程杨著：《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

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四、报纸文献

1. 《当代日报》。
2. 《申报》。

五、档 案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道教相关档案。
2. 浙江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道教相关档案。
3.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藏李理山档案。
4.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时期道教相关档案。

附录

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

林用中 章松寿

序 言

钟敬文

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几位青年学者，做了一件惊人的学术事情，那就是顾颉刚、孙伏园、容希白、容元胎、庄严诸先生底妙峰山香会调查。妙峰山底香会，是北方一个巨大的民众宗教活动。那参加人数底众多、团体组织底严密，以及宗教的、艺术的种种行为底表现，都是值得各方专门学者注意的事。但是它一向被冷落着。这种巨大的民众底活动，除了受鄙薄之外，恐怕不曾更牵动过读书人们底心。可是，时代毕竟到来了。这几位书呆子，竟假充了朝山的香客，深入圣地去了。他们用科学的智慧之光，给我们显示了那一角被黑暗蒙着的民众底行动和心理。自然，严格说，他们底工作，还没有做到最理想的境地。但是，我们谁能够否认它是件破天荒的工作，而且是件启发伟大的未来的工作！

近年来，民俗材料底搜集和研究，渐渐旺盛了。和应有的高兴同时，我们不免稍感到些缺陷，那就是实地调查的作业似乎太少些。民俗学底工作——第一步搜集材料的工作，是田野的（用某学者底话说，它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古生物的”）。仅向古文献中或个人记忆中去搜求材料，那结果，容易使我们底研究，限于狭道或甚至于走入曲径。只有更广泛更精密地去从事田野工作——脚踏实地观察、调查，乃至体味，这才是最有希望的康庄大道。但是，同时，我们也晓得这是一件怎样艰苦的工作。

杭州城外底老东岳，是江浙一带民众信仰底一个中心。它底秋季香会，是比妙峰山香会更强大更复杂的一个宗教活动。参加人数不下十万，会期延续至两星期以上。我们不必好奇地去过问那些“审疯子”、“发饷银”一类的特别行事，它底一般的活动情况，就够使我们睁大眼睛，屏绝思虑去注视。假如我们想理解民众底迫切的希求、民众底处事的热情，以至于他们底组织能力、艺术表现等，这是一个最美满的机会——此外，实在恐怕没有更好的。

关于这个香会调查底工作，记得顾颉刚、姜子匡两先生先后都曾尝试过。但因为时间匆促或别的缘故吧，似乎都没较详尽的记录报告我们。今年这个香会举行的时候，我刚巧正从远地回到杭州来，听说林、章二君在做调查的工作，我非常高兴。自己因为住在附近的缘故，也亲自去观察了两回。惭愧，我没有用笔墨记下当时所看到的情形，但那民众汇聚的圣地，它所给予我的种种印象，是深刻地保存着的。我怎能忘记那种充满着虔敬的、感激的神圣气氛？——虽然我们是不希望这种神圣气氛再延长下去了。

林、章二君，把他们调查所得的结果，做成这个报告书。它对于庙宇底历史及现状，香会底时期、行事及组织，香客底行动、生活及消费等，都有清晰的叙述。固然它或者还尽有可以补充的地方，但是像这样有价值的民众宗教活动底调查记录，恐怕是妙峰山以后底第一回成绩呢。我们一面固希望此后能够有更精密的报告出现，但是，在眼前，对于这个作业，已禁不住应有的欢跃了。

对于民众教育家们，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同样，对民俗学者、宗教学者、社会学者，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研究资料。

为了学问和事功，谁能够更深入地继续这种工作前进的呢——我睁着眼在期望！

写在前面

老东岳香火的兴旺，在秋季的西湖香汛中，是数一数二的。从废历六月三十日起，一直到七月十五日为止，这半个多月里，忙碌在杭徽路上企望免灾得福的善男信女，人数不下十万。像这样盛大集会，事态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一般人往往用“迷信”两字，把他认为不足道的偶像崇拜，轻率地丢开了，很少有人去注意和考察，作为研究民俗、宗教、社会、心理等学问的资料。可是在我们民教工作者看来，以为这是深入民间、了解民众心理、调查社会实际情形的好机会。本校陈校长对此深为重视，他曾经亲自去考察过几回，兴趣极浓厚。8月20日的下午，他对我们谈起这事，大家都觉得有意义。于是决定派专人去调查，我和章松寿先生，便是被派的两个。但是，我们对此虽有兴趣，做这种调查工作却是破题儿第一次。所以心里很恐慌，恐慌这个工作做不到好处。可是为了事业及职务的关系，不容推辞，同时想到胡适之说的“自古成功在尝试”这句话，更鼓舞了我们的勇气。于是相互商量了一番，准备了一些工作和参考材料，21日的上午在留下乘了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不到一刻钟，那送往迎来的汽车，已经把我们送到了老东岳。踏进山门第一遭的我们，挤在摩肩接踵的大众里面，把老东岳的形形色色，粗粗的观察一下，便开始调查的工作。第二天的上午，拿了陈校长的名片，去拜访当地的小学校长、乡长、保长，以及公安机关，向他们请教及探寻，并且随时随地和各班户的香客、庙内的道士、测字先生等，随便攀谈，希望在这些谈话中直接间接的探得一些事实，多明了一点庙会情形和当地社会状况，来充实我们的见闻。同时在静的方面，注意各处的布告、会启、石碑，以期有所印证。我们从庙会开始的第六天（废历七月初五日）起，到庙会结束之日止（七月十五日），前前后后，虽一共去了六次，但调查到的仅是一些大概的情形，更谈不到有何贡献。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作为这次调查的报告。其中难免有记载失实的地方，希望高明的学者和洞悉老东岳庙会详情的先生们予以指正！

老东岳庙的历史

杭县的东岳庙，共有三处，一在城里吴山，一在城外八盘山，一在法华山下，就是现在的老东岳。一般人心的趋向和香火的兴旺，要算这里第一。这庙宇创建的开始，是在宋朝嘉定十七年九月（宋宁宗末年，岁次甲申），工程的完毕，已是宋朝宝庆三年三月（宋理宗三年，岁次丁亥）。经过将近三年的时间，费了三十万大钱，于是在法华山下有非常盛肃的威仪和壮丽的佛堂出现。到明朝嘉靖四十四年冬天，中经一度的改建，庙貌又显露了新的姿态。万历时候，湖墅秦懋观方伯，添建了大中宫，庙宇的规模，从此更其加大。清康熙二十九年，这庙遭受火灾。乾隆初年，蛟水暴发，庙也遭殃。

嘉庆十四年，四所盐商和大中宫在宫人役，再集款改建。道光九年，又被大火烧掉。咸丰十年和十一年两遭兵燹，仅剩留下神像和殿庭。光绪元年八月十七日，秋录香会，因冥钱盈积，戏台着火，波及殿宇廊庑，幸亏庙祝救护得力，神像还得仅存。光绪二年，重行建造。到民国十五年，再重修嘉宁宝殿，香火的兴旺，不减当年。回顾这庙从宋到今，已有七百多年，经宋元明清四朝水火兵燹的灾祸，每次毁了再造，到如今人民奉祀不衰，这里面所潜存着的意义，委实值得我们去探讨。

参考资料

- ①《西溪梵隐志》卷一，《东岳行宫庙碑记》。
- ②嘉靖乙丑年重建法华山东岳行宫碑（在庙内）。
- ③法华山大中宫重建嘉宁宝殿碑记（在庙内）。
- ④光绪二年重修嘉宁宝殿碑。
- ⑤民国十五年重修嘉宁宅殿碑。

老东岳庙殿宇略图及神像一瞥

东岳行宫，有房屋大小一百多间，殿宇分配，略如下图。主要神祇是东岳大帝。和东岳并驾齐驱的是五岳大帝（因东岳为五岳之一），其次是东岳大帝的太后、太子、驸马和地藏、观音、关帝、三官、地母、五路财神、伽蓝、判官等。总计庙内偶像，大小三百有余。东岳大帝衣冠齐整，状貌尊严，栩栩如生，看去使人肃然起敬。

附七十六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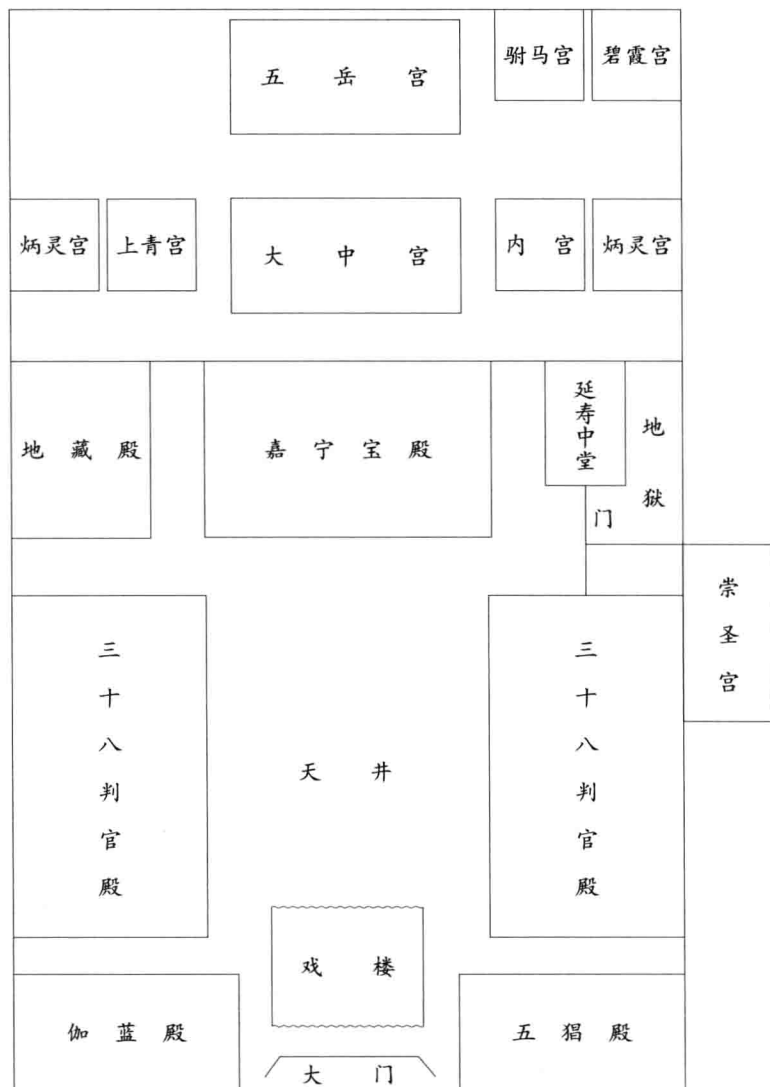
土神案殿	见报案王	本市香火案郑	孝顺案吴	速报案包
财宝案汪	婚姻案徐	受生案余	冤仇案白	王道案史
嫉妒案凌	温生案余	善簿案薛	财源案青	胎生案郝
劫灾案吴	索命案邹	触犯案程	杀命案萧	注死案高
雷雹案尤	魍魉案赖	堕胎案戴	忤逆案董	欺昧案戴
功德案牟	对证案周	善生案田	看经案余	水陆南北
贼盗案贺	水府案曹	都城案张	宿业案刘	子孙孩童
孤鬼案干	斋戒案梁	僧道案杨	生死案张	

（以上是上青宫万善会二、四、六柱敬立。甲戌孟夏吉立在嘉宁宝殿西边廊庑内。）

修造案郭	推勘案梁	签押案崔	官职案马	掠剥案李
箩昧案康	都察案袁	关神案萧	土地案王	恶簿案郭
贵贱案张	听事案雷	忠孝案梁	瘟疫案牛	放生案宋
卵生案牟	救生案袁	化生案郁	三教案马	三星案王
鬼神案赵	平筹案宋	恶死案处	增福案昌	刑狱案吕
词讼案李	子孙案睦	保生案安	走兽案耿	催生案卫
孤独案孔	长寿案闻	解冤释结	还魂案贾	风雨案李
福寿案陈	招证案成	还愿案徐		

（以上在嘉宁宝殿东边廊庑内。）

附东岳行宫殿宇略图



老东岳庙产及主持人情形

老东岳的房屋，都由各“班户”（香客的组织名称）醵资兴建，所以房产属于各班户，修建也归各班户负责。但因地产是郑氏宗业，因

此郑姓子弟，都环庙居住，子孙繁衍得渐渐地多了，于是形成老东岳市镇，他们是列于土著的地位。这庙也因此归郑姓管理，道士都是郑家各房子孙。平时便服居家，和常人一样。一到春秋香汛时节，便道装入庙，从事庙内布置、管理、放焰口、做道场、诵经等工作。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同时也是他们收入最丰的时候。据说他们一年的生计，都靠这过活。一到香会完毕，仅雇二三人看守庙宇而已。和尚、尼姑和游方僧，好像是向来没有的。

老东岳庙的传说及灵异

（一）传说

相传在老东岳未建以前，法华山下，有破庙一座，非常简陋。有位道人在那里作息过活，时常仰屋慨叹，想把庙貌刷新。一天，梦中瞧见神道，嘱咐他在某月日动工建造庙宇。醒来时，觉得非常奇异，自忖不但地方上没有这力量，就是赶紧募化，也非短时期内所能办到，只好姑且听它罢了。不料到某天，建庙的木材、砖瓦等物，源源运到，说是这庙里的道人募化所得。道人自己不知这事情的究竟，认为有神帮助，就主持其事，把庙建筑成功了。

（二）灵异

“明嘉靖乙丑年三月，朗瑛往东岳行宫游谒，见宋碑露于地下。召庙祝郑仕成语曰，石久风雨，坏无日矣，即蔽护之可也。明日适当会期，轰然碑碎，众方惊骇。祝曰，昨郎丈固已言之矣，是何验之速耶？时共以为异。一人曰，是神欲显灵而更新之也。一人曰，园前郎丈，秉文事者也，神岂有意哉！又明日祝来言其故，乞文彰之。予以前言偶中耳，夫何能文？祝又乞曰，碑之碎也，不伤人，神实司之。先生以无靳于言，以昭灵异……于是，述其颠末，命孙男廷玉买石镌之。”（见嘉靖乙丑年重建东岳行宫碑）

每年香会时期及特别行事

（一）香会时期

老东岳庙会，始于何年何月，殊难考证。惟根据兴建这庙的沿革，和重建法华山东岳行宫碑所载，有“……祈寿者往焉，招魂者往焉，追远者往焉……”等语，可云香会与庙俱来。至举行时期，春季自废历二月初一起，至四月初八日止，其中以三月廿八日香火最盛，香客最多。因是日相传为东岳大帝诞辰。秋季从废历六月三十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香火较春季为盛。在杭州西湖秋季香汛中，当以此为巨擘。

（二）特别举动

朝山进香，迎神赛会……几乎为一般人司空见惯，不足称述。惟老东岳庙情形，有几件较特殊举动，为他地所罕有，或不易见到者。爰列举如次，以供参考。

1. 审疯癫

东岳大帝的头衔，据庙内布告所载：“总理阴阳权衡社稷泰山青府中界至尊东岳大齐大王仁元圣帝慈光救苦感自在天尊”。他的使命为“提勘天下一切犯罪男女，昭明一切善恶，分别判罚”。疯癫的人，是被认为身上附有鬼魂的。每年到了大帝秋审的时候，便有审疯癫之举。到国体更新之后，始被官厅禁止（一说自北伐以后禁止）。那情形是这样的：

到了审疯癫的时候，把疯子先拖到地狱里，事前早化装好的，“一见生财”的白无常，哭脸流红的黑无常，摇折纸扇的大头鬼，执短烟管的小头鬼，鼻孔流火的判官，拿铁链勾魂的使者，以及牛头马面的夜差等，都一齐跟疯子进地狱，在地狱里面，大家席地而坐。于是把高粱、鸦片、鸡鸭、鱼肉大吃而特吃。这时候，地狱已经贴上大帝的封条，封锁了起来。里面仅点一盏菜油灯，照着各人可怕的鬼脸。等到吃光以后，疯子由家人伴着，躺在地上，旁置一草人。到了三更天的时候，狱门外砰砰三声，接着便冲进一阵烟火，那松香与硫磺的气味充满了整个地狱。这时，响起元郎郎的钢叉铁链声，尖锐的鬼叫声。疯癫在这现象下，被拖出来。于是那些化装的大小鬼怪，纷纷自狱中跟出。疯癫后面系一草人，算是受审者灵魂代表来要受痛苦。阴差手中的铁链钢叉，只

是向草人身上打去。疯子因在未出狱之前，已被众鬼卒用雄黄酒喷得满头满面，不会有所发作，他被拖到大帝案前，大帝坐在龙头案上，两面点起了半明不灭的红绿色风灯，照到那些做扮的鬼卒身上，胆小的看众，吓得毛发悚然，不敢正视。审疯子的时候，好像现在的游戏场唱双簧一样，大帝背后一人，疯子背后一人，一问一答，都由人嘴传达。问到疯子，都是前世冤家，今世报复，这一套话。大帝如法官一样，先行调解，然后提出条件，该要钱的给钱，什么银锭百万，弥陀经几藏，忏几堂，焰口几堂等。审完以后，全班假鬼还大调无常，疯子大游十殿。到了此时，箫管钟鼓齐鸣，由判官张伞前导舞蹈一阵，以度游魂。大帝抬回崇圣宫内，审疯癫一幕，就称完结。

2. 送牌位

各班户的香客，人死了以后，都要把牌位送到庙里，或各公所里来，供在里面。同时要放焰口，投文事。详细情形，见香客的行动一节，兹不赘述。

此外迎神赛会在过去也是举行的。北伐以后始行停止。

3. 大帝朝审

香烟迷漫，纸灰飞扬，把香客游人熏得头昏眼花，含泪盈眶。善男信女，口念弥陀，此往彼来，挤到水泄不通。东西廊庑之间，孝子哭魂之声，洋洋盈耳，使人心酸。这是老东岳白天的现象。一到晚上，香客稀少，大殿之上，两楹之间，只有坐夜的善男信女，看热闹的人们，和诵经拜忏的道士，以及大帝案前，轮到值堂的各班员役。大有“毕竟东岳行官中，风光昼夜两不同”之慨。等到大帝朝审的公案布置就绪，更鼓初起，殿上击鼓撞钟，管箫齐奏，顿时呈现着一番肃穆气象。这时全庙的人，都在静默着。公案之前的东皂西皂，念四人身着青衣，腰束红带，手提灯笼，左右分列。殿上击鼓撞钟三次以后，东岳大帝，从崇圣宫内抬出。殿上撞钟击鼓笙箫迭奏，热闹非凡。不多时，帐幕启处，大帝端坐堂中，身御龙袍，足登皂鞋，头戴皇冕，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两旁执事员役，个个屹然恭立，依次焚香礼拜，开始朝审。秩序如下：

(1) 案总书参谒。朝审开始，大帝案前官吏员役，代表发号施

令。第一道号令是令案总书参谒。仪式是，由传令人将令旗送达案总书。案总书奉令后，由殿下拾级而上，东西皂齐声喝彩“啊……”，叫得震天价响，案总书在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报告一番后退下。领取钥匙启开午门。

(2) 禀事。这是第二道命令。由各科、房、厅代表人，手捧朝笏，一一趋前跪禀。

(3) 公出。此时大帝身前幕闭，庭前挂出公出牌子。案前东西皂一齐跪下，齐声喊大帝公出。另由一人头顶香炉，一人手捧日月纸匣，到天井内跪下，俯首祝告，说是大帝祝告上苍。

(4) 拜衙。大帝公出返驾以后，幕复揭开，传令东西皂站堂，排成一字形。24人恭立案前，服装如前。每人手持木棍。拜衙令下，东西皂一齐赴两廊内巡视，一连三次，宣告完毕。

(5) 签押。由案内拿出印就的封条一纸，上面有“泰山青府七月十五日午门封”12字，签押令下，一人接了封条，在大帝前跪下，用朱笔在封条上签了一个押，就算完结。

(6) 朝参。第一节，是大帝最威武的时候，凡是上下四方的神祇都要到大帝案前朝见，如同从前皇帝时代的文武百官上朝一样。举行时由两个代表人一来一往的交互朝见。同时每一次都有红纸印就的章帖呈上。此举费时很久，案上章帖盈尺，在朝审一幕中是最隆重的一段。

(7) 听审。朝审既竣，殿上幕闭，大帝在幕后更衣。此时有一人，替大帝把外面的龙袍皇冕脱去。移时幕门启处，大帝又是一番气象了。据说，听审，就是审疯子。从前是年年举行的，革命以后，官厅禁止，迄今不审。秩序中虽然有这一幕，并不实行。

(8) 发饷。东岳大帝辖有18省，秋季香汛，为大帝秋审时期，所以在那布告上说：“接奉大帝钧旨，前着部堂，预算冥饷，按省拨解，以济幽魂，而循正例。”是以自六月三十日起，把香客解缴库房的冥锭，在每天晚上听审完毕时，发给中国18省。此举是奉到饷令后，由一人代表一省，趋案前领饷。发饷人将事前印刷好的饷票，填上冥饷杠数省名月日，加上大帝印，交给领饷人。各省发完，朝审一幕便算告成。可是已用了一夜的工夫了。

东岳庙速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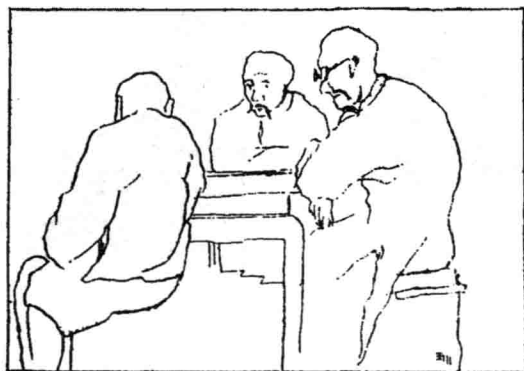
牛头



马面



谈经



东岳庙速写之二

老道



小憩



默念



庙会的办公机关

东岳大帝案下的办公机关，组织很大。系统方面，有科、房、厅、班四级，仿照明清时代的衙门制度。在科的方面，分为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等六科。六科之外，又有吏总科、户总科、兵总科、工总科、知印科、总六科等名称。在厅的方面，有先锋厅、禀事厅、中军厅、巡捕厅、旗牌厅、传宣厅等。在房的方面，有库房、稿房、案总房、校卫房、侍卫房、提刑房、宝藏房、签押房等。在班的方面，名目繁多共有七八十班。兹略举如下：

掌录判书	副书	头班官解	二班官解	中镇
侍卫	校卫	校尉	内家将	内监
内皂	内丁	内家兵	巡捕	銮舆卫
御前家将	护驾八将	文武中军	东承差	炮手
武艺	火牌	旗牌	御林军	新头快
黑二快	东河二快	仓头快	头皂	二皂
头健	二健	禁役	炉塘驾役	娑婆驾役
大班驾役	刽役	法夜役	黑桥夜役	东书役
西书役	吏典	东典膳	西典膳	坝手牢
敕玺	卸衣卫	传宣	午门总	上书房
承发中班	典乐府	西舍人	文武执判	提牢房
掌宫内监	官解差	军牢班	钺头皂	老大班
老二快	东承差	挂号房	大内传宣	碧霞传宣
承发房				

在科厅房办事的头目，大都是本山住户，各有办事场所。每房门首，挂有匾额或吊牌。标明所掌职司。至各班员役人等，大都是远近香客，在大帝前许下了愿，领了投文状，充当执事，为大帝服务。各科厅房办事人，也算为神服役，实际上也是为了生活。只有那些各班的员役，真是为神服役，每年都要来。他们的愿望，是在为来生着想。

庙会的办事日期

庙会的办公机关的组织，略如上述。至于他们秋季香汛的办公日期，也有一定。每年是从夏历六月三十日起（小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每天取一个字号做代表。各号的办事人员，是由各科厅班轮流职掌，毫不相混。每天香客的多少不一，各科房厅的收入也因之而异。据说，各号香客多少，全赖执事人拉拢香头的本领如何。兹把代日字号，列举如下：

月日	代日字号	月日	代日字号	月日	代日字号	月日	代日字号	备注
六月卅日	亭号	七月初四	正坤号	七月初八	古利号	七月十二	老福号	
七月初一	长号	七月初五	天号	七月初九	春号	七月十三	空号	又称古坤号
七月初二	贞号	七月初六	岳坟泰号	七月初十	首号	七月十四	新福号	
七月初三	元号	七月初七	红门泰号	七月十一	老坤号	七月十五	宪号	又称乾海号

在此十六日中，过去以“宪号”这天香客最多，也是收入最旺之一日。到现在，情形一变，元号、正坤号这两天香客最多。其次为天号、岳坟泰号、红门泰号、老坤号这四天。其余各号，均属平平，到了宪号香客很少，与前恰相反了。

香会的组织

老东岳的香火，在杭州秋季的香汛中，要算最盛的地方。一群一群的善男信女，自远近而来，余杭公路中，香客络绎。他们为同伴各种方便起见，有各种香会的组织。所以虽是道路怎样的远，而去的却不至于感受到怎样的困难。因为他们在动身之前，已由香头，把各种职务分配妥当，其余的香客只要配了几元，就可以不要麻烦。尤其是到老东岳来的香客，大多数是各班户中的一员，郑氏的各房就是他们固定的行台。据说，在从前香客都只称某某班，民国以来，那些旧名称不大沿用，而

有下列的各种新组织。但是与各班户各号的关系，仍是一贯的。兹将最近的香会名称，略举如下：

1. 重善集茶会 2. 崇圣宫茶会 3. 救济会 4. 仙林老会 5. 二山门长生集茶会 6. 新凉亭茶会 7. 维善会 8. 红门老会 9. 箔业茶会 10. 古荡茶会 11. 普利会 12. 大中宫茶会 13. 万善会 14. 善济会

这些茶会，他们除谋进香时期各香客们的便利外，同时兼顾到别人的方便，所以在道中设立茶棚，招呼其他香客进内喝茶、吃粥、吃馒头、歇夜，尽一点“结缘”的诚意。

香会的行动

到老东岳来的香客，其行动不仅是进香，还有送牌位、投文、解缴冥饷和许愿还愿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兹把彰明较著的几点列述如下：

（一）进香

进香人的目的，据道士说，七分求福，三分免灾。在大帝面前发了善心，希望神的保佑。一般人常讥为愚妇愚夫的迷信，妄费钱财。其实烧香者的心理，在大帝面前烧了一炷清香，抱着求福消灾的希望很大。他的消费支出，是自愿的，值得的。虽欲禁止，又安可能呢？

（二）投文

一般香客，怕死后无路可走，所以预先在东岳大帝之前许了愿，投了文，以便身后可在大帝案下充当一个役吏。兹将投文状的内容列下：

立投状人某某今具到

大帝案下，切身某年某岁某月某日生，某省某县人，现居某某社下，今情愿投充案下，某某自充之后，生前惠办公益，故后随班听用，不敢在外滋事，致干法律，合具投文状是实。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具投文状人○○○押

阳 保○○○押

阴 保○○○押

此外有冥凭执照各一纸。据说有了冥凭，将来在黄泉路上可以通行无阻，那冥凭上说：“……本岳仰体上天好生之德，证明善恶之因。如有善德男女，愿皈三宝，求免罪愆者，许掌案之员，考其从善实行，准给冥凭一道。于谢太阴之日，执引而行，凡过关津渡口，以及冥府各衙官吏验明即刻放行，不得稽留……”有了执照身后可在大帝案下充当员役。那执照上说：“为给凭验事。照得本岳职司生化，统理阴阳，普天之下，莫不瞻依。今据舍身投充员役验看分明，准充入册……准充之后，每逢至期赴殿随从照职，洗心办事，不得阳奉阴违……”这几件文件，用黄纸发封。投文取得后，保存家中。至人死之后，先将冥凭在床前焚化。执照及投文状，于送牌位入庙后，在大帝前焚化。这印刷文件，每人出了1元2角5分的代价，才可以领到。

（三）送牌位

凡是生前在东岳庙各班户投过文的人，或是在各班号之下，充任员役的人，身后他的子孙都要把他的牌位，在秋香时期，送到庙里去，或各班户的公堂里去。那仪式是，孝子及家属，穿孝服，捧牌位，提引魂灯，捎接引西方的纸竹幡、香烛冥锭。到了老东岳的头山门时，停止前进，跪在地上，哭了一场。由山门口的道士接了死者的投文状，他读过了一遍，好像在头山门神像面前报到一样。然后领导这一家孝子，向二山门进发。到了二山门，孝子们仍须跪哭，道士捧读投文状如前。于是引往庙内大中宫内宫、上青宫等处。此时道士如同解罪犯一样，孝子们悉听他指挥。到了将投文状在大帝前焚化时，孝子们哀哭逾前。道士们吩咐停止哀哭后，哀容收起，孝衣齐卸，送牌位的一幕，便告成了。据送牌位者面告，此事须费十余元。其用途是引进山门的道士一元，寄托牌位三四元，放焰口四五元，为数虽不算大，已非贫困人家可办云。

香客的生活情形

杭州香汛，除带有旅行性质的春香外，就要算老东岳的秋香了。年年自废历六月三十日起至七月半止，不但浙省各县的人前来进香，

即上海、苏州、松江以及广东等地方，都有香客赶来，他们的行动，已经略如前述。而他们的生活情形，我们也得知道一下，兹分衣食住行四点来说：

（一）衣

远道的香客及城市的香客，服装比较华丽，近郊的香客及乡村的香客，服装比较朴素。他们在入庙烧香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表示着上庙见菩萨，不可以亵渎神明的样子。尤其是一般老太婆，个个穿裙（按：裙为从前女人礼服），与家居时候不同。就是一般农民，向来是扣钮不大扣，裤脚常卷起，热来打赤膊的，但在这万头攒动，烟火弥漫，温度增高的庙里，大家都穿得整齐、干净，表示着文质彬彬的样子，比平时好得多了。

（二）食

秋香开始，老东岳的面饭馆，临时增加十余家。可是照顾这些面饭馆生意的人，大多数是游客、小商人、黄包车夫等，其次是极少数“烧散香”的香客。那些成群结队有班户的香客，是过门不入的。因为他们各有各的香会，各有各的班户，关于饮食问题，早已有人在那里准备着。他们此时仿佛过着大家庭的生活，许多人食同桌，居同房。菜肴方面，每桌有五六碗，比在家里吃得好。从前香客们完全吃荤，到了民国十六年，有公民潘炳南呈请杭州市公安局禁止荤食，一律吃素。查头山门石碑上的布告有“……当此炎热暑，疾病滋多发生……东岳香客，向系食荤，所有鱼鲜肉食，由城市购办上山，一经太阳蒸晒，已形腐臭。蚊蝇聚集，传染堪虞。……荤食杀生尤非所宜。嗣后香客上山，一律改为素食，永远以此为例。如违拘禁不贷……”等语，所以现在各班户香客，一律素食。

（三）住

老东岳虽然是一个小镇，店铺也不少，可是并没有安寓客人的客栈。而每天男男女女几千的香客，他们住宿的安排，很值得注意。据调查结果，事实是这样的。各班户各茶会他们朝山进香的日期，是不同的，16天的香期，分成16个字号，每一字号有多少香客，管多少班户，

他们事前是布置好的。到了进香时期，招待香客的各房，都准备好了。至各处香客，各班各会都有香头，负接洽住食等问题，彼此规定进香的日子，届期是风雨无阻。万一香客不来，香头都要赶来的。大家遵守了这个规矩，各事都井然有序，毫无手忙脚乱的现象。因此香客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有的香客，他们班户里富裕，在此地造了不少房屋，做香会的办公所和宿舍，平时则租给人家居住。关于招待香客的人家，在从前只有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老四房等，都是郑姓。现在郑氏子孙生齿日繁，已分为52房来招待香客了。各房名称如下：

庆云房	吉祥房	老四房明德	增荣二房
景云房	增寿房	东海房析	东海房（道）
长寿房	恒风房	明德大房	品高房
天保房	延寿房（瑞）	同盛大房（斋记）	龄风房
与福房（佐）	德庆房（震记）	嘉鹏大房	老三房益
心安房	兴福房（佐）	天喜大房	瑞芝大房
增福房	延龄房（三房）	德风房（庭记）	如意房
寿高四房	嘉鹤大房	老四房（锡珍）	云仙大房
延寿房	云海房	福寿房（宣）	云中大房
永庆大房	明忠四房	仁风房	龙泉四房
福寿房（聪）	吉庆四房	德风房（庭记）	资福大房
同盛大房（斋记）	长庆房	云海房	三房胜标
长庆房	三官殿房		

（四）行

自杭州到余杭这条马路开辟以后，香客们的来往便利，十百倍于从前。到进香时期，每天人力车数近千辆，公共汽车，加开老东岳专车。香客之“行”今非昔比。庙在山下，街道平整，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费力。所以用轿代步，可说绝无仅有。而坐轿到老东岳进香的，亦不易见，这是受车辆影响的缘故。

香客的消费和当地民众的利益

我们从将近10万的香客中，深深的体察到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这时候，做几天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香支出的一笔开支，他们均曾事前估计，差不多在预算之列的。同时供应香客需要的商业，和靠庙过活的一般当地居民，香期一到，正是他们秋收丰登、生财有道的黄金时代。这季的香客，据当地人说，最多的时候，每天有六千，最少的时候有两千多。半个月来总计不下10万人。每人的川资膳宿香烛等消费，平均每人以3元计，便要消费30万元之谱。就庙内的收入说，平均每天可收残烛十余石，锡箔灰四五百斤。至道士们的放焰口、做道场等收入，虽难以调查清楚，然相信为数亦不少。各班户的投文，每人收1元2角5分。假定每天有200多人投文，则16天便有3000多人，可收入3700余元。再加临时商场的增加，交通机关的进益，直接间接影响于社会经济、人民生计者，至深且大。据调查所得老东岳第一保居民140余户，并不业农及从事其他职业，一年生计就赖香会方面的收入来维持。香烛锡箔店，此地平日只有四家。在香期中，今年增至26家。由此以推，香客的消费，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关系之切，可以知道了。

感想及志谢

我们知道，庙会调查的工作，很少有人注意到。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出版，也是很少。这个荒芜的园地，正待着有人去开辟。所以我们这次在调查以后，发生下面几点感想：

(1) 具有悠久历史的老东岳庙会，内中情形非常复杂，一两个陌生人去调查，颇难探寻其底蕴。这次调查所及，不过是目前看到的一些情形，极少数人口中听到的一些报告，及碑上、墙上、布告上抄下的一些痕迹，当然不能代表整个的庙会，只能算是一些大概的情形。至于它

的可靠性，究竟有百分之几，在没有经过专家及洞悉庙会底蕴的人校正以前，是很难下断语的。

(2) 我们要想得到一个详尽无遗的老东岳庙会报告，一定要继续努力，随时随地搜集资料，才可完成一本“老东岳”的完全报告书。

(3) 朝山进香，一般人往往以“迷信”二字看待它，至于其在文化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很少有人去注意。可是在研究民俗的学者见解便大不相同，对于这种事实，别具慧眼去考察，认为是民俗学上的好资料。所以民俗学专家钟敬文先生，听到我们去调查老东岳庙会的事情，很高兴的来和我们讨论，并且指示我们调查的要点，很是难得。我们不胜感谢。

(4) 庙会为民间原有组织之一，本校林敬之先生对于民间原有组织富有研究，曾著文在中华教育界发表过。他在我们出发调查庙会之前，指示我们许多途径，并介绍了好几本有关庙会的书，使我们有相当的参考，事后又为我们校正这个报告，叮嘱我们继续搜集资料，以便将来付印。我们受了这种指导、鼓励，非常的感激与兴奋。

(5) 老东岳初小俞国华、黄迪之两先生，以及该乡乡长郑明征，保长郑明济，和留杭县下公安局派出所巡官巡长，在调查时帮助我们，并给予我们许多便利，同事刘焕林先生曾于8月26日陪用中去调查一天，王一心、吴廷玉、施世珍三先生，8月31日晚上，在老东岳嘉宁宝殿，帮同调查大帝朝审的情形，午夜方回，殊为难得。在此一并致谢。

民国25年9月4日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1936年12月出版)